本出版物由北京和平教育基金会资助出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Museum of the War of Chinese People'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责任编辑：唐立馨
文字编辑：张晓杰
封面设计：张　帆

团结无限人生

ISBN 978-7-5126-2834-2
9 787512 628342 >
定价：25.00元

抗战史料研究

2015·第2辑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
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

团结出版社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文收录

抗战史料研究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2015·第2辑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
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



抗战史料研究 2015·第 2 辑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抗战史料研究 2015·第 2 辑（总第八辑）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
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

编委会名单

顾　　问：金冲及　何　理　步　平

主　　编：沈　强

编 委 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新华　史桂芳　刘庭华　李宗远　李学通
李树泉　汤重南　沈　强　李　蓉　罗存康
荣维木　贺新城　唐开文　徐　勇　唐晓辉

特邀编辑：李　鑫　都　斌　程　皓　隆鸿昊　韩小昆

目 录

学术探讨

不忘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神　沈　强－ 1 －
抗战胜利经验的历史考察　刘庭华－ 6 －
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研究　赵秀宁－ 16 －
从华盛顿体系到东亚新秩序——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演进　史桂芳－ 26 －
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制度的起源与变迁　王树林－ 34 －

史料考证

浅谈抗战末期中日“河南会谈”　曾德刚－ 45 －
试论抗战时期第九战区作战方法——以“天炉”战术为中心的研究　隆鸿昊－ 53 －
“风起伶仃”——1937 年“九一四”虎门海战再考察　杨新新－ 65 －
时空视野下重庆大轰炸历史地位的思考　潘　洵－ 75 －
没有制空权的日子：抗战中期中国防空的窘境　袁成毅－ 83 －
近代日本在华长期驻军的谍报优势探析　许金生－ 91 －
试析胶东抗日根据地地方基层行政区划的变动（1938—1945）　杨焕鹏－ 101 －

专题研究

《马关条约》和“乙未之役”双甲子纪念——台湾先烈抗日的历史不容抹杀　王晓波－ 113 －

抗日首义　闽台双杰　李明滨－120－
台籍客家及蕉岭先贤们坚持民族大义五十年来的事迹略述　曾德宜－124－
台湾抗战遗存遗址述略　程　皓－128－

研究综述

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史，应跨越哪些误区？　步　平－137－
第五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都　斌　李　鑫－140－
近十年出版的中文抗战著作评述　吴　涛　李　颖－149－

抗战书评

新视野　新见解　新史料——《中国抗日战争热点难点透视》评介　李　鑫　都　斌－164－

Contents

Academic Researches

Keep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Mind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in This War
Shen Qiang - 1 -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Experiences of Succes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iu Tinghua - 6 -

Study on the New-life Movement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Zhao Xiuning - 16 -

From Washington System to New Order in East Asia: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Expansion Policy
Shi Guifang - 26 -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mmittee System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and the New Fourth Army Wang Shulin - 34 -

Historical Materials Research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Henan Talk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t the End of the War
Ceng Degang - 45 -

Discussion on the Methods of Warfare in the 9th Theater of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A Case Study Centered on the Tactic of "Decoy and Siege" Long Honghao - 53 -

Wind Blowing from the Lingding Sea—Restudy on the "9 · 14" Sea Battle at Humen in 1937
Yang Xinxin - 65 -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ical Role of Chongqing Bombing in Space-time View Pan Xun - 75 -

Days without Air Supremacy: Predicament of China's Air Defense in the Middl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Yuan Chengyi - 83 -

Research on the Japan´s Intelligence Advantage through Long-term Military Garrison by Japan in China in Modern History Xu Jinsheng - 91 -

Analysis on the Changes of Local Basic-leve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 Jiao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1938-1945) Yang Huanpeng - 101 -

Monographic Study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reaty of Shimonoseki" and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Undeniable History of Taiwanese Martyr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ang Xiaobo - 113 -

The First Patriots Rising to Resist Japan´s Invasion and Two Heroes in Fujian and Taiwan Li Mingbin - 120 -

A Brief Account of the Nationalist Deeds of Hakka Taiwanese and Predecessors from Jiaoling County in the Last 50 Years Ceng Deyi - 124 -

A Brief Account of Relics Sit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Taiwan Cheng Hao - 128 -

Research Overview

What Misunderstandings Should be Avoided in Cross-Strait Join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u Ping - 137 -

Overview of the 5th Cross-strait Seminar on the History of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Du Bin Li Xin - 140 -

Review on the Chinese Works on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Published in the Recent 10 Years Wu Tao Li Ying - 149 -

Book Review

New Horizon, New Opinion and New Historical Material—Review on *Perspective on Hot and Difficult Issues in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i Xin Du Bin - 164 -

目 录

学術討論

抗戦の歴史を忘れず、抗戦精神を発揚　沈　强－ １ －

抗日戦争の勝利から得た経験に関する歴史的考察　刘庭华－ ６ －

抗日戦争時期における新生活運動に関する研究　赵秀宁－１６－

ワシントン体制から東アジアの新秩序へ――日本の対外拡張政策の進化について　史桂芳－２６－

八路軍・新四軍の軍政委員会制の起源と変遷　王树林－３４－

史料考証

抗日戦争末期における中日「河南会談」について　曾德刚－４５－

抗日戦争時期第９戦区の戦術について――「天炉」戦術を中心に　隆鸿昊－５３－

「伶仃より風立ちぬ」――1937 年「九一四」虎門海戦の再考察　杨新新－６５－

時空視野による重慶爆撃の歴史的地位の再考　潘　洵－７５－

制空権がなかった日々：抗戦中期窮地に追い詰められた中国の防空　袁成毅－８３－

長期にわたって近代中国に駐屯の日本軍の諜報活動の優位性について　许金生－９１－

胶東抗日根拠地における地方行政区画の変動について（1938−1945）　杨焕鹏－101－

特別研究

『馬関条約』と「乙未戦争」、二つの甲子を経た記念――台湾烈士による抗日の歴史の抹殺を許さない　王暁波－113－
抗日初の義挙 福建と台湾の二人の烈士　李明滨－120－
台湾籍客家人及び蕉岭の先賢による民族の大義を守る50年の歩みの略述　曾徳宜－124－
台湾における抗日戦争の遺物・遺跡に関する略述　程　皓－128－

研究総論

台湾海峡両岸による抗日戦争史共同研究はどのような誤解を乗り越えるべきか?　步　平－137－
第五回海峡両岸抗日戦争史シンポジウム概要　都　斌　李　鑫－140－
ここ10年出版された抗日戦争に関する中国語の作品について　吴　涛　李　颖－149－

抗戦書評

新たな視野、新たな見解、新たな史料――『中国抗日戦争における話題と難点への解析』の書評　李　鑫　都　斌－164－

不忘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神

沈　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创造了弱国打败强国的光辉业绩。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特殊的时刻，重新审视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对于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神圣的全民族抗战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空前团结，共御外侮，抗击日本的侵略。可以说，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全国能够形成这种空前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战局面的基本保证。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率先提出武装抗日的主张。在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便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明确提出联合全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①] 并随后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军进行殊死战斗。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企图将华北五省分离出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在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②]。到1936年，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国共产党适应形势的发展，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③]，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捐弃前嫌，放弃了反蒋的主张，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重要转变。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面对国内复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奔赴西安，全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围剿”，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等六项条件。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若蒋介石能够“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

①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载于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9页。

②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载于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7页。

③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9月1日），载于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①。可见，此时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讨论并实施联蒋抗日的政策。不仅如此，红军中的黄埔将领，也向国民党军中的黄埔同学发出呼吁：“当此民族危亡之生死关头，过去之昔怨嫌隙，均应为民族利益而一概扫除。今后之道路，应为恢复黄埔时代之革命精神，精诚携手，不分彼此，共赴国难”②，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便发出《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③，号召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7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政治主张，并向全国郑重声明：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个宣言，再次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国共两党正式合作抗日的诚意。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全国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不分阶级和党派，不分民族和地域，不分老幼和男女，同舟共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如在毗邻北平南郊的长辛店，工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担任救护工作，还运来铁轨、枕木、麻袋等在城门洞、城墙和桥头修筑防御工事，协助第 29 军固守宛平城；在上海，上海妇女团体开办救护训练班，一个月内训练妇女达 1200 多人，然后分配到各个伤兵医院做护理工作。不仅如此，香港、澳门、台湾同胞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也积极参加抗战，如 1938 年 6 月，宋庆龄领导的、由国内外知名人士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保盟在港澳同胞配合下，广泛联络海外侨胞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人士，从海外华侨和许多国家的援华团体募集到大量捐款、物资，为支援祖国抗战做出了杰出贡献。

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后，面对日本对国民政府采取的诱降方针，以及国民党愈演愈烈的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叛国投敌行为，中国共产党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坚决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④，并对于阎锡山、朱怀冰等顽军制造的反共摩擦，给予坚决回击。在各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等政策，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可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得以建立和坚持下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民党军爱国官兵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在淞沪、太原、徐州、武汉、长沙等会战中顽强抗敌，取得了台儿庄、万家岭等作战的胜利；广大民众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为抗战做出自己的贡献；台湾、香港、澳门同胞以不同的方式参加进来，海外侨胞也积极支援祖国抗战。正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形成了全民族团结抗战、共同御侮的局面，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上主要有四大战场：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和北非战

①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 年 12 月 28 日），载于《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47 页。

②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致国民革命军黄埔同学书》（1936 年 12 月 29 日）。

③ 《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1937 年 7 月 8 日），载于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 277 页。

④ 《反对投降活动》（1939 年 6 月 30 日），载于《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73 页。

场。二战期间，中国率先开辟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制约着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有力地配合与策应了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

1937 年 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展开全国性抗战，在世界东方首先开辟了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总兵力达 400 余万人，战线长达 1800 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十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 160 万平方公里，中国直接或间接卷入战争的人口达 4 亿之多，至 1939 年欧战爆发，中国已独立全面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入侵达 3 年之久。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曾指令德国驻日大使奥托将军，令其说服日本参加对苏作战，但遭到日本军方的反对，时任日军参谋总长的杉山元指出，日本“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北进苏联“实际上办不到”①。1941 年底，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里宾特洛甫再次向日本提出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但再次被日本拒绝，日本大本营统帅部决定，“无论德苏战争如何演变，打消在昭和十六年（1941 年）内解决北方问题的企图”，“按既定方针继续对中国作战”②。中国的抗战不仅遏制了日本的北进计划，而且牵制了日本的南进步伐。欧战爆发后，1940 年，当时的纳粹德国横扫西欧，法国败亡，英国退守孤岛，苏联和美国还没有参战，可以说此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格局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日本南进的最好时机，但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百团大战，历时近 5 个月，毙伤日军 2 万余人，给予华北日军沉重打击。曾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与八路军多次进行交战的寺内寿一大将，在出访德国时明确告知德方：“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③ 可见，中国的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不仅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士气，而且拖住了日本的后腿，使它迟迟不能转入南进，这样就为美英加强太平洋地区的防务，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中国战场不仅制约着日本的“北进”和“南进”，从战略上配合盟军的作战，而且给予盟军切实的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虽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但仍根据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战略需求，毅然派出 10 万远征军，紧急开赴缅甸，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中国为同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如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中共情报人员阎宝航获悉纳粹德国将于 6 月 22 日进攻苏联的消息，毛泽东随即命令将这一重要情报电告共产国际，并通过季米特洛夫转交斯大林；同年底，中国国民党情报人员池步洲破获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此情报由国民党方面告知美方。除此之外，中国军民还对在作战中负伤的盟军飞行员进行救援，至 1945 年春，先后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即达 70 余名，其中包括后来曾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有力地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

在战争期间，中国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从根本上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 1937 年 3 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就提出了中、美、英、苏、法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的主张④。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 1937 年 8 月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政府都建议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成立正式同盟，中共中央在 1941 年 12 月 9 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

①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1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 153 页。

② 同上书，第 162 页。

③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 4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748 页。

④ 同上书，第 753 页。

⑤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 年 8 月 15 日），载于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 317 页。

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① 在中国的推动下，1942 年 1 月 1 日，由中、美、英、苏 4 国领衔 26 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持久抗战，有力地配合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国际上的高度赞誉与评价。英国首相丘吉尔在 1942 年 4 月 18 日给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的电文中写到：“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②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 1945 年 1 月 6 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表示，“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③。苏联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中也表示，“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④。总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虽然距离今天已经整整过去了 70 年，但抗战精神应当永久存在于每个国人的心中。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弘扬抗战精神，勿忘国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

2014 年 7 月 7 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77 周年活动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为了凸显抗战精神，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还例举了抗战时期，华北平原一个庄户人家的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同年 9 月 3 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了抗战精神的内涵：“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可以说，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对于当今时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富强、民主、繁荣的核心力量。抗日战争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次重大考验。抗战初期，在国内一片悲观失败情绪笼罩中，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最后胜利将属于中国的重要论断⑤，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发动人民，通过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多种灵活的作战方法与日军作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据不完全统计，仅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常牵制着 1/3 以上的华北日军和 60%以上的华北伪军，1945 年抗击着近一半的日本侵华总兵力⑥。可见，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夺取了全国政权，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彻底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新中

①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1941 年 12 月 9 日），载于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年版，第 787 页。

② 温斯顿 ·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4 卷，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76 页。

③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 480 页。

④ 崔可夫：《在华使命》，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年版，第 38 页。

⑤ 《论持久战》（1938 年 5 月），载于《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62 页。

⑥ 魏宏运、左志远：《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32 页。

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抗战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百折不挠，从曲折中逐步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才能最终实现独立、富强、民主、繁荣。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实现祖国统一的核心力量。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一场全民族战争。抗战期间，全国各族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阶层，纷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滚滚洪流中，筑起了捍卫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抗战精神，仍然是当今沟通海峡两岸，包括海外华人的一条重要纽带。近年来，两岸的沟通、联系越来越多，各种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为进一步密切两岸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2008 年底，大陆与台湾最终实现了直接通商、通航、通邮，为两岸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积极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国际和平秩序的核心力量。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提倡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主张联合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以尽早恢复世界和平。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在战争期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1945 年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会议最终通过了《联合国宪章》，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了会议，并作为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之一在《宪章》上签了字，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支持并参加了新的国际安全组织的建立，积极努力构建战后和平秩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吸收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在国际交往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准则，在国际上广受承认和欢迎。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维护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定。

不忘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是当代每个国人的神圣使命，正如习近平同志今年 9 月 3 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所言：“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当年，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其后，从解放战争到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又战胜了无数的曲折和困难，而蕴含于其中的伟大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对抗战精神的继承。如今，抗战精神依然充满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作为新时代的主人翁和建设者，我们应当从抗战精神中汲取营养，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勤奋学习，扎实工作，奉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追求之中，不断以新的辉煌成就来告慰抗战英烈和前辈！

（作者沈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

抗战胜利经验的历史考察

刘庭华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一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二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三是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及其作战原则，是弱国战胜强敌的成功战略指导。四是开辟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构成陷敌于两面夹击的战略格局，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独特战略举措。五是与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合作或联盟，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外部重要条件。

关键词：抗战胜利　主要经验

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因外敌入侵而割地、赔款和出让国家主权的屈辱历史；使中华民族空前觉醒和团结，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得到极大弘扬；光复了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失土；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枢纽，并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说明，中国人民能够在“亡国灭种”的危境中开辟民族的新出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是无限的。

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全世界有84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先后参与或被卷入这场大战，军队和民众伤亡总数达1.05亿多人，[①] 财产损失达4万多亿美元。中国抗日战场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毙伤日本陆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中国人民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局部抗战兴起，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前后长达14年之久。它是苏联、美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时间的三倍半，是英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时间的二倍半。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独立坚持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是东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然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100万左右的日本陆军主力，和2/5的日本海空军力量。

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取得了巨大战绩，共毙伤俘日军155.9万余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伤亡总数的75%以上。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3万余人，这个数目超过了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各岛的日军总和，占当时日军海外投降总兵力的50%以上。同时，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人伤亡383万余人（国民党

① 刘庭华著：《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第322页。

军伤亡 321.6 万余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伤亡 61.7 万余人）。中国军民的伤亡人数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人数总和 1 亿余人的 1/3 还多，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中伤亡最大的国家。苏联军民伤亡 2700 万人（其中牺牲 2000 万人），美国军人伤亡 1，058，046 人，德国军人伤亡 9，900，000 人（其中死亡 210 万人）①，日本军队伤亡 5790474 人。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 1000 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 5000 亿美元。②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一个现代化的法西斯强国的战争，它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伟大的。最后，大而弱的中国战胜了小而强的日本，这是弱国战胜强国的典型范例，它谱写了世界民族解放战争史上灿烂的华丽篇章，其经验极其丰富的，现择其要旨而述之。

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民族团结和英勇民族抗争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外来侵略。1937 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把中华民族逼到“亡国灭种”的危难地步，但却迅速促进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高潮、全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感，并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较以前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强烈、更广泛、更持久、更具战斗性，它超越了阶级、阶层、政党、地方实力派和不同军事集团的常规范畴，其最高层次和其他层次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有机结合点，使爱国主义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如宋朝岳飞、文天祥的“忠君报国”的爱国主义，也有别于近代“义和团”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爱国须抗日，抗日即爱国；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抗日成了区分是否爱国的唯一标准。抗日成了全民族不同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各军事集团的共同信念及判断是非的标准。各阶级、各政党、派别和各军事集团均能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至上，发扬“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语出《诗经·小雅·常棣》）的爱国主义传统，舍去历史上的旧有恩恩怨怨，自觉地使自己的利益服从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这个最高的民族利益，为祖国的危亡、民族的命运，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真可谓“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③ 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这是中华民族思想和精神上新觉醒的里程碑和质的飞跃。

抗日战争还极大地加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和海外华侨同祖国的血肉联系，这既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重要标志，也是抗日战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因素。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大家庭，几千年来的民族融合使各民族都为大一统的中国感到自豪，这种根植于中国人血脉中的民族认同意识，总是随着国家的安危、民族存亡，升华为中华儿女强烈的爱国责任感。七七事变后，全国各少数民族立即行动起来，建立各类抗日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迅速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广大海外华侨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处境，与祖国的兴亡盛衰息息相关。全国抗战爆发后，广大华侨表示“祖国的存亡，就是华侨的存亡。……宁可为祖国死，不愿看着祖国沦亡而偷生。”④ 他们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纷纷组织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竭力支援祖国抗战。据不完全统计，华侨捐款总数法币达 13.2 亿元，购买公债 30 亿元，直接侨汇 95 亿元，回国投资近 19 亿元。为祖国抗战起到了

① 刘庭华著：《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解放军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22-323 页。

② 同上书，第 265-266 页。

③ 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1937 年 7 月 17 日），参见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1984 年 4 月，台北中国文化出版部，第 1063-1064 页。

④ 《新华日报》，1938 年 4 月 24 日。

重要的“输血”作用。

总之，抗日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中国人民不但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① 毛泽东在 1961 年 1 月 24 日接见日本黑田寿山时曾风趣地说：“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②

物极必反，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战争时期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民众动员程度如此广泛，群众发动规模如此浩大，战斗意志如此顽强，抗击时间如此续长。抗日战争犹如一座熔炉，使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一次浴火重生，熔化并脱落了身上的污垢，以锻造后的光鲜独立在世界东方。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猖狂进攻，中国的军队与民众，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坚决抗日而求生存；以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坚持持久抗战为救国，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经过艰苦卓绝的 14 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说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蕴藏着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她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她不仅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伟大精神力量，也是永远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巨大动力，特别值得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永远继承和发扬。

二、建立、维护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不可分离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③ 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维护和发展，就没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国民党与共产党是近代中国两支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20 世纪 20 年代初，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两党合作北伐，取得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虽然政治信仰和追求不同，并且由于十年内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但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抗日救国却成为两党共同的最高目标。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坚强组织者和鼓舞者。日军的主要对手，既不是甲午战争时的腐朽、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也不是签署二十一条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政权和九一八事变时采取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而是面对一个团结起来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其中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以国家和民族解放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逐步调整自己的斗争方针。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此后，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辛的努力，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及至“联蒋抗日”，从而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32 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46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4 页。

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仍一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丢失了东北三省和华北不少国土，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1935 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面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迫近、华北即将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危险，也开始逐步调整政策，由对日妥协转向强硬，内政上逐渐变“攘外必先安内”为“攘外”与“安内”并举。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调整内外政策。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接受并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出现了空前的全国性团结救亡高潮，形成了举国一致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抗日民族统一线的建立，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及其胜利奠定了基础，但如何维护、巩固和发展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问题。据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与国民党共同坚持持久抗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统一战线内部摩擦事件的不断发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并确定：第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贯彻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第二，在与各党派相互关系上，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第三，在与顽固派斗争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时局的逆转，维系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大局。

可以说，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各阶级、各政党、各派别、各军事集团，虽然也为各自的利益斗争过、摩擦过，有时甚至矛盾十分尖锐，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始终没有破裂，一直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起了核心主导作用，成为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希望。

三、实行全面全民族的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及其作战原则，是战胜日本侵略军的成功战略指导

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及爱国有识之士，为提出符合国情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针对国民党最高当局不发动群众和武装民众，实行一条单纯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认为“民力和军力的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①] 特别是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路线。

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首先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战争动员，把战争的政治目的以及达到政治目的的方针、路线、政策告诉广大军民，以激发广大军民的爱国主义热忱，发挥全民族抗战的自觉能动性，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②]。这样就可以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以弥补武器装备落后等缺陷。其次，建立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进行人民战争的最佳组织形式。这种体制对建军、作战、开展群众工作以及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十分有利。一是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长，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二是可以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灵活地改变组织形式，主力军可以实行地方化，地方军也可以转化为主力军。中国共产党由于坚持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以仅有 5 万余人的兵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7 页。

② 同上书，第 511 页。

日军，并使自己获得了大发展，最后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力军。

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持久抗战的发展和胜利，可以说，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原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撰文说，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战争“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它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① 历史证明，全面全民族的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是弱国打败入侵强国唯一正确的战争指导路线。

在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和我得道多助的条件下，中国在战略上必须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长过程，转换和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以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于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即向国民政府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明确提出：日军以速战速决为原则，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战；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一线临战战区适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并同时在日军之翼侧的后方广泛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和消灭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方针、原则及其战法，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认同。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发《国军战争指导方案》，正式确定“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即实行“持久消耗战略，”② 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蒋介石认为，持久消耗战略的要旨是“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抵抗之目的”③；但在战役指导上，则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作战方针，主张“我们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和厚壁”。他认为抗战胜利的“要道”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④。虽然在战役战斗的指导原则上，国共两党存在重大差异，但在对日作战的总方针上，国共两党还是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即中国抗日战争必须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这是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几个大会战遭受重大伤亡的一个重在原因，也是整个八年抗战期间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最终发展结局大不相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总结抗战 10 个月经验时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发展进程的规律和胜利前途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科学地预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须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作战形式上，要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不同形式，等等。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勾画的战争轮廓的蓝图，一步步走向胜利，从而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实行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是坚持持久抗战战略总方针，消耗与削弱敌人，保存与发展自己，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有效作战形式。

在人类战争史上，游击战通常是作为配合正规战的辅助手段，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战争则不同，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⑤ 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因而，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担负着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并且，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参加，因而游击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遍及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四大敌后战场；它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贯穿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它不是永远停留在游击战状态，而是通过长期的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斗争，游击军和

① ［日］《丸》杂志，1965 年 12 月号。

② 《中日战争史略》上册，台北正中书局 1968 年版，第 169 页。

③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3 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7 年版，第 3851 页。

④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1 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4 年版，第 1073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52 页。

游击战必将向正规军和运动战发展，成为最后战胜侵华日军的强大生力军。所以，中国的抗日游击战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上升到战略范畴。“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①

在整个抗战全过程中，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与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在战略上对日军构成战略夹击的战略态势，陷敌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困境。在战略防御阶段，游击战担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牵制与打击敌人，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担负坚持敌后抗战，消耗与削弱敌人，支援正面战场作战，并积蓄力量，逐步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和准备大反攻的战略任务。在战略反攻阶段，游击战则转变为正规战，展开大规模反攻，收复失地。

游击战最能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参战歼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适合于采取广泛的分散的、群众性的麻雀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术手段，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以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胜利，并积小胜为大胜，逐步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为最后战胜敌人创造条件。因而，游击战是战略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的最有效的作战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于坚决执行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所以取得了敌后抗战的伟大胜利。抗战初期，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深入和正面战场友军的节节败退，八路军、新四军抓住有利战机，迅速大胆地深入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广泛开展游击战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广大敌后战场的开辟，敌后军民抗击了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的 58%–75% 和几乎全部伪军，逐渐上升为抗日的主战场，到 1945 年 9 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等 19 个省区，建立了 19 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 100 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 2 亿，正规军发展到 132 万余人，民兵 268 余万人。这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新中国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弱国战胜强国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战后，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著名学者伊藤宪一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归结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②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顾问，后任国务卿的基辛格 1957 年在他所著《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评价：《论持久战》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共产党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它的持久战思想”。

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亚、非、拉许多弱小民族和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所进行的解放战争广为运用。原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撰文说：“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③ 美国前国防部助理菲利普·载维达 1963 年在美军《陆军》杂志上撰文说：“图书馆里的书架都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但是，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

四、开辟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配合，构成陷敌于两面夹击的战略格局，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是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抗战胜利的独特战略举措

“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05 页。

② 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4 页。

③ ［日］《丸》，1965 年 12 月号。

担任敌后游击战，是必需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①] 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形成的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相互依存，这一特殊的战争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担负敌后战场作战，这是中国的国情军情所决定的，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显著特点。它成为国共两党实行军事合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的成功体现。

正面对抗是战争中常见的最普遍的战争形态。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是日军展开战略进攻，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这是无从选择的。而敌后战场则不然，它不能自然形成，必须依靠战争指导者，在知己知彼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去开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和敌、我、友三方的具体情况：敌强我弱，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中国在军事上单靠正面防御是难于取胜的，还必须到敌人的后方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敌小我大，决定了日军在中国占据的地域越大，其兵力就越不足，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城镇。这样，敌后广大乡村地带必然成为开辟抗日根据的理想区域。友军是曾经打过 10 年内战的宿敌国民党军，控制着全国大部分资源，且有 200 多万正规军，理所当然地应担负起正面战场的正规战；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数量少、装备差，但素质高，独立作战和生存能力强，且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有进行游击战和创建根据地的丰富经验。

因此，中共中央在 1937 年 8 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及时而果断地提出，我军在军事战略上必须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的转变，决定坚决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在敌后独立自主发动游击战争的方针，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创造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的战略任务。所以，敌后战场的开辟就成了中国两个战场形成的关键所在，没有敌后战场的开辟，也就没有两个战场战略格局的出现。

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向前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战场的一条重要经验。平原战、正规战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入敌后，首要的问题是要站稳脚跟，只有首先在山地展开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才能进退有据，达到保存与发展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只有奠定山地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才能依托它向平原发展，才能取得更多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歼敌的机会。

全国抗战初期，八路军由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即进入山西，山西及与之相连的晋察冀边区、晋冀豫边区正好是于我有利的山地。在山西，八路军依托几大山脉控制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对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先后开辟了晋察冀边、晋西北、晋冀豫边、晋西南 4 块抗日根据地。尔后，依托这些山区根据地向冀鲁平原发展，最后扩展到晋、绥、冀、察、鲁、豫 6 省广大地区，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在华中，当日军攻占上海、南京继续西进之际，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配合友军作战，并首先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和依托大别山开辟皖中、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尔后东进北上，开辟苏北、皖东，展开于苏、浙、皖、鄂大江南北广大地区，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在华南，当日军攻占广州和海南海岛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珠江、琼崖等抗日游击队，积极打击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东北抗日联军在七七事变前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形成了东北敌后战场，对关内抗战起到了战略配合作用。

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执行“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②] 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广大军民与日军浴血奋战的结果。它不但有力地配合正面战场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战略企图，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占领区的致命威胁，从而加快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这是侵华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53 页。

② 同上书，第 500 页。

战略相持阶段是中日战争全过程的枢纽，它是中国由劣势、被动转变到优势、主动和准备大反攻的基础。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了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它打乱了侵华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包围为战略反包围，与正面战场对日军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最后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最佳作战模式和重要经验。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由于敌后战场广大军民长期英勇奋战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建设，敌后解放区战场成为大反攻的战略出发地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解放区抗日武装成为战胜日寇的强大生力军。两个战场抗战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民族要战胜强敌，要独立、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团结一致，同舟共济。

五、积极开展灵活的抗日外交，与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合作或联盟，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外部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外交是抗日战争这部伟大史诗中的重要篇章，它在孤立敌国，争取友邦的思想指导下，表现出了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少有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可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

“弱国无外交”，是指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弱国没有外交主动权，而只能按照强国的意志行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大而弱的国家。因而，如何在世界上争取道义的支持，在列强之间巧妙周旋，权衡利害，因势利导，以实现“孤立敌国，争取友邦”的外交目的，是中国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据此，中国外交贯彻了淡化国家间意识形态的不同和政治制度的差别，以抗日为目的，同国际上一切反日力量建立和发展关系。国民政府宣称：“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朋友”。当时中国共产党虽不是执政党，不存在国家关系问题，但早已懂得并在实践中发展对外关系应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即提出应与一切反日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①] 1937 年 5 月，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七七事变后，又明确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订立反侵略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相协定”。[②] 总之，国共两党对外政策的共同之点，都力争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支持，着眼于孤立和打击日本法西斯。

拉住德国与中立德国，阻缓德国迅速倒向日本，这是七七事变爆发前后中国对德国政策的中心内容。七七事变前，中德关系有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发展更为迅速。德国先后派出了以前国防部长和前参谋总长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协助国民政府军事改革和军事训练，约有 30 万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中国的军火进口大部分也来自于德国，这对改善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也向德国提供其国防工业所必需的稀有金属，如钨、锑等，其数额占德国这类物资进口总量的 50%以上。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能从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大局考量，利用德国政府担心日本扩大侵华反而会助长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一心理，纵横捭阖地开展外交工作暂时维持中德关系，达成了中立德国，阻缓德国迅速倒向日本，不使为敌，来争取中德关系的继续发展。因此，国民政府故意多次向德国政府表示：日本侵略中国就是替共产党制造机会，世界上反共的国家应该出来阻止日本侵略，并支援中国抗战；如果日本一定要灭亡中国，中国将倒向苏联，云云。因而，德国遂决定保持中立，并继续维持对中国的军火贸易供应。据统计，在全国抗战爆发后的 16 个月中，平均每月仍有 3. 6 万吨军火贸易武器经香港进入中国，占中国进口军火贸易总数的 60%以上。此外，以总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1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6 页。

顾问法肯豪森等 30 多人的德国军事顾问团，还暗中参与了中国对日作战计划的制订，或深入到前线指挥部，如法肯豪森本人在淞沪战役中就曾多次前往前线，他还参与了台儿庄战役的规划，等等。直至 1940 年 9 月德日意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后，中德两国遂绝交。

联苏抗日，争取军援。由于地缘政治相邻的关系，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也构成威胁，特别是日、德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矛头直指苏联，这客观上促使苏联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尽管中苏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分歧，但基于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联苏抗日，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进行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针。

1932 年 2 月，中国就向苏联提出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问题。1933 年底，中国政府主动恢复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中苏邦交。之后，国民政府频繁向苏联派出军事、教育、艺术等多种代表团出访莫斯科。1935 年 12 月，蒋介石派陈立夫、张冲秘密访苏，商谈“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一个中苏互助条约”问题。1937 年春，苏联允诺以战争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武器援助。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苏即于 8 月 21 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美、英、法等国对日采取所谓“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政策时，苏联是当时世界诸强中唯一积极支援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国家。从 1938 年至 1940 年，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 4. 5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贷款。此外，国民政府通过谈判，还获得了苏联局部暗中出兵参战的军事支持，如苏联派出一批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帮助中国军队训练，并直接派遣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对日作战。先后来华参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 2000 余人，他们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兰州等城市的空战，其中 200 余人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

与美、英结盟，扩大外援。美国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盟国和支持者之一。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扩大，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损害或威胁时，才逐步改变对日妥协的政策；看到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持久抗战，认识到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后，美国才逐步加强援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美国政府采取所谓“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政策，不但不给中国抗战必要的援助，相反，却允许其企业和公司继续卖给日本大量钢铁、石油、机器设备等战略物资。1940 年 9 月，德、日、意签订军事同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才发生了较大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与美国结盟、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外交活动，使美国的援华大为改善。1941 年 4 月，罗斯福签署命令批准美国军人可以辞职加入陈纳德组建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帮助中国与日本空军作战。美国为实现“先欧后亚”战略，需要中国在东方拖住日本，因而才成为中国抗战的坚定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援外租借物资共 485 亿美元，其中英国所得占 63. 71%，苏联所得占 22. 76%，中国所得只占 1. 8%，约 7. 48 亿美元。

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较苏、美等国少。全国抗战开始时，英、法采取牺牲中国权益的对日妥协政策，对中国政府要求在对日问题上进行军事合作事宜始终未予积极回应。中国为维护滇缅、滇越、桂越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曾与英、法两国政府洽商军事合作问题，也一直难于达成共识。法国在 1938 年曾给中国提供铁路借款。1941 年后，英国从维护远东殖民利益出发，才开始重视中国抗日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两国才在远东成为共同对日作战的盟友，中、英两国军队在缅甸共同对日军进行了殊死作战。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各国人民相互支援，共同战斗所取得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得到过有关国家和人民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不能忘怀的，但主要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不畏强暴，英勇抵抗，独立坚持持久抗战，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过程，研究世界主要大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和苏、美、英、法等国援助中国抗战的前后差异，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各国均以维护自己国家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一历史经验值得深思和借鉴。

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表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决定战争的胜负不单纯是武器装备的对抗，而是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综合力量的较量，特别是战

争指导能力（即主观能动性）的较量。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必然得道多助，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必然失道寡助，人心向背决定战争的最后结局。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虽盛极一时，但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虽历尽 14 年的艰难曲折，但由于全中国人民的团结御侮，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光照千秋。

（作者刘庭华，军事科学院　研究员）

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研究

赵秀宁

内容提要：1934 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在全国推行。抗战开始之后，新生活运动受到极大影响，已不能按部就班的从事革新国民生活的工作，而是转向战时服务工作，其主要活动区域也从东南都市转移到西南西北后方地区。开展节约运动，协助国民精神动员运动，建立新运医疗队，推动伤兵之友运动，以及宣传、救济、募捐等活动成为新生活运动的战时主要活动。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标——民族复兴，始终未变；整齐卫生、规矩清洁等革新生活的常规运动也在大后方展开。

关键词：新生活运动　节约运动　国民精神总动员　新运医疗队　伤兵之友社

1934 年，在国民政府完成江西“剿匪”之际，蒋介石鉴于当时的情况，认为“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祭出新生活运动，以应对当时的内忧外患。这一运动在学界受到相当的关注，也有诸多的研究，但是多集中在抗战以前的新生活运动。[①] 有关抗战期间的新生活运动，研究相对较少。[②] 笔者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考察战时的新生活运动。首先从蒋介石的角度梳理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内涵的变化；其次以《新运导报》为基础史料，对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的重要活动进行论述，希望能对战时新生活运动有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

一、新生活运动目的不变

新生活运动着眼于国民生活之基本准则与行为，“以最简易而最急切之方法，涤除我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使趋向于适合时代与环境之生活。简言之，即求国民之生活合理化，而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基准也。”蒋介石对礼义廉耻的解释是，“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将礼义廉耻融进到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使我全体国民以‘礼义廉耻’为规律，实现之于‘衣食住行’之中，则生活之内容充足，条件具备，是谓生活革命之完成，

① 曹明臣：《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新生活运动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12 年第 2 期。

② 目前就笔者所见，代表性的研究有关志钢的《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生活运动》，乔兆红的《论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两篇专门讨论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的文章，他们对战时新运主旨的转变作了简要说明，并对战时新运活动做了大略的介绍和评论，但是其对战时新生活运动的总结主要是依据《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所辑的新生活运动史料，对战时新运总会的会刊《新运导报》的使用十分之少，因此也就忽略了许多战时活动。顾晓英的《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1934—1949 年）》其中一小部分涉及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将其归纳为发起节约献金运动、战地服务、慰问伤兵三个方面。曹艺的《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论析》，考察了新生活运动的缘起和发展，以及国民精神总动员对新生活运动的继承，认为“1939 年 3 月以后，新生活运动事实上已大部分融入国民精神总动员中”。

而我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亦即奠定于此”。[①] 在蒋介石的计划之中，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1934 年，蒋介石提出，发展教育是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根本方法，而新生活运动正是进行全民教育的最好途径。并强调“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的新生活运动是目前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亦最有效的革命运动”。[②] 1935 年元旦，蒋介石在演讲中强调，“去年兄弟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都能涤除旧污，刷新精神，以复兴我民族而建设现代的国家。”[③] 在同年的新生活运动纪念日上，蒋介石指出新生活运动是“中华民国新生命之基点”。[④] 1936 年，蒋介石重申“新生活运动不是世界上普通一般的改良社会运动，而是一种救亡图存的迫切的运动”。[⑤] 到了 1937 年，蒋介石再次强调从复兴民族出发推进新生活运动，“我们现在既已认定新生活运动是复兴民族唯一的途径，那么，我们每一个国民都应当切实实行新生活，切实推进新生活”，“来努力于复兴民族的奠基工作”。[⑥]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目的在于使礼义廉耻融化进国民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实现国民生活的生产化、艺术化、军事化，最终实现民族复兴。那么，在抗战开始之后，新生活运动这一目的是否有变？

1938 年，在新生活运动纪念广播中，蒋介石首先重申新生活的目的，“在于革命国民的生活习惯，振作国民的道德精神，来求得民族的复兴”。但是面对日本侵略日亟，蒋介石明确提出，“到今天来谈新生活运动，还有比‘雪耻复仇’更重要的吗？”[⑦] “希望全国一致，亲爱精诚，休戚与共，整饬日常生活，重秩序，守纪律，担当御侮救国的事业。”[⑧] 要求民众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实现民族固有的道德，抵抗日本的侵略。日本的侵略既已威胁到民族生存，要实现民族复兴，首先要抗日救亡，求得最起码的民族生存。在如此危急之情况下，新生活运动已不能按部就班地进行，抗战救国成为首要任务。

1939 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形势虽稍有缓和，但中国孤立无援的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在这一年的新生活运动纪念大会上，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表示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民族精神，“由于新生活运动的唤起，在一年有半的抗战中间，随时随地都有热烈坚强的表现”。对新生活运动的继续发展寄予厚望，“使新生活运动，成为争取抗战胜利的武器，成为策进建国成功的原动力”。同时，蒋介石对礼义廉耻的解释也更进一步，使之更加适合抗战的需要：“礼”字进为“严严整整的纪律”；“义”字进为“慷慷慨慨的牺牲”；“廉”字进为“实实在在的节约”；“耻”字进为“轰轰烈烈的奋斗”。[⑨] 纪律、牺牲、节约、奋斗，每一条都紧扣抗战这一主旋律，以抗战为中心。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的未变，但是其现实着眼点已经不仅在改变国民日常生活习惯上了，而是挽救民族国家的危亡，求得民族国家的生存，实现抗战救国。

1940 年，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的总结是，“简单说起来，就是要我们同胞一方面厉行战时生活，一方面努力战时服务”。[⑩] 1941 年，蒋介石再次强调，新生活运动是“明耻教战”的运动，目的在改变国民的生活，“使我们整个民族，能在此生存竞争非常的大时代中，奋斗牺牲，而求得进

① 蒋中正：《新生活运动纲要》，《前途》，1934 年，第 2 卷第 6 号。

②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前途》，1934 年，第 2 卷第 4 号。

③ 蒋介石：《民国廿四年为彻底实行新生活的一年——廿四年元旦在浙江省府委员就职典礼演讲》，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 年，第 39 页。

④ 《蒋委员长为新运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中央周刊》，1935 年，第 351 期。

⑤ 蒋介石：《新生活二周年纪念之感想——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第 46 页。

⑥ 蒋中正：《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训词——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在中央广播电台讲》，《中央党务月刊》，1937 年 2 月，第 103 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印。

⑦ 《新生活运动与抗战——蒋会长二月十九日晚八时广播讲演》，《新运导报》，1938 年 4 月，第 13 期，总第 53 期。

⑧ 叶健青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第 41 辑，台北“国史馆”，2010 年，第 177 页。

⑨ 蒋中正：《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演词》，《新运导报》，1939 年 2 月，第 22 期，总第 62 期。

⑩ 蒋中正：《新运工作在第七年度》，《新运导报》，1940 年 3 月，第 25 期，总第 65 期。

步与发展，使我们国家获得永久的独立和自由”。并肯定新生活运动对抗战的功用，“我们抗战到今天，所以能愈战愈强，实际上得力于七年来新生活运动推进的效果，确是不少”。① 1942 年，蒋介石还是很明确的提出，“要使民族道德复活，国民生活革新，以达到抵御外侮复兴民族的目的”。②

1943 年，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名义上已经与各国平等，但实际上并未摆脱弱国与不平等的地位。蒋介石在这一年强调，“我们在不平等条约废除以后，格外要推行新生活运动”，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使“我们一般国民的生活习惯，能够除旧布新，振衰起敝，然后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和人家平等，达到文明强盛的境域。”③ 蒋介石在广播中强调，当初推行新生活的最大目的，“就是要鼓励全国同胞，一致奋起，抵御外侮”，“就是要从各个国民自身的振作，来造成坚忍不拔的民族气节，湔雪以往一切的耻辱，创造平等自由的国家”。④ 蒋介石也记下当日的有关活动，“下午到参政会庆祝平等新约会后，自四时至七时为新运纲领灌音，颇费时力，然此为新运重要工具，亦为历史永久纪念也。晚到中央党部新运纪念节，餐食后讲演及播音，成绩颇良”。⑤ 从这条日记亦可看出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的重视。

1944 年，为推行新生活运动的第十周年，蒋介石在元旦当日，写下本年度政治中心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加强推行新生活运动。⑥ 在进行新运十周年纪念时，蒋介石追忆发起新运的主要目的，“我是要恢复我们民族优良的道德精神，同时迎头赶上现在的时代，使我们国家不致成为落伍的国家，使我们民族不致成为劣等的民族，被人家淘汰”。⑦ 1945 年，纪念新运十一周年，蒋介石通电全国，指出当年提倡新生活运动，“其主旨在转移颓习，其目的即为复兴民族”。⑧ 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始终秉持，不忘新生活运动推行的初心，即实现民族复兴，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立于真正平等的地位。

从以上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的最终目的始终未变，即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独立与平等。但是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却因战争的影响发生了变化。在抗战开始之后，战争成为一切活动的中心，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战胜敌人来进行的，新生活运动也不例外。新生活运动因时易事，不再局限于国民的规矩清洁等战前日常运动中，转而服务于抗战大局，展开服务伤兵，宣传动员，劝募捐献等一系列战时活动，策进战时生活，以求得抗战的胜利。

二、新生活运动活动区域和组织机构的变化

随着战争的进行和国民政府的西迁，国民政府丧失了其核心统治区域，统治力逐渐扩展于西南和西北地区。新运总会先迁往汉口，后迁往重庆，其活动范围也以国民政府的统治所及为限。战争使新运从其旧有的成熟的活动区域转向较为偏远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不言而喻，这对新运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已有的成熟的新运基层组织和活动纷纷消失，既有的也成果不复存在。但是这对新生活运动而言又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使其将新运活动扩展到从前所不能及的西南和西北，甚至更加偏远的地区，同时能将新运活动下沉到最底层的民众中间。

从地域上看，战时的新生活运动已经到达西南西北等非常偏远的地方。例如，在西南地区，1942 年，先后“于畹町、遮放、芒市、龙陵、保山、永平、下关、下庄、楚雄、昆明等十处设立

① 蒋介石：《普通（遍）执行工作考核》，《新运导报》，1941 年 2 月，第 34 期，总第 74 期。

② 蒋中正：《新生活运动八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新运导报》，1942 年 2 月，第 43 期，总第 83 期。

③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重要及其实行之要领——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出席新运晚会讲》，《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第 91 页。

④ 《蒋会长对新生活运动第九周年纪念广播词》，《新运导报》，1943 年 3 月，第 10 年第 2 期，总第 87 期。

⑤ 《蒋中正日记》（非出版品），1943 年 2 月 18 日，台湾“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整理，2015。

⑥ 《蒋中正日记》（非出版品），1944 年 1 月 1 日，台湾“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整理，2015。

⑦ 《新运十年纪念民族精神的复兴　蒋会长对全国广播》，《中央日报》，1944 年 2 月 19 日，第 2 版。

⑧ 《新生活运动十一周年蒋会长电勉同胞》，《新运导报》，1945 年 2、3 月合刊，第 12 年第 2 期，总第 106 期。

新运服务所，专事设备清洁卫生之宿舍，浴室，富有营养，鲜洁适口之饮食，简约之自助餐，更予行旅人士之便利。”又在丽江、墨江设立边胞服务站，为边远地区的民众服务，提供医药方面的救助。[①] 随着在这些边远地区设立服务所和服务站，新运活动在这些地区逐渐展开。云南的维西地处偏远，在丽江第一边胞服务站的推动下，不仅设立了中学，还开展了新运活动，包括注射疫苗、清洁卫生等活动。[②]

在西北地区，新运会成立第二服务所，“办事处设兰州，计有兰州等十七所，办理新疆车队，及西北移民，一般旅客之服务事宜，因西北地处边陲，满目荒凉，此项服务工作，颇收宏效。”[③] 这些服务所深入西北，其活动远达安西、敦煌等地。而且这些服务所在服务运输的同时，还推行清洁规矩、守时等新运活动。此外还为西北地区的垦民服务，以促进西北地区的开发。新运服务所深入西南西北服务不仅促使了新运活动范围的扩展，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新运活动在一些乡镇甚至是村落的普及，例如西北地区的江洛镇、双石铺镇等地都有新运活动。新生活运动的下沉，增加了新运在基层的影响力。

战争促使国民政府统治力向西南西北延伸，新生活运动的范围亦随之改变。从表面上看，新生活运动受战争影响，活动范围似乎被压缩了，但是新运的范围失之于东南，而收之于西南西北，失之于都市，却收之于偏远地区。战争没有使新运活动范围减小，反而使新生活运动的活动范围和影响深度得到了扩展。

新生活运动总会在组织方面也有不小的变化。1940 年 9 月，章楚取代阎宝航出任新运总会副总干事。1941 年 11 月增设一名副总干事杨舞心，“同年八月总会为适应战时环境之需要，将学校训练两组改为服务卫生两组，其学校训练两组原有工作归并推行组办理”。[④] 适应战时需要，服务战时环境成为了新生活运动的首要任务，教育民众、训练民众等平时工作只能为战时工作让路，同时也表明战时新运总会面临相当大的工作压力和困难。

在改组既有组织的同时，新运总会还为了配合战时需要，成立了新的以服务战时工作为目的的组织。在汉口期间，先后组织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和伤兵慰问组，为前线战士和受伤士兵服务。抗战中期，随着西南西北交通线的日益重要，新运总会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滇缅路沿线重要地区设立新运服务所，为交通员工服务。后为便于管理，在 1940 年 8 月，“设第一服务区办事处于昆明，直辖西南各地新运服务所”，“复于十月设第二服务区办事处于兰州，直辖西北各地新运服务所”。[⑤] 之后又在重庆设第三服务区办事处。在云南地区设立了边胞服务站两处，分别在墨江和丽江。此外，为了补充战地医护人员的不足，新运总会还组织了医务委员会，从上海等沦陷区招募医护人员，组织成立了新运医疗队，在前线和各地区展开服务工作。1940 年，又成立了伤兵之友社，从事伤兵服务工作。这些都是为适应战时需要而发起的新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战时服务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新生活运动增添了不少光彩。

在成立新组织的同时，新生活运动的既有组织也在不断扩展，主要表现在大后方的许多县镇开始设立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和新生活运动协进社等组织，例如南川、三峡、宜宾等诸多地区都新成立了新运会。在三峡设立了新运实验区，在重庆设立了陪都新运模范区。既有组织的扩展，扩大了新生活运动的活动范围，增加了影响力，也使战时服务工作扩展到更大范围，为抗战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新生活运动在战时的主要活动

新生活运动的战时活动大体上可分为几类，一是自身主动发起的活动，诸如募捐、抗战宣传、

① 黄仁霖：《一年来工作之回顾》，《新运导报》九周年纪念特辑，1943 年 2 月 19 日。
② 《新运动态》，《新运导报》，1944 年 5 月，第 11 年第 4 期，总第 99 期。
③ 黄仁霖：《战时新运之回顾》，《新运导报》，第 13 年第 1 期，总第 111 期，新运十二周年特辑，1946 年 1、2 月合刊本。
④ 《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第 208 页。
⑤ 同上。

救济难民、慰问伤兵、医疗服务等，在这些活动中，有些属于不定期举行，有的只是暂时性的，也有一些则是固定下来成为常务工作。二是响应政府号召展开的活动，诸如节约运动、协助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伤兵之友运动等活动，这些活动规模较大，影响也很大。以上两类可称为战时活动。三是战前既有的活动，也就是新生活运动的常规活动，主要是整齐清洁禁毒等生活运动，以及大学生暑期农村服务等服务活动，可以称作平时活动。下文主要论述第二类，即新运总会响应政府所展开的几项重要活动。

1. 推行节约运动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大力推行节约运动，以保障战时的经济运行，维持艰难的抗战局面。南京新运总会“于‘八一三’事件发生后，当即通告各新运委员会推动各该机关，加紧工作，并厉行节约，以符总动员及节制物力之旨”。① 1938 年 7 月，新运会武汉办事处发起组织武汉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以“提倡节约，增强抗战力量”，并公布了组织原则。② 8 月 11 日，重庆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成立，明确推行节约运动的目的，“为增加抗战建国力量，在政府节约办法颁布前先行初步推动，以其促成简朴刻苦适应时代要求的新风气；唤醒民众明了物质在战时之重要，以导入增加后方生产途径；提倡以节约所得贡献国家”。③ 重庆市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成立以来，推行节约，不遗余力，该会自九月二日，至九月八日，为宣传周，除组成宣传队五十余队，每日赴各处宣传外，并敦聘党国硕彦，每日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演讲”，④ 大力推行节约运动。

江西省新运促进会在同一期《新运导报》上公布了《战时生活须知》和《战时生活须知实施办法》，将节约运动分为精神方面和行动方面，并对不同类别的人做出了不同的指导。同期的《节约运动计划大纲》一文介绍了国民参政会通过的《节约运动计划大纲》。同年 10 月份出版的第 19 期《新运导报》则以节约为主题，刊发由各党政要人和新运领导人有关节约的相关论文，报道各地节约运动相关消息，为节约运动造势，引导民众从事节约运动，推动节约运动发展。

各地纷纷成立节约运动委员会，并公布组织简则，隶属于新运总会，充分显示出利用新生活运动总会已有的组织架构来推行战时活动的优越性，既节省了人力、物力等资源，又能使运动由上而下得到快速而实际的推行。从这一点来说，蒋介石所推行的新生活运动的确是在为抗战做准备。1938 年底，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国民党中央第 106 次会议议决“节约运动并入新生活总会办理，总分会均无庸设立”。⑤ 这样，节约运动就成为新运的一项常规运动，在各地得以推行。国民党的这一决议无疑也是体现了节约精神，利用新生活运动既有的组织优势，既能迅速地推行节约运动，又节省了建立一个独立的节约委员会所需的人力物力。也正是凭借其组织优势，新运会此后又承担了更多的战时工作。

节约运动成为新运总会战时的一项常规活动，在各地开展起来。各地的开展形式也有所不同，有的将节约与献金相结合，有的推行节约储金运动，⑥ 有的以废除不必要宴会推行节约运动⑦。1940 年，蒋介石发表《厉行节约争先储蓄——为劝导节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节约储蓄，各地又掀起了一股以节约储蓄的方式推行节约运动的风潮。尽管推行方式不一，但节约运动成为新生活运动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各地推行，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蒋介石在 1939 年的新生活运动纪念训词中就赞扬了新运总会所推行的节约运动。在 1940 年，蒋介石更将新运核心之一的“廉”解释为

① 王淑芳：《首都新运会一年来之回顾》，《新运导报》，1938 年 4 月，第 13 期，总第 53 期。

② 《新运导报》，1938 年 8 月，第 17 期，总第 57 期。

③ 《重庆市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成立大会记录》，《重庆市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组织简则》，《重庆市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初步实施方案》，《新运导报》，1938 年 9 月 1 日，第 18 期，总第 58 期。

④ 《各地新运消息》，《新运导报》，1938 年 9 月，第 18 期，总第 58 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国民党档案：国共档案，特种档案，特 27/30，《上总裁报告中央 106 次常会议决要案》，1938 年 12 月 26 日。

⑥ 《广东省新运会二十八年度十月份工作概况》，《新运导报》，1940 年 1 月，第 24 期，总第 64 期。

⑦ 《云南新运一二三月份工作情形概况》，《新运导报》，1940 年 6 月，第 28 期，总第 68 期。

“实实在在的节约”，以推动节约运动的进行。

2. 协助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实行

新生活运动在推行之初，即十分强调国民精神。检阅蒋介石的相关讲话，可以发现“精神”一词的出现频率相当之高。进入抗战阶段后，由于物质方面的不足，使得国民政府越发的强调民族精神的重要性。1939 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提出三个目标：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新运总会专门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国民精神动员会”，并制定了改进工作纲要，[①] 以协助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新运会 1939 年 6 月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推进国民精神总动员列在首位。其具体工作包括召开国民月会，协助精神总动员活动，号召各省市新运会协助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②] 蒋介石在布置新运第七年度工作时，首要的一点就是国民精神总动员，“厉行精神动员，策进战时生活”，要求新运会继续不遗余力地推进这个“加强抗战力量的基本工作”。[③] 有了总裁兼会长的大力号召，新运会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推进工作自然是不遗余力。干屏在《新运一月视察记》中记载了其新运视察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防空、精神动员和禁烟。[④] 在一些省市的新运工作总报告中，协助推进国民精神总动员工作也是战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⑤] 作为新运总会会刊的《新运导报》也及时报道有关精神动员的文件和事件，并且不定期发表探讨新运与精神运动关系的文章，增进对两者关系的理解，增加两个活动之间的互动。

1944 年，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五周年时，蒋介石指示，国民精神总动员“应与新生活运动表里为用一体推进外，更于本日广播中复述当时所颁纲领原文要旨以期唤起注意，我各地党政机关负有督率推动之职责，更应特加注意履行，以为民众示范”。[⑥] 对于精神总动员，新生活运动始终协助推进，虽非活动主体，但其相关活动还是受到了较高的评价。《大公报》评价道：“抗战以来，新生活运动更配合国民精神总动员，鼓舞抗战精神，服务战时工作”。[⑦] 陈剑如在战后总结评价为：“这一个运动，在抗战八年的过程中，它配合着‘国民精神总动员’，切实的激发了国民同仇敌忾的精神，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粉碎了敌人威迫利诱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终于使我们的抗战获得了最后的胜利。”[⑧]

3. 成立新运医疗队

新运医疗队始于 1938 年武汉会战之际，“上海爱国人士热心招募医生护士数人，组织一队，资助内地，为伤兵服务，数年来，由一队而增至八队，均由沪上人士担负资［助］。”[⑨] “重庆则由新运总会，组织新运医务委员会；配置工作，筹措费用”。[⑩] 新运医疗队受新运医务委员会领导，主要是为弥补当时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从事伤兵救护，以及为民众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新运医疗队主要从上海招募医务人员，最初组织了一队，后来扩充为八队，“每队有医生一人

---

① 《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第 326 页。

② 《本会近数月来之工作汇记》，《新运导报》，1939 年 12 月，第 23 期，总第 63 期。

③ 蒋介石：《新运工作在第七年度》，《新运导报》，1940 年 3 月，第 25 期，总第 65 期。

④ 干屏：《新运一月视察记》，《新运导报》，1940 年 5 月，第 27 期，总第 67 期。

⑤ 《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工作概况》，《新运导报》，1941 年 7、8 月，第 39 期，总第 79 期。

⑥ 《（蒋中正）电各省主席省党部主委希即饬知党政各单位检讨精神总动员与新生活运动实行成果并研议改进》，典藏号：002-090106-00016-429，台北“国史馆”藏。

⑦ 《大公报：新生活运动十周年纪念》，《新运导报》，1944 年 4 月，第 11 年第 3 期，总第 98 期。

⑧ 陈剑如：《新生活运动与农工同胞》，《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第 193 页。

⑨ 《新运总会报告业务工作概况稿 1942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 辑第 2 编　政治（5）》，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9 页。

⑩ 《新运医务委员会报告各医疗队工作情形稿（1943 年 12 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 辑第 2 编　政治（5）》，第 306 页。

至三人，护士三人至十人”，[①] 受医务委员会指挥。其经费最初由上海方面筹措，“重庆只担任经常之办公费及薪津之一部分，至三十年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始全部由重庆筹措。”[②] 由于现实环境的影响，各队组织情况并不固定，其中第四、第六、第七、第八队较为稳定，人事变动较小，“第一队至第三队曾一度中间结束，后又继续办理”，第二队、第五队因经费关系先后取消。[③] 还有一些在前方服务时受损严重，之后重建；每个小队的工作地点和服务对象也是不断变化的，大多是巡回服务。以 1943 年为例，“第一小队驻广东曲江，第二队驻湖南祁阳，第三队则在改编中，第四五两队驻重庆，第六队驻云南下关，第七队驻湖南衡阳，第八队驻江西赣县，为抗战将士，交通员工，社会民众及国际盟友服务，克尽阙职，为社会人士所称誉”。[④]

医疗队曾在各地主办医院、诊所，并协助伤兵医院的工作。“其主办之医院计有战时儿童保育会医院，儿童疗养院，空军云南驿医院，及赣县伤兵之友社辅助医院等四院。诊所有曲江永平赣县中华儿童新村等四处，曾经协助之后方医院计有十四，三十八，六十二，六十四，一一三，一五四等十三个，其余尚有各军野战医院，兵站医院”。[⑤] 各队的工作重点亦有所不同，“廿九年以后，新运医疗队由一队扩展至八队，当时为伤兵服务者有第二、第七、第八等队，其后兼为归国侨民服务者有第一队，兼为空军盟军服务者有第四队第六队。经儿童保育会商请为儿童服务者有第三第五两队”。[⑥] 至于各队的工作内容，以第六队 1943 年在滇缅前线的工作为例，其工作包括治病、疗伤、抗疟、防疫。在保山野战医院，与军医处，院方，红会第 011 队，通力合作，全员收治二百人。第六队在前线设立巡回医院，“巡回医院所到之处，前线士兵疾病虐疫，收即诊即愈之效，各部队长深感需要，函邀电约，纷至沓来”。与随军卫生队创建联合医院，独力创办云南驿空军医院，还为伤兵之友社服务。[⑦] 总之，新运医疗队工作繁多，服务广泛，鉴于本文篇幅有限，仅对新运医疗队工作情况作简要的介绍，以期能管中窥豹，使大家对新运医疗队的工作能有大致的了解。

新运医疗队服务地域广大，从前线到后方，从边疆到内地，其服务对象更是涵盖伤病兵、难民、民众、儿童、归国侨胞、边民以及盟军、外国侨民。其工作成绩十分突出，“据统计，从 1939 年春到 1942 年底，新运医疗队共治愈受伤人员达 10 余万，敷伤 60 余万人次，施行大小手术 1 万余次，矫治骨折 800 多人。”[⑧] 新运医疗队为前线士兵、后方民众提供了医疗服务，有效的弥补了战时医疗服务短缺的现状。但是受战争环境的影响，经费短缺、人员匮乏、医药及器械不足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医疗队，限制了甚至阻碍了医疗队的工作和发展。

4. 伤兵之友社

随着战争规模日益扩大，伤残士兵日益增多，许多伤残士兵得不到应有的照顾，有的甚至流落街头。在此情况之下，1939 年，后方出现了伤兵之友社的组织形式。伤兵之友社，“以从事慰问及救济负伤将士为宗旨”，同时还对社员、社徽、组织、经费、会期等相关问题作了规定。[⑨] 重庆方面也召开了伤兵之友社筹备会，但是这时规模还很小，也没有成立正式的组织，只是之后伤兵之友运动的先声。

---

① 黄仁霖：《一年来工作之回顾》，《新运导报》，九周年纪念特辑，1943 年 2 月 19 日。

② 《新运医务委员会报告各医疗队工作情形稿（1943 年 12 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 辑第 2 编　政治（5）》，第 306 页。

③ 《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第 264 页。

④ 黄仁霖：《一年来工作之回顾》。

⑤ 潘小萼：《新运医疗队工作之实际》，《新运导报》，1944 年 1 月，第 11 卷第 1 期，总第 96 期。

⑥ 《新运医疗队工作人员一年来奔走南北　忍艰辛服务军中》，《新运导报》，1945 年 1 月，第 12 年第 1 期，总第 105 期。

⑦ 《新运第六医疗队工作报告》，《新运导报》，1943 年 11、12 月，第 10 年第 10 期，总第 95 号。

⑧ 《新生活运动》，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印行，1947 年，第 34 页。转引自荣维木：《抗日战争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84 页。

⑨ 《伤兵之友》，《新运导报》，1939 年 12 月，第 23 期，总第 63 期。

1940 年，蒋介石明确提出在新一年的工作任务里，“协助兵役建设，尊敬受伤将士，这就是要我们同胞一方面助成兵役，一方面参加伤兵之友运动”。[①] 新运总会在 2 月 19 日新运纪念日，“成立伤兵之友总社于陪都，统筹整个伤友运动之进行，拟定各项章则办法通告实行”，[②] 并“扩大征求十万伤兵之友”，请宋美龄担任名誉队长，孔祥熙为总队长。[③] 利用新运会来推进此项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民政府暂无多余的资源来推行此项运动，而是顺势利用新生活运动的组织优势，使新生活运动增加了一项任务，既有利于顺利推进此项运动的进行，也避免了付出更多的资源。

纳入新生活运动之下的伤兵之友社，“附属在新运总会内，换一句话说，伤兵之友运动，为负伤将士谋福利，是新运会主要工作之一”。[④] 伤兵之友社的四项中心任务是：特别营养附烧开水，灭虫沐浴治疥，洗缝，补充卫生用品。[⑤] 该社还开展了“虽残不废”运动，组织了军人生产合作事业委员会，使伤残军人能够从事生产合作事业。征募社友，募集捐款等活动也得到推广，为伤兵之友运动争取到了更多的资源，促进了伤兵之友运动的发展。

各地成立的伤兵之友社也纷纷展开活动，为伤兵服务。渭南伤兵之友社为伤兵提供营养餐，给他们灭虱、沐浴，替他们缝洗衣物，还有代写书信、放留声机、床头慰问等活动，给伤兵带来了方便和温暖。[⑥] 宜宾的新运会则为伤兵解决了洗澡问题，受到伤兵的赞扬。[⑦] 各地活动不一而足。新运总会在 1942 年总结道，“本年度本会伤友总社及全国服务总队部之工作，致力于服务队经常工作之进行。服务队最多时达一百二十余队，目前共有八十一队，分布全国各军医院内，为住院伤病官兵服务，专事办理特别营养、灭虫、治疥、缝洗衣被、辅助卫生用品等工作，月需工作费二十五万元，伤病同胞受惠不浅”。[⑧]

5. 战时一般性的新生活运动

在以上几个主要性的活动之外，战时的新生活运动更多的是规模较小的战时常规活动和平时活动。战时活动主要有宣传、救济难民、募捐款物、重庆的机关新运活动等。延续下来的战前平时工作主要有季节运动、妇女训练、规矩清洁整齐卫生运动、大学生暑期农村服务活动等，这些活动尽管可以称之为平时活动，但也都充满了战时色彩。

宣传活动，在战争时期是不可或缺的，战争时期的宣传活动，一方面利用宣传进行战争动员，发动民众，支持抗战；另一方面可以使民众客观地看待战争，减少对战争的恐慌。抗战开始后，新运会即十分重视宣传，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活动，宣传方式十分丰富，宣传内容更是紧贴战时需要和社会问题，而且宣传活动能够深入到乡间农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宣传活动上，包括组织宣传队、宣传团、纪念日宣传、乡村宣传等多种形式，这些宣传活动包含着不同的宣传方式和丰富的宣传内容。在宣传方式上，有比较简单的贴标语，发宣传单，也有很新颖的幻灯宣传[⑨]、流动宣传车[⑩]、广播宣传，还有比较简陋的壁报宣传、演讲宣传等等。在宣传内容上，以契合现实需要为主，主要有抗战宣传、兵役宣传、节约宣传、卫生宣传、防空宣传、捐募宣传、禁烟宣传以及中后期的平抑物价宣传等。这其中抗战宣传和兵役宣传自然是最重要的，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宣传内容。

---

① 蒋介石：《新运工作在第七年度》，《新运导报》，1940 年 3 月，第 25 期，总第 65 期。

② 《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第 272 页。

③ 《“伤兵之友社”成立大会》，《新运导报》，总第 65 期。

④ 俞友仁：《伤兵之友社鸟瞰》，《新运导报》，1940 年 10 月，第 31 期，总第 71 期。

⑤ 《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第 284 页。

⑥ 《展开服务伤兵工作　改善物质精神生活——伤兵之友社渭南服务队二月份重要工作报告》，《新运导报》，1941 年 5 月，第 37 期，总第 77 期。

⑦ 何剑魂：《独角戏集——宜宾新运会廿九年七八九月工作报告》，1940 年 10 月，第 31 期，总第 71 期。

⑧ 黄仁霖：《一年来工作之回顾》，《新运导报》，九周年纪念特辑，1943 年 2 月 19 日。

⑨ 《三峡试验区一二两月份工作报告》，记载了新运会“绘制兵役及禁烟宣传连环漫画，分赴各镇并放映幻灯宣传”，《新运导报》，1940 年 5 月，第 27 期，总第 67 期。

⑩ 《本会近数月来之工作汇记》，记载了新运会“新置美观之‘宣传车’，流动宣传”。《新运导报》，1939 年 12 月，第 23 期，总第 63 期。

抗战期间，宣传始终是各级新运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即便在大学生暑期农村服务中，宣传也是重要任务。

战争使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失去生活来源，成为难民。新运会在战争之初即开展难民救济工作。八一三之后，南京新运会即展开难民救济工作。[①] 在武汉期间，新运会筹办难民工厂，“招收受难同胞，授以技术训练，俾难胞得自力更生，以固后方民众之经济基础，而前方将士得有日用所需，增加抗战实力，正所谓寓生产于救济，以救济为抗战者也”。[②] 这一救济方法不是单纯的施舍，而是使难民获得谋生的机会，又能为前线补充物资，可谓一举两得。此后，这一救济办法在各地展开，重庆、长沙等地均开办了难民工厂。在生活救济之外，新运会还为难民提供医疗服务。新运会在甘肃省为难民设立了问询处，并制定了《甘肃省会难民问讯处组织章则》、《甘肃省会难民问讯处办事细则》，为难民服务。[③] 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单纯的救济活动，以及募捐等方式。

募捐在战时始终是新生活运动的一项重要活动。在抗战初期，中国孤立无援，为补充财政不足，缓解财政困难，各种募捐活动层出不穷。新运总会尚在南京之时即已展开捐款活动，“发起一角募捐运动，共计募得捐款一千〇〇二元”，[④] 用于慰劳抗战将士。此后又发起一日一分运动，初期运行良好，所得款项登报刊载，后因战争影响，使这一运动“或照常推行，或停顿有日；所得捐款，或汇寄本会，或自行动支，或尚存银行，情形各殊”。[⑤] 总会鉴于此情况，决定这一运动于 1938 年 7 月 1 日全部停止。新运总会将这一运动捐款的详细情形在《新运导报》上刊出，列有明细表格，对捐款数额、用途、办理捐款的情形等都有详细说明，[⑥] 显示出这一运动的规范化。其它规模较大的活动有节约献金运动、捐献救国公债息金等。在这些较大的捐款活动之外，多是零星的捐款活动。在捐款之外，征募寒衣也是一项重要运动，在各地多有展开。“西康新运会主持棉背心运动，平日努力抗战宣传，一次捐得寒衣伍千件；福建新运会主持黄灾救济会，分三种方式征募，共得一万一千八元。”[⑦] 还有的地方捐钱铸造汉奸像，以警世人，以及捐出一日所得等。

战前平时工作也在继续地进行着，包括季节运动，即春季种植、夏季卫生、秋季节约、冬季救济。春季种植主要是植树运动。夏季卫生运动的内容则要相对广泛一些，包括加强清洁运动、发动国民生活改进竞赛、卫生防疫等诸多涉及日常生活的活动。秋季节约主要是号召节约，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冬季救济则是针对冬季这一特殊季节，展开救济活动，帮助贫苦之人。其它的整齐、清洁、卫生、规矩以及体育运动等活动在战时坚持了下来，有的与季节运动相结合，大多数是作为一项单独运动在各地推行。在各地的推行情况也不一致，这在各地的新运报告中可以看见。

新生活运动发起和推动的大学生暑期农村服务活动在战时也得以延续，但是参与的学校和服务地域明显受到限制。1938 年，许多学校尚在西迁途中，当年的活动只有川滇黔三省学校参与，[⑧] 规模也因此减小。但是众多高校迁往后方，与农村农民更加接近，其服务也更加贴近农村农民，符合农村的需要。当然，抗战是其中突出的主题，不乏兵役宣传等抗战宣传活动。此外，蒋介石还十分重视各地党政机关的新运活动，命令“各地党部团部学校与机关等，今后皆应为新运示范处，举凡总会所定之办法及其提倡之事业，皆须由以上各机关首先实施示民以行”，对不能力行者则要给与处罚。[⑨]

---

① 王淑芳：《首都新运会一年来之回顾》，《新运导报》，1938 年 4 月，第 13 期，总第 53 期。

②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武汉办事处难胞生活改进团工作简报》，《新运导报》，1938 年 7 月，第 16 期，总第 56 期。

③ 《甘肃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二十七年度工作述要》，《新运导报》，1939 年 1 月，第 21 期，总第 61 期。

④ 王淑芳：《首都新运会一年来之回顾》，《新运导报》，1938 年 4 月，第 13 期，总第 53 期。

⑤ 《一日一分运动结束》，《新运导报》，1938 年 7 月，第 16 期，总第 56 期。

⑥ 《本会办理输财救国（一日一分运动）经过并结束该项运动总报告（截至本年七月一日止）》，《新运导报》，1938 年 8 月，第 17 期，总第 57 期。

⑦ 《各地新运消息》，《新运导报》，1938 年 11 月，第 20 期，总第 60 期。

⑧ 《本会举办农村服务》，《新运导报》，1938 年，第 16 期，总第 56 期。

⑨ 《（蒋中正）电（吴铁城）（张厉生）等会订以机关学校为新生活运动领导与示范之办法》，典藏号：002-070200-00017-075，台北“国史馆”藏。

四、总结

抗战开始后，新运总会从实际出发，展开了慰劳前线士兵、照顾伤兵、宣传抗战、捐款捐物等活动。节约运动被纳入新生活运动之下，可谓一箭双雕，即利用了新运的组织优势促进其发展，又真正做到了节约人力物力。新运医疗队为前线军队和各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服务能力不足，缓解了社会服务缺乏的困顿。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抗战时期的一项重要动员活动，新生活运动利用自身的优势协助这一运动的推行，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根据现实需要提供服务是抗战时期新运的一个特点，在西南西北地区设立新运服务所就是其典型表现。新运在西南西北地区设立服务所，不但为从事运输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服务，还为边远地区的同胞带去了新运服务，西南地区的侨胞、西北地区的垦民也受惠不浅。尽管有各种不足和缺点，但是新生活运动在抗战时期的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蒋介石对新运的战时工作也给予肯定和表扬："在过去一年中，新生活运动总会所发动的工作，如组织战地服务团，慰劳伤病和前敌将士，改善壮丁的生活，提倡节约运动，发动学生暑期农村服务，都为适合抗战的需要，也都得到同胞热烈的赞助"，[①] "在抗战以后，这三年半以来，我们更致力于战地服务和后方救济，我们举办了战地服务团，举办了妇女训练，发动了兵役宣传和伤兵救济运动，收养了难童，救济了难胞的生活，推进了节约献金运动，实行了空袭服务，协助了精神总动员，更推行了其他种种与抗战建国有关的工作。"[②] 总的来看，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在坚持最终目的的同时，还适应战时的需要，展开新的活动，投入到抗战事业中，得到了新的发展，为抗战做出了贡献，实现了自身的升华。

（作者赵秀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

① 蒋中正：《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演词》，《新运导报》，1939 年 2 月，第 22 期，总第 62 期。

②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七周年纪念训词——三十年二月十九日在重庆播讲》，《新运导报》，1941 年 2 月，第 34 期，总第 74 期。

从华盛顿体系到东亚新秩序[①]
——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演进

史桂芳

内容提要：明治维新后，日本将“脱亚入欧”作为基本国策，通过与强国结盟、加入国际条约体系、实行“协调外交”等策略，来实现“与西方文明共进退”，推进“大陆政策”。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开始不满足于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下扩张权益，要打破束缚，在东亚构筑以自身为核心的新秩序，对外政策由“协调”转向“强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日本经历了从参加华盛顿体系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演变。这种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国际格局、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华盛顿体系　战略　大陆政策　东亚新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通过参加华盛顿会议、国际联盟等国际会议和组织，与列强“协调”中寻求利益最大化。但是，日本就此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要打破现状，建立在东亚的霸主地位。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告别“协调”外交，进而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提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主张。20世纪20年代—20世纪40年代的二十多年里，日本经历了从遵循现存国际体系到打破现状、建立独自领导国际新格局，从“协调”到“强硬”外交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亚太地区的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比较关注日本与华盛顿体系的关系、建设东亚新秩序等问题[②]，中国、日本两国大量相关档案、回忆录等资料的公开和出版，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日本与华盛顿体系、东亚新秩序的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实施等个案上，缺乏对日本从参与国际条约体系演变为冲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建立自身“领导”东亚新秩序的原因、演进过程、逻辑关联的研究；缺乏对日本对外政策转变与大陆政策之间关系、与近代国际秩序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阐释。本文以日本推进大陆政策过程中的策略变化为视角，利用日本外交档案、中日两国出版的史料等，系统研究日本参与、协调、冲破、重建国际体系的原因、发展轨迹及影响，特别是日本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对中国的侵略及影响，阐述日本不断发动战争的深层原因。

---

① 本文为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亚洲主义的演变与中日关系研究”（12BSS007）的阶段性成果。

② 中日学者的主要研究有：吴正俊：《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会议“边缘”谈判始末》，《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臧运祜：《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米庆余：《日本近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林庆元、杨齐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服部龙二：《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动与日本外交1918-1931》，有斐阁，2001年；细谷千博、斋藤真主编：《华盛顿体制与日美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细谷千博：《两次大战中的日本外交——1914—1945》，岩波书店，1988年；小林英夫：《帝国的幻想》，青木书店，1998年。

一、在与列强“协调”中扩张日本在东亚的利益

在19世纪“西力东渐”的过程中，孤悬海外的日本没能逃脱半殖民地的命运。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久，日本在欧洲列强的压力下，签订类似的“亲善”、“通商”条约，被卷入西方主宰的近代国际条约体系和国际关系中。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派岩仓使团出访欧美12国，其目的之一就是与西方列强重新签订新的平等条约，获得法理上与列强的对等地位。但是，日本提出的恢复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要求，均为西方国家所拒绝[①]。日本由此认识到所谓“万国公法”不过是列强欺压弱小国家的借口，要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就必须充实国力，“富国强兵”，靠实力夺取利益。甲午战争，是日本“雄飞”东亚的起点。战后的“三国干涉”，也让日本意识到在国力尚不足以与列强抗衡时，只能暂避锋芒，在与列强“协调”中寻找机会，扩张利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元老井上馨认为欧洲大战“对于日本的国运发展来说，是大正新时代之天佑。日本应举国团结一致，享受这个难得的天佑”[②]，与英、法、俄紧密联系，确保日本的利权。外相加藤高明则强调日本“一则借英要求应同盟的友谊，二则帝国可以乘次机会，清除德、意在东洋的根据地，提高国际地位。据以上两点就是参战的好机会”[③]。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其目就是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及太平洋岛屿的权益。日本随即出兵山东，抢占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控制的铁路和城市。日本还乘欧美列强忙于欧洲之际，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④] 要求。为了减少西方列强对日本的猜忌，日本打出了“协调”的旗号，1916年12月，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提出：“要尽力与列国保持协调，同时逐渐使列国承认我国的优越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在华投资也迅速增长，据统计，1919年日本对华投资为14.39亿日元，比战前增长近2倍。对华贸易总额达11.424亿日元[⑤]，比战前增长2.6倍，形成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日本为了独霸东亚而大肆扩张军备。巴黎和会上，列强接受了日本关于山东问题的“特殊条款”，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日本没有取得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法理”依据，加之列强特别是美国不愿意看到日本独霸东亚，要重新规划远东的国际秩序。

1921年11月，在美国的倡议下，召开了有英、法、意、日、中、荷、比、葡等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会议通过《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⑥]，明确规定了美、英、日、法、意五国主力舰数量和吨位，日本主力舰吨位是英美的60%。日本没有实现主力舰为英美主力舰吨位70%的愿望。但是，这个比例对日本的国力来说，已经相当高。因为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而美国则需将舰队分别布置在两个大洋，只有日本的战舰集中在东亚地区。日本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认为：“实行八八舰队计划确实有财政上的困难”[⑦]，这个比例是与日本财政状况相适应的。条约并没有限制日本海军航空兵，日本发展航空母舰。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⑧]，列强在“尊重中国主权和独立以及领土和行政之完整”的名义下，取得在中国平等的机会，否定了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亚洲“门罗主义”。日本对华盛顿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心存芥蒂，最初不想让列强插手讨论山东问题，坚持与中国直接交涉，但是，由于日本尚不具备与列强抗衡的实力，在国际干涉下日本与中

① 大久保利谦：《岩仓使团研究》，东京，宗高书房，1976年版。
② 江口圭一著：《日本历史14》，东京，小学馆，1989年版，第8页。
③ 伊藤正德编：《加藤高明》，下卷，东京，原书房，1970年版，第79页。
④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382-384页。
⑤ 雷麦著，蒋学模等译：《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5页。
⑥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9-10页。
⑦ 稻叶正夫、小林龙夫、岛田俊彦、角田顺编：《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3页。
⑧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15-18页。

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①]，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

华盛顿会议确立了东亚新的国际秩序，有学者认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远东外交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努力重新定义相互关系。在美国的主导下，旧秩序崩溃，以‘经济外交’为基础的促进调整诸权益的新时代到来”[②]。也有人认为华盛顿体系并不是什么新秩序，而是继续承袭过去的划分势力范围外交，日本在这个体系内继续推进大陆政策。[③] 笔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中国有“独大”之势，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确立了“门户开放”政策，规定了远东新的国际秩序，日本的活动被限制在华盛顿体系内，企图以此阻挡日本“独霸”中国的梦想。日本也意识到自身国力的局限，继续采取与西方列强“协调”的政策，在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下，逐步推进大陆政策。尽管日本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内阁频繁更迭，但是，其实行大陆政策的总体方针并没有改变。

1924 年 6 月，币原喜重郎任日本外相，开启了日本近代史上的“币原外交”时代。币原推行所谓“协调外交”，他认为：日本外交的根本是维护和增进在东亚的正当权益，“同时尊重各国的正当权益”[④]，与列强“协调”中获得最大的权益。币原的“协调外交”被军部视为“软弱外交”，军部主张以强硬的手段夺取中国利益。对于“软弱外交”的攻击，币原喜重郎强调：外交本无强硬与软弱的之分，取得利益是关键。“田中内阁曾经出兵山东，是积极的政策还是消极的政策？可以视出兵为积极，但是什么利益都没有得到，以失败告终。到底是消极政策还是积极政策呢？”[⑤] “协调”不意味着软弱，而是在“协调”中求得日本在华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币原一方面标榜“协调”外交，另一方面积极“协调”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把军事作为外交上“协调”的后盾。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军方秘密支持张作霖，币原则外交上配合军方的行动。正如中国学者指出的，币原“很好地利用了军方的活动，在‘不干涉’的名义下达到了干涉中国内政，维护其‘满蒙权益’的目标”[⑥]，这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高唱“协调”外交时，在寻求打破列强的制约，在现有国际体系下扩张权益。1927 年 4 月，田中义一担任日本首相兼陆相，他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东方会议讨论的《对华政策纲领》，核心就是要独占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田中内阁时期，日本外交渐趋强硬。但是，日本仍然在华盛顿体系框架内进行扩张活动，还没有公开抛弃华盛顿体系、构建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

二、冲破华盛顿体系侵占中国东北

日本一直对中国东北垂涎三尺，为配合武力扩张，20 世纪 20 年代起，日本就有学者以学术研究为名，论证东北与中国不同，强调东北地区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认为：“满洲本来就不是支那的领土”[⑦]，“支那如果希望完成新国家组织，就要抛弃满、蒙、藏等支那力所不及，又本非其领土的边疆地区”[⑧]，从历史上为日本侵略代表制造根据。1930 年初，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波及日本，日本社会矛盾激化，日本政府千方百计地寻找摆脱危机的途径，将向中国东北扩张作为解决国内危机、转移社会矛盾的办法。1931 年 1 月，前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提出“满蒙是我国的生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东京，原书房，1978 年版，第 4–8 页。

② 小池圣一著：《华盛顿体制的理解与变迁——战后日本近现代史的史学史考察》，《中央史学》第 21 号，1998 年，第 47–71 页。

③ 服部龙二著：《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动与日本外交 1918–1931》，东京，有斐阁，2001 年版，第 5 页。

④ 币原喜重郎财团编：《币原喜重郎》，东京，大日本协会印刷株式会社，1955 年版，第 262 页。

⑤ 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原书房，1974 年版，第 105 页。

⑥ 宋志勇、田庆立著：《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8 页。

⑦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论》，京都弘文堂书房 1923 年版，第 102 页。

⑧ 同上，第 27 页。

命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满蒙政策的危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严重”①。1931 年 3 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从军事上所见满蒙》一文中，提出解决满蒙问题“是基于日本帝国的使命，是建立在实现伟大理想之上的”②。1931 年 5 月，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满蒙问题私见》中也提出政府要充分认识中国东北问题的价值，“按照日韩合并的要领，对外宣布满蒙合并”③。关东军加紧在东北地区的调查和实战演习，准备着在东北发起军事行动。9 月，日本关东军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迅速武力侵占东北。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摄于中国人抗日压力，也担心国际上的干涉，将直接把东北并入日本的“领有满洲”的计划，改为扶植傀儡政府，“在满蒙建立独立国，将其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④，达到与直接“领有满洲”同样的目的。1932 年 3 月，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日本对东北的侵略表明，它已告别“协调外交”，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声称：“就日本的角度来看，满洲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只是承认满洲国问题”⑤，8 月 8 日，日本政府宣布承认伪“满洲国”。

中国政府抗议日本侵害中国主权、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行为，并向国联申诉日本。1932 年 4 月，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形成了《李顿报告书》。报告书认为日本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是非法的，“满洲国”不是中国自发的独立运动。报告书并没有指出日本侵略性质，要求东北设立自治政府，由列强共同管理。日本外务省发表长篇反驳意见书，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坚持“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反驳《李顿报告书》。在国联大会上，中日两国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933 年 2 月 24 日，国联召开特别大会对《关于中日争议的报告书》进行表决，报告书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奉劝日本从中国撤兵。报告书以 42 票赞成、1 票弃权（泰国）、1 票反对通过，日本投了唯一的反对票。松冈洋右声称：“远东纠纷的根本原因在于支那无法律的国情及不承认对邻国的义务，完全唯自己的意志行动之不合理愿望。支那在至今为止的长时期内懈怠作为独立国的国际义务，日本作为其最近邻的国家，蒙受了巨大损害”⑥。27 日，日本政府发表《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文及诏书》，称：“帝国政府认为已经没有与国联合作之余地，根据国联规约第一条第三款，帝国宣告退出国际联盟”⑦。天皇也在诏书中称：“在满洲国新生政权成立之时，帝国尊重其独立、促进其健全发展，以铲除东亚祸根，维护世界和平。不幸的是这与国联看法背道而驰，朕与政府审慎考虑，乃决定退出国际联盟”⑧。日本公开表示在中国问题上已经无法与列强协调，退出国联，独自维护东亚“和平”，表明日本告别华盛顿体系，进入构筑自身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阶段。

日本退出国联后，继续以武力为后盾压迫中国。1933 年 3 月，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随即进攻河北。5 月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日本以“塘沽协定为跳板，一步一步向华北渗透”⑨。1935 年 6 月，中日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日本通过这两个协定，排挤冀察平津一带的国民党势力。1935 年 11 月 25 日，日本策动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 月 25 日起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脱离国民政府的管辖。1935 年 12 月 16 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的半自治的地方政府，华北实际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

总之，日本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告别了“协调”外交，走向“自主”的强硬外交。而列强

① “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论》，东京，满蒙同胞后援会，1980 年，第 86 页。
② 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 7 满洲事变》，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 年版，第 139 页。
③ 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　国防论策》，东京，原书房，1967 年版，第 78 页。
④ 江口圭一著：《大系日本の历史 14》，东京，小学馆，1989 年版，第 201 页。
⑤ 内田康哉传记编委会编：《内田康哉》，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9 年版，第 334 页。
⑥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东京，原书房，1978 年版，第 264 页。
⑦ 同上书，第 269 页。
⑧ 同上书，第 269 页。
⑨ 安井三吉著、史桂芳等译：《卢沟桥事件》，香港，科华出版有限公司 1999 年 3 月，第 16 页。

对日本的姑息，只能助长其野心，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可避免。

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着手建立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进入全面战争阶段。1937 年 12 月，日军占领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1938 年 1 月 11 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决定：“若支那先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帝国今后也不期待以其为对手解决事变，扶植成立新的支那政权，与之协商调整国交、建设新支那”①。1 月 16 日，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言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②。18 日，日本政府又发表《补充声明》，强调“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权更为强硬。从历来的国际法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就可以达到目的。因为尚未到达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时期，所以，这次开国际法上的新例，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将它彻底抹掉”③。表明日本对中国政府的极端鄙视。日本认为攻占了国民政府首都，中国就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战争有望结束。然而，国民政府并没有屈服，宣布迁都，继续坚持抗战。1938 年 10 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很难再组织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了。日本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重新审视国民政府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改变“速战速决”的方针，准备应付长期战争。

1938 年 11 月 3 日，近卫内阁发表《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第二次对华声明，虽然继续声称“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绝不收兵，直到其崩溃为止”，又说“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④，改变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希望国民政府进行适应日本政策需要的改组后，参加东亚新秩序的建设。第二次近卫声明首次公开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日本由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发展到建设自身主导东亚新秩序的“立”的阶段。东亚新秩序的目标是确保东亚的永久和平，而东亚新秩序的具体内容就是“确立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互助关系，确立东亚的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东亚新秩序的理念是“渊源于我国的肇国精神。完成这一建设，是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任务”⑤，日本希望中国参加到东亚新秩序建设中来，承担建设新秩序的责任。

1938 年 11 月 30 日，御前会议做出《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的决定，提出“在互惠的基础上，日、满、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⑥ 三项原则。在“善邻友好”中，日本坚持中国要承认“满洲国”，建立所谓日满华三国的友好关系，在“共同防卫”中，要求中国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继续在中国驻兵，“经济提携”则要求中国为日本开发华北资源提供便利。东亚新秩序是日本“大陆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发展。12 月 22 日，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重申“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⑦ 的原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近卫三原则，呼吁“日满华三国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⑧ 经过日本御前会议和政府声明，明确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内容和原则，昭示着日本对华盛顿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东京，原书房，1978 年版，第 385 页。
② 同上书，第 386 页。
③ 同上书，第 387 页。
④ 同上书，第 401 页。
⑤ 同上书，第 401 页。
⑥ 同上书，第 405 页。
⑦ 同上书，第 407 页。
⑧ 同上书，第 407 页。

体系的彻底否定，在东亚确立日本为核心的东亚新秩序。

国民政府“外交部”第二天就发表声明，认为日本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政策没有改变。12 月 26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题为“揭发敌国阴谋与阐明抗战国策”演说，驳斥近卫声明“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①，逐一驳斥近卫三原则，认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是“推翻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总名称”②。

为拉拢中国参与东亚新秩序建设，1938 年 10 月，日本内阁决定设立以总理大臣为总裁的“对支院”③，处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务。蒋介石并没有被“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所迷惑。而一贯对抗日持悲观态度的汪精卫则在 12 月 19 日逃离重庆。近卫声明发表后，汪精卫立即发表《艳电》，称对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即以此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恢复和平”，“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痛巨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④。1939 年 1 月 1 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6 月，又以汉奸罪通缉汪精卫。1940 年 3 月 30 日，汪精卫在日本的支持下建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1940 年 11 月，汪精卫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条约》，条约给日本在中国驻扎军队、资源开发利用等各方面的便利，汪精卫以出卖国家主权获得日本的支持。同日，日本、汪伪国民政府、伪“满洲国”签订了《日满华共同宣言》。日本认为这是建设东亚新秩序的重要成果，“日满华三国完全融为一体，朝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目标迈进”⑤。日本还要继续扩大新秩序的成果，实现新的发展。

四、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与太平洋战争

1940 年 7 月，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7 月 26 日，日本政府制定《基本国策纲要》，提出“皇国现在外交之根本在于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其重点是解决支那事变，实现国防建设的飞跃，采取灵活的施政方针，以推进皇国之国运”⑥，把东亚新秩序发展到“大东亚新秩序”阶段，将“帝国”改称“皇国”。7 月 27 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通过了《伴随世界形势变化处理时局纲要》，纲要确定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帝国与世界形势的变化相适应，改善内外形势，在促进中国事变迅速解决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⑦，这里的南方指东南亚、西南太平洋一带，要夺取英、法等欧洲列强在这一带的殖民地，建设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新秩序。8 月 1 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发表讲话：“根据皇道大精神，首先确立日满华作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与过去被称为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安定圈是同样的，它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日满华是其一环”⑧，这是日本政府官员首次将大东亚新秩序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此后，“大东亚共荣圈”就成为日本建立国际新秩序、推行新扩张政策的代名词。9 月 27 日，日本与德、意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取得了德、意两国对日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支持，日本承认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日三国相互配合在欧亚分别调整英美等主导的国际秩序，激化了与英、美等国的矛盾。

①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五》，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年，第 670-671 页。
②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五》，第 672 页。
③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 392 页。
④ 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　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74 页。
⑤ 《朝日新闻》，1940 年 12 月 1 日（夕刊）。
⑥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 436 页。
⑦ 同上书，第 437 页。
⑧ 《东京朝日新闻》，1940 年 8 月 2 日（夕刊）。

随着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日本资源更加紧张，外相松冈认为“在各国推进经济集团化建设时，日本也需要扩大通商贸易上所必需的地域”①。“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取决于“共荣圈缔约界限最重要的必要条件是经济条件。如果东亚地区不能充分满足必要的经济条件的话，只要地理相邻，就必须扩大到东亚以外的地域”。② 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有很多没有开发的资源，当地居民又无力开发利用，“将非有力民族居住的地方当作日本的领土，为东亚诸民族开发利用”③。

为了夺取南洋资源，日本打出了帮助东亚各国从欧美侵略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旗号，“拥护王道从日本扩展到整个东亚，进而到全世界，是扶卫皇运的具体体现。但是从世界的形势看，以欧洲为中心存在着阻碍大业的霸道势力，不排除霸道势力，就不能完成八纮一宇的大业”④，在大东亚共荣圈内排除欧美旧势力，实现日本与这些民族“和衷共济、共存共荣、邻保互助”，维护大东亚的繁荣与安定。日本从人种上、地理、文化、历史等角度，鼓吹东亚各民族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必要性，把日本领导的新秩序从中国大陆扩展到太平洋地区。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开始了“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大东亚共荣圈进入实施阶段。东条英机认为：“帝国据国家总力进行大规模作战向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迈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大东亚各国及各民族各尽其力，确立以帝国为核心的基于道义的共存共荣秩序。这次新参加建设的地区，资源极其丰富，但是，最近百年来饱受美英两国的压榨，影响了文化发展。帝国来到这些地区，是为了确立大东亚的永久和平，进而与盟邦移到建设世界新秩序，这是亘古未见的大事业”⑤，鼓吹日本要确保大东亚战略据点，控制这些地区的资源，直至英美屈服。为了减少日本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阻力，日本鼓吹“天皇陛下为了大东亚的建设即亚洲解放，向美英两国的宣战大诏是拯救亚洲十亿民族的福音，是世界史上万古不变的宣言”⑥，用亚洲人民对欧美殖民统治者的不满，宣扬“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把亚洲各个民族从白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以种族对立来掩盖日本重新划分世界、建立世界霸权的野心。1942 年 2 月，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规定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是“日满华及东经 90 度至 180 度之间、南纬 10 度以北的南北各地区”⑦，表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1942 年 11 月 1 日，日本废除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和拓务省，成立了大东亚省。大东亚省设四个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南方事务局。成立大东亚省的目的，就是由日本直接控制占领区的外交、军事，使这些地区彻底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正如东条英机所说：“大东亚圈内没有外交”⑧。1943 年 11 月 5 日，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及“新菲律宾”总统罗雷尔、缅甸元首巴莫、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鲍斯等出席了会议。会上发表了《大东亚共同宣言》，确定了建设大东亚的纲领，“大东亚各国互相合作，确保东亚之安全，并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之秩序；大东亚各国应该相互尊重自主独立，实现互助敦睦，确立大东亚之亲善友谊；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传统，发挥各民族之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之文化；大东亚各国应在互惠之下紧密提携、合作，以谋求经济发展，来增进大东亚之繁荣；大东亚各国应与万邦敦睦交谊，消除人种差别，普遍进行文化交流，进而开放资源，以贡献于世界之发展”⑨。冠冕堂皇的“共存共荣”、“亲善”、“提携”等，都是为确立日本在大东亚的“领导”地位，确保日本在东亚的独占侵略利益。

① 《松冈外相演说集》，东京，日本国际协会 1941 年版，第 13～14 页。
② 前田光雄等：《大东亚共荣圈的民族》，东京，六盟馆，1942 年版，第 14 页。
③ 《石原莞尔选集 4》，东京たまいらぼ社 1986 年版，第 161 页。
④ 同上书，第 152 页。
⑤ 江口圭一著：《大系日本の历史 14》，东京，小学馆，1989 年版，第 30 页。
⑥ 伊东六十次郎：《大东亚战争と东亚联盟运动》，《东亚联盟》1942 年第 3 期，第 8 页。
⑦ 《杉山笔记》，下，原书房，第 88 页。
⑧ 深井英五著：《大东亚省的设置》，东京，岩波书店 1967 年再版，第 266 页。
⑨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 594 页。

1943 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转为守势。1943 年美、英、中三国发表《开罗宣言》。1944 年 8 月，日本通过《世界形势判断及指导大纲》，承认“大东亚诸邦，除满洲之外，在现在的形势下，对日合作态度已有消极之兆”①，为了避免失败，日本决定加紧对重庆政府的工作，解决中日战争；确保南洋地区，保全海上交通线；与德国紧密联系等，企图做最后的挣扎。1945 年 5 月 9 日，日本发表《关于德国投降的政府声明》，声称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自存自卫”，“欧洲战局的急变，丝毫不会改变帝国战争目的”。6 月 8 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今后应采取战争指导的基本大纲》中，仍然坚持“举国一致”、完成战争，并准备“本土决战”，顽抗到底。但是，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谓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也随着日本战败而化作泡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推行大陆政策过程中，经历了从“协调”外交到“强硬”外交、从参与国际体系到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侵略的过程。20 世纪 30—40 年代，日本对国际秩序的“破”与“立”的过程中，列强企图以姑息、绥靖政策继续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这反而助长了日本打破国际现状的野心。

（作者史桂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 602 页。

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制度的起源与变迁

王树林

内容提要：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制度起源于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部队中设立的组织领导体制和政治工作制度。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观念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理念，在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中普遍地设立了军政委员会。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逐步健全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军政委员会成为党在人民军队中的最高领导机关，并且曾经演变为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全面工作的最高组织机构。军政委员会制度实行党的集体领导与部队首长负责相结合的领导组织体制，为党领导人民军队开辟、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提供了强力制度保障。

关键词：抗日战争　八路军　新四军　军政委员会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在部分红军部队中创设了军政委员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确保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先后在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中普遍地设立军政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军政委员会是党在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中的最高领导机关，并且曾经演变为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全面工作的最高组织机构。军政委员会制度实行党的集体领导与部队首长负责相结合的领导组织体制，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拟以考察军政委员会的起源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军政委员会机构的设置及其性质的演变。

一、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制度的起源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就运用苏联红军的经验，在部分军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红军部队中逐步建立起规范的组织领导体系和政治工作制度。

（一）中共在红军部队中组织系统和领导体制的演变

1927 年 8 月，南昌暴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和领导军队的开始。在人民军队中建立党组织是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9 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后，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以红一方面军为参照系，中共在红军部队建立了自己严密的组织系统、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党在红军中的组织系统为：连有党的支部委员会（支委）；营、团、师分别设立党的营委员会（营委）、团委员会（团委）、师委员会（师委）；军有党的军委员会（军委）或前敌委员会（前委），军团有党的军团前敌委员会，方面军有党的总前敌委员会（总前委）。党的工作机关设立司令部、政治部、

经理处、军医处等。党的各级委员会对部队行使完全的领导权，举凡部队建设、作战方针、干部调配等重大问题，均须党的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有关干部分工执行，不得擅改。部队建设的某些至关重要问题，还要由党的代表大会做出决定。①

1929 年 12 月，古田会议强调在红军中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实行党委制等一系列根本原则。党委制在全国各红军部队中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与“支部建在连上”相配套的是，中共继续采用仿效苏联红军模式的北伐战争时期的党代表制度。自 1929 年起，红军中的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从 1931 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土地革命战争中期，红军中党的各级委员会取消了，由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代替了党委制。1930 年 10 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师以上部队政治机关中，设立负责处理党的日常事务的工作机关党务委员会。各级党务委员会由各级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特殊情况下，由上级政治部指定；书记一般由政治部主任兼任。1931 年 11 月，赣南会议通过《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机械照搬苏联经验，认为红军的党委制犯了“党的包办主义的错误”，因而做出了取消红军党委制的决议。至 1932 年 10 月宁都会议时，各地红军先后用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取代了党委制。②

中共中央移驻江西瑞金伊始，即模仿苏俄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关的权力至高无上。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丧失原有的根据地而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在紧张的战争状态中，党、军队、政权已融为一体，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在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体制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在军队政治委员制取代党委制的情况下，为了适应新的斗争环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保证党的政策在红军部队中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和党统一领导根据地党政军民全面工作，中共中央在远离中央领导并且独立开辟新苏区的红六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西路军等部队中设立军政委员会。但是，军政委员会制度在中共领导的红军部队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当时直接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掌控的中央苏区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中就没有设立类似的组织机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则是在闽西的红军部队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由中央分局代表领导设立的军队与地方党政合组的军政委员会。因此，中共在红军部队中主要是实行政治委员制度。

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军政委员会的创设来看，中共借鉴了苏联在远东游击战争时期的经验，即在远离苏区单独作战的红军部队中成立军事委员会，到新开辟的地区开展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部队政委，便于单独作战时统一集中领导，统一行动，③ 例如，中共曾在红七军团设立的军事委员会即相当于军政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政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包括部队首长及其副者等，主席一般地由政治委员（或中央代表）担任。由于当时红军部队实行的是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对红军行动拥有最后决定权，故而政治委员在军政委员会的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央代表在部队中起着领导、监督和协调作用，并负责直接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联系。军政委员会中政治委员和中央代表可以一身二任，其成员则大多包括红军部队中的军团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从而组成该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管理党务、政治与军事。在设立军政委员会的红军部队中，其按照政治委员制建立的党组织形式没有变化。④ 在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的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 1 卷，长征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4-45 页。

② 同上书，第 2 页。

③ 方方：《三年游击战争》（1948 年 8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西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6 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 1 卷，长征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64 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79-380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07 页。

恶劣战争环境中，军政委员会这种体制不仅部分起着红军中党的委员会集体领导的作用，而且可以建党、建政、建军并指挥之，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临时性的组织机构，其职能超越了红军中党的委员会。

（二）中共在红军部队中政治工作制度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是通过军队中各级党组织开展政治工作来实现的。中共在创建红军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三湾改编”是中共建立军队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和民主管理，确立新型官兵关系的开始。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初步提出和制定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官兵平等、军民团结的内外关系及正确的俘虏政策等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

古田会议确立了中共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一、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二、科学阐明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党组织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从理论上和组织上保证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三、提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各项措施。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放在首位，具体分析了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根源，指出了纠正的方法。强调了保证官兵平等、开展群众工作和优待俘虏兵等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初步形成了正确处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原则。①

1930 年 10 月，参照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制定和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明确指出了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是苏维埃政权的一部分，是党在红军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具体规定了红军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和政治工作机关及党和青年团的设置及工作职责、任务、范围和方法。这是红军第一部全军性的政治工作法规，对红军政治工作的规范化起到了推动作用。1934 年 2 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强调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确立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的胜利”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部队战术技术水平、政治工作人员要学习军事和指挥打仗等任务。② 由于受教条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红军的政治工作也存在着照搬苏军教条、脱离红军实际的错误倾向。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后，红军政治工作中一系列正确原则和优良传统逐渐恢复，为保证红军长征胜利，贯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转变，发挥了积极作用。

八路军、新四军是由红军部队改编而成的，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中共在领导红军时期的政治理念、组织观念、领导原则和工作制度等得以在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中传承。1937 年 10 月，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毛泽东从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两个方面分析了八路军的特点，提出了军队的作战方法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的观点。他对北伐战争时期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致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③ 毛泽东的论述不仅说明了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制度的起源，而且为我们探讨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制度的变迁提供了基本的逻辑框架。

---

①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8–115 页。

②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十年大事记（1927—2007）》，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6–37 页、第 73–74 页。

③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78–381 页。

二、红军部队的改编与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军政委员会机构的设置

1936 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共产党放弃苏维埃革命政策，转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 1937 年初到全国抗战爆发，中共就红军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而红军改编的中心问题是保障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单一领导。在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过程中，为了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同时为健全党的组织，以集体领导的方式来代替政治委员制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红军改编后的部队中设立军政委员会。

1937 年 5 月 10 日，博古（秦邦宪）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在新形势下党对军队的领导，首先是“保障与巩固部队中的工农成分，共产党的单一领导”。为此，“实行红军中的单一首长制”；“在军、师及独立行动之单位组织军政委员会”，作为党的组织，“指导军队的全部政治和军事工作，并向党中央负责”。① 大致在 6 月或 7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对红军改编后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中组织军政委员会，在团、师以上组织党务委员会做出原则规定：“改编后的红军，为适应新的条件的变更，确定红军中实行单一首长制”；“同时为健全党的组织，以集体的领导方式来代替政治委员制度，故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则组织军政委员会”；“为使党内的工作与一般的政治工作分开，党的工作与组织应有其独立系统，故在团师以上则组织党务委员会”。② 为贯彻执行这一决定，8 月 1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红军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具体规定：党的组织“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负责”。军政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由该部之首长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五人组织之（其余二人由上级指定）”，“其名单和书记均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指定与批准”。为了使军队中党内的工作与一般的政治工作分开，师、团两级及总部和师的直属队组织党的委员会；旅、营两级由军政主要干部组织特别小组；连队建立党的支部。各级党委会领导党的一切工作，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并且还规定：政治机关“师以上设政治部，团设政治处”；“营设政治教导员，连队设政治指导员”。③ 同日，红军总政治部做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应该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应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④ 强调改编后的红军必须坚持共产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

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重新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各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军事建设。其成员由 11 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亦称主席），周恩来、朱德任副书记（亦称副主席）。8 月 25 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驻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总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设 3 个师的建制：第一一五

① 秦邦宪：《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要》（1937 年 5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6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1937 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3 页。

③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红军改变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1937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19–423 页。

④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1937 年 8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 页。

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第一二〇师，“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梯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第一二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①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前方军委分会及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其成员 9 人，组成前方军委分会（1941 年 4 月后改称华北军分会），受中央军委统辖。八路军 3 个师分别成立军政委员会：第一一五师由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周昆、肖华组成，以林彪为书记；第一二〇师由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王震组成，以贺龙为书记；第一二九师由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王宏坤组成，以刘伯承为书记。②（详见表一）各师军政委员会均受前方军委分会统辖。

表一：八路军各师军政委员会成员名录（1937 年 8 月）

	领导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	书记	林彪	1937. 8—一一五师师长
	委员	聂荣臻	1937. 8—一一五师副师长
	委员	罗荣桓	1937. 8—1941. 7 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
	委员	周昆	1937. 8—1938 初一一五师参谋长
	委员	肖华	1937. 8—一一五师政训处副主任
一二〇师军政委员会	书记	贺龙	1937. 8—1940. 11 一二〇师师长
	委员	关向应	1937. 8—1940. 11 一二〇师政训处主任
	委员	萧克	1937. 8—1940. 11 一二〇师副师长
	委员	甘泗淇	1937. 8—1940. 11 一二〇师政训处副主任
	委员	王震	1937. 8—1940. 11 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副旅长
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	书记	刘伯承	1937. 8—一二九师师长
	委员	张浩	1937. 8—一二九师政训处主任
	委员	徐向前	1937. 8—一二九师副师长
	委员	陈赓	1937. 8—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
	委员	王宏坤	1937. 8—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 八路军 · 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 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 2 卷，长征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68、98 页。

1937 年 10 月，经与国民党谈判，中共同意将在南方湘、赣、闽、粤、浙、鄂、豫、皖 8 个省 14 个地区活动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国共合作抗战伊始，新四军不仅接受中共的领导，而且也接受国民政府军事机构的指挥，其组织序列和党的组织设置较之八路军方面要复杂一些。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1938 年 11 月后改称“东南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兼新四军分会书记（亦称“主席”），陈毅为新四军分会副书记（亦称“主席”）。③ 作为中共中央军委的派出机构，新四军分会负责领导新四军及新四军内党的事务，以确保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从 1937 年 9 月到 1938 年 3 月，新四军的领导机构逐步建

①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 八路军 · 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20 页。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成立前方军委分会及各师军政委员会的决定》（1937 年 8 月 2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 八路军 · 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 页。

③ 关于新四军分会的成员，有张闻天的 5 人说和项英的 9 人说，需要发掘新史料来考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 2 卷，长征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3–204 页。

立健全起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新四军的编制为4个支队（大致相当于旅的建制），分别由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任第一、二、三、四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组建初期，支队大部建立了军政委员会，或与地方党政合组了军政委员会，江北指挥部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1940年1月改称“皖东军政委员会”），江南指挥部成立了军分委。[①]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新四军最初的4个支队中，第三支队、第四支队设立了军政委员会。其中第三支队军政委员会由谭震林、张云逸、胡荣、赵凌波组成，以谭震林为书记（亦称“主席”）；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由高敬亭、郑位三、吴先元、郑维孝、林维先、胡继亭、肖望东、戴季英组成，以高敬亭为主席（即书记）。[②]

全国抗战初兴，红军接受改编，由于受国民党的干涉和共产党自身的让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曾一度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鉴于政治工作弱化给军队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恢复人民军队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先后任命了师、旅政治委员，并撤销了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③]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体制大体上是：中共中央军委设置军委分会作为党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各师级部队设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的统辖。军政委员会负责军队中党政军的全面工作，在实际上起着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要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部队实行单一首长负责制，最主要是负责军事工作，对军事事宜具有决策权，部队首长在军政委员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由此可见，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制度是一种党的集体领导与部队首长负责相结合的领导组织体制。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军政委员会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红军部队的军政委员会相比，具有如下特点：一、军政委员会是师一级或相当于师一级部队中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由于取消了政治委员，尽管仍存在师党委会，其职能已成为在同级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大体仅负责党务工作的组织。二、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秘密组织，军政委员会组织不向下级宣布，其关于军事、政治和党的工作的决定，分别交给军事、政治及党的机关执行。三、军政委员会实行的是集体领导与单一首长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军政委员会的书记（或主席）由部队首长担任，实行单一首长负责制。军政委员会不干预单一首长的日常职务和工作，对一般问题也只作原则上的决定和定期检查。单一首长对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不同意时，则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解决之，但在解决前仍须执行军政委员会的决定。这些特点表明，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军政委员会的设立，是中共以集体领导的方式来代替政治委员制度，健全军队中党的组织的重大举措，从而在制度层面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军政委员会性质的演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仅担负着抗击日军和伪军的作战任务，而且肩负着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治使命。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与地方党政共同组建了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全面工作。中共以八路军、新四军为基干力量，在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起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民众团体各自相对独立的系统。实行军政委员会制度是中共开辟、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大政治举措。

抗日战争伊始，中国共产党即明确提出自己参加抗战的战略方针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2卷，长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213页。

② 同上书，第211-212页。

③ 《八路军总部关于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及执行党代表制致张闻天并周恩来、邓小平电》（1937年10月19日），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73-74页。

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日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等。而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②] 中共向国民党解释这一方针的内涵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③] 要实施游击战争，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保存、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共产党的组织，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在各部队设置军政委员会，首先为开辟抗日根据地提供组织支持。

随着日军进攻的深入和国民党军的败退，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在陆续开赴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抗日前线不久，便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收复大片沦陷的国土，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1937 年 10 月至 1938 年 10 月，八路军在华北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太岳山南、晋西南、冀中、冀热辽、冀南、冀鲁豫、山东、鲁西北、冀鲁边和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华中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在开辟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与地方党政共同组建了军政委员会。这一时期，在抗日根据地陆续建立的这种军地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主要有：1938 年 3 月成立的以黄克诚为书记的太南军政委员会，6 月成立的以马国瑞为书记的冀鲁边军政委员会，9 月成立的由彭雪枫任主席的豫东军政委员会，10 月成立的以肖华为书记的新的冀鲁边军政委员会；1939 年 2 月成立的以贺龙为书记的冀中军政委员会，以萧克为书记的冀热察军政委员会，3 月成立的以罗荣桓为书记的鲁西军政委员会，8 月成立的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以朱瑞为书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1940 年 2 月成立的以贺龙为书记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3 月成立的以刘瑞龙为书记的苏皖边军政委员会，4 月成立的以黄克诚为书记的冀鲁豫军政委员会。这些军政委员会已经不再是原来中共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中单纯管理军队事宜性质的军政委员会了，而是统一领导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全面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

1940 年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关于各地组织军政委员会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各地组织的军政委员会，“以在当地党政军民各机关最负责的党员组织之，对当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负统筹的完全的责任并使各方面的工作求得适当配合，调整各机关的工作关系，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同志均须执行”。[④] 从而对军地合组的军政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机构性质和职能权力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从实践来看，八路军、新四军打到哪里，便把政权建到哪里，党的领导机关也建到哪里。一般情况下，开辟抗日根据地主力部队的负责人，大多是这一地区军政委员会成立时的主要负责人。军队的党组织首先帮助地方的党组织建设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起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民众团体各自相对独立的系统。当地方党组织在能力和威信各方面均能实际统一当地党政军民之领导时，以军队党组织为主导的军政委员会即可撤销，一切领导权乃归诸地方党组织，即党委领导一切。因此，军地合组的军政委员会并非永久性的组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抗日根据地领导该地区党政军民全面工作的组织机构都叫军政委员会，有的则设党的委员会，例如 1940 年成立的苏北区党委，就是这种实行统一领导的党委会，其性质和职能与军地合组的军政委员会基本相似。另外，八路军、新四军在开辟抗日根据地组建军政委员会

①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原则致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电》（1937 年 8 月 1 日），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 八路军 · 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 页。

③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解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 年 9 月 12 日），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 八路军 · 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 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 2 卷，长征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0 页。

的同时，其主力部队内部的军政委员会仍旧存在，例如 1941 年 8 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与山东部队会合后，组成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与此同时，一一五师有以罗荣桓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山东纵队有以黎玉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

1941 年，针对“各部队党的集体领导的作用不够，许多同志不善于发挥集体的力量来领导工作，甚至有的同志在首长制的名义下一切事情均独断专行，弄出了许多错误”的情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一、扩大党的集体领导的范围，在团以上组织军政委员会；二、颁布条例，对军政委员会的职权组织做出明确规定。① 同年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的命令》，提出“游击战争的环境与部队的分散行动，要求一定限度的集体领导与一定限度的集中指挥”。规定“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各级的集体领导机关。各级军政委员会“由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主要负责人组成之”，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一般的由政委担任；并明确规定军政委员会“为执行上级指示，决定该部大政方针，布置工作及检讨工作的计划机关”。“凡关系本部的军、政、党、后勤等一切工作，均可讨论决定”，并拥有“批准干部之升迁与调动”之权，其决定交由各部门执行。军政委员会实际上起着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但这并不削弱部队首长个人负责制。② 该条例颁布之后，八路军、新四军团、支队及分区以上部队内普遍建立与健全了军政委员会，成为本级部队中的最高领导机构。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重建军部，整编部队，完全摆脱国民党军政方面的束缚，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单一掌控的党军。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之后，新四军部队军政委员会制度的建设颇具典型意义。1941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新四军各师的领导干部：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副师长罗炳辉，政治委员郑位三，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兼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吴文玉；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兼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肖望东；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兼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任质斌；第六师师长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③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新四军各师军政委员会人选的提议：第一师由粟裕、刘炎、钟期光、周林组成，以刘炎为书记；第二师由张云逸、罗炳辉、郭述申、周骏鸣、郑位三组成，以张云逸为书记；第三师由黄克诚、吴法宪、彭雄、彭明治、朱涤新组成，以黄克诚为书记；第四师由彭雪枫、张震、肖望东、岳夏、赖毅组成，以彭雪枫为书记；第五师由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陈少敏组成，以李先念为书记；第六师由谭震林、江渭清、罗忠毅组成，以谭震林为书记；第七师由曾希圣、张鼎丞、孙仲德、何伟组成，以曾希圣为书记。④（详见表二）同年 5 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与东南局合组成立了华中局，同时组成了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即新四军分会），均由刘少奇任书记统一领导新四军的工作。新四军部队师、旅、团等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即是各该级的军政委员会。⑤

---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 2 卷，长征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 页。

②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的命令》（1941 年 2 月 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15-616 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1941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各师领导干部的任命》（1941 年 2 月 1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9、206 页。

④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各师军政委员会组成致陈毅等电》（1941 年 4 月 3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1 页。

⑤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 2 卷，长征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6、258 页。

表二：新四军各师军政委员会成员名录（1941 年 4 月）

	领导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第一师军政委员会	书记	刘炎	1941. 4—1942. 3 第一师政治委员
	委员	粟裕	1941. 4—1945. 1 第一师师长
	委员	钟期光	1941. 4—1945. 1 第一师政治部主任
	委员	周林	1941. 4—新四军政治部锄奸部部长
第二师军政委员会	书记	张云逸	1941. 4—1943. 2 第二师师长
	委员	罗炳辉	1941. 4—1945. 9 第二师副师长
	委员	郭述申	1941. 4—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未到职）
	委员	周骏鸣	1941. 4—1943. 2 第二师参谋长
	委员	郑位三	1941. 4—1943. 2 第二师政治委员
第三师军政委员会	书记	黄克诚	1941. 4—1945. 9 第三师师长、政治委员（兼）
	委员	吴法宪	1941. 4—1945. 9 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委员	彭雄	1941. 4—1943. 2 第三师参谋长
	委员	彭明治	1941. 4—1945. 9 第三师第七旅旅长
	委员	朱涤新	1941. 4—第三师第七旅政治委员
第四师军政委员会	书记	彭雪枫	1941. 4—1944. 9 第四师师长、政治委员（兼）
	委员	张震	1941. 4—1945. 9 第四师参谋长
	委员	肖望东	1941. 4—1942. 10 第四师政治部主任
	委员	岳夏	1941. 4—1945（？）秘书长
	委员	赖毅	1941. 4—1945. 9 第四师第十二旅政治委员
第五师军政委员会	书记	李先念	1941. 4—1945. 9 第五师师长、政治委员（兼）
	委员	任质斌	1941. 4—1945. 9 第五师政治部主任
	委员	刘少卿	1941. 4—1945. 1 第五师参谋长
	委员	陈少敏	1941. 4—1945. 9 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
第六师军政委员会	书记	谭震林	1941. 4—1942. 11 第六师师长、政治委员（兼）
	委员	江渭清	1941. 4—1942. 11 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
	委员	罗忠毅	1941. 4—1941. 11 第六师参谋长
第七师军政委员会	书记	曾希圣	1941. 4—1945. 9 第七师政治委员
	委员	张鼎丞	1941. 4—第七师师长（未到职）
	委员	孙仲德	1941. 4—1945. 9 第七师第十九旅旅长
	委员	何为	1941. 4—1943. 8 第七师政治部主任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 新四军 · 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1 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 2 卷，长征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4、277、284、291、299、308、311 页。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颁布的军政委员会条例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团、支队及分区以上主力部队中普遍建立了军政委员会，而此前在抗日根据地内军队与地方党政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一律改名为军政党委员会，以后又改名为党政军委员会，以资区别。例如，太行军政委员会 1941 年即改为太行军政党委员会，1942 年 2 月又改为太行党政军委员会；太岳区军政委员会也于 1941 年初成立了以陈赓、薄一波、安子文等组成的太岳区军政党委员会。军政委员会条例颁布和实施之后，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中的军政委员会的性质大体上与 1937 年 7、8 月间中共中央规定的军政委员会的性

质相似，不同的是那时只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中设立军政委员会，而现在则向下延伸到团、支队和分区以上的部队。这一时期，因应抗日战争深入发展和敌后战场持续延展的基本情势，中国共产党不仅扩大了军队中党组织的集体领导范围，而且尝试着厘定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伴随着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各种力量的发展壮大，军政委员会制度逐渐地演化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项基本制度。

四、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制度的终结

1941 年至 1942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处于抗战时期最为困难的阶段。为了做好迎接新的大发展局面到来的准备，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在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背景下，党委制逐渐取代了军政委员会制度。

1941 年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先后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工作和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在新形势下的抗战方针是更加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①] 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相继进行了精简整编，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并抽调大批精干人员充实到区、县，普遍加强人民武装建设。中共在抗日根据地逐步构建起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的军事体制。这种类似寓兵于民的举措，往往容易造成军队与地方两者之间的领导干部和组织机构不和谐的局面。为了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协调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2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即“九一决定”）。决定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体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决定明确规定取消各抗日根据地的党军政委员会。从此各级党委不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且是统一领导该地区党政军民全面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根据相关规定，主力军必须接受所在地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军队中的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则成为各同级党委（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的一个部门，与其他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但与其他委员会和其他部门不同的是，军政委员会仍保持其上下级直接领导和隶属关系。[②] 根据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委员会陆续撤销。例如，1942 年 9 月，太行党政军委员会改为太行分局，这是最早取消军政委员会而建立党委会的地区；同年 10 月，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及晋西区党委撤销，改建为晋绥分局；1942 年 9 月，苏北区党政军委员会改为苏北区党委；1943 年 2 月，淮南党政军委员会改为淮南区党委。

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军政委员会改设为党委会的时间则比较晚。1945 年 11 月，晋冀鲁豫野战军要求所属部队建立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对军事、政治工作一元化领导，并首先在纵队和旅建立党的委员会。1946 年 10 月，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又下发了《党的团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提出“在步、骑、炮各建制团中，均须成立一领导全体军事政治工作的一元化的党的委员会”。同年 12 月 25 日，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部队中党委的组织与领导的报告》，介绍了部队中恢复与建立各级党委的做法、效果和经验，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③] 1947 年 2 月 27 日，中共中央根据晋冀鲁豫军区的经验，发出《关于在军队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等，按照中共七大决定，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

① 《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81-688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22-430 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 3 卷，长征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38 页。

会。全军部队在中央草拟的军队中党的组织条例尚未公布前，“可根据晋冀鲁豫经验及文件实行改组”。[①] 从此，全军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普遍恢复、建立并日益健全起来，军政委员会随之被撤销。同年 7 月 2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又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初稿）》，对党委员会的性质、地位、组织机构和职权等作了规定，强调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各该部队领导和团结的核心。[②] 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在军队中实行的党委制，军政委员会制度宣告终结。

五、小结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抗日大背景下，为淡化军队的党派色彩以迁就国民党军政当局，中共先后在八路军、新四军师、旅、团各级部队中设立军政委员会，作为党的秘密组织来掌控军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设置军委分会作为党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最高领导机构，统辖各师级部队军政委员会，而各级部队军政委员会则均接受同级地方党委会和上级军政委员会双重领导。军政委员会作为党在军队中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部队中党政军的全面工作，在实际上起着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实行单一首长负责制，部队首长最主要是负责军事工作，对军事事宜具有灵机的决策权，因此军政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并不削弱首长个人负责制。军政委员会实行党的集体领导与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政治、组织制度，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曾一度演变为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全面工作的最高组织机构。在开辟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进程中，军政委员会这一中共党的组织系统作为一种内部机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八路军、新四军每到一处，首先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起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党委、军队、政府、民众团体各自相对独立的系统。当地方党组织在能力和威信各方面均能实际统一当地党政军民之领导时，以军队党组织为主导的军政委员会即行撤销，一切领导权乃归诸地方党组织。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的组织体制和运作机制在抗日根据地发展中具有示范、监护、引领的效应。

从 1937 年 7 月中共中央酝酿红军部队设立军政委员会，到 1947 年 7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恢复党的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制度持续十年之久。在抗日战争实践中，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的设置，借鉴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政治经验和组织范式，又逐渐积淀为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制度理念和价值观念，进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党的组织系统、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实现人民军队政治制度、组织制度的变革和传承。

（作者王树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副研究员）

① 《中共中央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决定》（1947 年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2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5 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 3 卷，长征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 页。

浅谈抗战末期中日“河南会谈”

曾德刚

内容提要：抗战末期，日本政府及军队为尽早从中国战场脱身，再一次加紧与重庆国民政府“谋和”。1945 年 7 月今井武夫与何柱国于河南新站集进行会谈。以《今井武夫回忆录》为基础，结合日文新版《支那事变の回想》及相关人员回忆录、日记，对会谈前联络人、会谈经过、中方态度等问题进行丰富和探析，可判断会谈中间联络人为吴树滋及杨揆一、杨蔚云，会谈气氛友好但未达成一致，中国方面希望尽早结束战争但无意与日本单独媾和。

关键词：抗战末期　何柱国　今井武夫　河南会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意相继投降，日本独木难支大势已去，但仍垂死挣扎做困兽之斗。为抽身于中国战场，1945 年 7 月 9—10 日，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与国民党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司令何柱国举行会谈，地点位于河南安徽交界之第十五集团军防区新站集，今井武夫称之为“河南会谈”,[①] 这是日本投降前交战两军高层将领之间的直接会面。抗战史论著多采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的记叙[②]，内容稍显单薄。其他当事人的记录或回忆，可对今井武夫有关“河南会谈”的回忆进行补充，同时也有记述不一致之处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会谈中间联络人

何柱国、今井武夫二人在 7 月见面前，多方从中牵线搭桥，其中关键人物之一为何柱国下属吴树滋。今井回忆：“一九四五年二月的一天，杨希一上将到南京珞珈路我的宿舍来访……当时，他接受他的旧友、重庆政府的中国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上将派遣的特使

① 关于会谈地点，何柱国回忆“日军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到我安徽省沈丘新站集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部与我直接谈判。”（见何柱国口述，施文淇等整理：《何柱国将军生平》，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19 页）何柱国此处回忆有误：今井武夫非中将而是少将，沈丘新站集在豫皖交界属河南境内。

② 黄有岚著：《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中：第十五章第二节为“何柱国、今井武夫会谈”；吴东之著：《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 1911—1949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写到“日蒋图谋单独媾和”；高书全、孙继武、顾民著：《中日关系史（第 2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中提到“今井・何柱国会谈”；臧运祜著：《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中，将会谈置于日本“对华新政策”中的一部分加以考察；李红喜著：《硝烟掩护：日蒋和谈秘档全公开》，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史精华》编辑部编《宋子文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中也有今井武夫、何柱国会谈的描写。周仁灏的文章《日蒋河南会谈有何企图》，《文史杂志》1999 年第 4 期对会谈进行了关注并分析。其余尚有一些以文学笔法描述非学术性的文章及人物传记中对会谈有所涉及；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1 页这样描述“1945 年 5 月，授意何柱国派吴树滋赴东京与日本政府再次商谈单独媾和问题。提出的条件是日本从全中国撤军；和谈成功后，中国不妨害日本在中国以外战场的行动。但因日本仍不肯撤军，此事不了了之。”根据资料考证，吴树滋未到东京，也未与日本政府接触。

吴树滋的要求，同他的弟弟、南京政府参谋次长杨振中将商议之后，想把吴介绍给我。据他们讲，吴在几个月前潜入南京，同保定军官学校同期同学杨希一讨论之后，到最近才下决心和我会见”。[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 1982 年 10 月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之《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 2 卷第 2 分册第 76—77 页中记述的战争终止前和平工作为：“总司令部方面，自 2 月下旬以来已有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负责进行着以日中和平为目标的李耀工作。李耀是当时在河南省南部的中国第 10 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上将的部下（上校）”按照时间、职务描述，日方资料中记载的所谓李耀应为吴树滋。何柱国也承认“我先派吴树滋到南京与日方接触”。[②]

引荐吴树滋与今井会面的汪伪人士主要是杨揆一、杨振兄弟二人。杨揆一，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两本《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97 页均误为杨希一。两本《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211 页中又提到“我擅自决定通过南京政府的前参谋长杨揆一，致力于同何柱国上将的接触”。今井描述，杨曾任汪伪参谋总长和湖北省省长，适时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查根据 1944 年 12 月材料编印的《汪伪政府所属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重要人员名录》，学海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 页中记载军事委员会委员杨揆一。其余有关汪伪资料中均为杨揆一，无杨希一。杨振，又名杨蔚云，在《抗战末期蒋军勾结敌伪一例》，《文史资料选辑》第 5 卷第十八辑中提到“我长兄（杨揆一）”。みすず書房 2009 年出版的高橋久志、今井貞夫監修《日中和平工作》，以みすず書房 1964 年版的今井武夫《支那事変の回想》为基础，第 182 页的叙述为“昭和二十年二月の或る日，楊揆一（ヨウキイッ）上將が南京の珞珈路にあった私の宿舎を訪ねて來た”由以上材料可知，杨希一为“杨揆一”之误，现有部分论文或书籍直接采用中译本《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97 页中“杨希一”，未加以考订，导致以讹传讹。

杨揆一与吴树滋并不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吴与杨揆一弟弟杨蔚云（杨振）才是，之前又同在东北军共事，故私交甚好。吴树滋为何柱国心腹，在此之前已多次到达南京，与汪伪政府内多位要员相见，与日方也有多次会面。杨蔚云回忆：“一九四三年底，驻皖北临泉的蒋介石集团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派其心腹吴澍滋（何之高级参谋兼汤恩伯的高级参谋），携何之亲笔信秘密到南京，拟见汪精卫。”[③]

吴树滋初次来南京，先到汪伪军事委员会任职的女婿陈轶群家，苦于见汪无门经女儿提示于当晚到杨宅。吴说明此行目的一是为汤恩伯清理物资，二是为何柱国妻贾氏办理走私。杨蔚云看过何柱国亲笔信后，表示长兄杨揆一赴湖北上任，自己并无带吴直接见汪的资格。翌早，杨蔚云带吴见林柏生，林见汪精卫后约定见面时间为 1944 年的元旦上午九时。到了那天，吴树滋、林柏生、杨蔚云共同前往，因汪精卫旧枪伤发炎体力不支，简谈约十五分钟。吴树滋出示何柱国致汪亲笔信，中心为“物资交流”与共同防共。杨蔚云回忆，汪阅后对吴说：“我希望何先生能率队来归。”吴回答说：“何在临行时曾嘱我一切均可携手合作，惟部队来归尚非其时。”当时汪甚表同情云：物资交流，共同防共。可以照办。最后汪说：“我现在有病，不能支持，事情可向林、杨二位商洽，我希望何先生以后多和我们联系。”[④]

杨蔚云回忆吴树滋第二次到南京在 1944 年 5 月，此时汪精卫病情加重已到日本治疗。吴树滋经杨蔚云介绍在上海路一号与日军军部第二课桥岛中佐、岛村大尉会面。密议物资交流与共同“围剿”。吴与日方还就互设电台达成一致，地点设在如意里五号，委托杨蔚云办理密电本和通信规定。因何柱国所在临泉指挥所电台设备不良电力不足，后在巢湖地区“三河尖”设立中间站，果然畅

①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97 页。

② 何柱国口述，施文淇等整理：《何柱国将军生平》，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19 页。

③ 杨蔚云：《抗战末期蒋军勾结敌伪一例》，《文史资料选辑》第 5 卷第十八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89 页。

④ 同上文，第 90 页。

通，以后何柱国与日汪联系均经此电台进行。

吴树滋再到南京时陈公博代理死去的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杨蔚云回忆 1945 年 4、5 月间吴陈相见。陈公博在战后审判中承认“何柱国的代表吴树滋也来南京见我了，并携有何先生一封信，说奉蒋先生之名来联络‘剿共’的。那位吴先生是林柏生介绍的，我派军令部长次长杨振和吴先生接洽”。① 后来吴树滋和桥岛又进行第二次见面，吴谈及何柱国部与张岚峰部共同‘剿共’击伤彭雪枫致其死亡和三河尖电台已通等。桥岛只说几句客套话，没有积极的表示。

杨蔚云回忆中还提到另外一个担当联络的中间人——黄民星。黄时任汪伪军委会翻译。据杨蔚云讲，1945 年 6 月黄得知杨与何柱国有联络时说：“目前何柱国方面这条路线既然打通，我打算去找今井武夫副参谋长，重申与何柱国方面的联系情形，或能从此打开全面谋和的道路亦未可知。”② 杨蔚云当即表示同意。黄民星见到今井后将想法和盘托出，今井即托黄邀请吴树滋、杨氏兄弟到他的住所会面。今井对吴树滋说：“你们要求物资交流，共同‘围剿’，设立电台，我们军部已件件应允。现在对你们也有个要求，就是从何柱国司令这方面打通全面谋和的道路。”③ 吴树滋则答来南京未负谋和任务，今井提示吴可通过秘密电台向何请示。吴表示赞同。告辞今井后，吴将电报经杨蔚云发出。数日后，收到何复电。几天后今井催吴再打电报给何柱国，约定时间、地点与议和条件。约 7 月初，何复电谓：“俟七七事变纪念日过后，不论何日，我与今井在新站集（周家口附近）会面。”④ 吴即刻通知今井，约定 7 月 12 日与何柱国在新站集会面。今井发给吴树滋通行证，促其先回临泉，7 月 11 日到周家口等候，俾届时一同前往新站集。

在今井武夫回忆中，有关会谈前他与吴树滋的见面寥寥数笔描写，比较简单。重要当事人之一杨蔚云的回忆则更为丰富，事件经过大体可信，时间上因日期久远存在误差，将今井与吴的会谈时间估计为 1945 年 6 月。今井武夫回忆他与吴树滋的初次会面约在 1945 年 2 月左右，“在南京我和吴树滋开始会见后大约三个月之间，吴树滋同中国第十战区司令部曾进行过数次联系……结果，五月中旬由吴树滋非正式地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和平原则大纲……到六月中旬，为最后洽商会谈的日期，吴从南京出发前往何柱国司令部所在地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附近的沈丘”。⑤ 何柱国的回忆是 1945 年 5 月派吴树滋到南京与日方接触，并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和平原则的大致精神，今井武夫与他谈判的时间为 1945 年 7 月 9 日。⑥ 结合今井武夫提到小矶国昭内阁期间禁止中国当地驻军与重庆进行和平工作，今井不得不暗地进行与何柱国联络这个情况，而小矶国昭内阁垮台是在 1945 年 4 月，初步可以认定今井武夫的时间记叙更为准确，何柱国提出的 1945 年 5 月派吴到南京与日方接触应该不是初次会面，是吴树滋向日方转达会谈条件的时间。

何柱国另一心腹张庆第讲：何柱国“派总部参议吴树滋到南京汪伪政府见其参谋总长鲍文樾（吴与鲍系保定军校同学，老朋友），经鲍率吴往返京沪与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取得密切联系。”⑦ 显然，张庆第对会谈的回忆属于道听途说，将杨蔚云误认为是鲍文樾，也误判吴与冈村宁次取得了联系。

综合以上内容可看出，抗战期间尤其是到抗战后期，日本、国民党、汪伪三方既在表面上存在着对峙状态，又暗通款曲，重庆与南京伪政府内军政要员虽各为其主，又不断私交。吴树滋初到南

①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凤凰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 页。

② 杨蔚云：《抗战末期蒋军勾结敌伪一例》，《文史资料选辑》第 5 卷第十八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93 页。

③ 同上文，第 93 页。

④ 同上文，第 93–94 页。

⑤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98 页。

⑥ 相关内容见何柱国口述，施文淇等整理：《何柱国将军生平》，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19 页。

⑦ 张庆第：《蒋军在豫皖边区勾结敌伪积极反共的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 14 卷第四十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146 页。

京投靠的即是故旧。吴到南京经林柏生见汪精卫、见陈公博、见桥岛，所负任务是走私物资与防共围剿，至于后来成为谋和通道中的重要一环，实非吴也非何柱国的初衷。有文章认为“会谈是由国民党军方主动邀请的”①，此种观点有待进一步验证。会谈之所以得以实现，今井武夫求和心切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杨揆一、杨蔚云兄弟积极推动日本与重庆实现“和平”也是重要因素。杨氏兄弟不仅将吴树滋引荐给汪伪高层与日本军官，通过黄民星介绍给今井武夫，而且设立秘密电台、掌管往来电讯，不遗余力。杨氏兄弟这样做的考量主要是出于形势所迫为求自保，汪伪人士目睹日汪势力渐衰，尤其自汪精卫客死他乡后，南京伪政权更是群奸无首人心不稳，灵通人士纷纷寻找机会与渠道攀附重庆方面，杨氏兄弟自然难以例外。

二、会谈条件及会谈经过

何柱国给今井武夫关于双方和谈条件的电文内容，今井武夫的记载为“一、日军无条件地从山海关至广东的中国国土上全部撤兵。二、日军今后应根据日华协议的条件，从满洲撤出兵力。三、中国不妨害日军在中国以外战场上的行动。”② 何柱国与今井武夫的记载相差无几，但杨蔚云的回忆则与上述两人差距太大，内容有六条：“（一）驻中国的日军高级将领应一致推翻天皇，同英国一样改为议院制；（二）在中国的日本军应全部缴械，缴械后准许全面向华北东北撤兵；（三）日本军在未撤退之前应让重庆军队进入东北，并阻止共产军向东北进军；（四）赔偿战争中中国一切的损失；（五）交还中国各次战役的俘虏；（六）交还中国各地战……（内容回忆不起）。”③ 杨蔚云提供的电文连自己都承认内容回忆不起，联系到 7 月 9 日何与今井会谈的情况，推翻天皇改议院制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日方所接受，不会成为双方和谈的基础。何柱国、今井武夫回忆基本相同，至此双方达成会谈意向。

当 1945 年 7 月初今井武夫通过杨蔚云设置的秘密电台得到何柱国的来电后，7 月 4 日从南京乘坐飞机出发，历经波折，7 日到达许昌，与今井明保翻译、从前就认识何柱国的许昌特务机关长新荣幸雄会合共同前往约定地点。8 日今井乘卡车到达周口镇，夜宿日军守备队内。9 日早晨，换上中国衣服着便装徒步出发。途中雇佣一辆排子车，穿越不属于任何一方势力范围的无政府地带，沿途所见又经与车夫交谈，今井见到了战争状态下原以为荒凉无人的地带呈现出的热闹繁荣景象。一路走走停停，下午到达新站集对过的小村庄，在这里遇到了前来迎接的吴树滋。前走两公里，吴树滋与今井等人骑马在士兵护卫下于下午两点到达目的地。

张庆第在村口迎接。早在 7 月 7 日张庆第接到何柱国电话“明天吴树滋参议去军区，有要事洽商，希遵照密函妥为布置。”④ 第二天吴树滋携何亲笔信到新站集，信大意为“国际友人于明日到达军区与我会面，暂拨霍守义部一营兵力到达新站集，归你指挥，沿途保护，妥为警戒，以防意外。”⑤ 9 日午前何柱国到新站集，张庆第此时才知国际友人原来是今井武夫。

何柱国到司令部门口迎接今井一行，寒暄过后即开始会谈，何密嘱张庆第“你不必参加，少一人知道好”⑥ 会谈分两天四次进行。何柱国曾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具有一定日语基础。其中，第一、第二次会谈通过今井明保进行翻译，第三、第四次会谈没有通过翻译，由何柱国与今井武夫夹杂笔谈直接交流。

---

① 参见周仁灏：《日蒋河南会谈有何企图》，《文史杂志》1999 年第 4 期。

②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98 页。

③ 杨蔚云：《抗战末期蒋军勾结敌伪一例》，《文史资料选辑》第 5 卷第十八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93 页。

④ 张庆第：《蒋军在豫皖边区勾结敌伪积极反共的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 14 卷第四十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146 页。

⑤ 同上文，第 146 页。

⑥ 同上文，第 146 页。

双方交流的核心问题集中于以下方面：关于日中和平谈判与撤军、日本国体保留与国土保全、满洲国与南京政府的地位。今井武夫提出“日本希望日华两国直接进行和平谈判”，“日本以维护国体、保全国土为绝对条件，这点如不被容纳的话，则决心继续交战到底。与此同时，对于满洲国和南京政府的处理，希望努力做到不违背道义”。① 对此何柱国回复：“一、中日单独媾和，在‘开罗宣言’以后的今天，无论如何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日本如果希望同中国媾和，必须同时把世界和平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事项。中国并不希望日本因战败而灭亡，希望日本仍旧可以留下来与中国携手维持东亚和平。希望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早日结束战争。二、日本如有什么请求，中国可以把日本提出的问题转达给盟国。蒋介石主席同意日本天皇制继续存在，并对各国首脑说明这一点。三、战后日本要从满洲以及海外撤回兵力。朝鲜、台湾、库页岛等地，必须让出来。四、这件事已经同盟国协商完毕，所以没有再度更改的余地。”②

今井坦言会谈是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虽然态度友好，但分歧较大，何柱国在会谈休息期间，“独坐院内，苦闷沉思，表现对严重疑难问题的思考。”③ 而今井武夫认识到同以往向重庆政府提议的和平条件相比，“彼我所要求的条件完全颠倒过来了，有了天壤之别。对于历史车轮飞速地转动和现实世界的严峻，感到不寒而栗。”④ 会谈双方比较开诚布公，条件摆明，底线露出，已经没有其他再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今井武夫 9 日晚辗转反侧彻夜未眠，10 日上午会谈之余，皆闷在房间，中午与何柱国共进午餐，下午一点辞别，从新站集出发，逆着来时路线，经周家口连夜返回许昌。因空袭和天气原因，今井乘坐火车 11 日过开封，13 日经徐州，14 日到达南京。⑤

三、会谈后中方态度

今井武夫返回南京立即向冈村宁次报告，并向大本营拍发电报，更详细地作了书面报告，但没有获得任何音信，对此今井只能猜测也许是因为日本本土连遭美机空袭而陷入混乱的缘故。何柱国将会谈情况也上报重庆中央，唐纵 7 月 21 日记录“据何柱国报告，彼于午佳（九日）与敌酋冈村、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在周家口我军防地会谈，共四次历八小时”。⑥ 今井对会谈之事非常在意，请杨蔚云催问，何复电称：“已派泽民兄（该军参谋长田泽民）赴渝面蒋请示，俟复再告。”⑦ 8 月中旬日本投降前，今井又要杨蔚云询问是否还有商谈余地，何复电：“目今议和问题，中国自身不能做主。要依照联合国的共同协议。”⑧ 今井得电讯后，知和谈之事难成便不再过问。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日军奉令放下武器，接受中国战区受降。缘于战争的突然结束，筹划中的通过张叔平工作实现今井武夫顾祝同玉山会谈半途而止。“河南会谈”也成为抗战期间日本与中国方面进行的最后一次秘密谈判，也为今井武夫自中日开战以来致力于推动的“和平运动”画上了句号。“河南会谈”以往在抗战史论著中为学者所轻描淡写，因此有把缪斌工作当作日本最后一次谋和尝试的论断，显然不是这样，缪斌 3 月 16 日抵达东京，4 月 26 日

①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03 页。

② 何柱国口述，施文淇等整理：《何柱国将军生平》，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19–220 页。

③ 张庆第：《蒋军在豫皖边区勾结敌伪积极反共的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 14 卷第四十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146 页。

④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05 页。

⑤ 杨蔚云的回忆是 7 月 13 日清晨，今井偕桥岛即返回周家口，旋即乘坐飞机回到南京。见杨蔚云：《抗战末期蒋军勾结敌伪一例》，《文史资料选辑》第 5 卷第十八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94 页。杨蔚云时间记叙不准确，今井乘坐飞机回南京之事不足信。

⑥ 唐纵：《蒋介石特工内幕：军统“智多星”唐纵日记揭秘》，团结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3 页。何柱国并未与冈村宁次会面。

⑦ 杨蔚云：《抗战末期蒋军勾结敌伪一例》，《文史资料选辑》第 5 卷第十八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94 页。

⑧ 同上文，第 94 页。

离开日本，这时吴树滋尚未向今井武夫提出和谈条件。有论著把何柱国、今井武夫会谈称之为洽降，也有观点认为会谈虽然没有取得成果，但为后来今井代表中国派遣军前往芷江商谈停战投降打下了基础，以上均不准确，不符合史实，何柱国与今井武夫的会谈发生在战争结束前，主要内容还是停战、撤军，实现“和平”。8 月 15 日，因为之前通过张叔平进行联络，冈村宁次派给今井武夫的任务从“谋和”转变为洽谈投降事宜，为今井飞往芷江打通重庆通道的是张叔平而非何柱国。

今井武夫对“河南会谈”报以极大的期待。一方面“桐工作”被军统玩弄于股掌之间、“和平掮客”缪斌的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之前的各种中间人士路线半途而废，让今井武夫这位长期致力于日华和平工作的人士感慨以往各种工作“不仅没有收到任何成效，甚至连日本政府的真正意图是否果真传达到了重庆政府的最高领导部门都还是疑问”①，而此次与何柱国的联系，“这和过去所谓的重庆路线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色……现在是同重庆国民政府军队内部、其地位身份都非常明确的现任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进行联系，只要能直接会谈的话，即使不能获得成功，但我认为可以得到某些重大启示”② 另一方面，今井武夫与何柱国的联系最初没有向上级报告，但随着小矶内阁的垮台，以汪伪南京政府作为桥梁试图诱和重庆政府迟迟没有进展，继任的铃木贯太郎内阁采取了无视汪伪政府的态度，陆相阿南惟几总负责，由冈村宁次具体负责现地交涉，指示中国派遣军“在抽出兵力整理战线的同时努力促成停战，无论成功与否，作战行动固应继续，但如能乘此时机开展工作，使敌不致追踪则幸甚，如能从局部停战导致全面停战则更属求之不得……对重庆及延安（以防止赤化为条件）同时进行工作。”③ 今井觉得大展宏图的机会到来，终于可以再次施展所长为国分忧。因此今井才不辞劳苦前往新站集，并在会谈后一再探询中国方面意见。即便得到何柱国拒绝继续会谈的回电后，今井仍不愿接受这个结果。在今井看来，中日双方高层都对他主导的“河南会谈”高度重视。今井曾听种村佐孝说“当时大本营很注意河南会谈的结果，立即考虑因势利导，并着手人事的配备等工作，但因战争后期通讯混乱，缺少充裕的时间，未能收到实际效果”。④ 今井也在与邵毓麟交流中得知“国民政府重视这次河南会谈的结果。邵当时在美国，重庆政府打电报命令他立即回国，对会谈的发展秘密做了部署。”⑤今井认为若不是战局变化之快出乎意料，会谈很可能取得突破。

今井根据种村佐孝和邵毓麟的说法对形势做了乐观的估计，而忽略了何柱国回电中表达的立场与态度。据唐纵日记记载“日本曾于中国进行和平阴谋，为委座所峻拒，并斥责何柱国不是。”⑥蒋介石日记未对“河南会谈”有记载，从唐纵的表述中可看出蒋介石显然对会谈情况不满意。蒋介石峻拒的原因主要是中日双方就核心问题难以达成一致。首要就是撤军。1945 年 5 月，吴树滋提出的会谈条件中提到日本从中国关内及满洲撤军，中国不妨碍日军在中国以外战场上的行动，何柱国与今井武夫面谈时，又进一步要求日军在关内及满洲撤军外，还要从海外撤回兵力。朝鲜、台湾、库页岛等地都需要让出来，并且盟国已经就此达成一致，没有更改的余地。何柱国提出的条件是要日本完全放弃自甲午战争以来通过历次战争所取得的利益，这是日本完全无法接受的。此时虽然意德相继投降，但日本军方依然保持乐观态度，尤其是在中国战场。冈村宁次说：“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⑦“我方下最大决心提出的条件为，中国派遣军亦可撤至山海关（需时一年）。”⑧ 其次，双方对汪伪南京政府和满洲

①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12 页。

② 同上，第 197 页。

③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51 页。

④ ⑤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08 页。

⑥ 唐纵：《蒋介石特工内幕：军统“智多星”唐纵日记揭秘》，团结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5 页。

⑦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1 页。

⑧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51 页。

国的处理意见不一。日方以道义为名，希冀保留傀儡政权，进而维护在满洲及关内占领区利益。国民党重庆政府既然要求日军全部撤军，对其卵翼下滋生的“怪胎”自然不能予以保留。无论伪满洲还是汪伪政权，重庆国民政府自始至终都未承认。日方提出满洲国不改变现状，显然与《开罗宣言》背道而驰。7 月 12 日，军政部长陈诚在国民参政会大会上述及东北问题时强调：“东北乃中国之东北，吾人抗战系由东北而开始，东北一日不收复，抗战一日不结束。”① 重庆政府对于伪南京政府，态度更是强硬，开展日本所谓“桐工作”，由军统特务假扮宋子良与日本接触，不仅极力阻挠汪伪政府成立，而且延缓日本对汪伪的承认。汪伪政权与重庆政权还存在对国民党政治符号及三民主义解释权之争，二者均宣称代表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对此，重庆政权肯定欲除汪伪而后快。再次，双方就和谈形式主张不一。日本希望两国直接进行和平谈判，中国方面则坚持在《开罗宣言》发表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单独媾和，必须同时把世界和平作为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有观点把何柱国与今井武夫的会谈定义为日蒋图谋单独媾和②，这种结论过于草率。如前所述，何柱国及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中明确记载了单独媾和不可能。除此之外，1945 年 2 月 14 日，冈村宁次偕同副参谋长川本、参谋延原在船津臣一郎陪同下抵沪拜访袁良。袁良转述蒋介石给冈村的口信：“（一）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但我认为中日合作对大东亚至关重要。（二）因此拟于适当时机为日本讲话，拯救日本非我莫属。然日本人误解我的本意，实为憾事。（三）望互相尽力克制。”③

另外周佛海日记中亦有记载。1945 年 5 月 31 日日记写到“八时，作民来，谈朱文熊［雄］返沪，大概无具体结论，但谓朱曾见敬之、岳军及天翼多次，蒋先生亦嘱朱在渝等候，表示中日单独和平为不可能，必须拉着英、美共同进行，如日方有表示，蒋先生于适当时机可以向英、美说话。”④ 1945 年 7 月 18 日，河边参谋次长听取今井武夫河南之行的汇报后，得出结论“无论通过任何渠道，今日对重庆来说，现在抛开美国公然采取日中和平的途径，是绝对行不通的。”⑤

蒋介石并未有与日单独媾和之意，在战争最艰难时期，蒋介石尚能坚持抗战、抵制诱惑，何况战争后期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反法西斯战争终将胜利逐渐明朗的情况下。1945 年 5 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策定抗战建国方案，蒋介石于 5 月 5 日在大会上发言中提到“现在对日决战，机运已熟，在纳粹祸首已经消灭，欧洲战争瞬将结束的今日；反侵略的主要战场，即将移到东亚。日寇穷途末路，唯有在中国大陆上拼死挣扎，妄想延缓崩溃。今后我们的抗战，就是要突破最后胜利以前最大的危险和最后艰难，完成我们九仞一篑的工作。自从临时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即提出‘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我们到了今日，更要知道‘万事皆以应乎作战要求为第一’。尤其是决战的今日，最后胜利系于最后五分钟；如果懈此须臾，不但前功尽弃，八年苦斗等于虚掷，已死军民不能瞑目，我们中国的前途固然不堪设想，而世代子孙也将陷于奴隶牛马，而万劫不复了！”⑥

蒋介石虽未料到日本投降之迅速，但中国在经历八年苦撑待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他不仅已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联系在一起，而且提出不可功亏一篑的警示，否则不仅辜负浴血奋战的军民，而且会给民族带来劫运。

---

① 秦孝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五至七月份，第 754 页。

② 参见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 1911—1949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版，第 591 页。

③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52 页。

④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21 页。

⑤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45 页。

⑥ 秦孝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五至七月份，第 29—30 页。

四、余　论

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之间兵戎相见，但谈判交涉也伴随其间。以往历次谈判大多由日方外务省、参谋本部或民间人士主动提出，中方处于应对接招态势，而“河南会谈”的主导权在中国方面。日军战争初期乃至中后期在中国战场很少失利，中国军队英勇抵抗不乏大捷，总体而言日军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达到了预期目标，挟胜利之威，日方总是提出欲壑难填得寸进尺的条件。战争末期，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无力回天，轴心国瓦解，苏联对日虎视眈眈，日本本土连遭轰炸的情况下，急于调整兵力收缩战线，几乎达到有病乱投医的状况。不仅希望借助苏联力量斡旋，而且还妄图开展延安工作。今井武夫感叹“最能反映出谈判基础的是当前的战况不利，因而谈判的主导权也移到了中国方面。这和大东亚战争开始以前的情况迥然不同，日本反而变成期望中国提出建议的一方了。”① 此次会谈，何柱国得到蒋介石默许，向日方提出的条件坚决不容更改，底气十足攻防易手。

蒋介石无意与日本单独媾和，对日本完全撤军也未报以太大期待，但并不放弃接触。蒋介石同意进行“河南会谈”除有挟英美之威促日本尽快结束战争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出于战争结束后东亚秩序及反共反苏的考量。共产党一直是蒋介石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抗战期间，日、蒋、汪关系复杂，盘根错节，物资交流风生水起、共同防共层出不穷。陈公博曾嘱伪军张岚峰与何柱国见一面商议军事问题，林柏生为吴树滋在南京活动开方便之门。类似情况不胜枚举。蒋与日军谈判，既能在战争结束之初可以依托日伪“维持治安”，又能在战后反共中增加实力。另外《雅尔塔密约》中有关外蒙、旅大港、中东铁路等条款以及苏联在中苏谈判中表现出的傲慢强横态度，都使蒋介石意识到，欲阻止苏联扩大在华和东亚势力，中国需与日本联手。蒋介石换取日本撤军实现停战和平的诱人条件是帮助日本维护国体即保留天皇制，但日本狂妄自大不予理睬，这也许是蒋介石发出“日本人误解我的本意”感慨的原因吧。蒋介石确实也向美英表明了见解：“发动战争的人，只是一小撮日本军阀，我以为必需的条件是根本铲除军阀，不能让他们再起来干政；至于日本的国体应该如何，最好待战争结束之后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由于一时的战争而干涉他国的国体，将会造成民族间永远的错误。”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驻意德军将领沃尔夫与英美曾隐瞒苏联进行秘密谈判，试图早日结束战争以减少损失，为战后国家恢复保留元气。沃尔夫与美国代表杜勒斯的谈判代号为“日出行动”，此行动被苏联探知引起苏联强烈反对，因美、德会谈地点在瑞士首都伯尔尼，所以此次风波史称“伯尔尼事件”。今井武夫与何柱国的“河南会谈”虽与“日出行动”不完全相同，也反映出无论欧洲战场还是东方战场，饱经战争摧残的交战国试图以谈判的形式早日结束战争，着眼于战后恢复与战后秩序的建立。战争结束前无论是美德秘谈还是中日秘谈在反共反苏的问题上都心照不宣。

抗战中和谈多秘密进行，惮于“敌人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并未留下多少文字资料，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河南会谈”是整个战争中秘密交涉的一部分。对于会谈，何柱国的上司李品仙回忆录没有相关内容，蒋介石日记中也没有记载，仅从已公开的回忆与日记中可略窥一斑。有关会谈前准备、过程、中方态度等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依赖于更多史料的发现。

（作者曾德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博士研究生）

①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5 页。

② 古屋奎二，陈在俊译：《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一卷，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央日报”译印 1986 年版，第 16-17 页。

试论抗战时期第九战区作战方法
——以“天炉”战术为中心的研究

隆鸿昊

内容提要：战术，即指挥军队作战，以求达成战胜目的之方法。抗战时期第九战区最重要的作战方法，即为“天炉”战术，虽然该战术是薛岳在抗战期间正式提出的，但早在20世纪30年代“围剿”红军时期，薛岳就曾实行过类似的战法。抗战期间，薛岳运用“天炉”战术，三次成功地阻止了日军对长沙的进攻，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可以说是该战术成功运用的经典战例。但同时应该指出，“天炉”战术并非完美无缺，1944年6月，日军第四次向长沙发动进攻，薛岳试图再次运用“天炉”战术，将日军围歼于长沙地区，却没有取得成功，这说明“天炉”战术是存在缺陷的。

关键词：第九战区　“天炉”战术　薛岳

战术，即指挥军队作战，以求达成战胜目的之方法。1942年，时任第九战区参谋长的吴逸志在论及战术运用对抗战的作用时，指出：“自我发动全民长期抗战以来，吾人本夙昔之兵法学理，与夫历次战役血汗所换得之经验教训，随时随地，巧为运用，五年之间，愈抗愈奋，愈战愈强，使顽敌剑钜痛深，陷入泥淖，不能自拔，其国力消耗殆尽，尤为致命之伤。”① 可见，正确运用战术，对于抗战的前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天炉”战术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抗战期间提出的一种对日作战战法，也是第九战区在整个抗战中最重要的作战方法。目前学界对于“天炉”战术还没有专门的研究，只是在对长沙会战及对薛岳的研究中会涉及“天炉”战术②。基于此，笔者试在本文中，从“天炉”战术的早期实践、在抗战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在实际运用中所存在的缺陷三方

① 吴逸志：《抗战五年我军战见战法之研讨》，1942年，第18页。

② 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如郭汝瑰、黄玉章所著《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罗玉明所著《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陈寿恒所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8年版；陈红民所著《略论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以南岳军事会议和长沙会战为中心的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等。目前的研究程度，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明确了“天炉”战术的概念，二是指出三次长沙会战是以“天炉”战术为指导，三是指出了“天炉”战术的优点。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天炉”战术的研究，仍有需要进一步改进之处，主要有三点。首先，“天炉”战术虽然是薛岳在抗战期间正式提出的，但早在1934年11月“追剿”红军的湘江战役中，薛岳就曾实行过类似的战法。在这次战役中，薛岳试图以湘江为依托，令湘军进行堵击，令桂军进行侧击，令自己的中央军进行追击，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地区。虽然这次战役的战法与日后的“天炉”战术有差异，但还是有相似之处，并且在作战期间的11月25日，薛岳给其部下周浑元的电报中，令其“力求压迫其（红军）主力决战于湘江，进入我天炉阵而击破之”，提到了“天炉阵”的字眼，因此，笔者认为湘江战役可以看作是“天炉”战术的早期实践，而目前学术界在对“天炉”战术的研究中，没有与湘江战役进行结合；第二，目前学术界对于三次长沙会战的著作或论文很多，但在涉及“天炉”战术时，往往只是简单地一提三次长沙会战是以“天炉”战术为指导，而具体如何指导，整个战役过程如何体现出了“天炉”战术原则，则没有过多的说明；第三，从1939年到1941年，薛岳运用“天炉”战术，指挥部队三次成功地保卫了长沙。1944年6月，日军第四次向长沙发动进攻，薛岳试图再次运用“天炉”战术，将日军围歼于长沙地区，却没有取得成功，长沙终为日军所占，这说明“天炉”战术在实际运用中，是存在缺陷的。目前学术界对于“天炉”战术的缺陷，几乎没有涉及。

面，对“天炉”战术进行独立的、初步的探讨。

一、“天炉”战术的提出及早期实践

“天炉”战术的正式提出，是在 1941 年。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薛岳于 1941 年 11 月 17 日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会上，薛岳“谆谆嘱以战胜决于平时，故平时应视如战时，操场应视如战场。且本既往所得之经验教训，创天炉战法”①。所谓“天炉”战术，“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阵地使用优越之兵力，实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致胜新方略，如炉溶铁，如火炼丹，故名”②。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在提及“天炉”战术时，指出“逐次引退敌人时，则以主力向敌之两侧机动设伏，亦须平时多加演习。如是，则敌目的既不能达，必退回原阵地，我则乘其颓丧撤退际，正面部队，反守为攻，以行牵制，主力实行猛烈夹击，一鼓而歼灭之”③。可见，“天炉”战术在实施时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当日军发起进攻时，我军担任诱击的部队节节抵抗，诱敌深入，消耗日军战力，而后转移到日军外线；第二步，当日军前进至我决战地带（即“炉底”）时，担任该地带的守军与日军拼死战斗，与此同时位于外线的我军主力部队，则对日军施以包围，与担任正面防守的部队共同围歼敌军。

薛岳之所以能够提出“天炉”战术，是其与日军长期作战的结果。自 1938 年底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至正式提出“天炉”战术前，薛岳率领部队经历了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以及第二次长沙会战等诸多战役，在三年的时间里，薛岳对于日军的战法颇为留意，积极寻找日军战法的弱点，在其手著《天炉战》一书中，明确指出：“自长沙会战以来，敌效仿希特勒之‘闪电战’，以所谓‘雷击战’，试用于战场。我为粉碎其新战法，而创意天炉战。”④ 日军的“雷击战”，“系依其部队之机动、装备之优越、兵力之集注，期于要点而发挥之，以收势险节短之效，此其特点也”⑤。也就是说，日军的“雷击战”，就是利用其速度及装备的优势，对我军防守的要点迅速猛攻，以争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作战任务。但是这种战法，却有“孤军深入，有劲者先、疲者后之弊”、“翼侧暴露，有受人侧击之危”⑥ 等缺陷，正是针对这些缺陷，薛岳才提出了“天炉”战术，以图在实战中能够从侧翼对日军实施包围，而后再将其歼灭。

如前所述，“天炉”战术是薛岳在抗战期间正式提出的，但早在三十年代“围剿”红军时期，薛岳就曾实行过类似的战法，1934 年的湘江战役，可以看作是“天炉”战术的一次早期实践。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已成定局，在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最初是想到湖南西部，与贺龙的红三军、萧克的红六军团会合。时任红一师三团政委的萧锋，在其 1934 年 11 月 13 日的日记中，写到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来团召开政工会议，会上谭“说明了部队到外线作战的意义和今后的任务，提出的口号是：赤化湘西南，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合，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⑦。红军在渡过湘江后，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

① 薛岳：《抗战回忆录》，第 24 页。
② 同上书，第 24 页。
③ 吴逸志：《抗战五年我军战见战法之研讨》，第 247 页。
④ 陈寿恒：《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 388 页。
⑤ 同上书，第 388 页。
⑥ 同上书，第 388 页。
⑦ 萧锋：《长征日记》，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 页。

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①。可见，中共中央在江西苏区失守前后，确实是想去湘西发展，创立新的根据地。基于这种认识，红军在离开江西后，借道粤北，进入湘南，而后向桂北挺近，打算从那里渡过湘江后再北上湘西，与贺龙、萧克部会合。

蒋介石于1935年10月底，得知了红军主力已经离开江西的消息后，立即于10月31日给湖南省主席何键、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等将领发电，令其“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绝不宽假”，并于同日电令正在江西“围剿”的第六路军总司令薛岳，令其“督励诸将士努力前进，急起直追，期获最后之成功”②。11月，蒋介石正式任命何健为“湘粤桂边”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在桂北、湘南一带湘江以东地区对红军的“围剿”。11月18日，薛岳抵达衡阳后，立即与何健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围剿”事宜，并做出如下部署：湘军刘建绪部（辖四个师）于11月25日以前到达桂北全州，接替原驻守的桂系部队，沿湘江布防，从西面堵击红军；桂系夏威部（第十五军）驻守在灌阳，从南面侧击红军；自己的部下周浑元部（辖四个师）“经桂阳、新田直驱宁远，跟踪红军追击”③，从东面追击红军；薛岳自己则亲率四个师及一个支队，“沿湘桂公路经祁阳、零陵向黄沙河前进，策应追堵各纵队之作战，主要防红军北上”④。其具体的“围剿”态势，如下页图所示：

根据薛岳的部署，湘军应于11月25日到达桂北全县，接替桂军的防务，而后沿湘江布防，可当白崇禧发现红军出广东境进入湖南后，有经临武、蓝山、南下江华，由龙虎关进入广西腹地之态势，便于11月22日擅自将部队撤往龙虎关和恭城一带布防，而把湘江沿岸的全县、界首、灌阳一线全部打开。此时的形势对红军极为有利，“白崇禧部已经撤走，湘敌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江、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湘江，抢先渡过湘江的”⑤。可是红军舍不得扔掉辎重，结果延误了行军时间，当27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全县城下时，湘军刘建绪部已抢先占领全县，不得已，红军主力只能选择从全县南面的界首渡过湘江。

此时的薛岳正率本部人马位于湘南黄沙河、东安一带，防止红军北进，当他得知红军主力已迫近湘江后，立即命令湘军从西面、桂军从南面、自己的嫡系周浑元部从东面，对渡江红军进行围击：在西线，湘军刘建绪部第十六、第六十二师在占领全县后，为堵击渡江红军，续向界首急进，但在觉山一带遭到红一军团红一、红二师的顽强阻击。觉山，位于湘江西岸，北距全县15千米，南离界首渡口25千米，一条与湘江平行的公路正好通过觉山，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为了占领觉山，阻止红军主力部队渡江，刘建绪部向觉山发动了极为猛烈的进攻。据参加这场战斗，时任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湘军在进攻时，“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⑥。双方在觉山一带激战四昼夜，直到12月1日，“得知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我们才放了心，令一师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⑦；在南线，桂军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和第七军第二十四师北返灌阳后，续向新圩前进。新圩是灌阳北部的交通枢纽，南距县城15千米，北距红军行军路线最近点大桥村古岭头仅5千米，新圩往北至大桥

① 《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934年12月18日），载于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

②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4年7—12月，第691、69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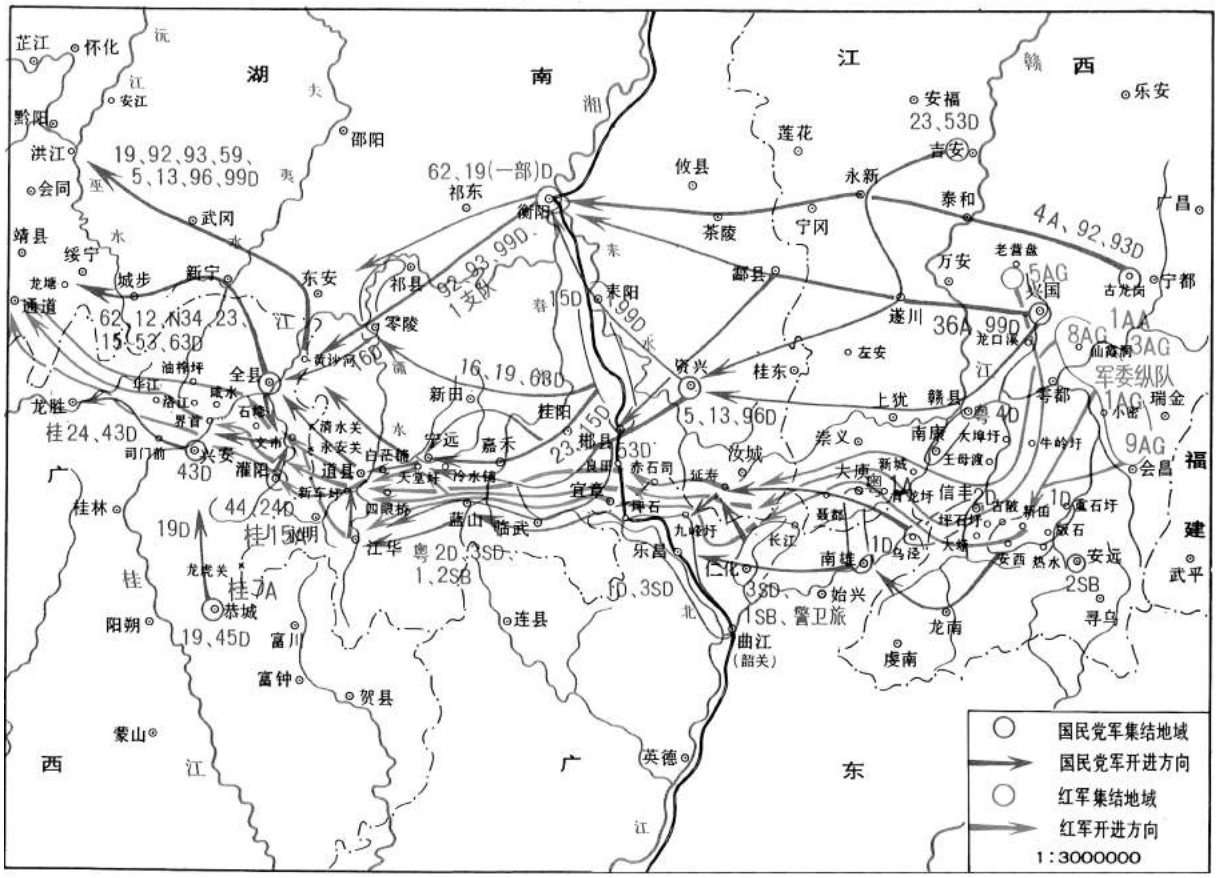
③ 李以劻：《薛岳追堵红军的经过》，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写组编：《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第45页。

④ 同上，第46页。

⑤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⑥ 同上书，第42页。

⑦ 同上书，第182页。



赣粤湘桂边追堵要图（1934 年 10—12 月）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写组编：《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附图 2。］

村无险可守。在这里，桂军遭到红三军团红五师李天佑部的猛烈阻击。据李天佑战后回忆，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敌人在猛烈的炮火、机枪掩护下，向我们的前沿阵地猛扑，指挥所离前沿不过三里路，敌人整营整连毫不隐蔽地向前沿冲击，越走越近，我们的前沿一直沉寂着，但是当敌人前进到离我们只有几十公尺时，突然腾起一阵烟雾，一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就像从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溃退下去的敌人射击。从敌人溃退的情况来看，我们给敌人的杀伤力不小，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事，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下，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①。从 11 月 29 日到 12 月 1 日，李天佑的部队阻击桂军三天，中央纵队过河后，五师才奉命撤出阵地，部队迅速过江；在东线，周浑元部奉命尾追渡江红军，但在文市遭到殿后的红五军团红三十四师的阻击，“我红三十四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剧烈。该敌在大炮、飞机配合下，轮番向我进攻，好像用大量的炮弹就可以一下子吃掉我们。战士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伤亡越来越大，但同志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地战斗着”②。战斗中，虽然周部给红三十四师重大杀伤（该师最终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被俘后自杀），却一直被阻于文市，没能追上红军主力。据参加此次围剿的第十五军参谋长蓝香

① 李天佑：《把敌人挡在湘江面前》，载于刘亚楼等著：《星火燎原》第 3 集（未刊稿），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 页。

② 韩伟：《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载于《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 年第 3 期，第 33 页。

山回忆，“红军主力全部渡江后，周浑元部才开到距文市向西不远处的新圩以北地区”①。

湘江战役是红军自长征以来遭受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1937 年 4 月，白崇禧在对广西县政训练班学员的演讲中，指出此次战役，红军“计被俘虏七千，缴械六千，散失与阵亡的约两万左右”②。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在战后也承认，“湘江一战，红军折兵 5 万，似乎已濒临绝境”③。在此次战役中，身为前敌总指挥的薛岳，试图以湘江为依托，令湘军从西面、桂军从南面、自己的部下周浑元部从东面，自己则坐镇北面，四面围击，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东岸。这种战法，虽然与日后的“天炉”战术有一定的差异（如不存在诱敌深入），但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以一定地形为依托，对敌军四面围击）。另根据薛岳 11 月 25 日给周浑元的电报，电令周部“力求压迫其（红军）主力决战于湘江，进入我天炉阵（即利用湘江地障，进行前堵后追、左右截击之意）而击破之”④，在这封电报中明确提到了“天炉战”的字眼，这说明此时的薛岳很有可能已经有了“天炉”战术的构思，因此，笔者认为，湘江战役可以看作是“天炉”战术的一次早期实践。

二、“天炉”战术在抗战中的具体体现——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为中心的研究

“天炉”战术较为频繁地运用，是在抗战时期，尤其是三次长沙会战，可以说是该战术成功运用的经典战例。以往学术界在论述三次长沙会战的过程中，涉及“天炉”战术时，往往只是简单地一提长沙会战是以“天炉”战术为指导，而具体如何指导，整个战役过程如何体现出了“天炉”战术原则，则没有过多的说明。基于此，笔者试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为例，从“天炉”战术的角度对该战役进行再探，以展现战役过程中是如何体现“天炉”战术原则的。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海军偷袭了美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第二十三军开始向香港发动进攻，与此同时，驻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发现中国暂编第二军和第四军有从长沙附近南下的迹象，时任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遂“认为有必要牵制其南下的行动”，“即使不能拖住敌人，也将给予其他重庆军以严重威胁”⑤。于是为配合香港日军作战，第十一军决定再次向湘北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发动攻击，作战主要部队为第三、第六和第四十师团，合计兵力约 12 万人。

早在 12 月初，第九战区便发觉日军调动频繁，向湘北集中兵力，其飞机也不断侦查守军阵地，遂判断日军有再次进攻长沙的可能，并积极进行战备。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根据“天炉”战术原则，制定了“战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之目的，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俟敌进入我预定决战地区时，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之”⑥ 的作战方针，并依据作战方针做出了如下部署：第二十军第一三三师、第一三四师两师，“第一步于敌强渡新墙河南犯时，应在既设阵地强韧抵抗，逐次消耗敌军兵力，务血战十日以上，争取战略运用之充分时间；第二步于达成第一步任务后，待命转至关王桥、三江口侧面阵地，自东向西，侧击尾击向汨罗江北岸南窜之敌”⑦；第三十七军，“第一步，应在汨罗江南岸既设阵地，血战十五日以

① 蓝香山：《白崇禧部堵截红军经过》，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写组编：《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第 153 页。

② 《三寓政策在广西的检讨》（1937 年 4 月 21 日），载于《白崇禧先生演讲》，1937 年，第 13 页。

③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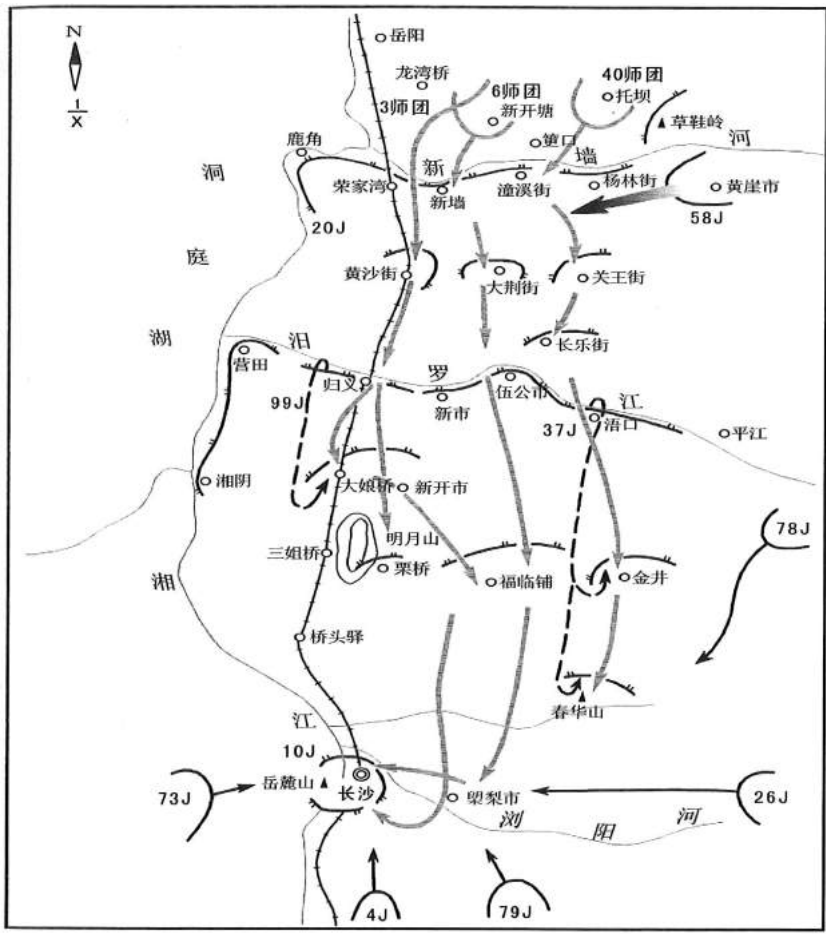
④ 李以劻：《薛岳追堵红军的经过》，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写组编：《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第 47 页。

⑤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长沙作战》，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39、140 页。

⑥ 赵子立、王光伦：《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载于薛岳、余建勋等著：《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会战》，第 109 页。

⑦ 《致第二十军杨军长号未涵电》（12 月 20 日），载于路家榜、吴静模编纂：《薛岳抗战手稿》，中国新光印书馆 1948 年版，第 81 页。

上，争取战略运用之充分时间。达成第一步任务后，待命转至社港市、更鼓台、金井间山地。以上时期，归岳直接指挥。第二步，待命归王副长官指挥。俟敌向浏阳河长沙进攻时，待命协同平江之第七十八军（附新十五师）自东北向西南攻向长沙南犯之敌。希确遵具报”①；第九十九军，“第一步应确保三姐桥、归义、营田、湘阴一带既设据点工事，及洞庭湖南岸湖防。第二步，待敌进至浏阳河北岸，向长沙进攻时，待命自西北向东南，夹击进犯之敌”②；第十军，“第一步应固守长沙岳麓山。第二步，待敌进至浏阳河北岸，向长沙攻击三天以后，待命自西向东，夹击敌军”③。其具体各军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第三次长沙会战经过要图（一）

（1941 年 12 月 18 日—1942 年 1 月 4 日）

［资料来源：郭汝瑰，黄玉章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图 7-2-1。］

12 月 24 日下午至 25 日晨，日军第四十、第六、第三师团相继强渡新墙河南犯，遭到守军第二十军的猛烈抵抗，26 日，日军“先后窜至关王桥、陈家桥、三江口、大荆街及青龙桥一带地区，战斗仍极激烈”④，至当日晚，日军西路第三师团进至归义汨罗江北岸，中路第六师团进至新市汨罗江北岸，东路第四十师团进至长乐街。第二十军在新墙河南岸阻击任务基本完成后，于 27 日凌晨

① 《致第三七军陈军长号未涵电》（12 月 20 日），载于《薛岳抗战手稿》，第 83 页。

② 《致第九九军傅军长号未涵电》（12 月 20 日），载于《薛岳抗战手稿》，第 83 页。

③ 《致第十军李军长号未涵电》（12 月 20 日），载于《薛岳抗战手稿》，第 84 页。

④ 《中央社长沙 27 日电》，载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纂组编：《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第 21 页。

“以一部留置正面，与敌保持接触，主力按原定计划向东南关王桥方面转移”①。至此，新墙河南岸战斗告一段落。

日军进至汨罗江北岸后，其第六、第四十师团于 27 日傍晚，先后在兰市河和长乐附近强渡汨罗江后，即遭到守军第三十七军的阻击，“其东中两路，三十日下午仍与我相持于长乐街新市以南山地，迄无进展”②。与东中两路日军相比，西路日军第三师团进展较为顺利，该敌 27 日由归义附近渡过汨罗江后，很快突破守军第九十九师的阻击，沿粤汉铁路两侧向南突进，至 28 日进至大娘桥附近。同日，第三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根据必须在汨罗江南岸围歼第三十七军的企图，“决定向福临铺方向转移，进入第 37 军背后”③，该师团遂由大娘桥附近连夜兼程东进，但在新开市一带遭到守军第一四〇师的抵抗，“攻我新开市之敌千余，经守军反击北溃后，复于三十日拂晓，在敌炮火掩护下，再度猛扑，激战至午，敌虽增至三千余人，但为守军反复肉搏所阻，敌乃施放毒气炮弹三十余，我第一四零师官兵中毒伤亡者约近百人”④。当薛岳得知日军第三师团已威胁第三十七军后方的情况后，立即令第三十七军向金井以东的山区转移，“我汨罗江南岸陈军、傅军，经予敌相当打击后，于三十日按既定计划，陈军向长乐街、金井东侧地区，傅军向铁道线以西地区转移，准备待机向南窜之敌围击”⑤。至此，我军在新墙河、汨罗江一带的守军在完成诱敌消耗日军的任务后，已转移到日军外线地区，“天炉”战术的第一步已经完成，在这一阶段，“我军按预定计划沿途节节阻击，使敌蒙受相当损失”⑥。

根据日军最初的设想，并没有进占长沙之意，只是“以第 6 师团、第 40 师团将新墙河左岸的第 20 军在新墙东南地区击溃，并于关王桥附近捕捉之。然后随着第 3 师团的到达，投入第 6 师团的右侧，将汨水左岸地区的第 37 军击溃后即结束作战的一个极其简单的作战设想”⑦。但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始终积极主张占领长沙，早在 12 月 25 日，他便提出“今后的作战是否伸展到长沙的问题，虽要与广州、香港方面的情况以及与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的关系，统筹考虑决定，但从一般面临的敌情考虑，要按下图（略）来指导，极易进入长沙、株洲，则对牵制广东有很大作用”⑧。29 日，当阿南根据飞机报告得知我军正向长沙退却的消息后，便“不及等待总军指示，乃独断专行命令第 3 师团向长沙方面追击，同时向总司令官提出独断请罪”⑨。

根据战前的部署，担任长沙守备任务的，为李玉堂统领的第十军。为守住长沙，保证我军外线部队对日军的围歼，李玉堂决定以“第三师主力占领长沙城垣，以一团控制于城东南角，拒止敌人南犯”，担任长沙城的守备任务；以“第十预备师占领自水陆洲、猴子石、金盆岭、黄土岭、林子冲、左家塘、半边山之线”，以“第一九零师占领黄土岭、左家塘、杨家山、鞍子山、湖迹渡、复兴寺、新河正街之线”⑩，担任长沙外围的守备任务。为了激励守军士气，战前，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便立下遗嘱，誓言此战“若不成功，决意成仁”，并嘱其夫人，如若其战死，“善教五子务须皆在专门以上学校读书，费用政府必有妥善处置”，并望“五子能继续革命事业，雪国耻报父仇，则可含笑九泉”⑪。

---

① 《军令部编第三次长沙会战经过概要》（1942 年 6 月），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44、545 页。

② 《中央社长沙 30 日电》，载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纂组编：《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第 26 页。

③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长沙作战》，第 154 页。

④ 胡璞玉：《抗日战史——第三次长沙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局 1966 年版，第 48 页。

⑤ 《军令部编第三次长沙会战经过概要》（1942 年 6 月），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 545 页。

⑥ 《中央社长沙 31 日电》，载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纂组编：《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第 26 页。

⑦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长沙作战》，第 141 页。

⑧ 同上书，第 148 页。

⑨ 同上书，第 161 页。

⑩ 《第十军于长沙附近作战计划》，载于胡璞玉：《抗日战史——第三次长沙会战》，第 86 页。

⑪ 《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载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服务团编：《精忠导报》第 6 卷第 1、2 期合刊，第 38 页。

1942 年 1 月 1 日，日军开始对长沙城发动攻击，但遭到守军第十军的顽强抵抗，“敌攻势之猛，实不亚于淞沪台儿庄之会战，我以血肉作长城，恶战四昼夜，从未有一小时之间断，战况之激剧由此可见”①。日军战史也承认，在进攻长沙过程中，遭到守军拼死抵抗：“重庆军凭据附近一带的无数掩蔽工事，进行顽强抵抗，毫无退却的征兆，兵力愈加愈多，事先已经储备好的大批弹药发挥了作用，反复逆袭达数十次。”②

当薛岳看到日军主力向长沙进攻后，便开始施行“天炉”战术的第二步，令位于外线的我军各部向进攻日军合围，与第十军合力将其歼灭：“当敌开始攻击长沙外围时，余即令第十九集团军之第四军，自株洲向长沙东南郊，第七九军自渡头市向东山朗梨市，第二十六军自洞阳市向东屯渡，第三十集团军之第七八军自三角塘、更鼓台向湖迹渡，第三十七军自蒲塘向望仙桥，第二十七集团军之第二十军自清江口向石子铺，第五八军自长乐街向安沙，直辖之第九九军向洪山庙、捞刀市，七三军自岳麓山渡湘江向长沙东北郊，四面猛烈围攻。”③ 在向日军合围的过程中，“我外围各军，均能切实遵照命令，如期到达预定位置，向敌猛烈攻击”④。战至 1 月 4 日，“我外围部队第四军之第五十九师、第一零二师已攻占林子冲、黄土岭、金盆岭等地，并与守城之第十预备师取得联络后，即向城东之阿弥岭、杨家山高地攻击，其第九十师，则已推进至黄泥塘附近策应作战，第二十六军之所属各师已到达孙家垅、舒家湾、麻笔铺之线，第七十八军已至寒婆坳附近，向栗山梅园市之敌攻击，第三十七军已攻占金井，第五十八、第二十军已到达汉家山、普家山、大塘冲、伍家埠一带，第九十九军之第一四零师，九时到达龙头，第九十二师已进至洪山庙，并以小部队分置于湖迹渡、黑石头等要点警戒”⑤。

面对中国军队的围击，1 月 3 日下午，“木下参谋长以及二见参谋副长、岛村作战参谋等一同聚集在军司令官室，向阿南军司令官提出了‘停止战斗，于 4 日夜开始反转’的意见”⑥，当日傍晚，阿南惟几批准了反转，并下达了正式撤退命令：“我军将敌牵制在长沙方面，已达到策应华南我 23 军的目的，并且扫荡了长沙市内大部地区。我军自令停止扫荡长沙，于 1 月 4 日夜开始反转，应击溃残敌，先向汨水一线前进。”⑦ 在撤退过程中，“饥饿惨败之敌，伤亡过半，溃不成军，残敌阻于浏阳捞刀两河之天然障碍，泗水溃逃，厥状至惨”⑧。日军从长沙的撤退，标志着“天炉”战术的第二步已经完成，此后，我军进入追击状态，到 1 月 16 日，日军已退至新墙河北原防地，基本上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12 月 31 日，伦敦《泰晤士报》在评论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即指出“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⑨。据日方战史记载，此次作战，日军战死 1591 人（内含军官 108 人），战伤 4412 人（内含军官 241 人）⑩。就战略目的而言，“这次作战是以配合香港作战为动机而进行的。然而我军推进到汨水一线时，情报以及兵站都没有充分准备，重庆军当时节节退避，我军完全跳入了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而进行作战的”⑪。通过日军的记载可以看出，此次作战，日军并未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而我军野战部队不仅没有被击溃，而且成功地阻止了日军对长沙的占领。整个战役过程，从作战方针的制定、到给各军的部署任务，再到作战前期我军在新墙河、汨罗江一带对日军的

① 方先觉：《保卫长沙回顾与前瞻》，载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纂组编：《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第 77 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长沙作战》，第 172 页。
③ 薛岳：《抗战回忆录》，第 21、22 页。
④ 《薛长官对长沙阵中日报记者之谈话》，载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纂组编：《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第 374 页。
⑤ 胡璞玉：《抗日战史——第三次长沙会战》，第 62 页。
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长沙作战》，第 182 页。
⑦ 同上书，第 183 页。
⑧ 薛岳：《抗战回忆录》，第 22 页。
⑨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纂组编：《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第 519 页。
⑩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长沙作战》，第 215 页。
⑪ 同上书，第 214 页。

引诱消耗，最后到长沙城下对日军的围歼，所有环节自始至终均按“天炉”战术的原则进行。战后，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在评论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指出此次战役，“薛长官决定了诱敌至长沙近郊，然后一举聚歼的战略。所以当敌渡新墙河、越汨罗江的时候，我方只以少数部队应战，诱敌深入，而长沙方面，则老早布置下天罗地网，等候倭军前来送命。故倭军一进抵城郊，即遭我坚强部队之迎头痛击，而我留置敌后部队，亦同时齐出袭敌，将其交通线完全切断，粮弹不继，倭军遂如瓮中之鳖，进既不能，退又不可”①。第九战区在战后所做的战斗详报中，谈及本次会战所得经验教训时，也指出，“本会战始终按照天炉战要领指导作战，故能随时随地予敌决定打击”②。可见，第三次长沙会战，堪称“天炉”战术成功运用的经典战例。

三、对“天炉”战术缺陷的初探

从 1939 年到 1941 年，薛岳运用“天炉”战术，指挥部队三次成功地保卫了长沙。1944 年 6 月，日军第四次向长沙发动进攻，薛岳试图再次运用“天炉”战术，将日军围歼于长沙地区，却没有取得成功，长沙终为日军所占，这说明“天炉”战术在实际运用中，是存在缺陷的。目前学术界对于“天炉”战术的缺陷，几乎没有涉及。下面笔者试对“天炉”战术在实战中的缺陷，作一初步探讨。

战争进行到 1944 年，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其本土与南方占领区之间的联系，面临着被美国海军切断的危险。在这种形式下，1944 年初，日本大本营决定实施“一号作战”，打通河南境内的平汉路南段、湖南境内的粤汉路北段以及广西境内的湘桂路，最终到达中越边境，以防在海上交通线被切断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本土与南方占领区的陆上交通。4 月，日军开始向河南第一战区部队发动进攻，而此时的军事委员会，已判明日军在打通平汉路后，必定向粤汉路进攻，遂于 5 月 14 日，指示第九战区：“敌打通平汉路后，必定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其发动之期，当在不远，务希积极准备，勿为敌人所乘，以粉碎其企图。”③ 薛岳在得到军事委员会的指令后，便根据“天炉”战术原则，做出了“战区以保卫国土，粉碎敌寇企图，于湘江东岸新墙、汨罗、捞刀、浏阳河、渌水间，湘江西岸资水、沩水、涟水间，节节阻击，消耗敌力，控制主力于两翼”④ 的作战方针，“准备于长沙附近与南犯之敌决战”⑤，并依据作战方针做出了如下部署：“第 27 集团军及第 30 集团军（欠第 4 军），在现地迟滞消耗敌人后，以主力向平江、浏阳附近地区转移；第 37 军在汨罗江沿岸迟滞消耗敌人后，向浏阳、永安市地区转移；第 4 军固守长沙及岳麓山”⑥，试图像前三次长沙会战一样，由外线部队与长沙守军合力将日军围歼。

5 月 27 日，并列集结于湘北地区华容、岳州南部、崇阳一线的日军 5 个师团，兵分三路，同时南进，向第九战区发动进攻。战斗至 6 月 1 日，东路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已先后攻占通城、麦市、南江、龙门驿等地，守军第七十二军新编第十三师被迫南撤；中路日军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相继攻占了杨林街、黄沙街、关王桥，进至汨罗江北岸，守军第二十军在日军的进攻下渡过汨罗江，向东南方向败退；西路日军第四十师团则击溃守军第一百军第六十三师，先后攻占南县、安

① 《半月时事述评》（1941 年 12 月 21 日—1942 年 1 月 5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所辖各战区档案，0—15—135，第 65 页。

② 《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1941 年 12 月 19 日至 1942 年 1 月 16 日），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凤凰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14 页。

③ 胡璞玉：《抗日战史——长衡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局，1966 年版，第 5 页。

④ 《第九战区湖南会战前敌我态势概要》，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 1293 页。

⑤ 《第九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指导方案》（1944 年 5—7 月），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 1293 页。

⑥ 同上文，第 1293、1294 页。

乡、三仙湖市等地。8 日，东路日军分别进至浏阳西北的相公寺及浏阳以东的蒋家埠附近，中路日军已突破汨罗江南岸守军第三十七军及第九十九军的防线，进至捞刀河北岸的水渡河、春华山地区，西路日军则击溃第九十二师，攻占沅江后又攻占花湖口，迫近白马寺。在日军强大的攻势下，新墙河、汨罗江一带我军守军部队，“不仅无力反攻，连防御都感不支”①，根本无法完成转移到日军外线的任务。16 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第五十八师团开始向岳麓山、长沙城发动总攻，守军第四军面对两个师团日军的进攻，在没有外线部队配合的情况下根本无力防守，两天后，长沙失陷。

长沙的失守，标志着薛岳试图运用“天炉”战术，再次将日军围歼于长沙城下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战后，第九战区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日军兵力强大：“敌发动攻势之初，第一线兵力即使用六个师团以上，更以两个师团在第二线推进，约共十五万人。我当时可用于浏长决战之兵力，实仅约六十个团”②。诚然，此次日军向长沙进攻，使用兵力远超于前三次作战，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通过正确运用战术，最终化被动为主动的战例不是没有，解放战争期间，中共西北解放军在延安地区的作战，就是典型一例。

1947 年 3 月，国军胡宗南部约 17 万人，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动进攻。当时在延安一带的中共军队，计有第一纵队、第二纵队、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共 2.6 万余人，如加上地方部队，则总兵力亦只有 3 万余人，无论从兵力上还是装备上，均完全处于劣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3 月 11 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③ 的决定。据时任新四旅第十六团团长的程悦长回忆，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曾接见新四旅团以上干部，并指出“敌人有二十三万，我们才两万多。两万多人要消灭二十多万，是有困难的。要战胜敌人，得有正确的作战方针。陕北山高路隘，你们牵上敌人去爬吧。等它爬够了，疲劳了，饿饭了，就寻找机会歼灭它”④。在这种战法的指导下，西北野战军在给胡宗南部一定阻击后，便主动放弃延安。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西北野战军利用胡部急于寻找中共主力部队决战的心理，始终以一部佯装主力，与胡部保持接触，对敌牵制，真正的主力部队则隐藏在陕北的山地中等待战机，最终分别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抓住机会，全歼胡部第三十一旅、第一三五旅及第一六七旅等部，共计 1.4 万余人，而自己的主力部队则基本没有受到损失。战后，美国政府在评论延安战役时，认为“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场伟大的胜利，实则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⑤，而国军方面也承认，十余万精锐部队，“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⑥。

同样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共西北野战军在延安战役中通过正确运用战术，取得了三战三捷，最终将被动化为主动，而薛岳的部队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却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说明在战术运用上，“天炉”战术确实是存在缺陷的。下面，笔者试结合湖南地形图，对“天炉”战术的缺陷作一初步探讨。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长沙以北新墙河、汨罗江一带的湘北地区，多为平原地带，这种地形为日军能够 5 个师团一线展开，齐头并进创造了条件。1944 年 4 月，日军第十一军在制定作战计划时，认为“关于作战初期使用兵力问题，为了全面发挥第 11 军的作战速度，最好从一开始就尽量展开强大兵力压倒对方”，并特别强调“预料重庆军将集中兵力向我进攻，故在外侧部署优秀兵团”⑦。可见，日军之所以这样部署，就是吸取了前三次长沙会战的教训，防止我军向外线转进，然后与长

① 赵子立、王光伦：《长衡战役》，载于薛岳、余建勋等著：《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会战》，第 224 页。

② 《第九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检讨》（1944 年 8 月 26 日），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 1329 页。

③ 刘统：《解放战争全记录》，青岛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87 页。

④ 程长悦：《记陕北三战三捷》，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八，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04 页。

⑤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58 页。

⑥ 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四卷，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1 页。

⑦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湖南会战》（上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7、20 页。



资料来源：胡璞玉：《抗日战史——长衡会战》，第四篇第三十二章第一节插图第二。

沙守军合力将其围歼。实战证明，日军的部署是明智的，“战斗开始，敌即以约六个师团并列推进，保持 140—200 千米至广正面，两翼常保持有力掩护，防我包围，致我数度反击，均未成功”①。可以说，在日军两翼兵力明显加强的情况下，还是按照原先的打法，试图以长沙为依托，让部队节节抵抗后转移至日军外线，而后再与长沙守军将其围歼，显然是不现实的。战前，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曾婉转地提醒薛岳：“看敌人在江南江北到处抓夫，水陆运输繁忙，其形势与第一、二、三次会战显然不同，兵力很大，仍在长沙照老样决战，到时敌人有打内线的，有打外线的，还有预备的，我们难以取胜。并且敌人自第三次战役吃了亏，必然妥筹对策，我们不宜老用一个‘死架子’打人。”② 可惜薛岳并没有听进赵子立的话。与湘北相比，长沙以南衡阳一带的湘南地区，则多为山地地形，这种地形不利于日军大兵团的展开，却利于我军的伏击。试想，如果薛岳能像中共那样，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主动放弃长沙，而后将主力部队南撤至衡阳周边的山地中埋伏起来，同时利用日军急于捕捉第九战区主力部队的心理，以一部佯装主力吸引日军南下，而后在衡阳一带利用地形优势将其围歼，那么，兴许战局会有好的结果。

四、小　结

“天炉”战术，是第九战区在抗战中最重要的作战方法，虽然该战术是薛岳在抗战期间正式提出的，但早在三十年代“围剿”红军时期，薛岳就曾实行过类似的战法，1934 年的湘江战役，可以看作是“天炉”战术的一次早期实践。抗战期间，薛岳运用“天炉”战术，三次成功地阻止了日军对长沙的进攻，三次长沙会战可以说是该战术成功运用的经典战例。但同时应该指出，“天炉”

① 《第九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检讨》（1944 年 8 月 26 日），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 1329 页。

② 赵子立、王光伦：《长衡战役》，载于薛岳、余建勋等著：《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会战》，第 218 页。

战术并非完美无缺，1944 年 6 月，日军第四次向长沙发动进攻，薛岳试图再次运用“天炉”战术，将日军围歼于长沙地区，却没有取得成功，长沙终为日军所占，这说明“天炉”战术是存在缺陷的。当日军加强两翼兵力，几个师团一字排开，同时向我军发动进攻时，我军便很难再运用“天炉”战术，让部队节节抵抗后转移至日军外线，而后再与正面守军将其围歼。

第九战区自 1938 年武汉会战结束后至 1944 年长沙、衡阳沦陷前，始终是与日军主要兵团对峙的最重要的战区。根据何应钦的《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经历了 22 次大的会战，分别是：1937 年 8—11 月的淞沪会战；10 月的忻口会战，1938 年 5 月的徐州会战，6—10 月的武汉会战，1939 年 3 月的南昌会战，5 月的随枣会战，9 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11—12 月的桂南会战；1940 年 1 月的豫南会战，5—6 月的枣宜会战；1941 年 3 月的上高会战；5 月的晋南（中条山）会战，9 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12 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1942 年 5 月的浙赣会战；1943 年 5 月的鄂西会战，11 月的常德会战；1944 年 4 月的豫中会战，6—8 月的长衡会战，9—11 月的桂柳会战；1945 年 3 月的豫西鄂北会战以及 1945 年 4 月的湘西会战[①]。在这 22 次大会战中，基本上由第九战区独立进行的有 6 次，分别是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与其他战区共同参加的有 3 次，分别是武汉会战（与第五战区）、浙赣会战（与第三战区）以及常德会战（与第六战区），总共参加了 9 次大的会战，几乎是 22 次大会战的一半，这是其他战区所没有的。因此，笔者认为，对第九战区作战方法的探讨，将有助于抗战时期军事史方面的研究。本文试从“天炉”战术的早期实践、在抗战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在实际运用中所存在的缺陷三方面，对“天炉”战术进行了独立的、初步的探讨，以期学术界今后在这一问题上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隆鸿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　历史学博士）

①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82 年版，附表二。

“风起伶仃”
——1937 年“九一四”虎门海战再考察[①]

杨新新

内容提要：民国以降，“闽系”海军把持海军战史编纂话语。格于派系纠纷，其对“粤系”海军主导之“九一四”虎门海战着墨不多，以致很长时期内，学界对此关注不够。经初步考证，1937 年 9 月 14 日，日海军突袭虎门，旨在封锁珠江出入海口，切断海外援华路，并无从海路大举进攻广州之意。是役，虎门要塞炮台与广东海军配合得当，系中方取得海战胜利之关键。“九一四”虎门海战当日，日方共出动军舰五艘；广东空军曾临空助战。海战中，中方击沉日驱逐舰一艘；而“肇和”舰长方念祖并未“临阵脱逃”，系后来者有意“误记”。

关键词：抗日战争　民国　海军　虎门　海战

1943 年 7 月，为纪念抗战六周年，时任国民党军队海军总司令的陈绍宽在专为《训练与服务》月刊撰写《抗战六年来的海军》一文时回忆到，抗战初兴，由于自身实力有限，无法直接在海上与日军对抗，海军被迫放弃出海作战，而将主要力量集中于江阴、武昌等地，协助陆空军保卫长江一线，对此有人揶揄海军此举无异于自动“降格”为“江军”，并发出了“海军到哪里去了?”、“中国没有了海，哪里还有海军?”等疑问。[②]

诚然，迟至 1937 年 7 月，日本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中日两国海军实力差距相当悬殊。深知“中国海军战力，非但无法从事海战，予日本海军以有效之打击，并且无招架之力”的国民政府，[③] 制定了“海军于开战初期，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保持我之实力，全力集中长江，协力陆空军之作战”的计划。[④] 因此，抗战初期，确也罕见中国海军主力与日海军间海上直接作战之记录。[⑤]

然而，少见却并不等于未有。事实上，1937 年 9 月 14 日，中日双方海军就曾在广东虎门海口发生过“抗战中仅有的一次中日海军军舰的对抗”，[⑥] 由于得到空军与虎门海岸炮台的配合，是役，广东海军击退了日军的进攻。此后在广州沦陷前一年多时间里，中日双方又在虎门附近的伶仃洋口海面，发生了大小数十次的空海战斗，而日军也始终无法从海上攻陷虎门要塞。直至 1938 年 10 月

① 本文写作曾得到广东省委党校曾庆榴教授、广州市南沙区虎门炮台管理所所长黄利平研究员的指导，亦蒙台湾“中央研究院”张力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赵立彬教授、四川省博物院陈默博士的批评、指正，特此一并致谢。

② 陈绍宽：《抗战六年来的海军》，载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7-323 页。

③ 蒋纬国：《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6 年版，第 65 页。

④ 马振犊：《国民党政府 1937 年国防作战计划（甲案）》，《民国档案》1987 年第 4 期，第 42-43 页。

⑤ 苏小东：《中国海军抗战评述》，《军事历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133 页。

⑥ 高晓星：《评中国海军的抗日作战》，《军事历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第 102 页。

日军登陆大亚湾，绕道攻陷广州，虎门海口要塞“仍屹然无恙”。①

对于这段历史，无论是发轫于民国年间的“海军史”、“海战史”研究或是晚近兴起的“抗战史”研究，均明显关注不够，对其来龙去脉，始终缺乏较为系统之梳理。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检讨既有研究何以“忽略”、“误解”此段历史的基础上，结合现有能见之各类资料对虎门海战之前后经过及其影响略作探讨，以期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之深入。

一、民国海军派系之争与虎门海战被“忽略”

据现有相关研究可知，为总结抗战以来的作战经验、教训，1939 年前后，随国民政府播迁重庆的海军总司令部，② 即着手开始整理、编写海军抗战之记录。③ 然而检诸当日海军总司令部编纂之各类海军战史资料可知，除《粤桂区海军抗战纪实》等专论提及 1937 年 9 月前后广东海军曾配合广东空军、虎门海岸要塞炮台对日海、空军作战之情况外，④ 其他众多文献，基本对此次海战“视而不见”。

由民国海军总司令部主持编纂之战史资料，主要内容多为海军第一、第二舰队等在长江沿线阻敌西犯之战例，对广东海军之此次海上对敌作战则着墨不多，一方面固然与抗战军兴以来，海军主力“集中力量，专事长江”，有关华南地区海军战报情况获取不宜。但另一方面，民国以降，政局紊乱，海军名为统一，实则内部“马尾”、“青岛”、“黄埔”等派系林立、相互倾轧。由于闽人长期掌控海政大权，以中央正统自居，⑤ 故其操持编纂之战史资料，多叙嫡系第一、二舰队之“战功”，至于“青岛”、“黄埔”乃至稍后兴起之“电雷”各系之“战绩”，则难入其“法眼”。因此，即便提及虎门海战之论著，对此役经过之记述亦多“语焉不详”、“轻描淡写”，甚至连指挥虎门海战之广东籍海军将领陈策之名亦只字未提。

抗战前后“闽系”海总编纂海军战史轻视，乃至忽视“青岛”、“黄埔”等系对日作战之做法，也影响到国民党败退台澎金马后台湾学界有关海军抗战史之研究。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社会“解严”以前，台湾学界关于海军与抗战关系之研究，除与海军交往不深的秦孝仪等编纂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偶有涉及之外，⑥ 其他由台湾海军军方或与之关系较密切者所出版之各类论著，则几乎照搬上述 1940 年前后海军总司令部刊行作品之编写范式，着重叙述海军在长江沿岸对敌之堵塞战、水雷战，基本未提广东海军等在抗战中的活动情况。⑦ 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台湾社会转轨完成，台湾“近现代史”研究摆脱政治话语干扰后，相关研究才开始注意到 1937 年 9 月前后中日双方在虎门海域发生的这场战事。⑧

较之台湾学界格于战报资料限制以及民国以降之派系杯葛，未将 1937 年前后广东海军抗战、中日虎门海战等问题纳入“海军史”、“抗战史”叙述中，由于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在同样少见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初期粤海军虎门作战史料》，《民国档案》2007 年第 3 期，第 39 页。

② 国民政府海军原由海军部统一指挥。南京沦陷后，1938 年 1 月 1 日，国民政府下令海军部暂行裁撤，改设海军总司令部，隶属于军政部。参见苏小东：《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九州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16 页。

③ 马幼垣：《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下册，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411 页。

④ 《粤桂区海军抗战纪实》（1946 年），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13 页。

⑤ 有关抗战结束前民国海军之派系纷乱，以及“闽系”海军操持中央大权的讨论，参见韩真：《民国海军的派系及其形成》，《军事历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

⑥ 《海军作战经过概要》，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 年版，第 45-46 页。

⑦ 参见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70 年，第 994-1031 页；王家俭：《海军对于抗日战争之贡献》，《海军学术月刊》1987 年第 7 期，第 8-26 页；庄义芳：《海军与抗战》，《海军学术月刊》1987 年第 7 期，第 27-37 页；柳永琦编：《海军抗日战史》，“海军总司令部”1994 年。当然，较之抗战前后海总编纂之战史，由于此时“电雷”系成员多已成为台湾海军骨干，故主要由台海军军方出版的这类研究，增加了关于“电雷”系以及欧阳格等人在抗战中对日作战情况的记叙。

⑧ 马幼垣：《海军与抗战》，《联合文学》1993 年第 9 期，第 184-186 页。

相关档案记录的情况下，大陆方面则于 1962 年前后，在《广东文史资料》上刊载了曾任虎门要塞司令的李洁之关于虎门要塞史略的回忆性文章。文中李洁之不但详述了晚清民国以来虎门要塞海防之沿革变迁，同时也对 1937 年 9 月中日虎门海战以及 1938 年 10 月日军进攻虎门要塞等情况作了专门回忆。① 此后，大陆方面又陆续以文史资料的形式刊载了曾任“海周”舰大副黄里、广东省江防司令部参谋胡应球等人关于广东海军与中日虎门海战的回忆文章。②

诚然，1949 年以后大陆各级政协所征集与发表之文史资料，并非属专业之“学术研究”范畴，且受囿于忆述者当日的环境与心境，内中之记录或颇有失真与不足。③ 但李洁之、胡应球的文章某种程度上却不乏学术参考价值，或可视作大陆方面关于虎门海战研究之“滥觞”。得益于此，至 20 世纪 80 年代国民政府正面抗战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兴起后，大陆学界部分论著便始有专章对虎门海战之相关史事进行了探讨。④

整体而言，目前台海两岸研究界已注意到七十余年前，中日双方海军在珠江口发生的这场海战，近年来相应研究成果亦可谓与日俱增。⑤ 然而由于文献缺乏以及受研究导向制约，总体观之，两岸学者对此问题之讨论深入不够，多数研究或道听途说，或人云亦云，以致以讹传讹。时至今日，此次战事依旧给人以迷雾重重、“能见度”较低之感。

二、配合舰队海战与战前虎门要塞之整备

就现存之各类研究来看，多数研究者一般视 1937 年 9 月前后之虎门海战为中日两国海军舰船于海上之直接争锋，较少言及此次海战中方最终能御敌于海口之外，系广东海军与虎门要塞炮台协同作战之结果。然而就现存可见之资料来看，无论“九一四”虎门海战爆发当日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发给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两封电报，以及战后由国民政府军政部编纂之《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报告，或是当日国内报刊之报道，内中皆有“我要塞炮加入攻击”、“我要塞炮击伤敌舰”等语，可知此次战斗虎门要塞非但加入了战斗，且在海战过程中起到了较为重要之作用。⑥ 而虎门要塞之所以能在是役中配合海军，发挥作战效用，则与晚清民国以降，广东地方当局对炮台之修缮、保养有关。

早在清代初年，清廷为“扼海口备御寇”，以“靖海洋”故，⑦ 便开始着手在伶仃洋口之虎门等处修筑炮台。⑧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虎门炮台为英军所摧毁后，清廷在战后迅速予以重建。第二次鸦片战争，虎门炮台再遭破坏，此后由于清廷着力于对太平天国、红兵起义之围剿，无力关注沿海海防，虎门等地之“扼险炮台，全行废堕”，⑨ 长期未能修复。⑩ 同治十三年（1874 年），日人

① 李洁之：《虎门要塞史略》，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 7 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2 年。

② 参见黄里：《广东抗日第一次海战的“海周”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 30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文闻：《旧中国海军秘档》，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4–145 页。

③ 章开沅：《〈党员、党权与党争〉序》，载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页。

④ 高晓星，时平：《民国海军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0 页。

⑤ 近年来，台海两岸出版之有关“九一四”虎门海战之成果，可参见张力：《从“四海”到“一家”：国民政府统一海军的再尝试：1937—194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1996 年第 26 期，第 279 页；饶品良：《广东海军对日作战研究述略》，《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3 期，第 78 页；陈悦：《民国海军舰船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47–448 页。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初期粤海军虎门作战史料》，第 35–36、39 页；《今晨敌炮舰轰虎门，被我机炸毁两艘》，《申报》1937 年 9 月 14 日。

⑦ 康熙《南海县志》卷九，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8 页。

⑧ 黄利平：《清代广州炮台述略》，载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编：《广州文博》，文物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8 页。

⑨ 中华书局编辑部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三，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4 页。

⑩ 黄利平：《清代广东沿海炮台分期研究》，载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编：《广州文博》，文物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79 页。

进犯台湾，清廷东南海患日炽。[①] 在“海防大讨论”之背景下，经由数任粤督张树声、张之洞、李瀚章等人先后主持，“参酌中西之制”，购置德国克虏伯、英国阿姆斯特朗新式海岸炮，于虎门炮台旧址，构筑了西式炮台。[②] 到光绪十四年（1888 年），前后经历约十五年，虎门炮台重建工程始告“大备”。[③] 由于同光年间重修之虎门西式炮台，较之此前之旧式炮台，立足于远距离打击，以在更大范围内控制珠江口洋面，并能与军舰协同作战，形成珠江出海口的整体防御体系。[④] 因此，清季的这一海防军事遗产，在清亡以后被民国军政当局所接收、继承。

据曾任虎门要塞司令的李洁之回忆，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原水师提督所辖之虎门、长洲炮台以及部分水雷队、交通运输船只为基础，成立了虎门要塞司令部，隶属于广东大都督下设之陆军司，至此虎门要塞这一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⑤] 然而由于民初以来时局混乱，虎门要塞隶属关系数经更迭，要塞司令如“走马换灯”。因此，很长一段时期内，要塞之各项设施非但未得到整顿、加强，反倒由于“内战频仍”，要塞“塞务废弛，工程毁坠，若隧道则半就倾圮；若林木则被伐殆尽；若防御工事及保护铁甲等则仅存形迹”，[⑥] 甚至因“粤中迭经变乱”，出现“各炮之炮闩及机件多有遗失”，要塞岸炮被挪作他用等问题。这导致要塞官兵风纪“每况愈下”，要塞战斗力较之从前“大为削弱”。[⑦] 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陈济棠统一广东，内部政局稍微稳定，与此同时，日人入侵外患日剧，作为海防重镇之虎门要塞才再次得到地方政府重视，予以修缮、整顿。

依照李洁之的说法，陈济棠主粤后，为防备海患，适应形势需要，陈济棠开始对虎门要塞进行整饬。然而无论其前任陈庆云或其后继者陈策等，所做之工作，不过仅为扩充组织、恢复部分编制，以亲信之“不学无术之徒”充之，对要塞之各项设备并无革新与建设。直至“九 · 一八”事变后，他本人出任虎门要塞司令后，才从编制调整、士兵训练、要塞内部道路建设、掩护林木种植以及装备添置、修缮等方面对虎门要塞作了全面整顿，并认为此类工作在抗战中“起了作用”。[⑧]

诚然，李洁之任职虎门要塞司令期间，虎门炮台在一定程度上确得到不小之“升级”。[⑨] 然而，考虑到李洁之的说法出自三十年后所做之回忆，且陈庆云、陈策在 1949 年以后或远赴外洋，或已作古，无法予以回应，故对其关于二陈于虎门要塞之修缮、整顿毫无贡献之说，后来者应持一种更为审慎之态度。

事实上，结合现存之其他资料考察可知，早在陈庆云接手虎门要塞司令后不久，他即注意到“广东之门户，香港以外厥为虎门。在此海军不振之情形之下，虎门之安危，广东之安危系焉。而南数省之安危又因以系焉”。[⑩] 为此他不但协同德国专家勘验并主持各炮台之道路建筑、营房修建、防护林之栽种等工程，[⑪] 且淘汰军士中“老幼、世袭及副业式（屯田式）”者，重新整理虎门要塞之防务编制。[⑫] 他并亲自赴广州、香港等地配制各炮位所需之炮闩、机件及弹药，使“各炮皆全，未有不能施放者”。[⑬]

到李洁之的继任者陈策时期，尽管虎门要塞之防务已收归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掌控。但陈策

①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76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博物馆合编：《明清皇宫虎门秘档》，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90–291 页。
③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六十四辑，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691 页。
④ 黄利平：《清代广东沿海炮台分期研究》，第 180 页。
⑤ 李洁之：《虎门要塞史略》，载虎门镇人民政府编：《虎门文史》第 1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0 页。
⑥ 《虎门要塞改善计划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藏，全总号 767，目录号 765。
⑦ 李洁之：《虎门要塞史略》，载虎门镇人民政府编：《虎门文史》第 1 辑，第 101 页。
⑧ 李洁之：《虎门要塞史略》，载虎门镇人民政府编：《虎门文史》第 1 辑，第 104–107 页。
⑨ 《虎门各炮台换装新炮》，《每周情报》1934 年第 12 期，第 77 页。
⑩ 陈庆云：《整顿虎门、长洲要塞计划之意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藏，全总号 787，目录号 2372。
⑪ 《中央整理虎门要塞》，《中华实事周刊》1930 年 4 月 20 日，第二十版。
⑫ 《虎门要塞最近之整理及防务》，《军事杂志》1930 年第 30 期，第 214 页。
⑬ 陈庆云：《整顿虎门、长洲要塞计划之意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藏，全总号 787，目录号 2372。

仍参照此前实地考察过虎门炮台之德国专家马德的意见,[①] 从炮械、机件之改良，辅炮、守兵增加，交通、通信改进，以及“完成防空设备，与炮台员兵之选择训练等”方面，继续对虎门要塞之各项设施作了“补苴罅漏”等工作。最终使炮台“纵勿敢夸为金汤之固，亦足以控制敌舰，固我门户而有余矣”。[②]

从上述陈庆云与陈策关于要塞整备之内容来看，其与李洁之的计划非常类似，足见自陈济棠主粤始，虎门要塞战备工程进行上的整体延续性。而如若考虑在李洁之前后，除陈庆云与陈策出任过虎门要塞司令外，尚有冯焯勋、张达、杨幼敏等人担任过该职,[③] 但由于冯、张、杨等人任职时间较短，且李洁之在回忆中更丝毫未提及他们与虎门要塞建设之关系，这从侧面亦说明陈庆云、陈策在改造与加强要塞战备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

由于经过陈庆云、李洁之、陈策等几任要塞司令之努力，到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前，虎门要塞战斗力已得到大幅度提升。同光以降在鸦片战争旧址上修筑之新式虎门炮台，绝非锈迹斑斑之抗英历史文物，而是“各炮保存尚好，其机件亦全，故炮皆能施放”，基本恢复了江防、海防军事功能。经德国军事专家达尔马在抗战前对其进行评估后认为，虎门要塞整体实力“实优于扬子江其他各要塞之上”。[④] 这为“九一四”虎门海战，要塞能够配合广东海军，击退日军进攻打下了基础。[⑤]

三、“九一四”虎门海战当日之情形与相关问题之考证

如前所述，经由数年之整顿，到 1937 年，七七事变前，虎门要塞各炮位基本恢复了控制珠江口洋面，协同海军作战之能力。与此同时，深知实力有限，难与日海军在外海直接较量，就在 1937 年 8 月日本方面宣布封锁东南沿海后不久，广东江防司令部在虎门要塞司令陈策的统一协调指挥下，于珠江主要出海水道布置了水雷,[⑥] 并“择要以沉船载石，阻塞航路，以配合陆军拒敌由水道进攻”，同时派出“肇和”、“海周”等舰，“巡弋于虎门至大铲一带，协同要塞作战”。由于战前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使 9 月 14 日凌晨，日海军突如虎门海口，中国守军能够迅速予以反击。

从目前能见之材料来看，较早详细记录“九一四”虎门海战当日战况之文献，系国民军政部于是役后不久编撰之《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下简称“《史实》”）。现援引《史实》记载如下：“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凌晨，敌舰五艘以‘夕张’轻巡洋舰为旗舰，以并列横队形向我虎门进攻。事前我已获情报，经陈司令转饬各舰与要塞炮台彻夜戒备。十四日凌晨，‘海周’与‘肇和’两舰奉命由大虎开出，搜索前进。其时曙光初显，航至沙角炮台正横，即发现敌舰黑影，急以信号报告要塞陈司令及‘肇和’军舰。三分钟后，敌向‘海周’舰发炮，我舰当即还击，‘肇和’接要塞信号即加速前进，向敌舰攻击，经三次修正弹着，卒于距离一万一千米之射程将敌旗舰命中，其时双方炮战逐渐增强，我要塞炮亦加入攻击。二十分钟后，敌舰队形紊乱，判断其已开始撤退，我‘肇和’舰舰长方念祖以勇敢决断下令横船，使舰首尾及傍炮一齐集中射击。总计炮战三十五分钟，敌旗舰‘夕张’号被毁，逃约十海里后沉没，尚有二艘负伤，我‘海周’舰舰尾中弹三枚，死士兵三名。闻敌指挥官阵亡，唯未能查出姓名。”[⑦]

综合现存之其他档案、报刊以及口述资料综合考察，可知上述《史实》记录，大体符合“九一四”海战当日之情形。然而，内中几处细节问题，较之其他各方说法，却颇有相抵牾之处（当然，其他各方说法之间亦有相左之处）：1937 年 9 月 14 日，日方突袭虎门海口，引发中日双方海战，是

① 马德：《虎门要塞视察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藏，全总号 787，目录号 2372。
② 陈策：《虎门要塞改善计划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藏，全总号 767，目录号 765。
③ 陈子欢编著：《民国广东将领志》，广州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4、105、112-113 页。
④ 达尔马：《考察广东要塞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藏，全总号 787，目录号 2371。
⑤ 《虎门要塞固若金汤》，《中央通讯社稿》1937 年 10 月上。
⑥ 《海军作战经过概要》，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第 45 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初期粤海军虎门作战史料》，第 39 页。

否系日军事先刻意准备，意欲从海路攻占广州，《史实》中并未说明。“九一四”海战当日，日方出动军舰数量，各类资料之记载不尽相同；中方“肇和”舰在此次海战中到底是“英勇作战”或系“临阵脱逃”，曾任“海周”舰二副的黄里的回忆，与陈策之报告以及军政部之记录相异。此外，海战当日广东空军是否出动、日旗“夕张”号有无被击沉，如此等等。上述诸多疑问，尽管学界已作了一定程度之讨论，但囿于认识及材料掌握之限制，叙述不够翔实，且研究者说法不一，尚有深入收集史料、细加探究的可能。兹分别作重新检讨如下：

（一）关于日本军舰海上进犯虎门之目的

由于《史实》并未说明 1937 年 9 月 14 日日军悍然袭击虎门海口出于何种诱因，因而既往诸多研究一般以为，“九一四”海战之发生，系日海军根据日方御前会议决议，试图从海上大举进攻华南、广州之举。[①] 然而，检诸日本海军战后出版之相关材料可知，1937 年 9 月前后，日本海军并未接到攻占华南、广州的命令。9 月 14 日，日本海军之所以派出舰队游弋于珠江海口，一则是鉴于淞沪战事爆发，华南方面反日情绪“更趋激化”，日外务省于是年 8 月 15 日下令从广州等地紧急撤侨，日方军舰加强在广州附近海域活动，意在配合日外务省进行撤侨行动。[②] 此外，1937 年 9 月前后，日本海军省、外务省发布封锁中国东南沿海，禁止“中国公私船只出入中国领海”的命令。[③] 日海军加强对伶仃洋口等海域中国舰船之“监视”并予以“解决”，[④] 亦有配合执行上述训令，试图切断经香港转道广东水路而进入中国内地之海外援华补给线，从而达成“屈服中国军民”之意。[⑤]

事实上，早于 1937 年 9 月以前，日军便不时有骚扰虎门海口等水域之举动。是年 8 月，日海军就已出动过飞机对虎门要塞及广东海军布防等情况作过空中侦察。此后，又有日机空袭虎门要塞，被守军击落，[⑥] 以及日舰炮击赤湾、攻占大铲岛，控制虎门海口外围等记录。[⑦] 而 1937 年 9 月 13 日，发生了广东空军误炸本国“海周”等舰的偶发事件，事后日军可能以为中国海军、空军的配合颇存罅隙，有机可乘，遂于是夜才首次派出“夕张”号等兵舰，潜伏在虎门外舢板洲后，希图于次日从海上向虎门要塞进攻，因而当日中日双方一般视此次海战为日海军之一次试探性的进攻。[⑧]

由此可以认为，尽管“九一四”虎门海战前，日海军在伶仃洋海域附近已有所准备，但其对虎门要塞及中国海军在珠江口之布防情况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其炮击虎门要塞很可能意在“造成一种紧张的空气”，使中方“注意到粤南较远方面，而多少松懈了陇海线上的战斗”。[⑨] 故将“九一四”虎门海战视作日军将从海路上大举进攻广州之始，恐须斟酌。

（二）海战当天日方出动军舰数量

根据“九一四”海战当日《申报》源于广州方面之报道：“日舰五艘，……向虎门炮台轰击”，[⑩] 这一记录与陈策在海战当日发给蒋介石等密电中报告之“敌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四艘向我

① 参见史滇生：《中国海军抗战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第 84 页；黄利平：《抗战时的虎门要塞》，《岭南文史》，2008 年第 2 期，第 34 页；饶品良：《广东海军对日作战研究述略》，第 78 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华书局 1991 年，第 242–243 页。

③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 1008 页。

④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 243 页。

⑤ 高晓星，时平：《民国海军的兴衰》，第 210 页。

⑥ 陈梓英，詹文格：《陈策将军与“九一四”虎门海战》，载虎门镇人民政府编：《虎门文史》第 1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09 页。

⑦ 陈安邦、陈安国编：《陈策将军纪念集》，未刊资料 2011 年，第 73 页。

⑧ 黄里：《“海周”舰与日舰的海战》，载虎门镇人民政府编：《虎门文史》第 1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15 页。

⑨ 金仲华：《我军扼守淮河北岸》，《抗战》1938 年 2 月 6 日。

⑩ 《今晨敌炮舰轰虎门，被我机炸毁两艘》，《申报》1937 年 9 月 14 日。

虎门进攻”数量相同。[①] 然而就在“九一四”海战后第二天，《申报》驻香港记者却一改前一日之说法，声称：“敌舰疾风、早苗等六艘，十四晨……犯虎门”，[②] 随后《申报》但凡源自香港方面关于“九一四”海战之相关报道，多援引9月15日之报道，认为进犯虎门之日舰数量为六艘。[③]

此后，曾亲历过“九一四”海战的海周舰二副黄里，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相关回忆中认为，海战当日日军出动之兵舰数量为三艘。[④] 黄里的回忆得到了学界部分研究之援引与肯定。而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秦孝仪等编纂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还提出了另一种说法：“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晨，敌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三艘，自伶仃洋直向虎门疾驶……”。[⑤] 如此，关于“九一四”海战日方出动兵舰数量，目前存有四种说法。由于暂未发现日方相关材料的记载，现仅能就中方之相关记录，初作判断。

考虑到黄里的说法系事隔四十余年后之回忆，且其在叙述时，并未直接表示进袭虎门之日舰为三艘，而是在谈到“我方飞机及时奉命到来助战”时，才提到“三艘日舰才不得不退去”。与此同时，联系黄里回忆的前后文来看，他在回忆中始终未正面提出日舰出动的数量，是故可以认为，黄里对“九一四”海战日方出动军舰数量之记忆并不清楚，其说法颇可商榷。而秦孝仪等编纂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日舰出动四艘的说法，虽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但无论是编纂者或是支持者，并未言及其记录之具体来源，且此说亦未见之于他处，明显系孤证。在尚未有新资料发现前，秦孝仪等人之说法似可予以暂时排除。

至于《申报》关于“九一四”海战前后两日相互矛盾的记载，如若检之其报道之细节，或可察见部分端倪。如前所述，《申报》在“九一四”海战当日曾根据广州方面的消息报道，是役日方出动了兵舰五艘。而在海战后第二日即9月15日，《申报》又根据香港方面的消息，对之前日舰数量的报道作了修改，声称“九一四”海战进犯虎门之日舰为“疾风、早苗等六艘”。然而就在9月15日《申报》同期之新闻中，又有报道根据广州“官场消息”的消息表示，进犯虎门之日舰为五艘，而该期《申报》中另有报道援引虎门要塞司令陈策于十四日晨击退日海军进攻后，与中央社记者的通话谓，进犯虎门的日舰为五艘。[⑥] 无论是广州“官场消息”，或是陈策与中央社记者的通话，皆与陈策在海战当日发给蒋介石之密电一致，表明海战当日虎门要塞方面及国民政府广州军政当局获取的袭击虎门要塞之日舰数量为五艘。而“六艘”之说，明显系《申报》驻香港记者获悉之传闻，可能并未得到核实。

事实上，“九一四”海战进攻虎门之日海军舰船数量为五艘，战后也得到了国民政府中央军政当局的肯定。在其后国民政府中央战史机构编纂之相关战史论著中，基本认定1937年9月14日，进犯虎门之日军为“敌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四艘”，[⑦] 可知“九一四”海战当天日方出动军舰数量为五艘明矣。

（三）海战当日“肇和”舰之行动

据“九一四”虎门海战当日陈策发给蒋介石等之密电汇报中提到：“肇和海祈周两舰”海战中皆“开炮助战，……官兵均异常奋勇沉着”，而上引是役后军政部编撰之《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也表示：“‘肇和’接要塞信号即加速前进，向敌舰攻击，经三次修正弹着，卒于距离一万一千米之射程将敌旗舰命中”。[⑧] 对此，曾任海周舰二副的黄里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回忆文章中表示海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初期粤海军虎门作战史料》，第35页。
② 《敌舰多艘炮击粤闽要塞，虎门口外敌舰三艘受伤，厦港炮战我方并无损失》，《申报》1937年9月15日。
③ 《敌舰六艘袭击虎门，粤海军迎战大捷》，《申报》1937年9月27日。
④ 黄里：《“海周”舰与日舰的海战》，载虎门镇人民政府编：《虎门文史》第1辑，第316页。
⑤ 《海军作战经过概要》，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第45页。
⑥ 《敌舰多艘炮击粤闽要塞，虎门口外敌舰三艘受伤，厦港炮战我方并无损失》，《申报》1937年9月15日。
⑦ 《粤桂区海军抗战纪实》（1946年），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813页。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初期粤海军虎门作战史料》，第35、39页。

战中“肇和”舰由于“舰长贪生怕死，畏缩不前，不敢抵抗”，以致“事后以临阵退缩罪，判处枪决”。[①] 而曾任民国东北海军上校舰长的张凤仁在其回忆中之表述更夸张，他非但认为“肇和”舰未参加虎门海战，且表示舰长方念祖海战当日并“未在舰上，粤当局以擅自离舰的罪名处以死刑”。[②] 那么，则“九一四”虎门海战当日，“肇和”舰之行动到底为何？上述两种说法，又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其实早在“九一四”虎门海战后不久，《申报》驻广州记者曾对参与过“九一四”虎门海战之“海周”舰某高级高级职员作过专访。据该职员表示，海战中他曾在“海周”舰上以“望远镜瞭望”，目击到“肇和”舰发炮击中“敌舰之尾部，舰尾敌旗堕入大海中”，[③] 这与《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中之记录一致。而如果注意到同在“海周”舰上，且参见过战斗的黄里在其后之回忆中只字未提“肇和”舰有开炮乃至命中敌舰之举，则若非事隔时久，其记忆不清，则是选择性地有意对之回避、隐瞒了。

目前来看，黄里刻意回避了这一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与方念祖及“肇和”舰原属东北海军即“青岛系”，奉系军阀倒台后，转投广东海军，非粤海军嫡系有关。在黄里回忆文章开篇，他便对方念祖颇有言辞，认为“方舰长当众说日舰炮火如何的厉害、航速如何的快，我舰各方面均落后等等”，给包括“海周”舰长陈天得，“肇和”、“海周”两舰总指挥姜西园等“粤系”海军军官等以“印象不佳”之感。[④] 因此，虎门海战中，“肇和”舰即便有发炮并命中敌舰之举，黄里可能也未必愿意在回忆中为其“贴金”、“背书”。[⑤]

至于黄里所说方念祖因虎门海战当日主动下令“肇和”舰撤退，后以“临阵退缩罪，判处枪决”，无论陈策当日向国民政府中央之密报或是稍后军政部编撰之《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皆未提及方念祖与“肇和”舰这一情节，则方念祖以“临阵退缩罪”被撤职枪毙，或别有他因，并非与“九一四”海战中其主动下令“肇和”舰撤退一事相关。

据曾在“九一四”海战后亲眼看见“肇和”舰被日机炸沉之原“福安”舰长黄雄回忆，“九一四”海战后，方念祖率“肇和”舰退回黄埔河面碇泊。日机发现“肇和”舰所在位置后，曾多次派机轰炸。当时军事委员会行营一部分亦设在黄埔（长洲），行营认为日机轰炸，有影响到其安全，曾商方念祖，差他驶离黄埔，但方本人始终未予理会。而“肇和”舰为日机炸沉后，军委会行营于是以方念祖“临阵退缩”罪名，借机将他枪毙。[⑥]

因此，综上可知，源于派系杯葛，黄里在回忆文章中，有意回避了方念祖率“肇和”舰在“九一四”虎门海战中发炮命中敌舰的这一功绩。他对方念祖海战当日，主动下令“肇和”舰撤退，以“临阵退缩罪”被枪决一事之回忆也并不准确。而黄里的“选择性记忆”，迨传至东北海军出身，未曾亲历海战，且对方念祖驾舰“倒戈”、“南逃”颇为不满之张仁凤处时，则难免以讹传讹，被夸大其词为“肇和”舰未参加虎门海战，海战当日方念祖并“未在舰上，粤当局以擅自离舰的罪名处以死刑”了。

（四）广东空军是否出动

受囿于将“九一四”中日虎门之战定义为海战作战的关系，无论是前引军政部战后编撰之《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或是目前所见之各相关研究，一般多叙海军在此次战斗中之功绩，较少言及

① 黄里：《“海周”舰与日舰的海战》，载虎门镇人民政府编：《虎门文史》第 1 辑，316 页。

② 有关张凤仁之回忆说法转引至郑守政：《方念祖并非方伯谦之嫡孙》，《日本研究》1989 年第 1 期，第 64-65 页。

③ 《敌舰六艘袭击虎门，粤海军迎战大捷》，《申报》1937 年 9 月 27 日。

④ 黄里：《“海周”舰与日舰的海战》，载虎门镇人民政府编：《虎门文史》第 1 辑，314 页。

⑤ 事实上《申报》中“海周”舰那位高级职员，也未提及“肇和”舰击中敌舰系方念祖之指挥，而将功劳归之与“粤系”海军关系更密切之“冯汝珍各重要人员”。在此，他明显将“肇和”舰与非广东海军嫡系的舰长方念祖作了有效切割。足见主要系“粤系”海军掌控之“海周”舰军官，与“肇和”舰长方念祖间的派系纠葛。

⑥ 陈安邦、陈安国编：《陈策将军纪念集》，第 73 页。

空军于是役之作用。然而从“九一四”海战当日之报道以及相关亲历者之回忆中可知，“九一四”海战，得益于空军之及时到来助战，最终使日舰不得不退去。[①] 陈策海战当日发给国民政府中央密电中有“我机追踪轰炸”等语，也印证了海战当日广东空军有出动。

广东空军之所以能在“九一四”海战当日出动并配合海军作战，一方面固然得益于早自 1931 年始，为加强防备，巩固要塞，广东军政当局便曾调派飞机常驻虎门附近机场；[②] 另一方面，则与要塞司令陈策平日厚待空军将士，在广东空军中颇有人脉，海战当日能够迅速联系广东空军协同作战有关。因此，诚如那时《申报》之报道所言，“九一四”虎门海战“重创敌舰”，实为“我海陆（要塞炮台）空”对日军舰之“夹击”所致。[③]

（五）海战当日日舰有无被击沉

有关虎“九一四”虎门海战当日，有无日舰被击沉之问题，根据“九一四”海战后军政部编撰之《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认为海战当日“敌旗舰‘夕张’号被毁，逃约十海里后沉没”。然而除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后人在其所编撰之《陈策将军纪念集》中支持这一说法外，目前所见，无论是陈策在海战后发给军政部之密报，或是海战当日各方的报道，以及稍后之相关研究，皆未提及“夕张”号被击沉一事。而从目前可知的材料来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夕张”舰曾调赴所罗门群岛等地与美海军作战，直至 1944 年 4 月 27 日，被美军潜艇击沉于帕劳岛海域。由此观之，“九一四”海战当日，“夕张”舰很可能未被中方海军击沉，《史实》等之记录或有误。

那么此次战斗，又是否有日方其他军舰被击沉？在日方相关材料尚不清楚的情况下，结合中方相关资料，后来者或能对这一问题有所“窥探”。据陈策海战当日发给蒋介石、何应钦等之密报曰，中方海军、岸炮曾“击伤敌舰一艘”，由于敌舰逃脱，陈策报告中并未提及被击伤之敌舰是否沉没。[④] 不过在海战后不久，《申报》援引大鹏湾附近渔民之报告称，十四日进犯虎门要塞，被中方击伤之日舰，“在大铲海面沉没”，这一消息也得到了曾亲历“九一四”海战之“海周”舰某高级职员的肯定。[⑤] 而从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战史部门编撰之《中国海军对日抗战经过概要》、《粤桂区海军抗战纪实》等“叙功不叙过”之宣传资料来看，内中也曾提到“九一四”海战当日，有“敌驱逐舰一艘”，被中方“击中后沉没”，但并未说明此舰即为“夕张”号，也未说明此舰之名号。[⑥] 是故，可以初步断定“九一四”虎门海战当日，确有一艘日方军舰被中方海军、岸炮击中后沉没。[⑦] 但此舰恐非日方之旗舰“夕张”号，而是随“夕张”一道进攻虎门的日军五艘军舰中之某一艘驱逐舰。

四、结语

囿于民国成立以降海军内部之派系分歧，以及华南战区海军战报资料来源之限制，抗战期间，

① 《今晨敌炮舰轰虎门，被我机炸毁两艘》，《申报》1937 年 9 月 14 日；黄里：《“海周”舰与日舰的海战》，载虎门镇人民政府编：《虎门文史》第 1 辑，第 316 页。

② 《调飞机拱卫虎门，第三飞机队驻防》，《空军月刊》1931 年第 2 期，第 15 页。

③ 《敌舰六艘袭击虎门，粤海军迎战大捷》，《申报》1937 年 9 月 27 日。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初期粤海军虎门作战史料》，第 35 页。

⑤ 《敌舰六艘袭击虎门，粤海军迎战大捷》，《申报》1937 年 9 月 27 日。

⑥ 《中日海军对日抗战经过概要》（1947 年 2 月），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 1880 页。

⑦ 至于海战中日舰为中方所击沉，均系中方材料之记录，在尚缺日方材料佐证的情况下，这类材料又是否有被“夸大”的问题？诚然，考虑到海战当日粤海军出动的“肇和”、“海周”等舰，若非舰龄偏大，即系由他种舰支改装而成，较之日海军出动的“夕张”号等舰，吨位小、航速低、火力弱，战斗力上有明显的差距。如若单以此类舰只在海上与日舰作正面对决，无论如何中方亦无法击退，乃至击沉日舰。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此次海战，并非仅系中日两国海军舰船间之海上争锋，海战中，虎门要塞炮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自陈济棠时期，历经数任要塞司令整备、修缮，虎门要塞各炮位“俱臻良好”，能协同海军舰只，基本控制伶仃洋海口。因此海战中，日方有军舰被击沉，很可能系中方海岸炮之命中所致。至于日舰之撤退，则很可能得益于中方空军之出动。参见黄利平：《抗战时的虎门要塞》，第 33–34 页。

由“闽系”海军把持之民国海军战史编纂部门，对 1937 年 9 月 14 日“粤系”海军与日海军在珠江入海口发生之抗战期间中日双方唯一之海上对决，有意无意“视而不见”，这导致相当长时期内，学界对此次海战知之甚少。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海峡两岸研究界方才注意到这场几乎被“遗忘”的海战。然而，受文献缺乏以及研究导向之制约，目前有关“九一四”海战之各类研究，深入不够，多有以讹传讹等问题。时至今日，此次海战仍给人以迷雾重重，“能见度”较低之感。

结合目前能见之各方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再检讨，可发现：“九一四”海战，绝非简单之中日两国海军舰船之海上争锋。海战中，虎门要塞炮台配合广东海军，击退日军进攻，发挥了不小作用。这与自陈济棠主粤始，广东地方当局对虎门要塞加以修缮、整备，使之恢复战斗力有关。

至于较早详细记录“九一四”海战当日战况之文献，系国民军政部于是役后不久所编撰之《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该《史实》之叙述，大体符合“九一四”海战当日之情势。惟“九一四”当日，日海军突袭虎门海口，意欲为何，以及海战中日方出动军舰数量、“肇和”舰之具体行动、广东空军是否出动、有无日舰被击沉等问题，《史实》所载与其他资料相左（当然，其他资料间亦有相互冲突处）。

在部分缺少日方相关文献的情况下，经初步考证，认为：1937 年 9 月 14 日海军悍然进攻虎门海口，旨在封锁珠江出入海口，切断经香港转道广东水路进入中国内地之海外援华补给线，恐并无从海路大举进攻广州之意。“九一四”海战当日，日舰出动数量为五艘。“肇和”舰在舰长方念祖率领下，曾发炮击中敌舰；方念祖后以“临阵脱逃”罪被枪决，非因海战中主动下令“肇和”舰撤退，而系此战后违抗军委会行营命令，拒绝驾舰驶离黄埔（长洲）水域所致。得益于虎门要塞司令陈策与广东空军的交好，海战当日广东空军曾临空助战。海战中，中方海军、岸炮联合作战，曾击沉日方军舰一艘，但该舰并非日海军旗舰“夕张”号，而是随“夕张”一道进攻虎门的日军五艘军舰中之某一艘驱逐舰。

（作者杨新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

时空视野下重庆大轰炸历史地位的思考

潘　洵

内容提要：立足于人类战争时空视野下对重庆大轰炸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重庆大轰炸历史地位的认识与思考。从中国抗日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和人类战略轰炸史的视角进行考察，日军对重庆实施的轰炸不仅制造了对中国城市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也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持续战略轰炸的恶例，成为世界战略轰炸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链条，对人类和平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关键词：重庆大轰炸　时空视野　历史地位　思考

重庆大轰炸是日本扩大对华侵略的一项重要战略行动，是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非人道暴行悲剧。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吸引国内外多方关注的焦点事件，在当时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南京大屠杀、731 部队细菌战等其他侵华暴行。[①] 轰炸不仅在中国战时的首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立足于人类战争时空视野下对重庆大轰炸的探讨，不仅有助于突破对重庆大轰炸研究视野的局限，也有助于深化对重庆大轰炸历史地位的认识。

一、制造了对中国城市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利用其优势的航空兵力对中国各地城乡进行了大面积的非人道的轰炸。无论是战争初期主要配合地面进攻的轰炸，还是相持阶段以后主要针对大后方的政略轰炸，都具有不区别军事设施和民间地区、军队活动和市民生活的“无差别轰炸”。

抗战初期，日军在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的同时，即开始对中国城乡滥施轰炸，据 1938 年 7 月上海文化国际宣传委员会根据相关资料编制的《一年来敌机轰炸不设防城市统计（1937 年 8 月—1938 年 5 月）》，日军的轰炸即遍及中国 16 个省的 275 个城市及交通线路。据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同期日军对中国城乡轰炸达 2204 次，投弹 26951 枚，炸死 10482 人，炸伤 13319 人，炸毁房屋 42087 间（栋）[②]。

① 潘洵：《抗争中的嬗变：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史学集刊》，2012 年第 3 期。

② 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江西统计月刊》，第 1 卷第 8 期，《全国各地空袭损失统计表》，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号，第 44 页。

日机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地域统计表①

(1937 年 8 月—1938 年 5 月)

省名	被轰炸城市及交通线名称	数目
江苏	枫泾、周泾港、青德、宜兴、金坛、南通、徐州、上海、南京、镇江、吴县、无锡、武进、江阴、阳山、刘堤圈、旧县、萧县、丹阳、平望、真如、句容、新安镇、海州、如皋、浦东、江都、常熟、淮阴、运河站、连云、溧水、昆山、南翔、吴江、戚堰墅	38
浙江	杭州、鄞县、衢州、诸暨、丽水、玉环、永嘉、义乌、金华、临浦、瑞安、兰谿、建德、镇海、富阳、萧山、王店、绍兴、嘉善、嘉兴、硖江、长安、临平、桐乡、崇德、闸口、艮山门	28
安徽	合肥、广德、蚌埠、宿县、六安、蒙城、符离集、安庆、南陵、舒城、桐城、寿县、永城、津浦县、阜阳、曹县、大通、武城、和县、含山、枣树庄、贵池、繁昌、东流、至德、铜陵、黄山、正阳关、徽州	29
江西	九江、弋阳、吉安、马当、南城、玉山、赣县、南昌、永丰、新淦、彭泽、星子、湖口、广昌、龙南、乐安	16
福建	漳州、石龙、福州、长乐、厦门、泉州、建瓯、浦城、漳浦、古田、澳门、龙岩、王庄乡	13
广东	广州、汕头、新会、北浦、石臼、蕉岭、惠阳、南海、黄埔、清远、海口、顺德、中山、白博赞港、马尾、石岐、梅县、长堤、曲三灶岛、潮安、高要、翁源、虎门、博罗、佛山、樟木头、南雄、洪山、从化、增城、韶关、容可、龙市尾、北海、府城、市桥、太平、乐昌、源潭、西塘翔、饶平、阳曲、宝安	44
河北	北平、天津、保定、大名、赤城、固安、卢沟桥、青县、廊坊、通县、顺德、琉璃河	12
山东	王庄、莒县、沂水、曲阜、蒙阴、台儿庄、兖州、宁阳、枣庄、德州、济宁、济阳、两下店、临城、临沂、鄂城、巢县、滕县、桑梓店、福兴集	20
山西	大康、晋城、芮城、垣曲	4
湖南	长沙、衡阳、醴陵、株洲、新桥、耒阳、奉化	7
湖北	武昌、汉口、濮阳、襄阳、孝感、宜昌	6
甘肃	兰州	1
广西	石龙、桂林、梧州、柳州、南宁	5
河南	郑州、兰封、安阳、洛阳、淮阳、新乡、珠玑里、汴城、商邱、永城、杞县、南阳、漳河头、汜水县、孝义、密县、八海、信阳、许昌、洧川、驻马店、赵口	22
四川	重庆、安县	2
陕西	西安、潼关、偏关、陕县、朝邑、咸阳、华阴、阌乡、清水河	9
交通线	粤汉路、广九路、宝太路、潮山路、广济路、省港路、平汉路、津浦路、陇海路、广花公路、平绥路、同浦路、宁阳路、京沪路、粤桂交通路、沪杭路、苏嘉路、浙赣路	18
		275

而日军轰炸的重点则主要集中于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沿海、沿江大城市，大规模的轰炸造成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

抗战初期日军轰炸主要城市概况表

被炸城市	轰炸时间		轰炸次数	投弹数	造成损害		
	开始	结束			死亡人口	受伤人口	毁坏房屋
广州市②	1937. 8	1938. 10		2630	1453	2926	
上海市③	1937. 8	1937. 10			死 2563，伤 2495，死伤未分 4500 人以上		
南京市④	1937. 8	1937. 10	65	523	392	438	1949
武汉市⑤	1937. 8	1938. 10	61	4500	近 4000	5000 余	4900 栋

① 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江西统计月刊》，第 1 卷第 7 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号，第 60—61 页。山东省数原表记 12，应为 20，径改。然表中地名于省区之分布似有不确者，如“山东”栏内之巢县、鄂城，“湖南”栏中之奉化，“湖北”栏内之濮阳等，唯原表如此，或为当时制表者所误，仍留之以存其原。

② 《广东省空袭损失统计表》，广州市档案馆档案，转引自官丽珍：《日军对广东轰炸损失初探》，《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市出版社 2008 年版。

③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血证——侵华日军暴行纪实日志》，成都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8-222 页，

④ 《南京市城乡各区敌机空袭损伤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6 页。在 1937 年 10 月以后，日军还有多次对南京的轰炸，因资料不全，未作统计。

⑤ 焦光生、李玉凡：《日寇轰炸武汉实录》，《湖北档案》，2005 年第 7 期。

相持阶段以后，日军为挫败中国“继续作战的意志”，攻击中国继续抗战的“战略和政略中枢”，[①]“促使蒋政权崩溃”，[②] 对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持续航空进攻作战。

日军对大后方城乡进行了大面积的无差别轰炸，仅就后方省会城市而言，只有西藏省会拉萨、新疆省会迪化没有遭受日机轰炸，连边远的青海省会西宁也曾遭到日机的空袭，1941 年 6 月 23 日，日机 27 架在西宁市投下炸弹 230 余枚，烧夷弹 30 余枚，并以机枪疯狂扫射。造成人口死亡 43 人，重伤 12 人，轻伤 16 人，被炸毁房屋 530 间，财产损失折合当时的“法币”119000 余元。[③] 除省会城市外，日军还对广大中小城镇和乡村进行盲目轰炸，以制造恐怖。据统计，日军在陕西省的轰炸范围遍及全省 55 个市、县、镇，[④] 甘肃省有 11 个市县被炸，[⑤] 云南省被炸地区达 21 县[⑥]，贵州省被炸县、市有 19 个[⑦]，四川省（含重庆）遭受轰炸的市、县最多，全省 143 个市县，被日机轰炸并有伤亡的市县达到 66 个，占当时四川全省市县总数的 48%。[⑧] 边陲小城松潘也未能幸免，在 1941 年 6 月 23 日，27 架日机轰炸了松潘县城，在城内外投弹 120 余枚，其中有燃烧弹 10 余枚，并进行低飞扫射，造成人员死亡 198 人，重伤 204 人，轻伤 293 人，炸毁烧毁房屋 245 幢。[⑨]

西安和兰州是西北后方遭受轰炸的重点城市，据资料显示，抗战时期日机轰炸西安 145 次，出动飞机 1106 架次，投弹 3440 枚，造成 1244 人死亡，伤 1245 人，毁坏房屋合计 6783 间，一次造成死伤百人以上的轰炸达 6 次。[⑩] 日军对兰州的轰炸开始较早，到 1941 年 9 月止，轰炸达 36 次，共出动飞机 670 架，投弹 2738 枚，造成 215 人死亡，191 人受伤，损毁房屋 21669 间。[⑪] 除了省会城市外，日军还对其他中小城市进行的轰炸，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也曾遭到 17 次轰炸，出动飞机 257 架次，投弹 1690 枚，死伤人员 398 人，毁坏房屋 15628 间。[⑫]

西南后方是日军轰炸的重点，除重庆外，日军主要轰炸的城市是四川省、云南省和贵州省的省会城市，同时重庆东部地区的战略要地万县、奉节、梁山等也是日机轰炸的重点。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省省会昆明市遭受日机轰炸 41 次，日军出动飞机 849 架次，投弹 2606 枚，造成人员死亡 916 人，受伤 1514 人，损毁房屋 22316 间。[⑬] 在云南省，昆明是遭受日机轰炸次数最多、进袭机数最多、投下炸弹最多、损毁房屋最多的城市，但不是人口伤亡最多的城市。云南省遭受轰炸人口伤亡最多的是保山县，虽然只经历了 5 次轰炸，死亡达 2335 人，受伤 322 人。[⑭]

在贵州省，日军曾 9 次轰炸贵阳市区和近郊地区。以 1939 年 2 月 4 日轰炸贵阳市中心区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最为惨重，敌机向市区投弹 124 枚（多为燃烧弹），市民死伤 1223 人（其中死 520 人，伤 703 人），炸毁房屋 1300 余所，经济损失达 2500 万元。[⑮] 其余 8 次轰炸损失不大。

---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内部发行），第 276-277 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 2 卷第 2 分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54 页。

③ 董继瑞：《抗日战争时期西宁曾遭日本飞机轰炸》，《青海工作》，2004 年 9 期。

④ 肖银章等编著：《日机飞机轰炸陕西实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 页。

⑤ 王禄明、陈乐道：《日军轰炸兰州及甘肃各地实录》，《档案》，2005 年第 2 期。

⑥ 《抗战期间日机袭滇伤亡损失总计》，云南省档案馆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16 页。

⑦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贵州省志·防空战备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 页。

⑧ 四川省档案馆编：《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 页。

⑨ 《松潘县政府为敌机轰炸及善后详情致省政府呈》，四川省档案馆编：《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第 109 页。

⑩ 肖银章等编著：《日机飞机轰炸陕西实录》，第 17 页。

⑪ 王禄明、陈乐道：《日军轰炸兰州及甘肃各地实录》，《档案》，2005 年 2 期。

⑫ 肖银章等编著：《日机飞机轰炸陕西实录》，第 43 页。

⑬ 《抗战期间日机袭滇伤亡损失总计》，云南省档案馆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第 417 页。另据《昆明市抗日战役敌机空袭轰炸损失表》，日机进袭昆明投弹 20 次，出动飞机 340 架次，造成人员死亡 850 人，受伤 1549 人，全毁房屋 4715 间，半毁 1950 间，微毁 945 间。见《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第 416 页。

⑭ 《抗战期间日机袭滇伤亡损失总计》，云南省档案馆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第 417 页。

⑮ 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军事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3 页。

四川省是抗战大后方的中心，是支持中国长期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因而也是日军轰炸的重点。省会成都市从 1938 年 11 月 8 日至 1944 年 12 月 18 日，先后 31 次遭受日军的轰炸，造成 1762 人死亡，3575 人受伤。除成都市外，四川省的梁山、奉节、万县等地也在日军轰炸的重点城市，但其人口伤亡和房屋损毁均没有超过成都市的损失。

而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日军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据《重庆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日机轰炸重庆 203 次，出动飞机 9166 架次，投弹 17812 枚，炸死炸伤人员 24004 人，其中死亡 11148 人、重伤 12856 人，炸毁、焚毁房屋 17452 栋、37182 间。①

抗战时期后方城市遭受日机轰炸损害表②

城市名称	轰炸次数	日机架次	投弹数量	人口伤亡		房屋损毁
				死亡	受伤	
重庆市	203	9166	17812	11148	12856	17452 栋 37182 间
成都市	31	—	—	1762	3575	—
昆明市	41	849	2606	916	1514	22316
贵阳市	9	约 80	150 余	520	703	1300 余
西安市	145	1106	3440	1244	1245	6783
兰州市	36	670	2738	215	191	21669

把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中国其他城市的轰炸进行比较，无论是抗战初期日军对沿海、沿江大城市的轰炸，还是相持阶段以后对抗战大后方城市的轰炸，无论是轰炸的频率、轰炸的强度、大规模持续轰炸的时间，还是轰炸造成的影响，以及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都制造了对中国城市轰炸的新的纪录，重庆也成为抗战时期遭受日军大规模轰炸持续时间最长、轰炸次数最多，造成损失最惨重的一座城市。

二、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持续战略轰炸的恶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大战场均曾实施过多次战略轰炸行动，而在西方军事学者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具有“空中战争”性质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有三次，即：1940 年至 1941 年，德国对英国的战略轰炸；1940 年至 1945 年，英、美对德国的战略轰炸；1944 年至 1945 年，美国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其中，德国对英国的轰炸虽以失败告终，却对英国构成了极大威胁，英、美对德国的战略轰炸取得了很大成功，触动了德国战争机器的要害，显著地加快了战争胜利的近程；而美国对日本的战略轰炸，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关系尤为密切，甚至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对日空中战争”。③ 而日军对中国城市的轰炸，在世界战略轰炸史上，几乎无人提及。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机作为一种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利用他们的空中优势，展开了大规模的空中轰炸，给各被侵略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其中，在欧洲战场，德国对英国首都伦敦的轰炸造成的损失最为惨重。而事实上，日本则率先开启了非人道的对城市的大规模持续战略轰炸的恶例，制造了为全世界所瞩目和谴责的恐怖行径。

这里，我们不妨把欧洲战场德国对伦敦的轰炸和远东战场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作一简略的对比。

1940 年 7 月至 1941 年 5 月，德国为实施其攻占英国的“海狮计划”，展开了对英国的大规模轰

① 重庆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防空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4 页。

② 以上调查均为不完全统计。

③ 李恩波、李学锋：《世界空战发展史》，解放军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81 页。

炸，英、德之间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场空战——英伦之战（或称“大不列颠之战”），这场空战中，德国空军共出动飞机 4.6 万多架次，投弹 6 万多吨，损失 1733 架飞机和 6000 名飞行员。英国 14.7 万人伤亡，100 万栋房屋被炸毁，损失 995 架飞机和 450 名飞行员。① 考文垂等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英国首都伦敦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摧残，从 1940 年 9 月初到 11 月初，伦敦平均每天遭受 200 多架德机的袭击，许多工厂、码头、铁路枢纽被炸毁，交通中断，无数居民被炸死、炸伤。

而日机对重庆的战略轰炸，从 1939 年至 1941 年，大规模的轰炸持续三年时间，出动飞机超过 9000 架次，投弹近 20000 枚，炸死、炸伤市民均在 1 万人以上，焚毁房屋达 17452 栋 37182 间。②

从发动轰炸开始的时间来看，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开始于 1938 年 2 月，大规模的持续轰炸开始于 1939 年的 5 月，而德军对英国首都伦敦的大规模轰炸开始于 1940 年 8 月，与日军对重庆的轰炸相比，晚了一年零三个月。

从轰炸持续的时间来看，德机对伦敦的大规模轰炸主要集中在 1940 年 8 月初至 1941 年 5 月，持续 9 个月时间；而日机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则从 1939 至 1941 年，持续长达 3 年之久。

从轰炸的规模看，德机在大规模轰炸伦敦的近两个月中，虽然每天出动飞机 200 多架，但由于英国战斗机的拦截和地面高射炮的阻击，真正对伦敦实施轰炸的飞机并不很多；由于保卫重庆领空的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力量有限，日本轰炸机在重庆上空肆意横行，特别是在 1940 年日军零式战斗机投入使用后，日军完全控制了重庆上空的制空权。因此，就规模而言，德国、英国空军数量较之日军、中国的空军数量为多，德军也曾多次一天出动 1000 架次以上的飞机轰炸英国城市，而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一天出动飞机最多为 200 多架次，但从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日机对重庆轰炸破坏并不亚于德机对伦敦的轰炸。

从轰炸造成的损失来看，尽管伦敦缺乏统计资料，但从整个英国在轰炸中遭受损失的统计资料进行推测，重庆的损失亦不会比伦敦的损失少。重庆城市街道几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1939 年的“五三”、“五四”轰炸中，下半城 27 条主要街道有 19 条被炸成废墟，燃烧弹引起的大火将朝天门、陕西街到中央公署两侧的 41 条街道烧成一片火海。而重庆上半城 38 条街道被炸，都邮街等重庆最繁华的 10 条主要街道全毁，熊熊的大火燃烧了近三天才被扑灭。1940 年的“八一九”、“八二〇”轰炸，两浮路、大田湾、两路口、中二路、通远门、中华路、学田湾、都邮街、大梁子、储奇门、磁器街、关庙街、较场口等地被炸得千疮百孔。几十处燃起的熊熊大火，“火区从上大梁子起，通过小什字，再向左折向龙王庙街、小梁子一直到会仙桥；再从苍坪街附近的瓦砾中把没有烧尽的残梁断柱重新点起来，连接到青年会，整整画了一大圈子。火焰熏红了半个天空”。“重庆的精华，大在火中毁灭了”。③“两天迷天的大火，千万人无家可归……几条繁华的街市，烧成了一望无际的瓦砾堆”。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庆不仅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根据地的重镇之一，而且与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苏联的莫斯科齐名，誉满寰宇，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四大名城，是四大名城中最先遭受无差别战略轰炸，持续遭受无差别轰炸时间最长，遭受轰炸损失也极为惨重的城市。时人也有这样的观察，赵宗鼎在《忆战时陪都重庆》一文中认为，“重庆被敌机的破坏，并不亚于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等大都市”。⑤ 在 1942 年《科学画报》增刊一篇《久被轰炸下的陪都》一文讲到，“这个四千年历史的古城屡受敌机无情的轰炸，总计在其人烟稠密、大道不多的区

① 李恩波、李学锋：《世界空战发展史》，第 144 页。关于此次轰炸，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1 页）统计为，德国空军共出动飞机 4.6 万多架次，向英国掷下了约 6 万吨炸掸，推毁英国 100 多万幢房屋，使 4 万人丧生，4.6 万人受伤。

② 重庆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防空志》，第 94 页。

③ 《灾区一瞥》，《新华日报》，1940 年 8 月 21 日。

④ 《寇机投新型燃烧弹，山城大火，精华区域都付之一炬，无家可归者达万余人》，《新民报》，1940 年 8 月 21 日。

⑤ 《空袭下的中国难民》，《日本在华暴行录》（1928—1945），台北：“国史馆”编印，1985 年 10 月版，第 739 页。

域中所受的炸弹，已不下 3000 吨之多。现存虽有 1/3 已被炸毁，而另有 1/3 已受重创，但照两年来的经验看来，重庆市确为世界上抵抗空炸的最强城市。”① 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也受到了国际社会反法西斯各国的一致声讨和谴责。

但是，英勇的重庆军民并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所吓倒，他们和伦敦军民一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轰炸斗争，积极疏散人口，不断改进防空设施，开展救护、救济。正是由于重庆人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重庆人民生命财产的牺牲和损失才逐年减少。②

三、成为世界战略轰炸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链条

在 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中力量规模空前地登上战争舞台，使空中开始成为一个新的战场。③ 在此次大战中，空中力量开始受到各国的青睐，制空权也开始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飞机的数量由最初的近千架发展到万余架，飞机种类，也由一两种执行侦察、炮兵校射任务的机种，发展成为用于执行侦察、空战、轰炸等多种任务的庞大家族；空中力量从分属陆、海军，到出现一支与陆、海军并驾齐驱的独立军种。尽管空中力量早在 1911 年的意土战争中就已出现在战场上，但大规模走上战争舞台，并对战争产生较大影响，空中成为一个独立的战场，空中战争成为一种新的战争样式，应该说是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大战爆发前的 1913 年，俄国就设计出世界上第一架装有四台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伊利亚 · 穆罗梅茨”号。载弹量达 400 公斤，航程 540 公里，并装有 8 挺机枪。在 1916 年前后，英国、法国、德国等先后研制出专用轰炸机。但初期的轰炸机，主要执行战术性任务，严格地说好像是“空中飞行的炮兵”。由于飞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发动机性能的提高，轰炸机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其任务也由战场轰炸，后来发展为后方轰炸。在这方面，尤以德国对英国的轰炸最为令人瞩目，影响也最大。

早在 1915 年初，德国为迫使英国军队撤离法国，开始使用“齐伯林”飞艇轰炸英国东部和伦敦地区。从 1915 年至 1916 年 10 月的 18 个月中，德国飞艇对英国进行了 51 次袭击，投弹 196. 5 吨，但是仅炸死 557 人、伤 1360 人，大体上每投掷 10 枚炸弹才能杀伤 1 人，远远没有达到迫使英国撤军和摧毁其作战意志的目的。轰炸效果虽然微不足道，但给英国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1917 年以后，德军改用以飞机为主对英国实施轰炸。在 1917 年 5 月至 1918 年 5 月的 1 年时间里，德国轰炸机总计空袭英国本土 52 次，出动飞机 435 架次，投弹 73 吨，炸死 860 人，伤 2060 人，给英国造成 150 万英镑的经济损失。④ 德军对英国实施的轰炸，虽然轰炸规模有限，效果也不甚理想，但却开创了战略轰炸之先河，体现了早期战略轰炸的雏形。英国在轰炸中深感空中力量的重要，于 1918 年率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独立的空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上又爆发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主要是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等。在这几次战争中，空中力量进一步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和优越性，更加受到世界上各军事强国的重视。于是，各国竞相发展空中力量，纷纷建立独立空军或加强空中力量建设。

在 1935 年 10 月至 1936 年 5 月的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意大利利用绝对优势的空军参战，仅用 8 个月时间就赢得了整个战争，并开创了使用飞机大规模投放毒剂（毒气弹）的新的空战样式，也达到了其预期的战略效果，战争中，埃方共死亡 76 万余人，其中被毒气熏死的就高达 27 万人。⑤ 意大利空军的轰炸主要是针对埃塞俄比亚军队进行的，基本不是针对后方城市和平民的

① 茸人：《久被轰炸下的陪都》，《科学画报》，1942 年增刊。

② 据统计，日机轰炸造成的人口伤亡，1939 年度每 1 枚炸弹死伤约 5. 5 人，1940 年度每 1 枚炸弹死伤约 1 人。见《空袭展览会昨日开幕展品数千件》，《国民公报》1942 年 4 月 16 日。

③ 参考戴金宇：《空军战略学》，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第 82 页。

④ 李恩波、李学锋：《世界空战发展史》，第 63-66 页。

⑤ 同上书，第 75 页。

战略轰炸，但其使用化学武器的战法却开创了极其恶劣的先例。在 1936 年 7 月至 1939 年 4 月的西班牙内战中，德国、意大利、苏联和法国的空军会战于西班牙上空，有近 3500 架飞机参战，其中 1937 年 4 月 25 日，德军“秃鹰军团”对格尔尼卡进行了 3 个半小时的连续大规模轰炸，使其遭到毁灭性破坏，居民死伤 2543 人（其中死亡 1654 人，受伤 889 人），守军士气受到重挫。① 这是一次典型的针对后方城市和平居民而进行的无差别轰炸。

而在德军对格尔尼卡实施无差别轰炸之前，1931 年 10 月 5 日和 8 日，日本关东军出动飞机对中国东北的锦州进行了轰炸，造成 16 人死亡（1 名俄国教授、1 名士兵、14 名市民），20 余人受伤。这也是有史以来在亚太地区的第一次无差别轰炸。锦州也成为中国第一个遭受外国飞机无差别空袭的城市，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第一个遭到轰炸的城市。日本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无差别战略轰炸的急先锋。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日本先后对中国的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进行了战略轰炸，“几乎我方的大城市，无一不被它毒炸”。②

而在日本实施的无差别轰炸中，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无疑是遭受轰炸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造成损失最惨重的一座城市，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最先遭受大规模持续战略轰炸的战时首都，③ 持续不间断地实施轰炸，以制造“恐怖”，挫伤抗战意志为目的；以城市为轰炸目标，对包括毫无军事目标的住宅区、商业区、文化区等在内的所有区域进行狂轰滥炸；针对重庆城市多为木质结构建筑的特点，每次轰炸不仅投下大量爆炸弹，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对城市平民和设施进行大屠杀大破坏，甚至低空使用机枪对密集人群进行扫射；完全不同于配合地面进攻，而是单独进行空中作战，企图使用空中力量达成决定性的效果。所有这些战法，都是日本航空部队在轰炸重庆的过程中开发的。1939 年的“五三”、“五四”轰炸，两天时间炸死市民 4572 人、受伤 3637 人，市区 10 余条主要街道被炸成废墟，数十条街巷的房屋起火，熊熊的大火燃烧近 3 天才被扑灭。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空中杀戮。而在此后的数年中，“跑警报”成为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持续多年体验“恐怖”生活的城市。

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了美日关系的恶化，④ 而日军轰炸重庆的经验又进一步膨胀了其利用空中力量扩大侵略的野心。正如日本著名军事史家前田则男所论，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成为通向对英美战争的跳板，发动了太平洋战争⑤。而美国后来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日本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正如前田则男所揭示的那样，日军空袭重庆时使用的战术，后来被美国空袭日本时照抄照搬，而广岛和长崎也就成为无差别轰炸历史上一条“进化”的链条。⑥ 从这个意义上讲，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开启了通向东京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乃至于后来的战略轰炸的道路，是世界战略轰炸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链条，给人类和平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和盟军对日本东京、大阪、广岛、长崎等的轰炸，虽然都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轰炸。日本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实施的残暴的无差别轰炸是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暴行，而盟军对东京、大阪、广岛、长崎的轰炸则是制止侵略战争的手段，是正义的战争行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是侵略者的自食其果，是日本侵略者种下的仇恨，给无辜的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抗战胜利后，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战后在美国主导的东京审判中，执行了“彼此同犯不究”的原则，没有对日机轰炸重庆等无辜平民的无差别轰炸暴行进行起诉，从而使日本在重庆

① 李恩波、李学锋：《世界空战发展史》，第 75 页。

② 卢豫东：《中国抗战军事发展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89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 19 页。

③ 中国的南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各国最先遭受无差别轰炸的都城，但其轰炸主要是配合其对南京的攻占，与日军后来对重庆等后方城市的轰炸相比，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战术意义的轰炸。

④ 参见潘洵：《抗争中的嬗变：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史学集刊》，2012 年第 3 期。

⑤ ［日］前田则男著：《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53 页。

⑥ 同上书，第 322 页。

犯下的残暴的非人道罪行没有得到任何的清算。然而，这样一种回避的态度却误导或模糊了人们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罪行。历史的伤痕还在，历史的教训还在，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更不能掩盖。

（作者潘洵，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没有制空权的日子：抗战中期中国防空的窘境

袁成毅

内容提要：日军占领武汉后，可资利用的航空基地越来越多，因此其对华航空作战反而比抗战初期更为激烈，并由战争初期的“战略轰炸”转为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略轰炸”，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其它各地遭受了来自日本航空兵持续的空袭。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空军不成规模，且多处于修整状态，根本难以应对日本的进攻，地面防空部队也由于战线的延长、防空武器的短缺难以得到充分的配置，中国的防空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各地民众普遍遭遇了日军的无差别轰炸。

关键词：抗日战争　制空权　防空

关于抗战中期的中国防空，重点区域当是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考虑到学术界对此已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故本文仅对这一时期中国防空的整体情况加以考察，凡涉及日军在重庆大轰炸的内容不作细述。①

一、日军“政略轰炸”的实施与国民政府空军的艰难应对

日军占领武汉后，继续向中国西部或西南、西北方向进击存在兵力不济的问题，且陆军的继续前进面临众多崇山峻岭，不利于其机械化部队的展开；海军舰队如果从武汉溯长江继续西上同样也有许多障碍。因此武汉就成为日本对华地面作战中的一个地理标界，日本海军的第一联合航空队、第二联合航空队以及陆军航空兵团所属的第一、第三飞行团总计约 200 余架飞机进驻武汉。② 此外，陆军方面还整修了山西运城机场，这样，武汉和运城一度就成了日军出击中国内陆各地的主要航空基地。

在作战指导方针上，日本制定了“压制敌人及攻击敌中枢战略”的航空作战计划，把空中进攻作战作为处理对华战争的指导方针，这意味着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将在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根据日本 1938 年 12 月 2 日的《大陆命第 241 号》，“大本营之企图，在于确保占领地域，促进其安定，力求以坚实之长期围攻态势压制残存抗日势力促其衰亡。”③ 该项命令具体规定了各方面的航空作战任务：“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主要负责华中及华北之航空进攻作战，尤应压制及扰乱敌之

---

① 该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唐守荣主编《抗战时期的重庆防空》（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重庆文化局等单位编写的《重庆大轰炸图集》（重庆出版社 2001 年版）、李金荣、杨筱著《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重庆出版社 2005 年版）、重庆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编《重庆大轰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潘恂等主编《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重庆出版社 2011 年版）等。此外，相关的研究论文也比较多，此处不一一罗列。

② ［日］前田哲男著，王希亮译：《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58 页。

③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74 页。

战略中枢，并尽力消灭敌航空战力，须密切与海军协同作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及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应以各自之航空部队，适当对其正面实施航空作战。”“参谋总长根据需要，就在华航空部队之运用、指挥及监督，得向有关军司令官作出指示。”①

基于以上指示精神，1938 年 12 月，由大本营陆军部和海军部共同缔结了《陆海军关于航空协定》，进一步明确了陆海军双方合作作战的方针：（1）在全中国的陆、海军航空部队协力实行战略航空战，粉碎中国继续战斗的意志。（2）对地面（水上）的协同作战由各陆海军航空部队担任。《协定》还规定了航空作战的要领是：陆军航空部队以航空兵团为主，主要担任对华北要地的战政略航空作战；海军航空队主要对华中、华南要地进行政略航空作战。《协定》对陆海军各方动用的兵力也作了具体规定。②《陆海军关于航空协定》划定了陆、海军各自的作战范围并协调了陆、海军航空力量的关系。此后，日本的陆、海军在华进行了密切的航空协同作战。

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在作战的战略上与战争初期有所不同，其作战初期的攻击目标主要是中国的军事阵地以及具有军事价值的场所和设施，同时也兼及非军事区域，但在相持阶段“敌空军之轰炸目标，亦随其政策之转变而由破坏我军事力量，改为对我后方城市及各建设之盲目滥炸狂轰。”③也就是说，对中国抗战大后方进行无差别轰炸成为日本陆、海军航空兵的主要作战内容。

在武汉会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日军的航空进攻主要是两广地区。1939 年 5 月以后，日军不断加大对西南和西北地区空袭的力度，以期打击中国的战时政治中心重庆，破坏国民政府在成都一带的空军根据地，摧毁中国西北地区的补给线，因此，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阳、西安、兰州等各城市普遍遭受日军的狂轰猛炸，特别是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造成军民极大的死伤和财产物资的严重损失。日军在这一年的航空作战中，海军航空兵起了主导作用，④ 同时海军航空兵还积极配合了陆军航空兵在各地的轰炸，如在 1939 年 5 月的随枣战役中，海军航空部队给予了地面陆军全面的支援，出动飞机达 1800 架次，投掷炸弹 900 吨，始终掌握着这一地区的制空权。⑤综计在 1939 年全国遭受日机空袭共约 2603 次，日机出动 14138 架次、投弹 60174 枚，中国军民死亡 28463 人，受伤 31546 人，被毁房屋 138171 间。⑥

相比之下，国民政府空军力量由于在战争前期损失巨大，无论是飞机数量还是飞行人员均难得到补充。1939 年空军的主要根据地西移四川，其中，轰炸航空队多调至成都、宜宾一带整训，驱逐航空队分别驻守重庆、成都、兰州等地，在担任防空任务的同时实施训练。当年国民政府空军的飞机总数不到 100 架，经过多次补充，到年底才仅有 170 架，而日军全年用于对华作战的飞机数在 700 架以上，中日空中力量的绝对失衡更加助长了日军的气焰。

由于国民政府空军力量过于单薄，难以正面与日军对抗，因此在 1939 年内主要是采取了偷袭日军航空基地的作战方式，其中较为重要的作战有：2 月 5 日，轰炸日军设于山西运城的飞机场，毁日机 20 余架。4 月 11 日，轰炸了山西境内的同浦铁路线，对日军的交通运输造成了一定的破坏。4 月 29 日，再次轰炸运城，使日空军基地起火。5 月 4 日，轰炸南昌外围地区，5 月 13 日，轰炸江西安义、奉新等地。10 月 3 日，轰炸日军设于汉口的机场，毁日机 30 余架。10 月 14 日，再次轰炸汉口日机场，毁日机 50 余架，消灭日飞行员 80 余人。⑦

---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74 页，第 474—475 页。

② 转引自［日］前田哲男著，王希亮译：《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第 56—57 页。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 年版，第 124 页。

④ 此处所列数据可能有所夸大，转自［日］外山三郎著，龚建国等译：《日本海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9 页。

⑤ ［日］外山三郎著，龚建国等译：《日本海军史》，第 109 页。

⑥ 此数与航空委员会防空监部所列数据似有不同。此处数据采自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 124 页。

⑦ 《中国空军抗战史》，《中国的空军》1946 年第 94 期，第 7 页。

除上述作战，国民政府空军在1939年也配合了桂南会战。在这场会战中，日本陆、海军航空兵使用各种飞机251架，国民政府空军以及苏联志愿队使用各种飞机总计只有115架。国民政府空军主动出击12次，投弹28吨，炸毁日机15架。协同陆军攻占日军据点四、五处，炸毁日军阵地3处。在与日军的空战中击落日机3架。除上述作战，国民政府空军当年还在桂柳、零陵、芷江等处与日军发生空战11次，击落日军重型轰炸机1架，快速侦察机1架，驱逐机9架，击伤日机2架。①

1940年，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凭借650—800架飞机的绝对优势，继续实施大规模的“政略轰炸”。1—2月间，日本航空兵一方面继续在桂南、粤北配合陆军作战，另一方面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滇越铁路沿线列为重点轰炸目标。3—4月，日军着重对东南地区的浙赣交通线实施破坏。5—9月，日本海军航空兵以汉口为基地，协同陆军航空兵对重庆以及四川其他地区实施重点打击，日军称这次航空作战为“百一号作战”。在这次作战中，应“百一号作战”的指挥官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山口和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大西的强烈要求，日本最新研制出的“零”式战斗机首次出现在中国战场，“零”式战队于1940年7月2日到达中国，在9月13日空袭重庆的作战中，13架“零”式战机与30架中国飞机交战，结果中国飞机被击落27架。此外，日军同年用“零”式战机两次空袭成都也获得很大战果，因此有日本军事史学者称“零”式飞机“打开了在中国腹地的航空歼灭战僵局”。② 1940年10月以后，英国重开滇缅路，日军为阻止中国方面经由该路输入战略物资，对滇缅路也经常实施猛烈轰炸。

总计1940年全年日机空袭全国各地2069次，日机出动12767架次，投弹50118枚，中国方面死亡18829人，受伤21830人，损毁房屋107750间。③

这一年国民政府空军仍然只能在被动应战的同时继续采取偷袭日军的战术。1月，苏联志愿队出击5次，使用飞机31架，轰炸了南宁等地的日军机场。4月间，国民政府空军第八大队会同苏联志愿队共同出击5次，轰炸运城日机场以及岳阳、信阳等地，使用飞机60架。6月下旬至8月，国民政府空军的三个大队出击16次，使用飞机124架次，重点对日军设在宜昌的机场实施了轰炸。这些小规模的袭击也还是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年初中国空军拥有的飞机总数为160架（其中驱逐机112架，轰炸机48架），到年底，仅余轰炸机和驱逐机共65架。

1941年日本海军航空兵因准备太平洋战争一度减少在华空袭，因此这一时期的陆军航空兵充当了主力，其对华轰炸的目标仍侧重于政略轰炸，并实施了所谓“封锁轰炸”、“疲劳轰炸”，总计当年日机袭击中国空军基地共89次，其中轰炸重庆就达45次，前后使用飞机3372架次。其中6月5日因日机轮番疲劳轰炸，导致重庆大隧道造成空前的惨案，8月上旬，重庆遭受日机日夜不停地连续轰炸达一周之久。④ 此外大轰炸也波及了中国一些不设防的城市和乡村，就连远在四川松潘、忠县等一些偏僻山野也均遭到轰炸。综计本年度日机空袭我国各地共为1858次，日机出动12211架次，投弹43308枚，中国民众死亡14121人，受伤16902人，损毁房屋9771间。⑤

尽管1941年日军航空攻势略有减缓，但国民政府空军仍然处于无力招架的境地。空军仅在3月间派出6架轰炸机轰炸了宜昌，另派少量兵力参加了9月间的第二次长沙会战。⑥ 空军的对日防空陷于空前的窘境。陈诚对此总结道：

自1927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起，至1930年底以前，为我空军艰苦危难之阶段……我原有参战飞机，不满200架，至1929年底，仅余老旧飞机65架，其困难可知，而敌人则企图实现其早日结束战争之迷梦，其空军兵力由600架增加于800架，性能亦远优于我，并不断对我展开空中

① 《中国空军抗战史》，《中国的空军》1946年第94期，第7页。
② ［日］外山三郎著，龚建国等译：《日本海军史》，第110页。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125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125-126页。
⑥ 《中国空军抗战史》，《中国的空军》1946年第94期，第8页。

攻势。[①]

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不但空军力量极其薄弱，地面防空力量也同样无法应对日军的航空进攻。

武汉、广州沦陷后，由于战况的变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地面高射炮部队进行了新的部署，将当时拥有的七五口径和七六二口径的高射炮大部分配置于西南地区的重庆、桂林、衡阳等地。随着日军空袭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军事委员会此后又不断地在贵阳、昆明、自流井等地增加了地面防空兵力，并利用从美国进口的一批一二七厘米高射机关枪等装备成立了炮兵第四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分别布防于四川、湖北和滇缅路沿线。

不过地面防空部队的高射武器严重短缺。到 1941 年 2 月，国民政府的地面防空部队仅有高射炮 419 门，高射机关枪 688 门挺，照测器材各式照空灯 41 具，这些武器和装备尽管都布防于上述各要地，[②] 但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除了防空武器严重不足外，地面防空部队还遇到了日本航空兵不断调整空袭战术的挑战。

1939 年欧战爆发后，日本效仿德国的“低空攻击及俯冲轰炸”战术，对中国大后方交通要道、重要桥梁以及仓库实施轰炸，将其成为最主要的袭击方式。1940 年 4 月 12 日，日军的 1 架轻轰炸机从杭州方向起飞后，在诸暨上空仅 300—400 米的高度俯冲投弹约半小时之久。同年 6、7 月间日机轰炸浙江金华车站和铁桥共有 11 次之多，其中有 6 次是在 500—1000 米不等的高度低空俯冲投弹。1941 年 4、5 月间，日军为策动浙东战事，派遣大批飞机轰炸浙赣沿线，其中在江西玉山一地的 10 多次空袭中，有 6 次是使用俯冲投弹。

面对日军上述轰炸战术的变化，国民政府的地面防空部队根本无力招架。周至柔认为造成此种惨痛教训的原因在于“士兵训练之程度不够，阵地配备之位置欠妥，官长学识经验之缺乏有以致之，而武器太少，火力薄弱，亦为一主要原因”。[③]

正是由于上述多方面原因，地面防空部队虽也取得了若干战绩，但并未能达到预期。据统计，1939 年高射炮部队在衡阳、重庆、兰州等地共击落日机 31 架，军方认为“以我国防空部队之薄弱，高射火器之落后，有如此之战绩已属不易”。[④] 1940 年地面防空高炮部队又击落日机 15 架。[⑤] 1941 年击落日机 14 架。[⑥] 防空部门认为，“在击落敌机之数字上虽觉稍逊，然敌机既不敢低飞，其所期之效果遂大减”。[⑦]

二、国民政府防空体系的进一步调整

针对武汉沦陷后日本航空兵实施空袭的新特点，国民政府在抗战相持阶段对防空体系也不断进行了调整。

1939 年 5 月，原来的航空委员会防空厅改称“航空委员会防空监”，下设防空情报处、积极防空处、消极防空处。稍后，又将全国防空的领导机构又改为“防空总监部”，由黄镇球任总监，主管全国防空策划与督导事宜。同年 8 月，黄镇球提议对原来的《全国防空机构办法》进行修订，他认为“自第二期抗战开始以来，敌机之轰炸目标已由都会要地而及于县市乡镇，为期减少损害，保全国力起见，应当对原有组织办法进行调整”。[⑧] 在他的努力下，1939 年 11 月 1 日，国民政府军事

① 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组（筹）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1985 年版，第 10—11 页。
② 何应钦：《对五届八中全会军事报告》，载民国丛书第二编 32《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海书店，第 415 页。
③ 周至柔：《全国空袭状况之检讨》（1942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号 787—17013。
④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 124 页。
⑤ 同上，第 125 页。
⑥ 同上，第 126 页。
⑦ 《抗战以来我防空部队击落敌机纪实》，《防空军人》1939 年第 1 卷第 1 期。
⑧ 《防空法案》，台湾“国史馆”馆藏档案，卷号 1567/001012306A002。

委员会在原来《全国防空机构办法》的基础上，制定了《调整全国防空机构办法》，构建起了从省到乡镇一级的防空组织机构网络。其主要内容如下：

（1）各省在省会所在地设立“全省防空司令部”，全省防空司令以省主席或当地负责警备责任的主官或行政专员等兼任；对于在军事或政治上特别重要的地点，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可设立以该地名称相冠的“防空司令部”；各省为推行防空业务指挥便利起见，可在重要地点设置“防空指挥部”，直隶于全省防空司令部。全省防空司令部设司令 1 人，副司令 1—3 人，下设第一、第二、第三科，兼办省会防空业务，防空指挥部设指挥官 1 人，副指挥官 1—3 人，下设第一、第二、第三股。全省防空司令部直辖该省防空协会、高射部队、防护团、情报所暨各防空指挥部，并切实与当地空军联络指挥作战，防空指挥部指挥所辖各县或各要地的高射部队、防护团、情报分所、防空监视哨队，监督指导当地防空协会县支会，并切实与当地空军联络指挥作战。

（2）各县防空事宜由县长主持办理，并向防空司令部或防空指挥部负责。在县政府的第一科内增设 2—3 人，承县长命令专门办理该县一切防空事宜。各县县长指挥该县防护团及所属各乡镇防护区（分）团，并指导防空协会县支会及监督该县内的防空监视队（哨），必要时应指派团队，组成步骑枪对空射击部队。

（3）各乡镇的防空业务由乡镇长负责办理，隶属于县长。各乡镇的防护区（分）团团长由乡镇长兼任，负组织训练及指挥之责。

（4）全省防空司令部、各地防空指挥部及县政府增加人员经费由省政府或当地行政机关筹措。①

《调整全国防空机构办法》规范了省、县、乡镇三级防空机构的职权和事权，也明确了各级防空机构的经费来源，对于推进防空业务的开展具有积极意义。

制定《防空法》的实施细则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防空制度建设的另一项重要举措。《防空法》自 1937 年 8 月颁布以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规定得过于笼统，很难起到法律规约的作用，因此 1939 年 11 月 13 日，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建议制订实施细则，②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随即召集有关机关部会加以讨论，形成了《防空法施行细则》。该细则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 1940 年 2 月正式公布实施。

《防空法施行细则》共 20 条，它对原来的《防空法》提到的一些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国民防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涉及防空的各个方面加以细化，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③ 它的颁布和实施，弥补了战前制定的《防空法》因条文过简难以落实的缺陷，也有利于各级防空机构依据本项施行细则开展防空业务。

防空教育是消极防空的重要内容之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防空当局根据战局的变化，对原来的防空教育形式进行了调整，战前防空学校在杭州和南京先后办了“人民防空研究班”共 13 期，自从防空学校西迁后，防空教育也渐向内地转移。1938 年 7 月，先是在湖南开办人民防空研究班第 14 期，培训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机关公务人员。防空学校迁到贵阳后，由于交通不便，防空研究班在组织形式上也进行了变革，将人民防空研究班的形式改为“人民防空研究游击教育班”，在地域上分西南组和西北组分别实施，西南组从 1938 年 12 月开始，以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的公务人员为对象，先后在贵阳、成都、昆明、桂林、衡山、吉安、衡阳等地办理了 10 期。西北组先后在西安、兰州等地办了 3 期，总计培训人员 8000 余人，分布各地实行民防工作。④

在防空设施建设方面，国民政府继续进行防空情报网的改进与新建。1939 年，黄镇球考察了衡

① 《防空法案》，台湾“国史馆”馆藏档案，卷号 1567/001012306A002。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张明凯：《抗战时期的地面防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下，1985 年，第 878 页。

阳、桂林、贵阳、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昆明等地的防空设施，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各地改进的建议，此后，各地因防空的需要陆续增设了一些防空情报机构和防空避难设施。在防空情报机构方面，到 1941 年 2 月，除中央情报所外，后方各省市共建有 18 个情报所，35 个情报分所，542 个监视队，3039 个监视哨，188 个独立哨，343 个无线电台。① 与此同时，防护团的组织也有了一定的扩大，据 1941 年 2 月各省上报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防护团队 862 个，防护团员 241788 名。② 在防空避难设施方面，各地也陆续增设了不少新的防空洞、防空壕与防空掩体等，到 1941 年 2 月，形成了可容 400 多万人以上的防空避难设施。③ 战时各地防空设施的建设虽然多数比较简陋，但聊胜于无，在减少民众伤亡方面这些设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空袭恐怖中的民众生活

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数次发生战争，但多数战争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区域，从作战的形式来讲，虽然也从冷兵器进入了火兵器时代，不过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来自空中的打击，而侵华日军从 1931 年到 1945 年在长达 14 年的时间里，凭借其军事技术优势，对中国各地全面实施了空中袭击，虽然空袭并没有达到其消灭中国人民抗日意志的目的，但毫无疑问，它对中国国民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警笛”声、“警报”声、警炮声等各种形式的声音构成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战争的特别记忆。在当时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无论是诗歌、小说、散文或戏剧、电影等都有反映日军空袭和人们防空袭的场景和感受。

空袭首先是对中国国民的生命构成重大威胁，从最高执政者到普通百姓都概莫能外。根据黄仁宇的研究，抗战期间蒋介石数次差点被炸身亡。1938 年 8 月 12 日，蒋介石入住的武昌省政府官邸四周均被日机袭击，卫士 20 余人身亡，蒋得以幸免。蒋在次日的日记中写到“目观近日敌机轰炸武昌与汉阳之凄惨，以及人民与士兵死伤之悲痛不忍心之至!”④ 1939 年 6 月 11 日，蒋介石所在的重庆黄山官邸附近也曾中弹，蒋当时正在三楼，幸未被炸及。1940 年 2 月 22 日，蒋驻广西柳州羊角山，其行营所在地被日机炸伤卫士 12 人，蒋在次日日记中记载了当时遇空袭之情形：“午睡初醒，二时十五分闻机声，命卫士审其方向，旋忽警觉敌机必来炸余，乃急披衣整装外出，其匆促之情殆不啻西安事迹之初焉”。“当余外出时，侍卫长王世和称：敌机已由头上飞过，似不要紧。余知敌机如来炸柳州，其目标必在余，乃急入后山之上层防空洞，少顷敌机二十余架齐向洞上投弹……旋又来袭抵空俯冲投弹……弹皆着洞上右方五十米突至一百米突至山巅，计伤卫士十二人……”1941 年 8 月 30 日，蒋介石的重庆黄山官邸再次被炸，死卫士 2 人，伤 4 人。1942 年 1 月 7 日，蒋在缅甸，日机有一弹坠落于蒋住所仅五十码处，幸好未爆炸。⑤

蒋介石长子蒋经国也有数次被日军锁定空袭的经历。1940 年 2 月 5 日，蒋经国从赣州回浙江溪口，当时以运输商身份长住溪口的日本间谍芝原平山郎，获知蒋经国入住武岭公园情报后，立即向日本派遣司令报告，日军认定蒋经国一定会在溪口过年，便选定 2 月 10 日即正月初三轰炸溪口，并把武岭公园作为首选目标，蒋经国幸好已离开溪口，方逃过此劫。⑥

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梅的经历更惨。由于溪口是蒋介石故里，常遭日机轰炸，1939 年 12 月 12 日，6 架日机轰炸溪口，毛即罹难，从赣州赶回奔孝的蒋经国挥泪写下“以血还血”四个大字，

① 何应钦：《对五届八中全会军事报告》，《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民国丛书第二编 32，上海书店影印版（据 1948 年版影印），第 414 页。

② 同上，附表 55。

③ 同上，附表 54。

④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8—189 页。

⑤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 188 页。

⑥ 周金康、裘国松《溪口民国史史料辩证与拾遗》，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0 年 4 月 10—12 日杭州溪口。

立于母亲的罹难处。①

普通民众虽然不会像蒋介石及其家人那样成为被锁定空袭的具体对象，但由于日军实施了旨在消灭中国人民抗日意志的政略轰炸或无差别轰炸，同样生活在空袭的恐怖之中。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差不多中国的每个家庭都有过躲避空袭的经历，也有很多的家庭直接成了空袭的受害者。空袭的影响无论对男女老少，或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阶层都概无例外，对大后方的妇女而言，“跑空袭”构成了生活的重要内容，以四川的重庆和成都为例，每遇警报声发出，妇女们总是带着铺盖、衣物和食品，躲进防空洞，平时一有空就得把饭菜做好，把衣物包好，准备随时“跑空袭”。② 更为悲惨的是即使进了防空洞，也有难保性命的，重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谈及：“人类的悲剧，每天在描画着，昨天本是同在一个洞里避难，今天又缺少了几个熟人。谁知道几时死呢，只有听着大自然的安排。”③“防空洞封口了，有些时还能听到里面救命的呼声。我们没有机器，只好一锹锹的挖掘，二公尺高的洞口，常费四五个小时还挖掘不开。最后洞口挖开了，但救命的声音没有了，洞里的人仍然歪垂着头，斜倚着，挤坐着，孩子们在母亲的怀抱中偎依着，这样，他们离开了尘世，忘记了一切，回到了自然的怀抱。”④

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多次遭日机轰炸，作家柳青则见证了处于空袭之中的延安百姓跑警报情景，他在《空袭延安的二日》中写到：“日本飞机嗡嗡地震荡着延安市的空气，人们慌张地乱跑着。我们的住宅离大东门最近，只有三四十步泥泞的街道。在那短短的街上，人们像热锅里的蚂蚁一样跑着。”⑤

日军对中国各地实施政略轰炸的目的就在于消灭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虽然中国民众并未因日军的空袭放弃持久抵抗，在某种程度上也甚至的确是产生了中国人民“愈炸愈勇”的一面，但我们同时也应当承认，空袭毕竟具有剥夺人生命的恐怖特征，它不可能不对民众产生诸如恐怖以及其他方面的心理影响。

台湾学者张瑞德系统考察了重庆大轰炸对当时人们的心理影响，他得到的结论是：第一，轰炸对于重庆民众造成的心理冲击包括恐惧、焦虑、愤怒等，焦虑造成民众的强迫性行为，如排便、进食、逃至远方等，愤怒则导致一些集体意识如社群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强化，有助于抗战。第二，许多民众在面临轰炸的威胁时，选择以宗教（尤其是果报、劫难的观念）和迷信（如算命、风水、碟仙等）方式寻求自我安慰。第三，经过长时间的轰炸，重庆民众对于轰炸逐渐适应，对于轰炸的反应也由恐惧、焦虑、愤怒转为逆来顺受。第四，轰炸对于重庆民众个性形塑的影响，可分正面和负面两种类型，而以民众的年龄和是否为直接受害者，两项变数影响最大。⑥

也有中国大陆学者在考察了重庆民众对于日军大轰炸的心理后部分地佐证了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从 1938 年 2 月开始日军展开了对重庆的不断轰炸，在初期，很多民众对大轰炸抱有盲目迷信和侥幸心理，对国民政府疏散人口的办法不予听从，在 1939 年 5 月到 1941 年间，仍然有两种心态，一种是遵命防空，一种是不顾政令，听天由命。⑦ 汪曾祺先生曾在《跑警报》一文中则谈到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时期师生对待空袭的“不在乎”态度：“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

① 周金康、裘国松《溪口民国史史料辩证与拾遗》，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0 年 4 月 10—12 日杭州溪口。

② 张玉法：《战争对中国妇女的影响（1937—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妇女研究编辑委员会编：《近代中国妇女研究》，2009 年第 17 期，第 172 页。

③ 胡伯翰：《重庆防空》，《航空建设》，1947 年第 2 卷第 8 期，第 12 页。

④ 同上，第 12 页。

⑤ 穆青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 1937—1949：报告文学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年版，第 170 页。

⑥ 张瑞德：《在轰炸的阴影下——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空袭的心理反应》，载林丽月主编：《近代国家的应变与图新》，台湾唐山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7—278 页。

⑦ 鲁克亮、齐琼芳：《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日军轰炸的意识演变》，《西南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第 180 页。

‘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① 其实“不在乎”所反映出来的，既有民族精神不屈的一面，更反映了国家在失去制空权状态下民众的无奈。

总之，从 1938 年 10 月武汉、广州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空军由于在战争前期损失巨大，在此阶段已无力应对日本陆、海军航空兵的强势进攻，地面防空部队也由于装备不足难以起到有效的防空作用，中国防空局面陷入空前的窘境，致使中国民众在此阶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日军无差别轰炸。这一状况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美国对华空中援助的不断增加才得到改变。

（作者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　教授）

① 《跑警报》，汪曾祺《无事此静坐》，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6 页。

近代日本在华长期驻军的谍报优势探析

许金生

内容提要：近代日本多次出兵侵华，形成清国驻屯军、关东军等长期驻军。驻军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获种种“特权”，在参谋本部的领导下收集各类情报。与日军的其他谍报主体相比，驻军在收集情报方面具有“地”、“人”、“时”方面的明显优势，这些优势便于驻军长期持久展开各种规模、形式的谍报活动，及时准确获得更全面深入、丰富细致的情报。对参谋本部而言，驻军在收集中国情报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是十足的“平时谍报机关”。

关键词：谍报活动　关东军　中国驻屯军　侵华日军

序言

1928 年日本陆军中央情报机构——参谋本部制定的《谍报宣传勤务指针》，在“第一章谍报机关组织”中列举的“隶属于参谋本部或者受其领导”的“平时谍报机关”之一便是日本在外国的驻军。对于其谍报职责，《指针》的第 21 条规定为“担任相关方面的谍报任务，为此可根据需要向要地派遣谍报机关，而且直接派遣间谍。与相关各方面属于其他系统的谍报机关保持紧密联系。”① 据此可知：1. 日军在外驻军负有谍报任务；2. 驻军可以在“要地”建立自己的谍报机关，派遣谍报员；3. 驻军平时需与其他谍报机关保持密切联系。

当时日本主要在中国驻兵，以上规定显然是针对在华驻兵的。自 1894 年以来，日本以种种形式多次出兵侵略中国，甚至在一些占领地区形成了规模不等的长期驻军。因为被定性为“平时谍报机关”，这些驻军自然就是一个个谍报机关，是日军对华谍报体系的组成部分。

驻军的谍报活动一直受参谋本部统一指挥。二十年代初期参谋本部还制定了《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军事调查参考书草案》《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兵要地志以及军用资源调查报告例规》等，作为驻军等对华谍报机关收集中国军事情报的纲领和指南。根据以上文件，驻军参谋部需制定对华军事谍报的长期计划和年度谍报计划指导情报工作，并且按照指定的时间和格式，定期、不定期提交报告。②

日军在华长期驻军主要有关东军和清国驻屯军（七七事变后改称“支那驻屯军”，一般统称“中国驻屯军”）。有关两者的各种研究并不少见，但对其谍报功能以及作用未见系统考察。近代日本军方在华谍报主体众多，有驻华使馆武官、驻在武官、特务机关、应聘将校、支那研究员、来华船舰等，③ 与这类谍报主体相比，长期驻军有哪些谍报优势？在日军的对华谍报中处于何种地位？

---

① 飯田忠雄“旧陸軍参謀本部の”諜報宣伝業務指針“について”神戸学院大学《神戸学院法学》第 2 卷第 3、4 号，1972 年，第 102 页。

② 有关参谋本部《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军事调查参考书草案》等的内容和中国驻屯军、关东军的执行状况，请参阅拙稿“戦前期における参謀本部の『対支軍事諜報計画書』について”日本立命馆大学《立命馆经济学》第 60 卷第 2 号，2011。

③ 有关应聘将校、日军船舰的谍报活动，详见拙稿“近代日本在华‘应聘将校’与谍报活动考论”民国档案杂志《民国档案》第 4 期，2014。“南清舰队与近代日本海軍的中国情報収集活動”日本立教大学《ランゲージセンター紀要》第 31 号，2014。

本文拟围绕以上问题，以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为例，从“地”、“人”、“时”三个角度加以分析，借此对长期驻军的谍报功能及其在日军对华谍报方面的作用加以考察。

一、“地”之优势

“地”指“地利”。根据《辛丑条约》，1901 年 5 月参与镇压义和团的日军“清国驻屯队”改称“清国驻屯军”，长期驻扎中国。驻军司令部设于天津，在北京、天津、塘沽、山海关、秦皇岛驻扎守备队等，负责“保护”日侨和天津至北京的铁路。在上述铁路沿线和军队驻地，中国驻屯军享有公开活动的“特权”。

同样，根据日俄战后的协定，日军向中国东北长期派驻了军队，即关东军。日本通过战争取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及其支线以及铁道沿线两侧和沿途火车站的附属地、在租借地和附属地的行政权、警察权、平均每公里铁路驻兵 15 人的驻兵权。依据以上特权，日本将辽东半岛租借地划为“关东州”驻兵把守，南满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大连、金州、营口、海城、鞍山、辽阳、奉天、新民府、铁岭、公主岭等也有日军重兵驻守。在以上地区，关东军以护路为借口也就享有公开活动的“特权”。

因为属于“合法”驻扎，驻军在公开和秘密收集情报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地利”优势。为了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参谋本部还划定了谍报区域，将华北、西北地区划归中国驻屯军负责，将东北和蒙古地区划为关东军负责。

就公开收集情报而言，与驻在将校、特务机关等偷偷摸摸收集情报相比，驻军凭借“地利”，能够公开活动，借此获得更全面准确的情报。

首先，驻军的各级军官能够以驻军代表等身份公开与当地军政要人交往，与记者等各阶层结交，借机刺探情报。关东军要人与东三省朝野政要交往密切，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加赘述。在此仅以中国驻屯军为例，该军盘踞的京津地区，国民政府建立前是中国的政治心脏地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天津，清末民初则云集了中国北方的达官显贵，因此在此刺探中国重要政情、军情，监视北京动静极其方便。

驻军的日常开支中有一项为“机密费”，一般由“秘密交际”、“秘密侦查”等部分组成。“秘密交际”指交际方面的费用。表 1 是中国驻屯军 1911 年下半年的具体用途。如表所示，该军每月都有此开销，在这半年的“机密费”中，日币共 2173 日元，其中“秘密交际”费占五分之一左右，洋银共 10950 圆，“秘密交际”费几乎占了一半，交际之频繁可见一斑。在 1927 年的机密费中，这种费用仍然占第二位。[①] 可以想象，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要员是如何利用“地利”，通过宴请等手段结交各界名流，笼络感情，在杯盏交错中获取情报的。

表 1　中国驻屯军“机密费”用途别统计（1911 年 6—12 月）

用途区分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计
秘密侦察	日币	175	125	225	125	125	125	785	1685
	洋银	765	580	562	572	1420	1061	1260	6220
秘密交际	日币	132	7	112	7	41	7	182	488
	洋银	736	630	286	283	894	568	613	4010
宪兵侦察	日币								
	洋银	60	60	60	60	60	60	120	480
北京步兵队长	洋银			40		200			240

资料来源：“機密費受払の件報告”1911 年、“清駐軍機密費受払の件”1912 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309000、C03023019100。

① “機密費使用区分の件”1927 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1003754200

说明：原资料未标明货币单位，“日币”应为“日元”，“洋银”应为“圆”。另外，原资料金额标至最小单位，为行文方便，均四舍五入。

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给参谋本部等的密电中，可以看到司令官的一些情报来源。仅以 1917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为例，“秘”字“天电”第 108、110、112 号分别报告了司令官与“陆宗舆的时局谈”、“周自齐就时局对本职的谈话”、访问黎元洪询问政变的情况等。① 能够轻易接触这些中国政界核心人物，并且随意交谈，没有“地利”，没有平时较好的“交际”基础，是无法做到的。

其次，驻军在驻地带具有自由进行野外军事演习、训练的所谓“权利”。这种权利实际上也是谍报优势，因为驻军可以以演习训练为幌子公开收集情报。据中国驻屯军 1913 年 10 月修订后颁布的《支那驻屯军教育要领》可知，军司令部将每年举行若干次野外演习规定为驻军进行自我教育的必修项目，并且明确赋予了谍报任务。

要领规定，驻军平时需进行“一般教育”和“特殊教育”。“一般教育”一年定期举行三期，另外再举行数次野外教学。教育的理由和目的在于“为了使部队得以投入战斗和展开，在当地对操典的原则加以演习，北支那是最合适的地方。在进行教育演练或警备勤务时，大陆的地形与日本大不相同，值得深入研究”。并且“以上只是一例，如果进行演习，总是以在北支那地区战术上的研究为主要着眼点来实施的话，将会取得巨大收获”。很显然，中国驻屯军是要求各地驻军演习时充分利用在中国的“地利”，适应并且研究大陆地形等特点，实地探究相关战术。

“特殊教育”也同样注重实地研究。例如对于军官教育，“冬季的教育和讲学主要是中国各种情况和各国状况等，应该选定合适的问题，利用在当地驻扎的好机会带着兴趣研究。”“地图上的战术尽可能根据北支那地区的地形加以研究。”而“研究实验的事项或收集到的资料将作为参考”，“必须报告”。② 这样，一年多次进行的“教育”演习训练成为名副其实的谍报活动，而《支那驻屯军教育要领》的制定，则使这种谍报活动完全常态化、制度化。

现有史料中有大量谍报报告就来自这种演习训练。1903 年的《天津北京间行军记事》和《天津北京间行军所经道路侦察略图》便是现存最早的报告之一。前者报告了模拟实战状态在天津至北京区间对中国和日本等三国马匹进行耐力测试的情况、沿途地形、人马给养实验结果、卫生状况等，提出了相关建议，后者则是通过行军演习绘制的地图。③ 从标题上看它们都是通过“行军”训练获得的。

《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是中国驻屯军编辑的日军谍报报告目录。④ 表 2 是该目录所收的 1936 年、1937 年该军编印的部分兵要地志资料，“编写者”为唐山守备队、天津驻屯步兵队第一大队、炮兵联队、第一联队。1937 年的编写时间均在七七事变以前。从名称就可以判断，它们都是通过在京津地区行军或演习所获。以上部队只是中国驻屯军的一小部分，其他部队也一定有相同报告。驻军各部队利用演习等机会收集情报状况由此可窥一斑。

表 2　中国驻屯军下属部队利用行军演习收集的兵要地志表举要（1935 年、1936 年）

编写者	日期	报告名称
唐山守备队	1936	由唐山通往满支国境地区道路大队警备行军及汽车道路侦察报告
天津驻屯步兵队第一大队本部	1936	唐山–丰润、唐山–河头汽车专用道路侦察报告
支那驻屯炮兵联队	1937	平津地区道路侦察综合要图、北平北部地区道路景况要图、北平黄村固安定附近地形道路侦察要图、耐寒行军经过图
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	1937	天津–东安县–旧州–礼贤镇–丰台道侦察报告要图
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	1937	北平八里庄–田村、跑马场–古城、卫门口–石景山、玉泉山–碧云山五里坨道路侦察报告要图

① “支那ノ部”1917 年。外務省記録、1 門政治、6 類諸外国内政、1 項亜細亜、各国内政関係雑纂。JACAR：B03050027800

② “支那駐屯軍教育要領改訂の件”1913 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357400

③ “天津北京間行軍記事”、“天津北京間行軍経過路偵察略図”1904 年。陸軍省大日記、参謀本部関係文書、参謀本部雑（秘）。JACAR：C09123113900、C09123114000

④ 有关《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的具体编辑者和内容，详见拙稿“『蒐集資料目録補修訂正追録』からみた華北駐屯軍の兵要地誌調査”日本立教大学《ランゲージセンター紀要》第 30 号，2013。

从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工作汇报看，其下属部队至 1937 年仍在进行这种“教育训练”，如在七七事变前夕的 6 月，步兵第一联队“军官实施现地战术”研究，第二联队“实施秦皇岛野营”训练，战车队“针对攻打围墙进行研究”，炮兵队少尉以上军官研究针对张家口、战北、南口、密云的现地战术，工兵队对军官实施现地战术教育，通信队实施无线电移动训练。[①] 由此形成的报告仍在不断提交。[②] 而七七事变的导火索也正是在进行这种所谓“演习”时引燃的。

表 2 仅是兵要地志方面的例子，中国驻屯军利用“地利”收集的情报远远不止于此。从《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资料的“编写者”一栏可以看到，由“天津驻屯步兵队”、“唐山守备队”、“支那驻屯炮兵联队”、“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等提交的报告，涉及军事、兵器、经济、资源、交通、运输等领域。就连中国驻屯军的下属医院也加入了收集情报的行列。仅以 1931 年、1932 年以“支那驻屯军医院”名义编制的报告为例，上述目录中就有《冬季由结冰下取水时使用的器具之方案》《北支那各地水质检查成绩表》《入院患者原因调查书》《天津在留邦人卫生状况调查》《北支那各地水质检查成绩表》，基本上都是卫生兵要方面的基础调查，当地的水质、疾病调查是重中之重。

关东军每月提交一份汇报部队当月状况的《月报》。据此可知，与中国驻屯军一样，关东军下属部队平时也例行进行“教育”和“演习”训练，并且同样以此为借口调查和研究当地的地形、气候、卫生等兵要地志，尤其关心各兵种如何在东三省严冬气候下进行作战。利用东北地广人稀容易避人耳目的特点，关东军常常强行越过“守备”地域演习训练，收集情报。

例如，1907 年 1 月《月报》报告的第十师团寒冬教育研究的项目是：在海城附近试射野炮测试其严寒状况下的性能，枪炮对冻土的穿透力，冻土开挖法，在冻土上挖修工事或拖拉炮车的声音传出的距离，静夜单个步兵和整队步兵在冻土上发出的声音传出的距离，寒气对弹道的影响。[③] 这完全是在调查当地独特的兵要地理对作战的影响。关东军二十多年来一直进行如此演习、训练，对“守备”区域的各种情况基本上都了如指掌。

此外，驻军还常常利用一些特殊时机公开收集情报。典型之例是 1918 年 5 月日中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日军获得了在东支铁道沿线和爱辉等通往中苏国境主要作战道路沿线自由活动的权利，获得了在华北采购军需物资等的方便。关东军、中国驻屯军借机在东北、华北、西北实施了兵要地志和军用物资调查。

就中国驻屯军而言，军司令部 1918 年 9 月制定《军需品调查要领》，决定对各种粮食、家禽牛马、鸡蛋果蔬、防寒材料及被服、燃料等进行调查。调查项目有数量、价格、交易惯习、运输方法、集散地及设施。[④] 各调查组以直隶省的大市场和产地为中心展开活动，至 1919 年 2 月提交过三次报告，如《军需品调查报告第三回（直隶省南部地区羊毛、牛皮、棉花、蔴调查）》。

1919 年 4 月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又拟就《碳矿地侦察一般要领》，决定将军需品调查扩大到矿产。[⑤] 在 1919 年，中国驻屯军完成的报告有《军需品调查报告第四回（天津——锦县之间京奉铁道沿线家畜调查）》《军需品调查报告第五回（长芦盐调查）》《军需品调查报告第六回（西陵及保定西部地区矿产调查）、第七回（北京西北地区及大同包头方面矿产调查）》《山西省的矿山概况及泽州的铁》《矿产陕西省镇安铜山的概况》《海州的磷矿》。从名称看，以上报告大多是矿产，矿产已成为调查重心。另外，调查地域完全超出“北支”，大同、包头也在其中。显然，中国驻屯军扩大

① “支那駐屯軍月報送付の件”1937 年。陸軍省大日記、陸満密大日記。JACAR：C01003332200

② 例如支那驻屯炮兵联队 1937 年年初提交有“平津地区道路侦察综合要图、北平北部地区道路景况要图、北平黄村固安定附近地形道路侦察要图、耐寒行军经过图”。

③ “関都府陸軍部月報進達の件”1908 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909100

④ “軍需品調査に関する件”1920 年。陸軍省大日記、西密受大日記。JACAR：C03010226700

⑤ “炭鉱地偵察要領送付の件”1919 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483300

了调查地域范围。

中国驻屯军甚至把调查扩大到了兵要地志。据同年 11 月完成的《西部内蒙古兵要资料》说明，“为了调查军用资源，今年 6 月本军司令部所属陆军一等主计①居川进一自天津出发赴察哈尔盟、乌兰察布盟旅行。本报告根据其报告编纂，作为兵要地志资料提交。”② 就内容而言，该报告完全以兵要地志为主。这说明中国驻屯军利用公开调查的机会，肆意扩大了调查范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利用中国政府的隐忍退让，在蒙古、西北、华北地区公开或半公开强行实施兵要地志与军用资源等调查。其中规模较大者有 1935 年进行的“绥远省特别调查”和“嘱托班大调查”。这两次调查可谓“兴师动众”，调查者在百人上下。③ 这些调查受到了中国当地政府、警察的阻止。但是，中国官方除此以外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中国驻屯军、关东军在蒙古、西北、华北地区建立的谍报机关，九一八事变后也纷纷公开活动，在实施分裂“谋略”的同时，收集当地的政情、民情、军情、兵要地志和经济状况，为进一步侵略提供情报和建议。

在秘密收集情报方面，参谋本部需要从日本国内秘密派遣专业谍报人员来华，十分耗时不便。与此相比，驻军也具有“地利”优势。

首先，驻军盘踞中国，便于以驻地为根据地随时向周边地区，甚至中国全境同时派出大量谍报员。以中国驻屯军为例，该军一建立就派人四处收集情报，至 1902 年 12 月，铃木参谋已完成“南清地区兵备及卢汉铁道的价值”的调查，村冈大尉“视察”了山东，金子中尉“视察”了天津镇江之间的大运河，町野中尉“视察”了东部蒙古，服部中尉完成了“有关张家口海拉尔之间的旅行”。④ 这时中国驻屯军建立仅一年有余，能派出多人四处侦察，无疑得益于地利。因为远离驻地，可以肯定这些人都是秘密行动。

从表 1 中国驻屯军 1911 年下半年“机密费”的用途看，“秘密侦察”的开支，日元约占其总支出的五分之四，洋银更超过其总支出的二分之一，均居开支首位。这种开支每月都有，说明“秘密侦察”是中国驻屯军的工作重点，完全属于日常工作。

中国驻屯军留下的巨量“侦察”报告也能从侧面说明这种侦察的频繁。在《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中，由中国驻屯军等根据实地调查编成的兵要地志、军用资源、军事、经济、外交、思想、教育、交通等报告达数万种。其中属于中国驻屯军调查撰写的兵要地志报告约有 640 种，而冠名为“调查”的 162 种，“侦察”的 151 种、“旅行”的 38 种、“实查”的 8 种，“视察”和“复命书”的各 6 种，“踏查”的 3 种，以上一共 374 种，占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姑且不论标题中未出现以上词语的其他资料如何得来，仅就这部分资料而言，虽然无法得知这些调查报告形成的具体背景，但冠以“侦察”、“旅行”、“视察”的无疑是以旅行者等身份秘密行动所获。这些报告涉及的区域远处至新疆、青海、山西等地，遍及整个中国，远远超出了规定的“守备”范围，中国驻屯军不可能派出穿着军服的谍报员公然侦察，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也绝不会允许，剩下的只能偷偷进行。“机密费”中的“秘密侦察”肯定就花在这类活动上。

1920 年前后中国驻屯军曾经组织过一次资源与兵要地志调查。表 3 是此次活动的一部分。据此可以看到，12 个调查组差不多是同时进入目标地区的，如果不是以天津等驻地为根据地，是很难如此频繁快捷地进行谍报活动的。

---

① 主计：日本军队中负责“财务”者。

② “兵要地誌資料の件”1919 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521000

③ 有关“嘱托班大调查”的详情，请阅小林英夫“華北占領政策の展開過程——乙嘱託班の結成と活動を中心に”駒澤大学経済学会《駒沢大学経済論集》第 9 卷第 3 号。1977 年。

④ “12 月上旬中旬々報外進達通知”1902 年。陸軍省大日記、参謀本部関係文書、参謀本部雑（秘）。JACAR：C09123037600

表 3　中国驻屯军地形及资源调查实施概要表（1919 年 12 月—1920 年 3 月）

侦察的地区	调查的主要项目	日数	侦察者姓名	摘要
北京、张家口之间	北京、张家口之间的作战道路一般地形	15	北京步兵队远山大尉	调查完毕
北京、郑州之间	从北京至河南省郑州之间的地形侦察	30	天津步兵队志贺大尉	同上
河南省道口附近	天津、道口镇之间的水运和资源调查	25	同上森下大尉	2 月下旬着手
山海关、北京之间	山海关、北京之间的作战道路和兵站研究	16	军司令部森长大尉	3 月上旬着手
山西省太原地区	山西省资源和利权调查	18	同上川岸大尉	调查完毕
直隶军粮城附近	地形和资源调查	8	派遣大队藤井大尉	同上
天津通州附近	芦台、蓟州、平谷、通州之间地形侦察	14	同上斋藤大尉	同上
连山湾附近	连山湾及其附近港湾调查	7	军司令部上野大尉	正在调查
永定河河盂	天津至北京西北方永定河河盂地形侦察	10	天津步兵队木村大尉	调查完毕
正定、太原之间	直隶省正定至太原之间地形侦察	15	派遣大队手塚中尉	3 月上旬着手
平泉热河附近	北京、热河、平泉、栾州之间地形侦察	16	同上青木中尉	同上
正定西北地区	直隶省正定西北地区的矿山资源调查	15	北京步兵队森大尉	同上

资料来源：“地形偵察実施に関する件”1920 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501400

与中国驻屯军相比，关东军在东北的此类活动更为猖獗。因为在南满铁路及其支线等地有驻军，一有变故很快能获得接应，关东军随时随地以“旅行”、“视察”为幌子，向驻地周边地区，甚至是东三省和蒙古的服部派出大量谍报员。关东军对“满蒙”展开的历次系统性物资与兵要地志“普查”，都离不开各地驻军的帮助。

由此可见，“旅行”、“视察”、“实查”是驻军派遣谍报员秘密侦察的惯用伎俩，驻军司令部实际上就是谍报大本营，各驻地就是谍报据点。中国有关方面对于这种秘密谍报活动是防不胜防的。

正是因为具有如此优势，参谋本部亲自实施对华谍报活动时，往往会选择驻军驻地为谍报员在中国的根据地。例如，1910 年开始的对华物资大调查指挥中心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负责盗测中国兵要地图的“土地调查班”，[①] 总根据地也设在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其次，在设立特务机关广布谍报网方面，驻军也具有“地利”优势。与参谋本部远离下属谍报主体（如使馆武官、驻在武官、特务机关、应聘将校等），指挥不便相比，驻军毕竟是盘踞在中国境内，在指挥和监管下属谍报机关方面要便捷得多。因为有此种“地利”，中国驻屯军先后在西安、归化、张家口、兰州、新疆、迪化、太原、北平、徐州、郑州、绥远、济南，关东军先后在长春、哈尔滨、奉天、满洲里、吉林、黑河、齐齐哈尔、山海关、赤峰、承德、张家口、多伦、张北、德化、百灵庙、库伦、绥远、西乌珠穆桂沁、阿巴嘎等地建立过特务机关或谍报据点。从数量上来看，驻军的谍报机关远远超过参谋本部在华建立的谍报机关总和。这些谍报机关成为日军在华收集情报，实施各种阴谋的重要据点。

再次，驻军便于在相关地区秘密建立无线电谍报机关。外国军队在中国架设电台显然侵害了中国主权。但日本驻军以军内联系为借口，一直在各驻地架设无线电台。这就为日后实施无线电谍报活动打下了基础。

日军参谋本部正式研究无线电谍报技术始于二十年代初，因为当时的短波接受技术还不发达，要截收到中方大量明晰的无线电信号，必须就近设点。1923 年参谋本部曾经向各军推广截收和破译技术。在华驻军属下的无线电信所便利用工作之余，对中国北方军政无线电联络系统进行研究，并且尝试截收和破译中方无线电报。

就中国驻屯军而言，至晚 1928 年已经能够破译奉军电报。例如，1929 年 1 月中国驻屯军司令

① 有关“土地调查班”的活动，请参阅拙稿“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第 1 期，2012 年。

官提交的《北支那军队调查报告》的附图“奉军移防预定要图”便是“根据 11 月 17 日密电制作”。[①] 对于冯玉祥部的电报，1929 年中国驻屯军也能够破译。如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松本同年 5 月 17 日发出的谍报报告就是破译的冯玉祥与下属军官来往的电报。[②] 当时中国驻屯军参与侦收的有天津旁受所、天津电信所、北京电信所、塘沽电信所、秦皇岛电信所、山海关电信所。1929 年 5 月各所截收的中方电文共达 1852 份，已经达到了较高的侦收水平。[③]

1929 年 2 月参谋本部暗号班长百武晴吉中佐至旅顺关东军司令部指导破译电报密码后，关东军正式展开对华无线电谍报活动。关东军的下属无线电信所分布范围更广。与中国驻屯军一样，这些电信所都参与了侦收活动。

正是基于驻军的这一“地利”优势，参谋本部 1929 年 6 月决定在旅顺、天津驻军营地建立谍报专用的“无线受信所”，正式开启了日军对华无线电谍报工作。依靠以上这种技术情报，三十年代以来日军获得了中国军政部门的大量机密情报。1931 年 9 月和 1937 年 8 月两度任职于陆军省军事课的西浦进战后回忆说，七七事变时日方获得的九成谍报都归功于无线电谍报。[④]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地利，日军就不可能在中国设立如此之多的无线电谍报据点，获得如此重要的情报。

二、“人”之优势

在收集情报方面，驻军还具有绝对的“人”的优势。参谋本部在对华谍报方面，虽然十分投入，一直派有大量专业谍报人员，但与驻军相比，仍相形见绌。

驻军的这种优势，首先体现在整体数量上。对于驻军来说下属部队本身就是一支庞大的谍报队伍。关东军当初的编制是六个独立守备队、一个师团、旅顺重炮营和宪兵队等，共一万多人，驻扎在南满铁路及其支线沿线两侧重要地段和沿途火车站等地。中国驻屯军当初由司令部、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队、一个野战炮兵中队和医院组成，共一千多人，后来逐步增加。以上大量军人实际上就是谍报后备力量，根据需要稍加训练都可以成为谍报人员。

而驻军所承担的谍报任务也需要大量人员的参与才能完成。参谋本部制定的《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军事调查参考书草案》，涉及的调查范围包括军事、地理资源、交通、外交、财政经济、内政、其他七个部分，作为日常谍报任务，要完成如此全面的调查，必然需要足够的人手。另外，驻军还会根据需要不时组织各种规模的调查，这也需要大批人手。驻军拥有的大量军人恰好能满足这种需要。

表 2、表 3 便是好例。据表可知，中国驻屯军在 1920 年前后组织的资源与兵要地志调查，有 12 个调查组差不多同时进入目标地区，而 1936 年、1937 年实施的兵要地志调查，各地驻军都以大队为单位参加。表 1 中列有“北京步兵队长”的两笔开支，应该就是“北京步兵队”进行这类谍报活动的费用。兵要地志调查有其特点，有些项目是参与者越多，调查越全面、细致、可靠。同时组织如此多的人员参加调查，只有驻军才能做到。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驻屯军出于侵略和“开发”华北的需要，多次进行过大规模调查。这些调查都大量动用了驻军。如 1935 年秋季，中国驻屯军制定《昭和十年度绥远省特别调查纲要》，对绥远的资源、经济、商业、农业、矿业、畜牧业、交通等进行全方位彻查。1936 年各调查组就完成的《昭和 10 年秋季实施绥远省特别调查报告》达二十种，涉及军用资源、占领地统治资料、金融及货币、新绥长途汽车公司、畜产、绒毛、农业、矿产地质、航空事项、黄河上游之水运、兵要卫生、

① “北支那軍隊調査の件”1929 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1003888400

② “馮軍方面状況送付の件通牒”1929 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1003889000

③ 有关日军在华无线电谍报活动，详见拙稿“七七事变前日军在华无线电军事谍报活动”天津历史教学社《历史教学》总第 501 期，2005。

④ 西浦進《昭和戦争史の証言》原書房，1980 年，第 46 页。

给水地质、电政状况、绥远商业与西北贸易、平绥铁道概况、交通概要、绥远概况等。一年内能完成如此众多的调查项目，只有动用大量人力才能做到。

1935 年 10 月开始的“嘱托班大调查”，比绥远调查规模更大。为了调查，中国驻屯军成立了三个班，称甲、乙、丙嘱托班。甲班负责与经济产业开发、管理相关的研究，由 24 人组成，分货币与金融、财政与贸易、政治与外交、产业、交通五个小组。乙班共 151 人，调查内容与甲班基本相同，分为工业班、经济班、铁道班、港湾班、矿山班、汽车与交通道路班，调查范围不仅限于华北，包括甘肃、青海，甚至远至上海。调查翌年底大部分完成。尽管遇到很多困难，不少调查并不准确全面，但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果，如重点调查的矿山，调查班围绕 26 种矿种调查的矿山达 159 个。各调查虽然多以满铁借来的人员主导，但驻军也派出了大量人员参与。

关东军在谍报方面也大量使用了下属部队。仅以 1919 年关东军组织的两次兵要地志调查为例，为调查齐齐哈尔至哈尔滨之间的水上路线、札兰诺尔至来库之间的水上路线、哈尔滨至车陆之间的陆上路线、哈尔滨至漠河之间的陆上和水上路线，当年夏天关东军将 57 名军官组成四个班调查月余。① 同年年底，参谋部又制定计划，组织下属部队实施由掏鹿经海龙、兴京至抚顺的“长途耐寒行军”训练，目的在于研究沿途道路和居民住地以及邻近地形状况、马匹的使用方法、给养状况、卫生气象状况等。参加者约 500 人，由相关步兵联队、炮兵联队、工兵大队、守备队、支那马调查班、第 16 师团司令部、宪兵队抽调人员组成，从出发至解散共 34 天。②

以上调查规模都很大，驻军依仗的正是“人多势众”。也正因为拥有丰富的人力，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才能在各自负责的谍报区域广布谍报网，建立大量特务机关。

驻军“人”之优势，亦体现在“质”上。参谋本部派遣的专业谍报员本来就有限，更缺乏掌握各种专业知识的人员。与此相比，驻军作为一支建制比较完整的正规部队，兵种基本齐备，有步兵、工兵、骑兵、炮兵、辎重兵，还有医生、兽医、测绘员、无线电技术人员、兵器技术人员、主计等。

根据《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等可知，参谋本部要求驻军收集的情报范围极其广泛，其中一些项目，非相关专业者难以获得准确情报。除了专业性很强的地质矿产外，驻军的各种专业人员基本上能够胜任相关的谍报任务。例如，活动时间长达十多年的关东军“支那马调查班”由骑兵、辎重兵、兽医等组成。③ 驻军的“物资调查班”骨干都是长期专门从事后勤物资供给的主计。驻军在无线电谍报方面取得的成功则得力于通信技术人员的大量存在。驻军中的医生和兽医不仅平时负有调查卫生兵要的任务，也会承担临时调查任务。1935 年的“绥远省特别调查”报告第 6、第 12、第 13、第 20 号《畜产》《兵要卫生》《给水地质》《兵要卫生与蒙古人体能检查》都是由中国驻屯军下属部队军医或兽医调查撰写。驻军可谓“人才济济”。

三、“时”之优势

指驻军在时间上具有的优势。参谋本部在中国设立的谍报机关，除了位于重要都市的少数几个以外，大多是时断时续，并且谍报机关的负责人更换频繁，缺乏连贯性。与此相比，驻军自成立后就一直持续驻扎在相关地区，参谋部则始终如一计划、领导着全军的谍报活动。

这种长期驻扎可以确保谍报活动长期持续进行。其利点有二。一是能够确保情报的全面、细致、准确。以兵要地志为例，有些项目只有长期连续调查，才能充分获得统计、分析用数据，找到

① “関東軍管下ノ将校管内各地旅行ノ件”1919 年。外務省記録、5 門軍事、1 類国防、10 項軍事調査及報告、帝国陸海軍将校海外派遣雑件。JACAR：B07090462600

② “鉄嶺守備隊耐寒行軍に関する件”1920 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500100

③ 有关“支那马调查班”的详情，请阅拙稿“「満蒙」における軍用資源調査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軍の馬調査について”日本立命館大学社会システム研究所《社会システム研究》第 24 号，2012。

规律，江河湖海等的冰冻期、有关地区的气候变化特征等就属于此。例如，在气象方面，中国驻屯军1902年起就在《旬报》中专设“气象表”汇报各驻地每天的阴晴、风向、风力、气温、雨量等，一直持续到1908年，[①] 此后同样的调查仍在继续，并且，从中国驻屯军编的《支那军事要览改订资料》“气候”一章看，至晚在1917年前后还把调查范围扩大到西安、归化、张家口。[②]《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上载有中国驻屯军司令部1923年编的《张家口气象表》，表后标有“10月、11月、12月”，说明这种气象表是每月编辑的。该目录中还有中国驻屯军司令部1936年编辑的《北支气象月报》，意味着三十年代还有气象月报。这些都需要连续不断的调查。

关东军的调查也是如此。仅就军用资源而言，自1905年起关东军就对东三省和蒙古东部连年展开各种规模的调查，马在当时是极其重要的军用资源之一，为了调查东三省马匹的分布、体质、体能、军用价值等，根据参谋本部指示，关东军1918年专门成立“支那马调查班”，一直调查到九一八事变前，调查范围遍及东北各地和蒙古东部。如此年复一年有计划有组织地调查，无疑能获得全面、细致、准确的资料。

二是可以确保情报的时效。情报都具有时效性，及时更新才有价值。驻军的长期驻扎可以对谍报目标反复跟踪调查，不断订正、补充、更新信息。例如兵要地志，随着时间的过去，地形、地貌有可能变化，道路和港口有可能新建或改建，必须不断跟踪调查，随时修订原有的资料。中国驻屯军在此方面充分发挥了“时”之优势，《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录有中国驻屯军所编的各地兵要地志，其中有关河北省省会保定的兵要地志有24份，时间段分布于1904年至1937年。有关天津至保定的道路状况与沿途地形调查报告，共10份，时间是1904年至1937年。冠有“山西”之名的报告则达38份，时间是1904年至1937年。同样是山西，但冠为更加具体之名“太原”、大同的兵要地志报告有14份，时间为1904年至1937年。如表4所示，军方对通向西北军事经济重镇太原、大同及其相关要地的沿途地形、交通等尤其关心，仅就该目录收录的报告看，数十年来是反复调查。这种长期对固定目标的跟踪调查可以保证决策者能够获得最新情报。

表4　中国驻屯军有关太原、大同的兵要地志调查报告（1904—1937年）

编写者	时间	报告名称
支那驻屯军司令部步兵中尉渡边宽	1904	太原地区旅行复命书
步兵少佐西田恒夫	1913	山西太原府侦察报告
步兵大尉山中祐五郎	1914	大同归化城及太原间侦察报告
步兵大尉佐藤政信	1916	西陵—灵邱、代县—太原间侦察报告
步兵中尉松冈守义	1916	新保安—桃花堡—蔚—浑源—大同间侦察报告
步兵大尉森静枝	1917	宣化—阳原—大同—登镇间侦察报告
支那驻屯军司令部步兵中尉手塚润	1920	正定、太原间兵要地理实查报告(一)(二)
支那驻屯军司令部步兵大尉远山壮雄	1920	归化城、独石口、保定、太原、□保间之地域
工兵少佐细田四郎	1921	山西省太原陕西省榆林间、山西省汾阳马斗关间道路侦察报告
步兵大尉笠原嘉兵卫	1930	山西中东部元氏—昔阳—阳泉道、正定—平山—孟县—太原道作战道路调查
町田步兵中尉、阿久根工兵中尉	1931	石家庄—井陉—太原道、顺德—和顺—太原道、清化镇—泽州—太原道调查报告书
支那驻屯军司令部	1934	正太铁路太原—大同道大同包头间平绥铁路沿线地形与作战之关系
支那驻屯军司令部和知鹰二	1936	太原城西侧新机场略图

军事调查是驻军每年的重点谍报对象。据现有资料看，驻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就基本上

① 1908年1月上旬的《旬报》“杂件四”写有：“自本旬起省略气象报告”。(“清駐軍旬報進達の件”1908年。陸軍省大日記。JACAR：C03022908500)

② “支那軍要覧改訂資料の件”1921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571400

每年都将调查所得列表详尽报告，报告的项目包括各省驻军番号、军官背景、人数、马匹数量、各类武器数量、其他装备等，还附有部署示意图。自二十年代参谋本部制定《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等纲领性文件后，驻军的上述调查每年都必须实施，在年底上报。因为调查项目基本相同，这种调查实际上就是对同一项目的跟踪确认，是对上年度报告内容的更新。通过这样的调查，参谋本部每年都能获得最新信息。通过对比每年积累下来的报告，中国东北、华北、西北军队历年变化状况也能一目了然。

四、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深入中国境内长期公开驻扎的日本正规军队，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在参谋本部领导下收集情报，驻军司令部实质上就是驻军的谍报大本营，其下属军队则是一支支谍报部队，各级官兵都是一个个后备谍报员，整个驻军完全是名副其实的“平时谍报机关”。

而且，与参谋本部的其他谍报主体相比，驻军在收集情报方面具有“地”、“人”、“时”三大显著优势。依靠这些优势，驻军可以以公开和秘密形式长期展开各种规模的谍报活动。日军在华驻军大大拓展了参谋本部对华谍报的密度、广度、深度，在收集情报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日军对华谍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军全面侵略危害中国的尖兵。

（作者许金生，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试析胶东抗日根据地地方基层行政区划的变动（1938—1945）

杨焕鹏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胶东地方基层行政区划变动异常频繁，中共在地方政权组织形态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其地方行政区划也随政权发展而变动。胶东抗日根据地内行政区划变动与当时的战争形势、社会环境、传统风俗、敌伪顽三方错综复杂的关系等诸因素相适应的。根据战时胶东具体实际，根据地由沿袭原国民党政权的行政区划到取消乡制，实行行政层级简化，并在区以下行政区划中取消保甲，恢复闾邻，不断调整基层行政区划的关系，以使基层政权顺利运转。

关键词：胶东抗日根据地　基层　行政区划　变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韩复榘不抵抗政策，山东大部很快沦陷，国民党政权的迅速瓦解、崩溃。日军很快占领了胶东几乎全部的城市及重要市镇，并以此为据点形成了向乡村渗透与扩张的态势，造成“敌占城垣，伪居城郊；敌居城郊，伪住市镇；敌占市镇，伪住乡村，侵略我国土之具体象征”。① 原有的国民党行政区划几近瘫痪，运转不灵，胶东半岛很快就陷于敌我顽三角激烈的极力争夺之中。各种势力犬牙交错，错综复杂，如何恢复、扩大与保证政权的顺利运转是我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首要任务。确立行政区划，是保证政权正常运转的首要前提，也是树立我党政权合法化的必要步骤。行政区划的确立与变动，是我党在乡村基层进行抗日战争动员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区别于其他势力的一个重要标志。胶东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共及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领导下，随战争的进程，依据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情形，以动员基层乡村民众进行抗日为主要目标，不断对根据地的行政区划进行变动，以适应战时的需要。

中共自建立政权之初，为保证政权的高效运转，同时改革地方基层行政，就非常重视对行政区划的工作。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权中都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区划，并根据政权控制的范围、战争态势、各地风俗人情、传统习惯等因素不断对象征区划进行调整变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巩固、扩大与巩固革命政权，加强社会动员。学术界对中共不同时期各个革命政权的行政区划已有了初步的研究②，取得了一些成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于 1938 年开始在胶东地区建立政权，随着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扩

① 《地委关于开展整理大村落城镇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栖霞市档案馆藏，档 3-1-3。

② 主要成果有任中和：《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演变概述》，《历史档案》，1988 年第 3 期；邱荣渊：《闽西革命根据地行政区划析议》，《龙岩师专学报》，1988 年第 1 期；赵剑、罗雄飞：《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行政区划的调整及其历史作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 年第 6 期；李金龙、王宝元：《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制度研究》，《求索》，2007 年 12 期；李金龙：《中央革命根据地行政区划体制创制与改革刍议》，《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 年 5 期等。

大，战争态势的变化，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保证抗日政权的高效运转，改革乡村基层行政，中共在胶东抗日根据地不断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与变动。本文以档案资料为基本史料，同时考以这个时期的报告，试图对抗日时期中共在胶东地区的行政区划变动进行解析，以图来透视这个时期中共在胶东发展的动态过程。

一、利用、改造国民党旧政权的行政区划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胶东地区的政权随之败退与崩溃，胶东抗日根据地就是在这种权力呈现真空的情形下建立起来。正如中共山东分局所指出的那样："在发动抗日民族游击战争初期，那时主要任务在于发动游击队。乡区县以上旧政权不能执行抗日任务，当敌人占领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线之后，便大部崩溃了，全部都无力维持秩序，在一个相当期间，陷于无政府状态，那是乡村还继续由旧势力统治着，其政治态度是观望的，敌人的势力一到，便变为维持，变为付粮拿草的顺民政权"。①

在抗战之初，中共迅速占领了蓬莱、黄县（今龙口）、掖县（今莱州）三县，成立专员公署，胶东抗日根据地就是以三县联合公署为雏形发展起来。在胶东抗日根据地成立之初，中共仍然延续了国民党政权在胶东的行政区划，并对此进行了改造，以便于中共领导抗日工作，加强对基层战争动员，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7 月 1 日，中共山东分区就做出了关于恢复县区乡政权的指示，指出：要针对敌人的扫荡，县、区、乡政权遭到破坏，各地均应恢复抗日政权，保障党的领导。战时行政区划基本为县—区—乡—村，区乡政权恢复大部后，各地应于十天至三十天内，必须恢复各县政府。随即召开各区代表及县级各团体代表会议，产生县政府，县界应以地形及战争需要重新划分，并不受旧行政县界限制。县区乡长均须兼八路游击大队长、中队长及分队长职务，取得合法保障。② 这一指示就成为中共在胶东建立政权，以及进行行政区划的重要依据。

1939 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1）在敌人扫荡中，旧政权跑了，我军立即委任新的专员、县长、区长、乡长，然后再行民选，以树立新政权。（2）在武装摩擦中，要注意夺取县印等物，以便委任新政权，但无县印则立即自刻县印。（3）在民众为民主民生的斗争中，直到反对汉奸与反动分子的武装抗日起义中改造反动政权，建立新政权。（4）在群众拥护及我们有足够武装力量条件下，即使旧政权还存在，我们应寻求机会委任新县长、新专员，对抗日政权，不怕双政权现象。（5）在还能用灰色面目求得沈鸿烈、韩德勤、李品仙委任的地方，仍求其委任。（6）在敌后方，下级政权的独立作用已大大增长，因此我们除自上而下的争取政权外，还应自下而上争取政权，绝不应该放松争取县乡政权的一切机会。③

由这两个指示我们可以看出在抗战初期，胶东地区中共的行政区划仍是依照原国民党原有的行政区划来建构抗日政权的，以原有的行政区划来取得人们对新政权的认同以及国民政府对新政权的认可的。对此，1939 年中共山东分局对胶东工作的意见中也指出："目前应依蓬、黄、掖三县政权为基础，立即建立专员公署，并联合其他县政以及同情我们的区乡政权以拥护这一专署，……不让步的推行三县的县政权，故意不执行政令的区乡长进行改选。"④ 这符合当时抗战形势及国共合作需要，对于中共向乡村的渗透与扩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中共就在山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权，行政区划自上而下也基本完善。"山东抗日民主政权是在很短的一年多时间中，各

① 《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民主组村政总结》，《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3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34 页。
② 《山东分局关于恢复县区乡政权之指示》，《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4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 页。
③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4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2 页。
④ 《山东分局对胶东工作的意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4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6 页。

地自发的，从上而下，从乡、区到县的生长起来的，所以开始时表现出很大的零乱与不统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后，在九十县政权中不仅建立了各县区乡村各级政权的组织与领导系统，而且建立十个专员公署与一个主任公署”。①

为了进一步完善抗日政权的各级行政区划，1940 年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制定了战时县、区、乡、村各级政府组织条例，规定各抗日根据地设县—区—乡—村四级行政层级。② 明确规定：县政府为代表全县抗日人民之抗日民主政府，为实行地方自治之领导机关；区公所直接受县政府之管辖及区参议会之监督；乡公所受区公所之管辖及乡参议会之监督；村公所之组织设村长、副村长、村政委员会，须呈由乡公所转呈区公所加委。县、区、乡、村皆以民选为组织原则。同时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形，为便于各抗日根据地领导抗战工作，也做出“各县如因县境辽阔或其他人为障碍，对于行政上指挥不便时，可在适当地点酌设县政府行署，就近领导各该地区政权工作，其内部组织由各该县政府自行规定之”。③

自抗战爆发到 1941 年 10 月期间④，中共在胶东地区的抗日政权的建立基本上是依托原有的国民党政权的行政区划进行建构的，这对于加强国共合作，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强化人民对抗日政权的认同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政权内的行政区划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行政区划与军事指挥紧密联系在一起，军政合一也是这一时期行政区划最为突出的特点。我们从 1941 年 4 月 27 日文登县第二区公所为坚持反扫荡给镇海乡长之训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区长在反扫荡战中应是优良的游击队，区长、乡长分别切实掌握区中队，领导自卫团土枪队，并导民众实行空舍清野，粉碎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领导自卫团，严格检查行人，捕捉汉奸敌探，切实负责传达情报，办理担架运输。环境任何恶劣困难也要保持各级政府的联系，尤其是区与乡、乡与村以及行政机关与动员机关学校民众团体的联系。”⑤

二、取消乡政权，建立三级行政区划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尤其是 1941 年后，日本改变了对华侵略策略。对国民政府实行由原先的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国民党各级政权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共摩擦日益增多，胶东抗日根据地战争形势日益复杂。为了便于领导抗日战争，树立正面的形象，以区别于敌顽政权，体现或突出自己政权特征，争取民众向抗日政权靠拢，以便于在乡村进行抗日战争动员，中共于 1941 年 4 月份开始对行政区划做出调整，改变了过去一味依赖于原国民党政权的行政区划的特征，开始根据战时及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情形进行有机调整。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及国民党政权仍采取了战时国民政府推行的行政区划，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原有的地方基层政权多被掌握在传统势力手中，甚至有的被敌伪掌控，成为其对抗抗日政权的重要工具。如荣成县政府于 1941 年报告，“各方面反映，一般旧的乡长，多被敌伪利用，给敌人纳粮完税供给物品给敌人”，⑥ 而基层的保甲组织则更成为敌伪对抗我基层抗日政权的手段，“敌占区及投占区，一般的实行保甲制反共反八，破坏抗战。”⑦ 采用原有的行政区划，无法突出我抗日民主政权的特点，造成了基层民众对敌我顽三者政权形态的模糊，无法体现我抗日民主政权的抗日、

① 《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工作》，《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5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9 页。

② 《山东省战时县区乡村各级政府组织条例》，《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6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6—32 页。

③ 同上。

④ 当然由于胶东抗日根据地各个县发展的具体情形不一，具体执行的时间可能不太一致。

⑤ 《威海抗战史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4 页。

⑥ 海阳市档案馆藏，档 1-1-1。

⑦ 同上。

民主、革命等特征。由此，旧的行政区划已经不适合抗战形势的需要，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便成为完善抗日民主政权的必然步骤。

1941 年 4 月 23 日山东省战工会发布《关于全省行政区域划分的决定》，要求各地在 7 月底前制定各地实施计划并督促实行。在这个决定中决定对山东省的行政区划根据各地实际情形及考虑战略与发展方向进行重新划分，划分的原则是必须跨铁路、跨河流、跨公路、跨据点，以便作真实的连成一片的发展；划小行政区域，增多行政单位，减少行政层级，以便集中加强干部配备，增加行政效率。① 将全省划分为胶东、清河、冀鲁边区、鲁中、鲁南、鲁西六个行政主任区。这次行政区域划分的决定在地方行政区划的目标是逐渐做到划小县、区、乡范围，直至取消乡级，这样地方行政区划逐步由县—区—乡—村四级变为县—区—村三级，以致取消乡级。② 山东省战工会正式确定了胶东抗日根据地的界限与范围，“胶东区以潍县（全县在内），高密（全县在内）安丘之西门口（在内）以北及胶县张哥塞（在内）、曹文（在内）两地以北为界，上属各点迤东与东北各县均属之。潍县至青岛段胶济路工作，归胶东。”③

1941 年下半年，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内中共开始对地方行政区划进行变更，划小县的管辖范围，“县政府之范围以直径六十里到一百里为原则，旧有大县得划分为两个以上之县，重新确定县名或名义上仍用行署，但实际上是完全独立之县，每县不得超过十五个区。”④ 实行县—区—村三级行政层级制度，取消乡级行政区划。同时在村一级基层政权中取缔保甲制度，恢复原有的闾邻制度，确立革命的行政区划层级。这样做的目的，根据胶东抗日民主政府的说法便是，“使得敌人找不到代办人”⑤，“为了扩大下层政权的民主、提高威信”⑥，巩固下层政权。⑦ 乡级政权取消后，为了突出抗日政权的特点，中共在基层开始改变区、村政权的名称，将原有的区公所与村公所改变为区政府与村政府。⑧

新的行政层级约在 1941 年 10 月后开始在各县推行⑨，1943 年 9 月山东省战工会正式公布《修正山东省县政府组织条例》、《修正山东省区公所组织条例》⑩，胶东抗日根据地也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制定了《村政暂行条例》⑪，以法令的形式将县-区-村三级行政区划正式确立下来。规定“县政府为全县行政最高领导机关”，“各县划为若干区，设区公所，代表县政府管理本区各村镇行政事宜”⑫，“行政村为抗日民主政权基础的自治单位”，⑬“讨论，计划，执行县区政府令办事项”。⑭ 这样，在县及县以下就有了明确的行政层级，“三级政府的组织原则，行政村政府受县政府领导，区公所是县政府的代表，村政府并受区公所之领导”⑮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便于直接控制乡村基层，在这一时期山东省抗日民主政权曾有过进一步简化行政层级的打算，将地方行政区划直接简化

①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全省行政区域划分的决定》，《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6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61—363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海阳市档案馆藏，档 1-1-1。

⑥ 同上。

⑦ 《胶东东海区一年来政权工作总结报告（一）》，烟台市方志办藏。

⑧ 《胶东区党委关于目前政权工作的决定》，山东省档案馆藏，档 24-1-495-2。

⑨ 由于各地具体情形不同，敌占区、游击区（边沿区）、根据地三者之间推行的时间可能有所差别。

⑩ 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编印：《法令汇编》，1943 年，第 42—59 页。

⑪ 《村政暂行条例》，栖霞市档案馆藏，档 13-1-7。

⑫ 《修正山东省区公所组织条例》，《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1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5 页。

⑬ 《村政暂行条例》，栖霞市档案馆藏，档 13-1-7。

⑭ 同上。

⑮ 《胶东区村政选举暂行条例（1942 年）》，《威海抗战史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4—124 页。

为“主任公署—县政府—行政村，战工会之作总的原则上的领导，专署和区公所，则为传达的督察机关”。[①] 这样变为专署及“区是工作单位（也就是虚级），村是领导单位（也就是实级）”。[②] 这可以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率，符合行政制度改革的原则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简化管理层次”，[③]“适度减少行政区划层级数量，扩大行政区划管理幅度”。[④] 由于受到诸多自然条件与战时环境等因素的限制，这种行政区划方法没有得到实施，在实际运作中仍将区作为一级行政区划。

对于区村政府的行政人员，中共在抗战之初主要依赖原有的基层行政人员，这样就使众多的基层行政人员便成为双保险，“国民党来了给国民党干，好好好，给国民党征粮，征丁，征捐，征人；共产党来了，好好好，也给共产党干，这叫双保险”[⑤]，这样就在基层民众中模糊了抗日民主政权与敌伪顽政权的界限，使三者等同起来，认为不过是争夺地盘的三方势力，这不利于抗日民政政权的建设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影响，取得民众对抗日政权的认同，确立政权的合法性。新的行政区划确立后，中共开始改变这一状况，确定自己的基层行政人员，以别于敌伪顽政权。笔者在莱阳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时，老人告诉我：

“人家就是改个名，俺不和您一个名。俺选的干部，俺叫他村长，你选的保长。一进门就两下子，不要他。”“给国民党干保长，八路军这里就不要他，不稀要他。”“给国民党办事的全部不要他。要个穷人哦。”[⑥]

在县以上的行政层级当中，胶东区行政公署直属于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所辖，“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为山东省行政之统一领导机关，对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负责。”[⑦] 为适应战时环境，“将全省划分为若干行政区，设行政公署”，“行政公署为行政区之行政最高领导机关”[⑧] 胶东抗日根据地按照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区划，则为胶东区行政公署。根据具体环境及工作需要，下设东海区、西海区、南海区、北海区、滨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区，成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代表行政公署督察其所辖区之行政工作。[⑨] 这样在 1943 年 8 月左右，胶东革命根据地就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行政区划及政府机构，主任公署—专员公署—县政府—区公所—行政村。同时县区范围均划小，取消旧乡制，减少行政层次。[⑩] 这种政区划分方式，是战时复杂的斗争环境相适应，据当时胶东参加革命工作的王西钊同志回忆，“大县划小县，大区划小区的好处，是把敌人占据的中心区变我们的边沿区，敌人的边沿区变我们的中心区（小根据地）、也就是敌人占据交通要道，我们占据乡村，敌人占据平原，我们占据山区。这样区域小，便于控制，干部人数少，便于机动灵活，有利于发动组织讲众，有利于同敌人周旋，有利于同敌人斗争。”[⑪]

由于战时环境特殊，敌我顽争夺异常激烈，各级行政区划的界限经常变更，胶东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往往根据战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派生许多准政区与虚幻政区，1943 年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针对这一现象就指出：

各县如确因县境辽阔，敌伪分割或其他人为障碍，在行政上指挥联系不便时，在行政上指挥联

① 孟东明：《行政村建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胶东区党委实验区工作对村政工作三个月总结》，山东省档案馆藏，档 24-1-7-1。

② 同上。

③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15 页。

④ 李金龙、王宝元：《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制度研究》，《求索》，2007 年第 12 期。

⑤ 2008 年 8 月 6 日晚，莱阳汪家夼村 JFB 访谈。

⑥ 2008 年 8 月 7 日晚，莱阳汪家夼村 GBL 访谈。

⑦ 《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组织条例》，《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1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24 页。

⑧ 《山东省行政公署组织条例》，《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1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4—27 页。

⑨ 同上。

⑩ 《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议员大会关于通过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施政报告的决议》，《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0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9 页。

⑪ 王西钊：《抗日战争岁月中莱西县革命争主要事件的回忆》，《莱西文史资料》，第 5 辑。

系不便时，得于适当地区设置县政府行署，就近领导各该地区行政工作，其内部组织由各该县政府呈请行政公署或行政专员公署，核准施行。

各地区已经具有县政府实质之县政府行署，办事处或联合办事处，应即改称为县政府，并视其实际情形，适用修正县政府组织条例及新颁编制表各规定，由各行政公署或行政专员公署核请施行，并呈报本会备案。①

山东省抗日民主政府往往随着战时具体情形，以及政权扩展范围的扩大与缩小不断对行政区划与行政界限做出适当的调整，1945 年 10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山东省政府就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以下行政区划做出了调整的要求：

不接敌之县，应斟酌交通，经济等情况，分别平原，山区，人口密度，并参照战前老区划，作县界的适当调整。其原则大致为每县人口三十万上下，村庄在七百至一千上下，县界之能符合战前县界者，尽量依从其县界，以便于适合人民之习惯。但过去之县界太不合理者，如插花地，飞地，落星地等，则须调整，使其便于行政。

凡县境内有县城者，须以原县名命名，县政府必须争取进驻县城，以扩大政治影响。新成立之县，须择定在交通上、经济上、文化上有条件之重大市镇作为长期驻所。以增加行政便利。

各县所辖应以十个区至十五个区为原则，区公所应进驻适宜之重要市镇。

各县的太大市镇（不一定各县都有），可设县直属镇（等于区的）。此等镇可根据自然条件，包括若干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村落。但一般县城城关连附近村落在内，则概划城关区，不必算之为市。县直属镇及城关区，以其居民必较集中，由市民性质，且情况比较复杂，故配备干部须较一般区为强。

各行署可指定一个县，令选择一个区，参酌联防区，学区，集市及其他工作条件，作划乡之实验，将实验之结果呈报核定后，然后决定应否推行，以采取慎重态度。

区所辖一定之大集镇可设镇，受区公所领导，并适当加强干部。

新解放区可采用联合村、单一村制。一般村为单一村，极小而分散的村落采取联合村制，须注意居民习惯，觉悟程度及其他历史的自然条件，多尊重民意，不得强制。

铁路沿线尚未完全解放之地区，应服从军事斗争形势及需要，其区划为临时过渡性质的，一切调整应服从军事与对敌斗争。②

从此指示中我们不仅推断出，胶东抗日根据地各行政区划界限不断变动，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行政区划的层级并不是十分严格的执行的，如在这一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在适当区可以有乡之实验。无独有偶，1942 年东海区在实行县—区—村三级区划的过程中由于乡的取消造成了行政上混乱，有一段时间曾恢复乡级政府调整区界：

以各县按照跨河骑路包围据点原则，恢复乡级政府重新划分区界。荣成划分为七个区五个乡；文登划分为八个区六个乡；威海仍照原有八个区（没有乡级）直辖 364 个村；牟平将原有十个区 100 个乡，划出八、九、十三个区，六区的四个乡，七区的三个乡，划分给牟海，余者划分为八个区 64 个乡。牟海由牟平旧八、九、十三个区及六区的四个乡，七区的两个乡与海阳旧三区及二区的两个乡，划分为七个区 52 个乡。海阳原有六个区 55 个乡，除将第三区及第二区的两个乡划归牟海外，余者划分为七个区 45 个乡。③

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整，在 1944 年前后胶东抗日根据地最终形成了定型的行政区划，如下列各表：

① 《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关于修正县政府组织条例的训令》，《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1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73 页。

② 《山东省政府关于调整各级政府行政机构及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指示》，《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5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40—543 页。

③ 《胶东东海区一年来政权工作总结报告（一）》，烟台市方志办藏。

表 1　胶东各海区基础数字统计

区别	区数	村数	每区平均村数	每村平均户数	每户平均人口	每人平均地亩	总面积(亩)
东海	100	4028	—	—	—	—	45416
西海	95	3353	—	—	—	—	32785
南海	97	3271	—	—	—	—	40187
北海	90	3374	—	—	—	—	28585
滨北	81	4769	—	—	—	—	34528
合计	463	18795	40	120	4	12. 3	181501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档案馆藏，《烟台各海区县基础数字统计，1948》，档 31-1-107-1 而制定。—表示无统计。

表 2　东海区各县基础数字统计

县别	区数	村数	每区平均村数	户数	每村平均户数	总面积(亩)
石岛	7	231	—	28529	—	1686
荣成	10	472	—	53157	—	3248
海阳	12	518	—	76254	—	8800
乳山	14	559	—	81098	—	6075
牙前	10	306	—	32933	—	2946
牟平	15	526	—	68169	—	7650
威海	8	343	—	40173	—	2692
昆嵛	14	555	—	76845	—	8640
文登	10	517	—	57083	—	3679
合计	100	4208	40	513971	121	45416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档案馆藏，《烟台各海区县基础数字统计，1948》，档 31-1-107-1 而制定。—表示无统计。

表 3　北海区各县基础数字统计

县别	区数	村数	每区平均村数	户数	每村平均户数	总面积(亩)
招远	9	350	—	34689	—	2500
栖霞	14	509	—	40751	—	4200
栖东	9	321	—	30726	—	6000
蓬莱	15	657	—	73195	—	4872
福山	11	373	—	56824	—	4512
招北	11	424	—	52799	—	2930
黄县	14	527	—	62830	—	2500
龙口	7	213	—	34365	—	1071
合计	90	3374	37	386179	115	28585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档案馆藏，《烟台各海区县基础数字统计，1948》，档 31-1-107-1 而制定。—表示无统计。

表 4　西海区各县基础数字统计

县别	区数	村数	每区平均村数	户数	每村平均户数	总面积(亩)
平度	13	534	—	52142	—	3500
潍北	8	247	—	33787	—	3675
潍南	7	286	—	35691	—	2880
掖县	15	518	—	97255	—	4200
南掖	14	505	—	65186	—	4200
平西	15	419	—	55757	—	2750
昌南	11	363	—	38321	—	2664
昌北	12	481	—	66909	—	8916
合计	95	3353	35	445048	133	32785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档案馆藏，《烟台各海区县基础数字统计，1948》，档 31-1-107-1 而制定。—表示无统计。

表 5　北海区各县基础数字统计

县别	区数	村数	每区平均村数	户数	每村平均户数	总面积(亩)
即东	14	468	—	65413	—	5500
平南	13	546	—	55236	—	3500
莱西南	10	354	—	47715	—	2300
莱东	12	413	—	45141	—	3602
即墨	15	197	—	31298	—	3679
平东	11	467	—	55450	—	3600
五龙	10	361	—	55065	—	3025
莱阳	12	465	—	46755	—	4981
合计	97	3271	33	402064	121	40187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档案馆藏，《烟台各海区县基础数字统计，1948》，档 31-1-107-1 而制定。—表示无统计。

表 6　滨北区各县基础数字统计

县别	区数	村数	每区平均村数	户数	每村平均户数	总面积(亩)
诸城	10	601	—	63227	—	4800
莒北	9	583	—	55164	—	3400
藏马	8	394	—	58072	—	3897
五连	7	426	—	52890	—	6500
胶县	8	448	—	42844	—	2070
胶高	11	481	—	55411	—	3850
胶河	9	485	—	60724	—	3575
高密	11	638	—	73111	—	3596
胶南	8	533	—	63123	—	3240
合计	81	4767	59	524566	109	34928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档案馆藏，《烟台各海区县基础数字统计，1948》，档 31-1-107-1 而制定。—表示无统计。

自 1941 年 10 月后胶东抗日根据地根据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的指示，调整了原有的行政区划，在地方基层形成了县—区—村三级制的行政区划层次。这一时期行政区划最大的变动就是乡级区划的取消，取消保甲、恢复闾邻制的村政改造。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时期行政区划的变动与胶东各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权改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对于树立良好的政权形象，以区别于敌伪顽政权，取得人民对抗日政权合法性的支持，对基层进行抗战动员，保证抗日根据地的稳固起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完成三级制的改造，增加了行政效能，加强了政府对村级的领导，使政令可迅速传到下层，深入下层。”① 当然由于乡级行政区划的取消，在一段时间内也造成了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混乱与不便。

三、县以下行政区划的具体运作

乡级行政区划的取消，减少了行政层级，便于胶东抗日政权直接掌握乡村。然由于这次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发生在抗日相持阶段，敌我顽三方关系错综复杂，对乡村的争夺异常激烈，而这次行政区划的调整缺乏统筹与论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困难，甚至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出现了行政层级的混乱，县—区—村三级行政区划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了不可操作性。为了使抗日民主政权正常运转，胶东抗日根据地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往往打破县—区—村三级行政区划的限制，采取了诸多暂时性与实验性的行政运作，以弥补三级行政区划的不足。尤其是在乡取消后，区以下行政区划更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乡取消后，由区直接领导村级行政区划，“区公所直接领导村庄，一般在四十个以上，单位太多，不易照顾周到。”② 甚至有的大区直辖 140 多村，不便领导，故许多海区有打算恢复乡镇公所的念头。③ 同时由于传统的乡级行政区划的废除，打破了人们固有的行政区划的习惯，故在有的地区进行区村划界时，造成了诸多的混乱。“（文登）因为虽然取消了乡级政府，但划分时仍以旧有乡镇为单位，所以比较整齐；荣成方面打破了乡界，以致许多民众弄得一塌糊涂，莫名所以，表现得颇为凌乱”。④ 在此情形之下，如何使政权顺利运转，理顺各级行政区划的关系，不仅考验着中共领导艺术，也是巩固与扩大的政权的必然要求。

为了改变乡取消后，区直辖村庄过多，指挥不灵的弊端，山东省战工会决定，“区公所范围以管辖二千户到四千户，面积直径二十里到三十里，村庄四十个到六十个为原则，取消乡之区公所，得就五个至八个村中选择工作较好，地点较适中之村为中心村，并得委托中心村公所协助督促各自然村之工作。但中心村对普通村是平行的，不是上下级关系。”⑤ 胶东革命根据地根据本地区的战争态势、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等因素，规定：“户口、商店在五百户以上之重要市镇，在政治与经济上有重要意义者，得单独成立一个镇，设立镇公所，直接受县政府领导。在政治经济上无重要意义之大村，其户口超过一千户以上者，亦得自设一镇。镇附近之小村得划入镇，受镇公所领导。”⑥ 这样就使这些镇在乡取消后，在事实上具有了乡级行政区划的层级与功能，这对于强化县对乡村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区的控制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各县以此为由，“竟把很多不足五百户的普通集场划上几个小村凑够五百户也设一个直属镇”，过多地增加镇的设置，这样就使各县设的直属镇太多，从而增添了县的领导负担，使镇成为县的行政累赘，“这样县里的领导单位太多了，县政府也领导不过来”。⑦

乡取消以后，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地方县—区—村三级行政区划的具体做法便是将原先的区划小，直接由区公所领导村庄，但区所辖村庄仍然过多，照顾不周，不便领导，于是各县在推行之初对于行政区划层级采取了变通的方法，实行中心村制，“五个至八个村庄成立中心村，作为区公所

① 《胶东东海区二十九年度政权工作总结报告》，山东省档案馆藏，档 27-1-10。

②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关于村政组织与工作的新决定》，《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7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94—402 页。

③ 海阳市档案馆藏，档 1-1-1。

④ 同上。

⑤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全省行政区域划分的决定》，《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6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61—363 页。

⑥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关于村政组织与工作的新决定（1941 年 10 月 12 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7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94—402 页。

⑦ 孟东明：《行政村建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胶东区党委实验区工作对村政工作三个月总结》，山东省档案馆藏，档 24-1-7-1。

之辅助组织。”但中心村制与取消乡的精神不符，同时弊端过多，故不久之后便取消中心村，代之以行政村制，“但因距离太远村庄太多，如以一般之村公所兼任，则因干部力量关系，不易起作用。扩大中心村村公所组织，扩大其职权，则易形成小乡，与原来划小区取消乡之精神不合，因此，经考验后，决定取消中心村制，改用行政村制，做到每小区管辖单位不超过二十个行政村为原则。”①

山东省战工会对行政村的划定是以人口为主要标准，参考经济、距离、风俗习惯等诸因素将自然村与行政管理结合起来的一种区划方法，其具体的规定如下：

1. 根据地户口在百户以上，人口在 400 以上的自然村，群众已有组织（抗日的群众团体）即划为一个行政村，为县政府领导下的一个行政单位。

2. 不满百户的自然村，应与附近村庄编划为联合行政村，但各村距离以不超过三里路为原则，超过三里以上，户口有 50 户以上的自然村，亦得单独编划为一个行政村。

3. 三里以内的数个小村，户口总数超过 150 户而不满 200 户者，亦只得编划为一个行政村。

4. 联合行政村村政府所在之村为主村，其他为副村，村政府应设于人口众多，地点适中之村庄。

5. 联合行政村为各自然村民主的联合组织，副村为行政村的一部分，不是政权的一级行政村，对副村的领导，应是民主集中制的，副村庄行政上必须服从行政村的领导，行政村在领导上，必须根据民主原则，不得包办。②

行政村的划分方法，虽然比中心村制具有可操作性，但由于行政村的划分打破了乡村社会中固有的传统的自然村的划界，尤其是联合行政村的出现往往就导致了主村与副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胶东抗日根据地在具体运作过程中许多地区往往为图省事，节约行政成本，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形，对行政村划的过大，行政村之间的自然村距离过远，甚至于过分勉强，“但各县执行的时候，为了避免区的领导单位过多，两个一百户以上的村庄，也划作一个行政村，几个小村联合起来的行政村超过二百五十户甚至三百户的也有，距离超过三里的也有，几个互相有矛盾水火不相容的村庄也强把它们划到一块，这样划分的行政村，行政是不会统一起来的，所以各自然村仍是各自为政，划分了等于不划分。”③ 这显然与当初行政村设计是不相吻合的，为解决这一问题，胶东抗日民主政府多次训令要求各县要根据各自然村的风俗、历史、习惯等因素因地制宜来划分行政村，以图使行政村制度与当地传统相适应，同时还规定了主村与副村之间的关系，作为实施行政村制度的基本制度：

1. 在几个小村合组成之行政村，其村公所为各自然村之联合组织。因此，在按照人口比例直接平等选举出来之村民代表会议，为全行政村之最高权力机关，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选出之村长，村行政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关。因此，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行政村对各自然村为领导关系，各自然村必须执行行政村之决议，并接受其领导。

2. 为防止大村与小村之间发生不平等起见，一切重要问题必须经过村民代表会讨论，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民主表决。

3. 为使区公所深入普遍对各小村之领导起见，区公所在计划与总结工作时，可召集各自然村长一起开会。④

抗日民主政府在基层一个基本改革就是取缔国民党政权与日伪在基层推行的保甲制度，恢复与推行闾邻制，这是抗日政权区别于敌伪顽在基层行政区划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对于闾邻的划分山东省战工会 1940 年规定五户为邻，二十五户为闾。⑤ 1942 年胶东抗日根据地决定实行划小区制度，

① 孟东明：《行政村建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胶东区党委实验区工作对村政工作三个月总结》，山东省档案馆藏，档 24-1-7-1。

② 《胶东区村政选举暂行条例》，《威海抗战史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4—124 页。

③ 孟东明：《行政村建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胶东区党委实验区工作对村政工作三个月总结》，山东省档案馆藏，档 24-1-7-1。

④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关于村政组织与工作的新决定》，《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7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94—402 页。

⑤ 《五年来的民主建设总结》，山东省档案馆藏，档 31-1-3-10。

将原先的区级行政区划划小，取消乡即行政区划，以区直接管辖行政村。为了便于实际操作，对于闾邻制度重新做了修正，规定十五家为一闾，取消邻由闾直辖各户，其上直属于划村及行政村。①

针对各行政村与自然村的不同情形与风俗习惯，为了进一步完善闾邻制度，在邻取消后，又决定设“里”作为对闾的补充，以提高行政效率。“二十闾以上之大村及镇，村镇公所领导单独过多时，得就其街巷之区划分若干里，作为村镇工作与闾之中间组织。里以管辖八闾至十五闾为原则。”②

抗日民主政权是以民选为基础的，如何将村民代表会议和行政机构的合而为一便成为基层行政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行政村就是如何将村民代表大会主席和村长统一起来以及把代表和闾长统一起来的这两个问题。③ 由于邻被取消，闾成为行政村下控制各户的单位，因而闾的功能日益增多。由于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与姻缘为纽带而形成的差序格局，家族与宗族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作为控制户的闾在乡村选举中往往起到重大的作用，以至于“大部分村子把闾长做了人民的代表，把闾弄成了政权的一级，有事召集闾长商量，一地公粮田赋柴草的征收完成由闾长负责。”④ 这与中共在基层对于乡村社会的改造是不相符合的，以至于在根据地内有取消闾的声音，“在研究公民小组和闾的组织接合的时候，有人主张取消闾，因为闾是统治家长的，所以是个封建的统治机构。”但由于“但在这社会经济是以家庭做单位的时候，取消了闾还得有和闾相同性质的机构来代替，不过换换名字而已。但是无论如何，闾长的权限是一定要缩小的，闾长的工作一定要减轻的，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⑤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抗日根据地经过艰苦的摸索以及对乡村社会改造，最终形成了村民代表与闾长统一，行政系统与公民小组相结合一套方法。⑥

值得注意的是，取消乡之后而在胶东出现的镇、中心村、里、副村、闾、邻等单位均非基层行政区划的层级。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些单位往往承担了行政区划层级的职能，故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基层民众往往将这些单位看作是单独的行政区划。周振鹤先生曾著文指出在研究行政区划的过程中，引入虚级的“小概念”，他指出：

虚级是指不具备充分必要条件的一级政区。其具体表现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不被中央所认可，但实际上具有一级政区的功能。……二是政区形态的不完善。……三是中央政府或某一级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形成的管辖区。……虚级只是后人为了研究的方便提出来的概念，并非正式官书上的记载。而且虚级说到底主要还是指处于该级的行政组织的职能不完备而言。⑦

周先生对此还提出了虚幻政权的概念。“虚幻政区是指只有行政组织而无行政区划，甚至行政组织与行政区划两样皆无，而只有行政机构空名的特殊现象。”⑧ 当然周振鹤先生主要是针对的县以上行政区划而言，我们不妨将周先生这一概念更进一步深化，将其引入到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之中。可视这一时期频繁变更的镇、中心村、里、副村、闾、邻为基层行政区划的“虚级”，区以下虚级政区变动频繁，说明中共对如何巩固与加强对基层的控制的模式不断进行摸索，是其对基层控制不断进行调适的反映，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变动的频度也正是中共在基层控制深化的不同程度的反映。正如周振鹤先生所支出的那样：“行政区划的出现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直接进行行政管理的权力一种新制度与新概念的产生，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产物，而是有一个长时段的过程。”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乡级基层行政区划的取消，区以下行政区划变动频繁尤其是行政村

① 《五年来的民主建设总结》，山东省档案馆藏档 31-1-3-10。

②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关于村政组织与工作的新决定》，《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7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94—402 页。

③ 孟东明：《行政村建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胶东区党委实验区工作对村政工作三个月总结》，山东省档案馆藏，档 24-1-7-1。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复旦学报》，2001 年第 3 期。

⑧ 同上。

⑨ 同上。

内的虚级政权的变动更为剧烈。区以下基层虚幻政区的不断变更正是中共不断探索如何控制与管理乡村基层的反映，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观察，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向前延伸到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在基层的行政区划的变更，向后可以一直延伸到当下正在实行的“村改设区”的模式的演化。在这其中尽管行政区划及管理的形式发生了诸种改变，但其目标没有实质的改变，那就是如何控制与管理基层社会，不断调整国家、地方与基层三者之间关系，以便于更好地对基层的管理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与环境的需要。

四、小结

行政区划不仅是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政权存在的基本前提，因而行政区划的研究也是研究一个政权的切入口与突破点，也是政权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行政区划的研究，可以透视一个政权的政治活动形态，诚如周振鹤所指出：“因为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观念以及自然地理环境都有密切的关系。”① 对行政区划研究也是政治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县以下行政区划的研究也是周振鹤先生近几年所力倡的微观的小尺度的政治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② 通过对基层行政区划研究可以直接窥视一个政权对乡村基层社会管制与治理的形态。

抗战时期，胶东地方基层行政区划变动异常频繁，中共在地方政权组织形态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其地方行政区划也随政权发展而变动。胶东抗日根据地内行政区划变动也与当时的战争形势、社会环境、传统风俗、敌伪顽三方错综复杂的关系等诸因素相适应的。正如宋月红所指出的那样：“不同时期，不同原则或不同条件下的行政区划形成相应的行政区域格局与类型体系，进而在行政管理上表现为不同状态的区域行政以及国家行政与区域行政间的互动关系。不同行政区域类型呈现一定的社情、域情差异和自然生态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差别，而且在中国单一的国家结构中，不同类型的区域行政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作用、功能、结构也是各具特征的。”③ 抗战时期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行政区划是不一致的，胶东抗日根据地与抗战时期陕甘宁相较二者差别是相当大的，无论是行政区划层级的设置还是行政区划的变动。④

我们从上述分析可知，胶东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动首先是以适合当时战争态势为出发点的。战争进程、战争形势、敌我顽三者之间关系的演变都是决定胶东抗日根据地内地方基层行政区划设置与变动的主要因素，同时结合胶东当地的风俗传统、自然环境、地理人文等因素。在一定意义上，行政区划不仅是政权重要因素，更是政权的象征，行政区划成为在基层乡村民众心中的新政权的符号。乡级行政区划的取消，在基层取缔保甲恢复闾邻等，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正是中共在基层树立政权的正面形象，区别敌我顽三者在基层政权的重要标志，争取政权合法性的有力象征，动员基层民众抗日的重要工具。

（作者杨焕鹏，鲁东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① 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 年第 2 期。

② 同上。

③ 宋月红：《行政区划与当代中国行政区域、区域行政类型分析》，《北京大学学报》，1999 年 4 期。

④ 任中和：《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演变概述》，《历史档案》，1988 年第 3 期及李金龙：《中央革命根据地行政区划体制创制与改革刍议》，《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 年 5 期等论著。

《马关条约》和“乙未之役”双甲子纪念
——台湾先烈抗日的历史不容抹杀

王晓波

2015 年 4 月 17 日，是《马关条约》签订 120 周年，梁启超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①

1894 年 11 月 24 日，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发表宣言称：“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命，强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②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率进京赶考的各省举人，在天安门拦下满清皇帝上“万言书”曰：“伏乞皇上近法列圣，远法禹汤，特下明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励天下，同雪国耻。”③ 除“责躬罪己”外，并提出“变通新法”，而有尔后的“康梁变法”。

“近之辱国丧命，强藩压境”即甲午战败。兴中会是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革命路线的开始，“康梁变法”则是宪政改革路线的开始。故“割台湾，偿两百兆”乃“大梦之唤醒”，中国警觉要救亡图存了。“公车上书”力争“诛奸相，绝和议”，台民力争“义不臣倭”统统无望后，只得拥唐景崧为首领，5 月 25 日，成立台湾抗日临时政权，准备自力抗战，开启了台胞抗日五十年的历史。

5 月 29 日，日军登陆三貂湾的澳底。6 月 5 日，唐景崧搭德轮回厦门；6 月 7 日，日军进台北城；6 月 17 日，宣布“始政”。台湾抗日临时政权要自力抗战，原有的清兵或有留下来的，但多已奉命内渡。有前来支援的黑旗军刘永福，黑旗军名气虽大，但人员有限；另有临时招募来的粤勇，良莠不齐；此外多为义勇军。其人数，据陈汉光说：“抗日政府成立后，去杨岐珍及万国本十余营时加新起义军（以八营计）及团练渔团等对抵外亦不上四十营”（日参谋本部《日清战史》载仅三十八营，人员计共为一万三千二百名）。若以日混成第一旅团台湾史料载，甲午战争之初，全台兵勇有七十一营，如是计算最多亦不能超过百营。连氏《台湾通史》载：“‘土客新旧为数三百数十营’谅不确实。”④ 或据《台湾警察沿革志》的记载：“当时台湾除正规军（专属练勇两军）外，还有十数营绿营军，他们被委任以驿递、邮夫、盐务、保甲等职，在番界为生番做警卫，还有的称作屯丁以归化番与隘勇相同。除此外，台湾兵力有一百五十余营，人数约五万人。”⑤ 至于武器，《警察沿革志》载：“非正规军的兵器往往是猎枪、木枪，十有八九没有火器，携带剑戟竹枪。”⑥ 至于日军方面，陈汉光说：“侵台日军最高指挥机关为台湾总督府，陆军主力为近卫师团。混成支队辅之。嗣因死伤过多，无法南侵，始调第二师团到台协助。至台南陷后，北部义军继起，乃再调混成第七旅团来援。先后兵数总计有 70049 人，马 9434 匹。海军有常备舰队及运送船四十余艘，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台湾中华书局 1965 年台二版，第 1 页。
② 孙中山：《国父全集》第二册，“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4 年再版，第 411 页。
③ 《现代中国思想家》第三辑，巨人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79 页。
④ 陈汉光：《台湾抗日史》，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2 页。
⑤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抗日运动史》（第一册），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3 页。
⑥ 同上，第 86 页。

汽艇短艇数百，人员总数约一万余人。此外尚有武装警官七百余人，兵力可谓相当雄厚。”①

近卫师团是日本的精锐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训练有素，而义军却多乌合之众，武器简陋，而有“竹竿绑菜刀”之说，对照两军实力，胜败早已了然。唐景崧出走后，留守台南的刘永福拒绝被推为首领，而只负责继续号召领导台民抗战。

由于唐景崧的出走，日军轻易拿下台北，但日军继续南下时，却遭受到吴汤兴、徐骧、姜绍祖等人的严厉的抵抗。据向山宽夫说：“以大嵙崁为中心所进行的义民军抗战，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该地乃是素以勇敢闻名的岛内少数粤族的集居地带，住民连老幼妇女均拿起武器作战。此次战斗，日军有二十名阵亡者、二十六名负伤者，消耗步枪弹六万二千六百发。”

由于受到激烈的抵抗，使日军对义民军与住民心怀强烈的复仇心。占领大嵙崁的部队，在“连呼报仇、报仇下，搜杀败兵，彻夜不止”的情况下，恣意杀戮。“在大嵙崁失陷时，被捕的数十名义民军和江国辉，因‘受到拷打亦三缄其口’而全遭杀害。”②

另据《警察沿革志》云：

“（六月）廿二日攻占新竹，廿五日返回安平镇，打败袭击我后勤补给线的敌军（义民军），尔后的战斗并未如攻略基隆台北般容易，不免时而陷入苦战，莫非此等地方之贼徒非军队，而是土寇，出没隐现丛泽山野，如我军穷追猛打，徒疲于奔命而已；而且无法判别土民与土寇，在田园挥锹，状如良民者，一见我军队弱小，立即摇身一变，恣意叛逆。……如看敌兵居上风时，附近的村庄均变成敌，连妇女都喊叫、挥舞枪支、冲向战线；而且冥顽不畏死，据守村落中散居的人家，抵抗我兵，若自家为我炮弹破坏时，更转移到邻家作战，稍有可乘之机，必定加以逆袭。”③

受到激烈的抵抗，日军开始进行报复式的屠村和烧杀。陈汉光列举如次④：

山根支队之暴行

（六月）廿二日山根少将令林大尉率步兵一中队、骑兵一小队、炮兵一小队、工兵半小队为左侧卫，向大嵙崁河左岸三角涌附近前进。翌日五时始向三角涌街推进。是日尚有若干不屈不挠义民，犹作零星抵御，但均不敌。日军入三角涌街，火烧民房，见人便杀，数小时后一个美丽而繁盛之乡镇，已变为满目凄凉之焦土！遍地死尸，惨不忍睹。当时林大尉率领之左侧卫亦到二甲九，烧毁民房，并乱杀无辜乡民。据日方记载，死者约一百余人，民房遭毁者一千五百余座。

内藤支队之暴行

七月廿二日清晨，内藤大佐率步兵三中队、炮兵一中队（炮二门）、卫兵一小队，向塔寮坑南方前进。另以仓田少佐率步兵一中队、骑兵一中队（欠一小队）、炮兵一小队（炮二门），向大嵙崁河左岸搜索推进。廿四日大焚民房，翌（廿五）日日军见目的已达，遂收军还塔寮坑。是役乡民遭屠杀，据日方宣布者亦达三四百人之多，民房遭烧者亦达一千座以上。

松原支队之暴行

（七月）廿二日五时松原少佐率步兵一队沿大嵙崁河右岸溯流前进，七时兵至板桥，大搜民房，十三时起于四汀头放火焚烧民房，见人便杀。翌（廿三）日晨兵进土城，少数义民出拒，终不敌而散。日军

① 陈汉光：《台湾抗日史》，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4 页。

② 向山宽夫著，杨鸿儒译：《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上），福禄寿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版，第 106 页。

③ 同上，第 128 页。

④ 陈汉光：《台湾抗日史》，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8—89 页。

入村，亦烧亦杀，乡民遭杀者二百七十余人，房屋被烧者约八九百座（以上数目均系日方记载）。

吴汤兴、徐骧、姜绍祖均列入连横《台湾通史》列传外，洪弃生亦有《台湾沦陷纪哀》一诗记其抗日事迹曰：

“谁料大厦倾，乃逢一木当。香山、苗栗间，义民起如蝗。鏖战不得前，敌马徒披猖。自言海上来，未遭此颉颃。倡之者为谁？义士吴徐姜。用矛赴齐师，争推为徐骧。绍祖亦悍斗，视死如阳阳。吴君（汤兴）能统率，亦未易低昂，村妇佐磨刀，耕农自裹粮。”①

吴、徐、姜均在战争中牺牲，洪弃生还有《哀苗山》一诗，悼念之。诗云：“台湾破碎已三载，至今人说徐、吴、姜。徐君勇敢推善战，儒巾结束变戎装。腰下长携三尺刃，手中能擎百子枪。冲锋独队遇强敌，出没山林成战场。姜君勇悍亦异常，一时驱虏如驱羊。吴君统率同一气，义旗一竖神扬扬。诚知大敌未易御，民众聚合非久长。又况援师不足恃，岂能双手除欃枪！如火如荼敌军至，六月七月人惶惶。苗栗山头台安海，西有舟鲛东有狼。为猿、为鹤不可知，数君名在家已亡。存没死生疑传疑，生死于君两不妨。生为国士死国殇，望风凭吊歌一章！”② 斯役也，牺牲的除了吴、徐、姜外，还有新楚军的杨载云（湖南人），和黑旗军的吴彭年（浙江人）、袁锡清、林鸿贵。

吴德功有《头份吊古》诗云：

“头份岭下车纷纷，头份岭上日欲曛。荒冢累累蓬蒿满，停舆凭吊新楚军。回思乙未六月间，台岛治兵如丝棼。伊时廉蔺不交欢（自注：黎景嵩不服刘永福），南北将帅门户分，公本血性奇男子，丹心捧日才不群。初寄专阃拜登坛，讵料金牌召孔殷。公愤奋臂冲前敌，身冒炮火甘自焚。呜呼新楚军！统将谁？蓝翎游击杨载云。”③

吴彭年，浙江余姚人，是刘永福的幕僚，而非军人。日军进迫彰化，求援于刘永福，永福已无将可派，彭年慨然请缨数次，最后永福谓：“兵来御之，死守无恐。”终战死彰化八卦山，事迹见《台湾通史》列传，且有连横《八卦山行》记其事曰：

“书生抵死在疆场，志士不忘在沟壑。城存与存亡与亡，万民空巷吞声哭。裹尸马革复何惭，弩目牛皮今非昨。提刀大笑向天行，中霄几见旄头落。我来山上吊英灵，独汲寒泉荐秋菊。国魂飘荡国殇哀，哀哉今人气萧索。”④

预期的内地援助不能兑现，眼见弹尽援绝，刘永福终于在 10 月 19 日，出走台南城；20 日，搭英轮离台，而言：“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虽然，刘永福离台，但驻守东部的刘德杓（安徽人）仍持续对抗，直至 1896 年 7 月。后又投效柯铁虎的铁国山。

黑旗军的抗争失败了，在日军占领下却尽是烧杀掳掠、奸淫抢夺，无恶不作。

洪弃生在《老妇哀》一诗中记述着：

出门逢老妇，白发蓬压眉。矮兵蹴之行，哀哀泣路歧。乞食不得饱，眼泪垂作糜。问妇何所苦？呜咽不成辞。有室无可归，残年丧子儿。一家八九人，遭杀不胜悲！大者能扶耜，小者仅知饥。爱女倚房居，刺绣手牵丝。大妇在炊下，淅米玉如脂。一夕闻兵来，悚息泪交颐。聚泣共吞声，忽有兵人窥。闯入掠衣饰，索钱勒藏赀。刀枪交股下，大者死阶墀。回头视幼子，身首已分肌。女、妇骇啼走，拼命于一时，缕陈不及终。哭声已涟洏。更端问老妇，摇首不闻知。旁人纷纷说，甲乙亦如斯。甲家益酷死，馈矮为矮欺。遗下数顷田，芜秽草差差。复存数间屋，入夜栖鸢鸱。东家绝炊火，西舍游鹿麋。亦有矮人宿，连甍卧豺熊。破壁系鞍马，折门煮牲牺。行人不敢过，迂路且鞭笞。世衰人物贱，不死皆便宜。翘首望苍天，言之有余噫！叹息百年上，琛赆朝四夷。民物皆丰贵，鸡犬亦雍熙。草野无知觉，听我吟哀诗。⑤

① 洪弃生：《披晞集》卷 1，第 7 页。
② 洪弃生：《披晞集》卷 3，第 41 页。
③ 吴德功：《割台三记》，第 55 页。
④ 连雅堂：《剑花室诗集》，第 55 页。
⑤ 洪弃生：《披晞集》卷 3，第 17 页。

简大狮在厦门听的供词也说："我简大狮，系台湾清国之民。皇上不得已以台地割畀日人，日人无礼，屡次至某家寻衅，且被奸淫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嫂与母死之，一家十余口仅存子侄数人，又被杀死。因念此仇不共戴天，曾聚众万余以与日人为难。然仇者皆系日人，并未毒及清人；故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唯我一介小民，犹能聚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去年大势既败，逃窜至漳，犹是归化清朝，愿为子民。漳州道府既为清朝官员，理应保护清朝百姓。然今事已至此，空言无补！惟望开恩，将予杖毙，生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犹感大德！千万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① 诚如简大狮所言"因念此仇不共戴天"，北部则以胡嘉猷（胡阿锦）为首，秘密协议企图共同夺回台北，在 1895 年 12 月 31 日半夜，以大屯山和观音山的狼烟为信号，由各地攻向台北城，一时声势大振。日本官兵死 128 名，伤 58 名，后又从日本调军队来台驰援，胡嘉猷等人起义终于功败垂成。

起义军不但公告檄文，并有军纪约束："一、奸淫妇女者斩。二、强夺民财者斩。三、泄露军机者斩。四、临阵退缩遁逃不前者斩。五、冒他人之功为己功者斩。六、散布谣言惑乱军心进行欺骗者从重究办。七、所过之处若窃取百姓物件、杀害无辜之民者，查实后按军法治罪。八、义兵及各壮士攻至城市，许其擒杀倭寇，决不可贪利废公。若有日本之仓库及商店物件，须加封保护，待平定之时秉公颁赏。"②

但日本近代鼓吹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竟连续在《时事新报》发表社论，主张血腥镇压台民起义。其言论如次："我对征讨、镇压的方法，也有不少遗憾的感觉，但是提起往事无补于事，这次骚动正是绝好的机会，应以军队彻底扫荡，斩草断根歼灭丑类，将土地尽行没收，以举全岛为官有地的决意，实行英断。否则仅止于一时性的镇压，今后这种骚动必然迭起，非但措置不妥，而且每有骚动就会引起国内人心的动摇。影响所及，商业的繁荣受到妨碍，甚至有意迁往该地的企业，也会因此取消计划，致使刚欲向外发展的机运遭受挫折。海外领土的小纷扰虽非国家的大事，但是影响却不少。我欲再向当道劝告；应该当机立断，一举消除祸根，永久断绝骚动之患。"（一八九六年一月八日）③

"关于处理台湾的骚动，如在前号论述，无非下定英断歼灭丑类，使其一人无存，以期扫荡全岛。该岛民等狡狯，遭遇我大军便临时佯装顺民，窥悉兵力单薄就忽然蜂起逞凶，其无智宁可垂怜，然而他们的本性顽冥不灵，究竟未能醒悟，应以除非将其歼灭别无办法的觉悟，一举扫尽丑类。或有人以为他们之中，不无真正的顺民。而竟一举予以歼灭，未免太残忍，不过我说歼灭，意非并合其种族予以歼灭。

愿意顺从我国的人民，就是日本国的良民，当然应该厚加保护，但是如果仅以表面上的顺从，便认为良民，则是一大错误。比如这次骚动，实际上必有煽动者，惟响应煽动而蜂起的几万贼徒，不外是平时认为良民的徒辈。他们并非从心底真正服从，征之事实已经明显，所以纵使再遭大军征讨而表示一时的顺从，对曾经响应煽动而抗拒我国者，断不可宽容，应该悉予付问军律，给予严重的处分。"（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五日）④

"因为当初已经清楚，令其割地之目的，完全在土地而不在人民，所以关于处理该岛的问题，当局这应该仅考虑土地，断不可把岛民置于眼中。应该抱持一种觉悟，以为实际上得到名叫台湾的无人岛，从而决定经营的大方针。如果按照这方针办事，百般问题迎刃可解，一定非常容易，毫无困难。应该断行所欲为，目的唯在收取土地。如果该岛民等心服我政令，而真正表示顺民之实，即令他们不投我们所好，实际上也未便给予严重的处分。可是他们非但不从心底归服，动辄相率企图

① 王炳耀：《中日战辑选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9 年，第 104 页。
②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抗日运动史》（第二册），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91 页。
③ 转引自黄俊杰：《台湾意识与台湾文化》，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06 年版，第 53—54 页。
④ 同上书，第 54—55 页。

反抗，杀戮我官吏人民，实为顽迷非法之徒，迄今骚乱不绝，宁可趁其频繁骚动的机会，固应将罪状明白者，付诸严重处罚，而苟有帮助或隐蔽嫌疑者，则不留情地驱逐境外，并将其土地财产等，尽予没收为官有。”（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①

“我敢保证，实际上的处置，没有他们想象那么麻烦。本来该岛民企图反抗，正是道地的螳臂当车。台湾人虽愚，应该自能量力察觉利害，唯因他们不详悉日本人的力量，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妄作抵抗，只要将实力显示其眼前，尽管他们无知，当能悟之不可争而自行屏息。以土匪的蜂起为例，据悉去年以来，经我军扫荡流血的地方大都平稳，而骚动的发生，限于我军通过而未流血的地方。就是因为不知日本军的力量，他们才会蜂起，所以，凡是有反抗形迹的人，应该尽予诛杀，使其一人无存，以歼灭丑类。三百万岛民当然不可能尽为不轨之徒，即使有异志之辈，如果目睹可怕的事实，也会改心变成顺民。这是杀一儆百的办法，土匪之类即使尽杀，为数并不多，而促使全岛民幡然悔悟的功效却很大。所以我主张应给予严重的处分。”（一八九六年八月八日）②

“该地的处理方法，应该效仿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开发美洲大陆的办法，把无知蒙昧的蛮民尽予驱逐境外，由日本人掌管一切殖产权力，以确定举全岛使之日本化的方针，逐渐付诸实行，以期永远的大利，是为我所希望。”（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一日）③

福泽谕吉至今仍为日本人所尊崇，是千元钞票上的人头像，但却是煽动屠杀我台民的吹鼓手。在福泽谕吉的鼓吹下，据向山宽夫的记述：“在第七旅团抵达的同时，开始在各地展开讨伐；一月廿一日，攻击陈秋菊居住地的乌月，同月廿三日起，攻击台北近郊；卅一日，攻击宜兰的民壮围（后称壮围），自二月十日起，攻击大嵙崁、三角涌、铜锣园、龙潭陂、咸菜硼等地的抗日队。所谓讨伐，是‘严密搜查各村民房，以刀枪抵抗者当然格杀，凡持有武器、举动不自然者，均予以枪毙，并连同毁坏武器，和房子一起烧毁’。如此彻底进行的结果，光是第七旅团所杀害的人数，便多达两千四百五十四名，若再加上宪兵队杀死的三百七十七名，共有三千名以上的抗日队员与住民遇害。其中又以起义激烈的宜兰，呈现所谓‘迄一月廿八日，大约一千五百人被诛戮，一万户民房被烧毁，宜兰平原的大半成为灰烬’的惨状。加入起义的各地有力人士也不少。士林首要望族，出任台北保良局干部及士林保良局长的潘光松，虽未参与抗日游击活动，但仍以和抗日队互通款曲之由，于一八九六年三月七日，依台湾人民军事犯处分例，被陆军军法会议判处斩首刑。蜂拥起义在遭到重创下，最后宣告失败，最高领导人胡嘉猷之后也逃亡中国本土。尽管失败，但北部地区的抗日队，日后仍不断进行大大小小的抗日游击活动。”④ 在福泽谕吉的鼓吹下，日军屠杀我台民更是恣无忌惮。日军讨伐队的交涉委员今村平藏，留下一八九六年六月讨伐云林的日记《蛮烟瘴雨日志》云：“廿、廿一、廿二之三天，讨伐队、宪兵、警察官、支厅员等打成一片，扫荡散窜于各村落之民军。支厅员悉皆从事扫荡，仅留谷书记官（信敬）、吉田属（清）及工役一二人看守，松村支厅长亦亲自鞭马临阵。于是乎，云林东南一带之地，则斗六堡东南面一半、鲤鱼堡及打猫东堡各地五六十里间，凡兵烟之下，无不尽成肉山血河，既不分良匪，复未辨薰莸，几千房屋竟付诸一炬，无数生灵顷刻间尽成斩首台上之怨魂。”

“廿三日随从儿玉队，将归还云林而路过九芎林庄东端龙眼树下时，井口警部迎接我队，提交一封信与儿玉中队，此乃讨伐之严令是也。倏忽间九芎林庄成为焦土，村民血肉飞散，变成惨绝人寰之地狱，旋行石榴班海丰仑之杀戮烧焰，腥风卷烟，阳光凄然。同时全部讨伐队，横扫云林平原。残烟死灰未灭，满眸极其酸鼻，令人怅然自失，大有天柱将折，地维将裂之慨。如此对付新领

① 转引自黄俊杰：《台湾意识与台湾文化》，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06 年版，第 55 页。

② 同上书，第 56-57 页。

③ 同上书，第 53 页。

④ 向山宽夫著，杨鸿儒译：《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上），福禄寿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版，第 194-195 页。

土之酷烈惨淡政略，其活历史展开于当时云林地方矣，世人称之为屠杀案。后家村地方亦终于难免。按自从清治时，云林地方素称强暴难御，故在施政当初，竟行如此强硬猛烈苟不可侵犯之政策，盖全出于当局者之方寸也。”①

日军的杀戮并没有吓倒英勇的义勇军，反而引起更强烈的抵抗。七月四日，台南县警察课警务系长警部矢野武平给知事的报告中云：

“兹将近来之土兵军纪有关事项，列举数端以供参考。

曰：云林守备兵在战斗中，不听指挥，呐喊后纷纷脱阵。

曰：士兵领得日给六钱五厘之薄酬，互为讥笑，相率脱逃。

曰：松村云林支厅长求军官死守，并盼进而扫荡，军官以难以达到目的而下令撤退。支厅长以仅有少数之守备兵，实难固守而频叹不已。

曰：军官之良马数只被夺，匪魁竟骑其马昂然指挥众匪，我方士兵竟欣赏言道：匪徒使用无烟弹药，神出鬼没，又善于指挥，配以群匪挥镰刀竹枪突喊而来，实其勇无云云。

以职观察此批土匪较台北之土匪更剽悍善战，反观我士兵与比之显然软弱数倍，士气低落，一无是处也。”②

7 月 6 日，台南县知事矶贝静藏向总督报告说：“现在土匪以林圮埔为据点，配以云林，聚集街为两翼，窃占刺桐港及北斗之要地，并控制南方之大埔林，将匪力集中于北斗，企图越过南投，而攻台中县属南门街，有直冲彰化之迹象。惟台中城壁已破，势不堪防守，迫得我军必撤至彰化之局面，预料群匪乘势掠取此要冲。反观我守备队，不仅士兵缺乏进取之慨，且士气沮丧，加之，兵寡不足恃。若以此趋势迁延，将误戎机，甚至已往所收揽之民心，悉归水泡，良民亦势必附和匪徒，其理甚为彰明。因此此刻更需勇猛之‘剿匪’队，歼灭匪群，以重建皇国之威武，是急不容缓之时也。”③

可见义勇军的失败不在于勇猛不如日军，而在于武器太不如日军。日军的肆意烧杀，不但引起外国传教士的痛斥，并且连总督府也觉得“超出意外”。《警察沿革志》说：“此次台南管内旅团的讨伐行动，虽以疾风暴雨之势横扫山区和平原，暂时使民心受到洗刷，但在杀气凌人氛围下，失当之处亦难避免。以致不久就怨声四起，使地方官十分懊恼。从现台南县知事在翌年三月呈报的明治卅一年（一八九八）末第一、二次大讨伐及平阿堠、潮州、恒春匪变中当地民众受损害的统计中，摘录几个主要数位如下：被杀二千零五十三人，伤者不计其数。房屋被烧毁者中，全部烧毁二千七百八十三户，半烧毁三千零三十户。房屋财产被烧毁和畜禽损失合计约折时价三万八千余圆。其中，阿公店一带的讨伐极为激烈，以致滞留在安平、打狗地区的外国人提出问题。如英国传教士范加逊、西班牙传教士某曾投书香港《每日新闻》，痛斥暴行。”

“不过，因讨伐中被害之大超出意外，总督府命台南县知事采取善后措施，以一万圆为限付给救恤费。县根据各地受损害的轻重，加以调查后进行了赈恤。”④

相对于日军的烧杀掳掠，义勇军除了胡嘉猷有军纪约束外，根据日方的记载亦多是“号令严明”。1897 年 4 月 25 日，义军袭击潮州庄宪兵分驻所，《警察沿革志》载，“匪徒枪械很多，号令严明，分兵对分驻所夹击。”⑤ 1898 年 7 月 12 日，义军袭击宪兵，《警察沿革志》载：“他们各自屯粮练兵，互通声气，企图联合进犯，并对凤山地方民间声言：‘我等绝不抢夺农民财物，只攻打楠仔坑、阿公店，杀日本官吏，为民除暴。’”⑥

1898 年 12 月 28 日，林少猫等发起对潮州庄专员公署攻击，《台湾宪兵队史》称：“号令甚严

① 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新编》，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7 页。

②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云林、六甲等抗日事件关系档案》，1978 年，第 50 页。

③ 同上，第 54 页。

④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抗日运动史》（第三册），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04—805 页。

⑤ 同上书，第 783 页。

⑥ 同上书，第 793 页。

明，其势力实不可轻视。”①《警察沿革志》亦载：“此次匪变，土匪总数超过千人，号令严明，秋毫无犯，只杀日本文武官员。”②

1900 年 10 月 8 日，郑忠清等义军进攻赤坎派出所。《警察沿革志》称：“匪徒专门标榜排斥日本，自称义军，不抢掠民众，所以民众多归服。”③《台湾宪兵队史》亦载：“自称义军，秋毫无犯，绝不抢劫，从而愚民归服者很多。”④

1901 年 11 月 23 日，发生“朴子脚事件”，《警察沿革志》载：“彼等对当地民众毫不为害，不掠一物。对其所需要的物品，虽十分细小也按价付钱。”⑤ “乙未之役”后，诚如向山宽夫所言：“日后仍不断进行大大小小的抗日游击活动。”有北部的简大狮，有中部的柯铁虎，有南部的林少猫，人称“三猛”，一直到 1902 年，“后壁林之役”林少猫被歼灭。后又有 1912 年到 1915 年的“罗福星事件”、“噍吧哖事件”等，直到 1930 年，又爆发原住民抗日的“雾社事件”。

“亡人之国，必先亡其史”，日据时代，日本人抹杀台湾人民的历史，光复后，也忽视台湾这段历史，以至台湾“本土化”竟成了歌颂日本殖民统治的“皇民化”，不亦悲夫！时值马关割台和乙未之役 120 周年，我们又岂能遗忘这一段台湾先烈英勇抗日的历史。

（作者王晓波，台湾世新大学　教授）

① 台湾宪兵队：《台湾宪兵队史》（下），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17 页。
②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抗日运动史》（第三册），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10 页。
③ 同上书，第 847 页。
④ 台湾宪兵队：《台湾宪兵队史》（下），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66 页。
⑤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抗日运动史》（第四册），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77 页。

抗日首义　闽台双杰

李明滨

中国全民抗战始自1937年七七事变。若从九一八事变抗击日本侵略东三省算起，则抗日战争爆发时间应前推至1931年9月18日。但是还有更早的台湾民众抗日义举，在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朝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当地民众在1895年奋起武装抗击日军登台。那应属于抗日战争首义。台湾民众打响了抗日战争的先声，一批闽台抗日志士登上抗战的舞台，演出了可歌可泣的一幕。其中就有尊敬的前辈林森先生和李应辰先生。如今，当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光复70周年之际，我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林森和李应辰先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闽台志士先人。

林森（1868—1943）后来曾任国民政府“主席”，青年时代在台北工作，恰巧赶上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日本的大事变。那时引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割台消息传到台湾时，民众群情激奋，据当地报载“若午夜暴闻惊雷，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集于市，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若无天地。”台北鸣锣罢市，决心抗日，著名的刘永福黑旗军就是在此时组成，进行抗拒日军登陆台湾的。而林森与一批闽籍在台人士随即行动起来，投身反对割台的抗日斗争，加入刘永福抗日队伍。

据林森口述好友蔡人奇笔记《闽警》（1904年）一书，述及1895年5月至6月的战况，“闽人李治安，在台湾电报学堂肄业，当政府割让台湾与日人时，台人起而自立。李擅地雷术，上条陈于刘将军永福，刘命其带营布设地雷，日人死者无算。未几，李为流弹所中，遂被害”。

据蔡人奇后来所编《藤山志》，对林森有更多描写：

“民前18年甲午中日战争，逊清割台议和，公（林森）愤甚，集合同学陈（李）治安等6人，以科学制造地雷，组成地雷队，隶于刘永福元帅麾下彭佳森将军营中，扼守彰化之八卦山，抗敌三载（应为三月之误）有奇，日寇为地雷队炸毙者不计其数。彰化为台南北之孔道，八卦山其要塞也。不幸汉奸粤人邓某，闽人黄某为日寇之向导，由荒山荆棘丛中引寇至八卦山之背，彭将军所领军队仅五百人，皆久战沙场之士，见山前有敌，下山御之，而敌人又为地雷所炸，正在追奔逐北，而敌人已由山背登山，山头被占，彭将军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彭殉国，陈（李）治安亦战死。公幸脱险，避于友人倪耿如家，乘夜渡帆船沿海边回闽。”时值当年8月。

由于时局紧迫，匆促间所存资料无多，这里所引据林友华先生著《林森评传》和《林森年谱》（华文出版社，2011年），但简短的几则记录已足以反映林森投身抗击日本侵台的形象。

然而，作为忠实信奉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新华日报》评语）的林森，有着辉煌的传记，而其开始部分，即在台抗日事迹，所存资料毕竟太少，与总体很不相称。今天，为纪念林森，后人可做的事应该有两点。一为分析研究早年既有史料，认识意义，为其一生事业增光。一为把他与同辈闽台抗日志士对照，用当年台湾抗击日寇登台，昂扬而悲壮的气氛，以陪衬和烘托林森之杰出。

从林森早期史料分析，可见其意义有三。其一，有忧国忧民情怀，把抗日与革命相联系，使人

生事业有了高起点。

林森之奋起抗日，绝不是热血青年的一时之为，而是有其深刻的“民族、民权之思想”[①] 基础的。他于 1868 年出生在福建闽县尚干风港村，面对清末政府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步步进逼中国的时代。他少时有家学传统文化的熏陶，小学在福州又进了教会学校，受到西方思想的启蒙。1890 年考入台湾电报学堂，接触当年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科学报国”的思想。青年时代已具有极度厌恶清政府腐败、丧权辱国，导致社会危机频发，民不聊生的现状。于是日军侵台对他便是极大的刺激，激发起爱国的热情。抗日便成了他革命生涯的起点。

其二，有了良好开端，此后即坚持理想，终生矢志不移，他从此便投身于国民革命，先是追随孙中山，在闽台等地组织和创立革命的兴中会。后又投入“五四运动”，为反帝反封建出力，参加革命军为北伐战争效力，并且力所能及地参与促进二次国共两党合作，直至年高德劭荣任国府主席 12 年，当他 1943 年 8 月 1 日在任职上病逝时，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中共中央发出唁电，云：“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兹闻溘逝，痛悼同深，谨此致唁。”

其三，从此以后，追求完满的人生，赢得后人尊敬。

林森从在台抗敌起，一向秉持反清抗日的思想，后来发展为建设国家和收复台湾的人生抱负。这样的一生自然赢得国人的尊敬，尤其是台湾人民的纪念。不然为何台湾自光复以后就不断扩展以他的名字赋予全岛各地为路名。不但在北中南三大都会城市都有大街设其名，例如，台北有“林森南路”、“林森北路”，高雄有“林森一路”、“二路”和“三路”。后来，至 2000 年有人统计，在全岛 21 个县市，包括澎湖的马公市，都有“林森街”或“林森路”[②]。如此普遍的现象，当笔者 20 世纪 90 年代在台讲学曾在台北“林森南路”附近住过，以为这是他长期为政界要人之故，然至近来读了《评传》和《年谱》之后，才悟到这另有因缘，原来林先生在台湾沦陷三年后，1898 年又折返台湾，在台北、台南，尤其是嘉义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早有广泛的影响，以致台湾光复后不久，1947 年在嘉义建立“青芝亭”并立碑纪念。碑曰：“故主席林公子超，民前 14 年春，为革命渡台，任台南法院嘉义支部通译。翌年春，应总理召返国。”[③]（此处总理系指孙中山先生）。

至于与闽台抗日志士相对照，也可按全局与个别两个方面。从全局看，《台湾抗日史》就是典型的全面情况。

可惜如此杰出之林森，在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出版撰写 1894—1895 年那段时间的《台湾抗日史》（1981 年出版）竟未提及。该书设九章，从甲午战争前酝酿写起，重点详写战后割台日军登陆，我方军民奋力抗战由北退南，直至高雄，台南失落，全岛沦陷全过程。应该算是一部那段历史的权威史书。台湾“文献委员会”林衡道主任委员所作“序”，称该书“不仅史料丰富，且博采地方父老口碑，广集有关抗日古迹之照片，其征文考献所用之功夫，使人不胜感篆”。他肯定该书对“光耀先贤奋战抗日之民族气节，激励后人保乡卫国之爱国情操”，尤具“历史教育之贡献”，人们当然可以从那广阔而悲壮的战斗背景上感受林森的卓越表现。

这里自然会产生疑问，一部台湾抗日史，竟然忽略了林森，问题出在哪里呢？恐怕在于林森战后仓促离开，且他那支队伍几乎全军覆灭，在台已不存留任何文字资料与口碑。他的事迹只能见于回乡后闽地的相关文字记载了。因此我们必然会诉诸个别的事例，用突出的相近的一个例子可以作对比，如据该书所记，有一位同样是闽籍的在台抗敌志士，同是属于刘永福的黑旗军，战后也迅速折返内地的李应辰，则其事迹则仅见于台湾，而内地毫无讯息。为了作比照，不妨简述如下：

李应辰（1860—1922）又名应时，字宗聘，祖籍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马巷李厝人。祖上渡台，定居台北县淡水镇中寮里。从小好学，热衷武功。1883 年参加淡水厅武学考获第五名，于清末

① 叶楚伧：《国民政府林故主席墓志铭》，《林公子超遗集》，第 10 页。

② 郑梓：《林森先生与近代台闽两地的离合姻缘》，台湾《福州月刊》2000 年 7 月 31 日。转引自林友华《林森评传》第 37 页。

③ 同上，第 35 页。

1891 年考中文科举人。恰其堂叔李祥奎、堂弟李应东亦考中武举，于是“兄弟叔侄举人”一时并称，极具名声。如今在中寮里有举人“旗杆屋”，在淡水李氏祖庙“燕楼宗庙”里，仍保存那些当年中举的记功匾牌，如《文魁》《武魁》等，一切都得到悉心照顾，族人们至今引以为荣。在当年，如此家族抗日，有极大影响。

《台湾抗日史》特为其辟有专节，题为《高尔伊倡议，李应辰联庄》。文中记载：“当日军侵入台北城郊之际，绅士高尔伊痛大局靡滥，版图易色，易服赶至内寮，就商于光绪十七年辛卯科举人李应辰，谋抗大敌，应辰血性之士也，慨然应允，遣家丁持简邀集沪尾（现名淡水）十八庄执事及诸父老，会于其宅。众皆义愤填膺，愿效一死，以报宗国。遂决定每庄各出壮丁五百人，各携械弹，组织成军。誓师之日纷争前敌。”高尔伊上书刘永福云：“举人李应辰联沪尾十八庄，庄五百人，精悍可恃，沪尾有警，愿当前敌。”据该书并转述台北县志记载：“……倭人自基隆进犯，未遂阙去，军民由新竹进攻，可与犄角，三貂岭简天瑞、郑天喜，一呼而应者万人。尔依于五月初十日，约为内应，驱倭入海，与犒六万金，允于十四日合力并击。（因）抚军（指唐景崧）出奔，事遂不果……五月十六日，林朝栋出援台北，至新竹；吴汤兴、姜绍祖二军，次大湖口，值崩军难窜，悉台北城不保，乃分屯新竹、中坜间，以待新命。十八日，沪尾（淡水）陷，李应辰、高尔伊唉援军不至，约十八庄义士归入芝兰，敌一中队（番号不明）分头截击，恶战时余，不胜，退大屯山。”最初，日军企图从淡水登陆，但见港口水雷密布，防范严密，被迫改从澳底登陆，台北陷落后，李应辰率领淡水军民步步防御，打了两个月的游击战。

这里的“沪尾”是淡水的别称。显然，李应辰所率的壮丁不但固守着淡水，而且向上层表示：如若淡水港口发出危急警报，即自愿充当御敌先锋。可见众人的抗日之心多么强烈。在这样广泛的群情激昂、同仇敌忾的背景上，李应辰不就是一位率众而起的英雄吗？

该书记载，在战斗败退时，“夜宿乱山中，缺月在天，虫声凄切，众皆热血沸腾，苦难入睡，李应辰感怆尤深，高吟一律以示志”：

临危仗剑事专征，一寸心强十万兵。
闻敌仓皇走将帅，防秋功业付书生。
诏来北阙难承旨，寇入东都誓效贞。
历鬼可为需记取，男儿南八是豪英。

这首诗极为鲜明地体现了李应辰爱国爱乡的情怀。清廷本来就想以丢弃台湾换取朝廷的安宁，根本不顾民众的呼声，在台湾义军节节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清军却受命撤离台湾，使得台北不战而陷入敌手。正如李诗中义愤填膺地谴责的“闻敌仓皇走将帅”，当权者在国难当头是如此仓皇逃走，防卫敌寇的千秋功业只能落到“临危仗剑”的（我辈）书生（文举人）头上了。试想想看，此种难堪的局面，能令这位有强于“十万兵”的决心的壮士安生吗？此所谓“欲哭无泪，欲斗无门”也。其悲愤之情天日可见，其批评和谴责的锋芒直指腐败的清朝廷。这种凛然正气在宗庙保存的文物中也处处可见。

后来，李应辰“在龟崙岭炮战中受伤，终因兵力悬殊，抵抗乏力，退至鹿港，遂携家眷离台，迁往厦门。”李应辰回到福建同安县后，居于 1891 年中举时回乡建的举人厝，并受到族人的敬重。当年中举后在同安县马巷李厝，族人们不仅为李应辰、李应东兄弟和叔父李祥奎在“李氏家庙”（祖厝）前树立两对旗杆，以记功彰显，而且在“李氏家庙”（祖厝）内复制他们中举时的牌匾，包括《文魁》《武魁》等匾牌，与淡水的记功文物完全一样。李厝的这套文物一直保存到“文革”期间才被人为地破坏。同时，李应辰建造了一座两进的大屋，即“举人大屋”，地点在李厝村中心地带，与“李氏家庙”祖厝并排，其规模略小于祖厝，但仍然装修得金碧辉煌，颇为壮观。李应辰回到厦门后，抗日的意志却始终不移。他每到一处都参加或组织训练“抗日义勇队”，训练乡勇进行操练，举行打靶活动，准备抗击咄咄逼人的日寇。后于 1922 年终老于故乡。

书中内容，读来令人感动。笔者曾拜访该书作者王国璠先生。年逾九旬的王老亲切接待，交谈

成书的过程。他曾任职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期关注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对于台湾抗日史有全面的了解，受李应辰事迹感动，所以对其思想、行为、影响及意义都有独到的描写。他谈到李之事迹，不但已入台湾抗日之正史，在台北县志、镇志都有记载，乡亲亦广有口碑，易于搜寻。有感于其精神，他并写出专文在报纸上宣传，题曰《抗日举人李应辰》。

反观内地，对于李应辰之事迹，无论口头、文字，从无只言片语提及，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两岸有了来往交流，才逐渐耳闻其事。2010 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5 周年，其事才登上全国性的刊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办的《中国抗战研究动态》（2010 年第三期），题为《台湾抗日举人李应辰》，并收藏了李应辰生前使用过的遗物，在纪念馆中展出。2011 年，台盟中央、全国台联、北京市台盟、北京市台联四单位联合在北京举办的《辛亥革命与台湾同胞——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图片展览，才列入《淡水举人李应辰与抗日诗抄》，作为专版展出。

不过，人们可以想见，假若林森在台湾留有更多的史料，史家不也可以写出痛快淋漓、浴血奋战的壮士吆！这里李应辰就是对林森一个鲜活的衬托，使人发生联想。

将林森和李应辰作对比，同样一段经历，在闽台两边的记载截然不同。林森之事当年仅记诸福建，在台湾不留文字。反过来李应辰之事，在台湾已入正史，而闽省父老则一无所知。可见问题出在两岸的长期隔绝，各自仅了解一边的情况。今日，当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台湾光复 70 周年之际，我们期望两岸已经有条件来往交流讯息资料，互通有无，编一本更为完整全面，两岸均能读得到的台湾抗日史，以弘扬林森等一代先贤的英雄事迹和爱国精神。

同时，海峡两岸，闽台各地还有许多重要的抗战遗址和抗日志士故居，皆可以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后代牢记历史，热爱祖国，开辟未来。

参考文献

[1] 林友华：《林森评传》，华文出版社 2001 年及 2011 年修订版。
[2] 林友华：《林森年谱（1969—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 年版。
[3] 曾雄主编：《台湾儿女祖国情》，台海出版社 2000 年版。
[4] 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编著：《台湾会馆与同乡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作者李明滨，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台籍客家及蕉岭先贤们坚持民族大义五十年来的事迹略述

曾德宜

《闻南京陷倭感赋》

龙蟠虎踞建新猷，十载经营一旦休；
土木辉煌飞炮焰，园陵佳丽蹦胡酋。
金脂银粉哀谁享，肝血尸骸逐水流；
大难只尽当大悟，去私结众济神州。

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宗愚弟丘琮书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惟目前两岸当局因为办理纪念这个事件，因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考量，故对于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诠释和说法。不仅如此，在这场全球性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战争中，因为当时的台湾及澎湖群岛被日本霸占，故曾生活那个时代台湾同胞，亦有人陈述个人当时的认知，而大受其他海内外的华人的挞伐。

战争毕竟已经过了 70 年，关于这场战争的领导权的争议、某些老人家的个人记忆，其实对于现代社会已不是那么重要了。从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所提的“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七十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及台湾和澎湖群岛重回中国的版图，其所代表的意义，则是中华大地在文化及历史上不致遭遇外族侵略下的“第三次亡国”命运，以及在这场反侵略的战争中，中国方面虽然牺牲相当惨烈，但最终仍由坚持“民族大义”者获得了胜利，体现了民族气节和正义。

诚如，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提到：“中国几千年以来，遭受了政治力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经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以及在较为文言版的《三民主义》“今请进而论民族主义”所言：“何为民族主义？即民族之正义之精神也。惟其无正义、无精神，故一亡于胡元，再亡于满清，而不以为耻，反谓他人父，谓他人君，承命惟谨，争事之恐不及。此有民族而无民族主义者之所谓也。”假设这场战争的结果，如果是以同盟国和中华民国的阵营战败收场，或许之后历史课本上，可能将如元朝、清朝般地多个“和朝”，而日语可能为所谓“国语”，而取代现在的“汉语”系统，产生如上述所提到的民族和国家认同错乱现象，也不足为奇。

更精确地来说，这个结果的历史意涵，不仅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抗战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史上的抗日胜利；不但由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一方，所获得的胜利，这也是由坚持民族气节的一方，所获得的正义。同时，这段民族精神发扬和坚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实际上是个长达五十余年的坚持与奋斗，故今年应纪念的不仅是抗战胜利 70 周年，两岸政府更该全力办理纪念台湾乙未战役发生 120 周年的奋斗伟绩。

无论是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或者是自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起算的史观，都未注意到 1895

年甲午战争后，台湾人民即自发地响应战斗的“乙未战役”的抗战历史，台湾人民于日据时期于岛内所进行的武装或非武装之“抗日活动”，以及诸多台湾志士长久以来心向祖国，不忘根本的历史事迹。因此，当两岸当局大肆庆祝这个伟大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但多数的新生代因未曾体认如前述的深刻意义而不甚重视，甚至更有人觉得与己无关，仅从个人的记忆及体验的角度，来看待这段这件七十年前发生的事件。

然而，孙中山先生在清廷不断消灭民族意识的二百余年后，仍保有此一“民族精神”，并敢提出前述基于民族立场的批判、倡议革命，以推翻外族统治。此外，在日本帝国非法地取得台湾的主权后，客籍人士如丘逢甲及刘永福等人，仍持守此一民族大义，以行动成立台湾抗日临时政权和发动抵抗日本正规军队的“乙未战役”。经我们了解到当时民族主义的环境和现实条件后，或许，客家人可以自豪地说，此系源自于我们客家族群始终坚持的理念和价值观——作为汉人族群中维护历史正义和坚持民族精神的传人。

不仅如此，“客家”这个处处为客、处处是家的汉人族群，千百年来垦拓迁移，无论所迁移的环境如何险恶，客家人为寻求生活环境的安定，不断地自北方中原地区向南迁徙，长期下来锻炼出坚忍的毅力与硬颈的精神，来向大自然生存法则挑战，除了成为语言与文化价值体系的守护族群外，在族群特性基础上所形成的价值观为个人毅力之强大甚至顽固的“硬颈、坚持”精神；以及每逢遭遇外族入侵时，秉持民族气节的表现，亦足以垂范中华大地，诚为中华文化传承上、历史正义与民族精神的表现上，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蕉岭三杰”——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已呈现在两岸当局的历史教科书中上，为我们所熟悉并广为流传给后世外，如前述在这段与日本统治台湾半世纪的期间（1895—1945 年），亦有许多生活在两岸的客家人和本乡蕉岭的先贤们，秉持着民族气节与大义精神，在民族发展的史册上亦同样不朽，作为客家精神展现的典范。

从第一次中日战争后到第二次中日战争，无论在台湾的武装抗日或非武装抗日的事件中，以及祖国大陆的抗战时期，除本乡外皆有台籍的客家先贤们参与其中，这些历史事迹，亦值得我们后人永远尊崇。

一、台湾抗日临时政权和“乙未战役”的抗日战争

如丘逢甲在清廷依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参与台湾抗日临时政权之成立，作为义军统领外，台湾民间各地亦于 1895 年间，尚有以各地之民众组成民军与日本正规军作战的事迹，即史称之“乙未战役”，其中的义军领袖之一的吴汤兴和徐骧亦系祖籍蕉岭。此外尚有诸多客籍人士，如屏东六堆的义军和发生在萧家古厝“步月楼”战斗中的萧光明等。

清廷割让台湾后，当时成立的台湾抗日临时政权主要是由客家人为抗日之需求所悍然成立的组织。根据学者薛云峰的研究指出：当时清廷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回后，以当地客家文人丘逢甲为主的一群仕绅即力主成立之，亦为客籍人士的刘永福亦抱持“与台存亡”的态度，以彰显“义不事倭”的自力救济的信念，并挟持当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担任首领，以取得日后守土备战的正当性。同时，台湾抗日临时政权成立后，客家人中有北埔的“金广福”姜家后代姜绍祖、头份的武秀才徐骧、高屏六堆军等客籍人士，也纷纷决定响应参战，史称“乙未战役”。

当时，客家族群组成义军参加抗日武装行动的领导人物，主要出身自底层的地方菁英，最著名的是以寡击众且战死沙场的吴汤兴、姜绍祖、徐骧三人，因三人皆拥有生员功名，而在台湾史上有“客家抗日三杰”、“竹苗三秀才”等美称。

吴汤兴（祖籍蕉岭县三圳伍子湖），苗栗铜锣湾人，家族在苗栗一带拓垦有成，个性任侠豪爽，为地方上的领导人物，为响应抗日事业，在同为苗栗人的丘逢甲引荐下获首领唐景崧授予“统领台湾义民各军关防”，率领义军在新竹一带布防，对抗南下的日军，于发生在彰化的八卦山战役中阵

亡，时年 30 岁，其妻黄贤妹不久后也投水自杀，展现客家妇人的贞烈及剽悍。

姜绍祖，新竹北埔人，武装拓垦组织“金广福”垦号第一代垦户首姜秀銮的后人；年方 20 岁却敢耗费巨资，独力招募 300 余人而组成仅约 700 人“敢字营”的抗日义军，自任指挥官，率军与吴汤兴、徐骧等人共同防卫新竹城，然不幸仍寡不敌众，在新竹城收复战中战败被俘，之后以身自殉于国，留下绝命诗一首：边戍孤军自一枝，九回断肠事可知，男儿应为国家计，岂敢偷生降夷狄。客家男儿坚持民族正气之音，迄今读来仍掷地有声，令人动容。

徐骧（祖籍蕉岭县谷仓村），苗栗头份人，能文能武，18 岁应试获生员功名，后为塾师培育乡里人才。乙未战争之际，徐骧散尽家财，募勇参战，与杨载云、吴汤兴所部共组“新苗军”，防卫新竹一带迎击日军，此役杨载云牺牲后，徐骧与吴汤兴退守苗栗、台中等，曾联合刘永福在大甲溪重创日军，之后仍坚持民族气节屡败屡战，当时，刘永福见其年轻可为，劝其内渡回大陆，惟其不从故在防守曾文溪的战役中，捐躯卫国，时年 29 岁。

二、日治时代下的武装和非武装抗日活动

“乙未战役”之后，台湾各地仍有零星的武装反抗，客家先贤除广为人知的罗福星烈士之事迹外，尚包括林少猫、蔡清琳、赖来等皆为在地客家人抗日活动的要角，令日本殖民政府头痛不已。至“噍吧哖事件”发生后，台湾同胞体认到民间无法以武装方式进行对抗日本殖民统治，故台籍知识分子改采以非武装抗日之方式抗争，其中与林献堂、蒋渭水组成“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民众党”的赖和，以及吴浊流、吕赫若等具有民族意识的文学家，亦系为我们客家人士。

林少猫，台湾在日治时期初期的抗日代表人之一，凤山县港西下里万丹街竹篙笼（今屏东县万丹乡万全村）的客家人，与简大狮、柯铁虎被并称为“狮虎猫抗日三猛”。1895 年清廷割让台湾消息传出后，林少猫即散尽家财，以银圆招募闽南人、客家人千余人，与七百名排湾族勇士合成抗日部队，共两千余人，并获得刘永福之军火援助；之后因台湾总督府改变政策，以招降方式劝降，并运用地方乡绅进入加礼山劝林少猫降服，在前无援兵后无粮饷的困境下，林少猫不得已提出十条要求，后被日本当局接受而发给十大要求准许书，林少猫遂在 1899 年，率三十余部属下山接受台湾总督府招降，惟仍于 1902 年遭偷袭杀害。

蔡清琳，是发生在 1907 年“北埔事件”之领导者，新竹州北埔支厅月眉庄（今新竹县峨眉乡）客家人。1907 年间，因当时日本总督佐久间佐马太，为殖民统治之需求须攫取台湾山林资源，拟进行对于原住民的进攻，欲抽调山区隘勇对付凶悍“蕃人”（原住民），蔡乃乘机说民众抗日，并略仿兴中会等组织，创设“复中兴联合会”，自为总裁，宣称清国军队将反攻台湾，呼吁民众响应以驱逐日本人；并游说赛夏族总头目赵明政（大打禄），于 1907 年 11 月 14 日夜起事，率众攻加礼山、鹅公髻、一百端、长坪头、大窝、大平等警察分驻所，并攻入北埔支厅，将支厅长渡边龟作及全体警员杀害，日本巡查及其家属亦不能幸免，共计屠杀 57 名日本人。总督府闻变，急从台中、新竹等处调兵镇压。起事队伍见并无清军支援，一遇日军即溃。蔡清琳逃遁山区，藏匿于总头目处，因起事者认为受蔡所骗，故愤而将其杀死，并献其尸向日军投降。

赖和，有“台湾新文艺园地的开垦者”与“台湾小说界的褓母”，并在有“台湾的鲁迅”及“台湾现代文学之父”之称。在台湾闽、客人士长期混居下，赖和闽南语流利，仍保有客家认同，但已经不会说客家话，曾赋诗道：“我本客属人，乡语径自忘，戚然伤抱怀，数典愧祖宗。”不但是台湾重要的作家，同时也是台湾 20 世纪 30 年代作家所公认的文坛领袖。1918 年远渡厦门行医期间，赖和受到“五四运动”的冲击，返台后积极参与台湾新文学运动，创作成就斐然。同时，赖和在 1921 年 2 月参与台湾抗日志士仿效爱尔兰争取独立的议会路线，所推动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0 月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并且当选理事。1923 年 12 月 16 日，赖和因为日本殖民统治当局镇压文化协会人士推动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而进行全岛性逮捕行动的“治警事件”，而与蒋渭水

等人一起入狱，遭到羁押长达 20 多天，其间写下了多首诗歌，例如《出狱归家》写道：“莽莽乾坤举目非，此生拼与世相违。谁知到处人争看，反似沙场战胜归”。

三、中日战争时期

丘念台先生，初名伯琮、国琮，中学时更名琮，生于台湾台中，于乙未战役后随逢甲公返回蕉岭故乡，榜其居曰：“念台山馆”，以示不忘光复台湾。先生仰承庭训，以“念台”为别号，日后办理党务工作时，由蒋中正先生发给党部委任状，书其名为“丘念台”，自此以“念台”为正名。

念台先生于中学时期加入同盟会，成为秘密革命党员，之后留学日本，就读第四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采矿科。在日读书时，积极联络台湾青年，组织“东宁会”，以便让台湾青年日后和中国大陆发生联系。毕业回国，先后任职东北沈阳兵工厂技师、西安煤矿公司采矿主任等职，并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即投入抗日的行列，投入发动广东及上海各抗日团体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并亲率慰劳团员出关，分赴兴城、凌南、绥中各地驻防部队，致送捐款，济助慰问。

本文起始即引用他在 1937 年底抗战初期时，念台先生写给同宗族兄丘哲先生（也是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前辈）的一首诗，述说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沦陷敌手的感叹，故使得他认为外敌当前，同胞们务须放下彼此的歧见，真诚地合作，故在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环境下，并于 1938 之初，即在客籍人士丘哲和叶剑英等人的协助下，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赴延安考察及学习组训民众之法。当时，自卢沟桥事变后，南京沦陷，武汉大会战前夕，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关系尚处于融洽阶段，故丘念台往访延安受到中共接待，并对其礼遇予以重视，毛泽东亲自接见并垂询。考察结束后，于 1938 年 10 月至 1944 年 2 月担任第四战区长官部参议兼“东区服务队”队长，工作是前线军民政治工作。

当时，尚有由台湾回到粤东原乡参加抗战工作的客家人，较为知名者钟浩东、萧道应（乙未抗日先贤萧光明之子），蒋碧玉（文化抗日先贤蒋渭水之女）、黄素贞及李南锋等，系参加丘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1942 年冬，钟浩东跟随丘念台赴福建龙岩联络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1943 年，东区服务队在罗浮山的冲虚观和白鹤观分别开办了罗浮中学和补习学校，同年，丘念台先生派遣钟浩东、李南峰、徐森源、邓云龙 4 人潜入广州敌占区，深入到广州沦陷区的台籍人员中去做军事工作。当时在广州的台籍人有数万人之多，钟浩东、李南峰以台籍同胞的身份在旅粤台胞中秘密活动，徐、邓两人从旁策应，进行政治工作，直到抗战胜利。惟这段台湾人亦有参加抗战的历史，因白色恐怖的因素干扰，鲜为人知，故让人以为台湾人只有抗日活动，而没有参加过抗战，此诚为民族精神教育失落的遗憾。

诚如本文所述，客家先贤们在时代动荡、颠沛流离之际，辗转于中华大地上千百年间，仍能以无畏的精神与毅力，一代接着一代地传承着本身民族气节与精神，成为唯一以“价值与文化”认同而非仅以区域的有限基础为认同的族群。“客家人”的精神十分可贵，除了以捍卫“民族文化”、实践“民族正义”为特质外，并往往愿意承担起对整个民族、国家的责任；更是在中华民族遭遇“存亡续绝”的危难时，勇于奋不顾身地追求“民族正义”实践之群体。

这份精神、价值、毅力及勇气，实为我们客家族裔的后世子孙所应珍视的资产，以及我们中华民族其他族裔的后代子孙，亦应视为榜样且用心学习的典范，如此甫能让我中华民族的未来，真正充满光明与希望，能从民族精神与气节的立场，追求文化的复兴与时代新文明的缔造。

（作者曾德宜，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会员、台北市文化局助理研究员）

台湾抗战遗存遗址述略

程　皓

内容提要：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期间，台湾同胞为保卫家园，维护民族尊严，持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武装和非武装抗日活动，在台湾各地留下了许多抗日遗址，后人为缅怀他们的事迹，又修建了许多纪念设施。这些抗日遗址和纪念设施，是如今重温历史、警示未来的重要场所。

关键词：台湾　日军　抗日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日本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割占台湾。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从未停止抗争，数十万台湾同胞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全面抗战爆发后，台湾同胞积极参加和支援大陆人民抗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① 两岸的仁人志士携手奋斗，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如今，台湾各地的许多抗日遗址和纪念设施，作为台湾同胞抵御外侮的历史见证，是如今重温历史、警示未来的重要场所。2015 年 3、4 月间，笔者曾前往台湾实地调查抗日遗址和纪念设施，现择重要者略述之，以飨读者。

石门古战场旧址

位于屏东县牡丹乡境内。近代，日本侵略台湾，肇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牡丹社事件，其发生地是由虱母山和五重溪山断崖夹峙而成，因地势险要，俨如门户，故名石门。1871 年，琉球国的渔民在海上航行遭遇风浪，漂流到台湾南部，误入牡丹社，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死 54 人，是为牡丹社事件。1874 年，日本以“琉球为日本版图”，“藉口称兵台湾”。② 日军在西乡从道中将率领下，在琅峤登陆，遭到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深感局势严重，委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处置事件。当时的日本见沈葆桢“据理诘之”③，且自身尚无力久据台湾，遂派人与清政府议和。1874 年 10 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北京专约》，日军在勒索“抚恤金”10 万两、修路建房银 40 万两后撤出台湾。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曾在虱母山附近的一处无名小丘上立碑纪念西乡从道，旁边则另建“征番战役病殁者忠魂碑”，以纪念在牡丹社事件中阵亡的日本士兵。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组织民众推倒“忠魂碑”，并将西乡从道纪念碑的碑文改为“澄清海宇还我河山”。④

“抗日名城”亿载金城

即二鲲鯓炮台，又称安平炮台，位于台南市安平区。1874 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抵御日军侵

① 《台胞抗日是全民族抗战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 年 9 月 2 日第 1 版。

②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 526《琉球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4624 页。

③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 413《沈葆桢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2045 页。

④ 钟志正、张健丰：《乙未战争研究——你不知道的台湾保卫战》，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33 页。

扰，加强海防，开始修筑此炮台。两年后，亿载金城正式完工，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座西式炮台。亿载金城占地约三公顷，为西洋式红砖建筑，呈四方形，四隅有突出的棱堡，架设大炮以利远攻。城门外额上书“亿载金城”，“喻此城坚固能存亿万年”①，内额上书“万流砥柱”，醒目苍劲，都是沈葆桢亲笔题写。中央凹入的场地用来操练军队，城外引海水为护城壕，城垣四周树木茂密，城内绿草如茵。亿载金城作为台湾岛上的海防重地，曾为抗击日军入侵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因此素有“抗日名城”之美誉。



亿载金城

雾峰林宅

位于台中市雾峰区。雾峰林家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从清代中后期开始兴盛，建造有台湾规模最大的官宅，同时也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统称“雾峰林宅”。雾峰林家分顶厝、下厝两个支系。1884 年，法军进犯基隆，雾峰林家下厝的林朝栋奉台湾巡抚刘铭传之命，率地方兵勇“栋军”抗敌，在基隆狮头岭炮台坚守半年，厥功至伟。林朝栋之子林祖密，在乙未割台后，随父内渡，后置在台家产于不顾，向日本驻厦门领事馆提出退出日籍，成为台湾同胞恢复中国国籍之第一人，他曾大义凛然地表示：“大汉之民，何能因财富而受辱于倭奴。”② 林祖密第五子林正亨，从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抗日战场，参加过昆仑关大战和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如今，雾峰林宅内常年陈列有关于林朝栋、林祖密等人抗日事迹的历史图片展。

盐寮抗日纪念碑

位于新北市贡寮区盐寮滨海公园内。1895 年 4 月，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闻此噩耗，矢志“愿人人战死而失台，绝不愿拱手而让台”③。为了逼迫台湾人民投降，日军于 5 月 27 日兵分两路进犯台湾，一路于 5 月 29 日从三貂角强行登陆，另一路于 6 月 1 日攻占基隆。台湾人民奋起反抗，在澳底海岸一带组织义军英勇抵抗日军，但因寡不敌众而全军阵亡。当地人民为纪念这些抗日义士，特建了这座抗日纪念碑。1975 年 10 月 25 日，即台湾光复三十周年之际，当时的台北县贡寮乡政府在纪念碑底座又镶嵌了一块石碑，碑文盛赞盐寮抗日义举是“惊天地而泣鬼神，诚我民族之伟大精神，有以致之”④。

三角涌抗日义民营旧址（清水祖师庙）

在新北市三峡区有一条闻名遐迩的民权老街，全长 248 米，共有 102 间店铺。三峡，旧称“三

① 张健丰：《日落台南城——光绪乙未抗日最终章》，海峡学术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5 页。
② 邵铭煌：《探索林祖密：新印象、新风貌》，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 页。
③ 蔡尔康等编：《中东战争本末》卷 4，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 203 页。
④ 《盐寮抗日纪念碑》，1975 年 10 月 25 日立。



盐寮抗日纪念碑

角涌”，因大汉溪、三峡溪、横溪在此汇流，地形呈三角形而得名，“涌”为闽南语“起浪”之意。1895 年乙未割台后，三峡民众自发成立近千人的三角涌义民营，伏击日军运粮船队。日军纠集重兵疯狂进攻三峡，义军奋起抗击，予敌重创，但终因实力相差悬殊，不得不撤进山里。日军一路烧杀，三峡老街“烟焰蔽空”，“遍地死尸”①，原本繁华的街市几成废墟。直到 1915 年，老街才得以复建。在三峡，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祖师庙，修建于清乾隆中期。早期来自福建安溪的移民，为供奉抗元义士、清水祖师陈昭应，专门在三峡兴建了祖师庙。当年，三角涌抗日义民营就是在清水祖师庙成立，并以此作为军械库与粮仓。

先贤丘沧海先生誓师抗日碑

位于台中市北屯区，落成于 1969 年 8 月。沧海，是丘逢甲的号。1895 年 6 月，在日本侵略者武装侵占台湾的危急形势下，为抗日保台，台湾著名士绅、进士丘逢甲等，发起组建抗日临时政权——“台湾民主国”，拥戴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本人为义军统领，建元“永清”，并以台湾绅民的名义致电清政府，表示：“台湾绅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② 失败后，丘逢甲内渡大陆。

姜绍祖墓

位于新竹县北埔乡一处山坡上。日军攻陷台北后，兵分两路南下进犯台中门户新竹。家境殷实、生员出身的姜绍祖，毅然毁家纾难，散尽家财，得资筹造武器，组织义军。1895 年 6 月中旬，他与吴汤兴、徐骧等联合抗击进犯新竹的日军近卫师团，在大湖口等地重创日本侵略者。后返回北埔，重新组织队伍。18 日，再率义军向新竹城东门发动进攻，在徐骧义军及广大群众支援配合下，反攻取得重大胜利。7 月底，率军攻城时，遭到日军拦击，他率百余名战士退入竹林中继续战斗，因力竭不支，最后与 70 余名战士一同被俘，自杀殉国，年仅 20 岁。数年后，姜绍祖的遗体才被其母寻获，家人“拾以葬于北埔之大坪林”③。由于姜绍祖与吴汤兴、徐骧都是客家人，后来都为国捐躯，被誉为“客家三杰”。

杨统领庙与徐骧纪念公园

位于苗栗县头份镇，两者相距不远。乙未割台后不久，日军占领台北，随即进犯新竹，新楚军杨载云部曾与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率领的义军联合抵抗。1895 年 8 月，日军进攻苗栗以北的尖笔

① 戚嘉林：《1895 台湾保卫战》，载《祖国文摘》2010 年创刊号，第 23 页。

② 《申报》1895 年 6 月 3 日第 1 版。

③ 符立中：《载入台湾抗日史册的姜绍祖》，载丘秀芷主编《破碎山河谁来补——台湾抗日先贤先烈传》，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 2015 年增订版，第 28 页。

山时，杨载云壮烈殉国，新楚军将士大多英勇战死。10 月，日军近卫师团进攻嘉义，徐骧等与黑旗军王德标部联合抗击，激战中徐骧身负重伤，高呼“大丈夫为国死，可无憾”①，壮烈牺牲。

八卦山抗日烈士纪念碑公园

位于彰化县彰化市。1895 年 8 月，日军攻陷台中后，分三路扑向彰化。黑旗军吴彭年部、新楚军及吴汤兴、徐骧所率义军与日军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少将山根信成率领的近卫师团主力在彰化城东面的八卦山展开血战。吴汤兴、吴彭年英勇牺牲，所部伤亡殆尽，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台湾军民击成重伤后不治而亡。战后，彰化县政府在八卦山之战旧址上修建有八卦山抗日烈士纪念碑公园，公园内有供奉抗日烈士英灵的祭祀厅一座，对面则有两处炮台遗址，旁边还有一座乙未保台和平纪念公园。山脚下，有一处废弃的防空洞，现被辟为“1895 抗日保台史迹馆”，馆内展出了大量日军侵台及台湾军民拼死抵抗的历史照片。

步月楼之役旧址

位于屏东县佳冬乡萧家古厝。1895 年 10 月，日军在枋寮登陆，随后进攻凤山县六根庄（今属屏东县佳冬乡）。当地客家领袖、富商萧光明被推举为义军首领，他领导乡民、义勇及刘永福“黑旗军”留置的部分士兵，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佳冬是典型的防御性聚落，拥有栅门、城墙、刺竹林等防御设施，萧光明率众镇守四个主要栅门，当日军前进到距守军三四百米处时遭到激烈抵抗，日军决定主攻东栅门的步月楼。战斗从早上 8 点多持续至午夜，“日军战死将校 1 人、士兵 14 人、受伤 57 人；义军则战死 80 余人”②。这就是六根庄之战，又称步月楼之役。在是役中，萧光明的次子萧升祥坚守东栅门，直至战死；三子萧月祥率大刀队迎战于南栅门，身受重伤，不久也去世。

三峡灵应六人公庙

在新北市三峡区民生街北侧，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庙，牌匾题作“三峡灵应六人公”，当中供奉六位抗日烈士的灵位。1896 年，台北县（今新北市）人林成祖在当地发动抗日起义，事败，与其他六位志士一同被捕遇害，遗骸被葬在三峡河西岸。1964 年，当地绅民在其墓地原址建祠奉祀。后伴随着城市建设，原址已被繁华的街市所包围，遂于 1988 年易址重建，烈士的遗骸也被移入其中，供民众祭拜。

“七脚川事件”纪念碑

在花莲县吉安乡吉安溪（旧称七脚川溪）畔，矗立着一座“七脚川事件”纪念碑，是 2011 年 11 月吉安乡公所为纪念“七脚川抗日事件”而兴建的。1908 年，花莲县七脚川部落阿美人不满长期被征调，延误农耕，爆发激烈的抗日事件，后遭到日军全面“迁村”，被迫离开家园，被称为“七脚川事件”。纪念碑旁边有一块关于“七脚川事件”的说明牌上印着这样一段文字：“民族间的历史仇恨可以被化解，但是历史的事实不可被磨灭；缅怀七脚川部落在事件中受难先人英灵，兴建碑石，一为永久慰灵，二为追求族群融合之发展立下誓言标竿。”③

台北监狱围墙遗迹

位于台北市中正区金山南路“中华电信”台北营运处旁。1910 年前后，台湾各地抗日义军风起云涌，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修建规模庞大的监狱。台北监狱四周围以高墙，所用石材多取自刚刚拆除的台北府城墙。现存的这段监狱围墙上有一处用红砖封死的拱门，俗称“运尸门”。当时，狱

① 转引自陈孔立主编：《台湾史纲要》，九州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6 页。

② 萧开平：《血战步月楼的萧光明》，载丘秀芷主编《破碎山河谁来补——台湾抗日先贤先烈传》，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 2015 年增订版，第 18 页。

③ 《七脚川事件纪念碑园区纪事》，2011 年 11 月。

方在刑场公开枪决了许多抗日志士，其家属只能半夜从“运尸门”领回遗体。

罗福星烈士纪念馆

位于苗栗县大湖乡，屋顶呈深蓝色，外观为浅黄色，建筑风格仿客家特色，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其中四层系抗日烈士罗福星史迹陈列馆。罗福星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影响下，认识到“只有推翻满清，才有光复台湾的希望”①，遂秘密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他在台湾组织同盟会支部及抗日团体，从事复台运动。1913 年 12 月被日本警察拘捕，历尽严刑拷打，始终不屈，次年 3 月在台北监狱英勇就义。

“噍吧哖事件”纪念公园

位于台南市玉井区，公园内有一座“噍吧哖事件”纪念碑。20 世纪初，台南人余清芳、罗俊、江定等以西来庵为根据地，以传教为掩护，广募志士进行抗日活动。1915 年 5 月，余清芳等发布谕告，树帜抗日。7、8 月间，余清芳率部围攻噍吧哖市街，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上万人被屠杀，余清芳等领导人被捕牺牲。是为“噍吧哖事件”。这是日本统治台湾 50 年期间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抗日事件。

抗日烈士余清芳纪念碑

位于台南市玉井区虎头山顶，系 1981 年由当时的台南县政府出资所立，碑身上部四面字迹完全一样，均为“抗日烈士余清芳纪念碑”。底座正面镌刻着“忠义可风”四个大字，背面是碑文，对余清芳等领导的“噍吧哖抗日事件”予以高度评价，其中提到：“是役也，事虽不成，烈士亦以身殉！但其英勇不屈之精神，实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②

玉井忠烈庙

又名噍吧哖余清芳纪念庙，位于台南市玉井区某居民住宅区与农田、水塘之间。该忠烈庙的规模很小，只有三间，其中供奉着“噍吧哖抗日事件”领导人余清芳、罗俊和江定三位烈士的照片和灵位。据了解，这座忠烈庙是由仰慕烈士英名的当地民众捐资兴建，目前由当地林真合女士负责管理。

栎社二十年题名碑

位于台中市雾峰区明台中学校园内，1922 年 10 月 8 日落成。明台中学校址，原为雾峰林家顶厝一系的花园——莱园。1902 年，出身雾峰林家顶厝的林献堂，和族人林朝崧、林幼春等在此共同组建栎社，是日据时期台湾三大诗社之一。林献堂一生倡导民族运动，大力宣扬中华民族意识，与日本殖民者进行非武装抗争，曾发起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并出任总理，被认为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意识觉醒和文化重建的开始”③。

雾社事件纪念公园

位于南投县仁爱乡雾社，1954 年落成。1930 年 10 月 27 日，受尽日本殖民者压迫的马赫坡社赛德克人在首领莫那鲁道的领导下，联合周边几个部落，趁雾社地区举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之机，向敌人发动攻击，将与会的 137 名日本人全歼。起义军连续攻占多处日警驻所，杀死十余名日警，日本在当地的殖民统治濒于瘫痪。日本殖民当局调动大批军警进攻雾社。尽管赛德克人英勇作战，但毕竟寡不敌众，被迫退守地形险要的断崖绝壁、山林洞窟。日本殖民当局甚至出动飞机，向赛德克人投掷毒气

① 陈三井：《罗福星与中国革命》，载罗秋昭等编《台湾抗日英雄罗福星烈士殉国一百周年纪念册》，2015 年再版，第 83 页。
② 台南县政府：《抗日烈士余清芳纪念碑碑记》，1981 年 5 月。
③ 林柏维：《台湾文化协会沧桑》，台原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 页。

弹。莫那鲁道见大势已去，誓死不降，在马赫坡举枪自杀。12 月 8 日，起义失败，“雾社原住民同胞几乎陷于灭绝”[①]。1933 年，莫那鲁道的遗骸被日本人意外寻获，通过比对身上的佩刀和饰品，判定了其身份，遗骸随即被运送至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土俗人种研究室作为标本。1974 年，在广大赛德克人的强烈要求下，台湾大学将莫那鲁道的遗骸返还，在雾社事件纪念公园隆重下葬，一代抗日英雄得以魂归故里。墓的前方，有“雾社山胞抗日起义纪念碑”和莫那鲁道的雕像。



雾社事件纪念公园内的莫那鲁道烈士之墓

雾社事件余生纪念碑

位于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清流部落。据雾社起义领导人莫那鲁道的外曾孙莫那巴万先生介绍，雾社事件后，日本人强迫赛德克人搬迁到清流部落，随后又挑动亲日的族人来报复他们，是为第二次雾社事件。当时，住在这里的族人尚不足 300 人。雾社事件余生纪念碑十分低矮，它的高度只有 1 米多，号称“台湾最小的纪念碑”。

芦洲李宅古迹——李友邦将军纪念馆

位于新北市芦洲区，是抗日英雄李友邦的故居，现辟为李友邦将军纪念馆。李友邦肄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主张“救台湾必须先救祖国”[②]，全国抗战爆发后，发起组织成立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转战于浙闽一带，长期从事抗日复台活动，在台湾抗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芦洲李宅初建于 1857 年，后遭水患损毁，1893 年改建成为现在的三进四合院格局与样貌。2006 年，芦洲李宅以“芦洲李宅古迹——李友邦将军纪念馆”的名义对外开放。



芦洲李宅古迹——李友邦将军纪念馆

① 陈小冲：《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1 页。

② “国立国父纪念馆”：《台湾先贤系列：李友邦鹣鲽侠侣》，2007 年版，第 21 页。

国民革命忠烈祠

位于台北市中山区圆山，修建于 1969 年。迎面是由三个拱门组成的大牌坊，中间是“忠烈祠”三个镏金大字，两侧匾额分别题有“取义”、“成仁”。牌坊背面，中间是“万古流芳”，两侧分别题有“忠义”、“千秋”。正殿外观仿北京故宫太和殿，殿内正中供奉着“国民革命烈士之灵位”，旁边则是“中华民族远祖黄帝之灵位”和孙中山先生像，两侧偏殿都悬挂“烈士祠”匾额，东侧为“文烈士”，西侧为“武烈士”。国民革命忠烈祠内奉祀着不同时期阵亡的官兵共计 39 万余人。其中，除所谓“剿匪”、“戡乱”等时期阵亡者外，其他诸如开国、讨袁、护法、东征、北伐、抗战等时期的阵亡官兵，许多是海峡两岸共同尊崇的，台湾抗日烈士姜绍祖、简大狮、罗福星、余清芳、赖和、莫那鲁道、邹洪等即包括在内。

中山堂

原名“台北公会堂”，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延平南路，1936 年建成。1945 年 10 月 25 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此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主官陈仪发表广播讲话称：“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向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① 遭受日本殖民统治达 50 年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不久，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将“台北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中山堂是台湾光复的历史见证。



中山堂

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

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延平南路，中山堂对面，2011 年 10 月 25 日落成。碑文盛赞“抗战表现出中华民族坚苦卓绝、抵御外侮的伟大精神”。② 纪念碑与中山堂之间的广场目前是台湾地区纪念抗战的重要活动场所。

“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③ 台湾同胞长达半个世纪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活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让我们一起缅怀为民族解放付出巨大牺牲的先辈和英烈们，继承他们的爱国主义传统，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作者程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　历史学博士）

① 何应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71 辑，文海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147 页。

② “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碑文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碑文》，载《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会讯》2011 年第 7 期，第 7 页。

③ 《历史无法重来　未来可以开创　万众一心　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4 日第 1 版。

附：台湾重要抗日遗址和纪念设施一览表（据不完全统计）

抗日遗址和纪念设施名称	所在地
承恩门(北门)	台北市中正区
丽正门(南门)	台北市中正区
重熙门(小南门)	台北市中正区
景福门(东门)	台北市中正区
西门红楼	台北市中正区
台湾巡抚衙门旧址	台北市中正区
台湾布政使司衙门旧址	台北市中正区
逸仙公园	台北市中正区
中山堂	台北市中正区
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	台北市中正区
“国军”历史文物馆	台北市中正区
台北宾馆	台北市中正区
台北监狱围墙遗迹	台北市中正区
齐东街日式宿舍	台北市中正区
“国父纪念馆”	台北市信义区
“国民革命忠烈祠”	台北市中山区
日本台北“北警察署”旧址	台北市大同区
少帅禅院	台北市北投区
日军卫戍医院北投分院旧址	台北市北投区
盐寮抗日纪念碑	新北市贡寮区
芦洲李宅古迹——李友邦将军纪念馆	新北市芦洲区
三角涌抗日义民营旧址	新北市三峡区
三峡灵应六人公庙	新北市三峡区
三角涌街市	新北市三峡区
瑞三煤矿公司	新北市瑞芳区
怀德亭	新北市瑞芳区
基隆港	基隆市中正区
狮球岭炮台	基隆市仁爱区
宜兰旧监狱门厅	宜兰县宜兰市
宜兰旧监狱岗哨	宜兰县宜兰市
中山公园	宜兰县宜兰市
龙潭	桃园市龙潭区
日本警察宿舍旧址	桃园市大溪区
大溪公会堂	桃园市大溪区
大溪武德殿	桃园市大溪区
北埔姜家天水堂	新竹县北埔乡
北埔姜家金广福公馆	新竹县北埔乡
姜绍祖墓	新竹县北埔乡
深坜山秀农场日军刑场旧址	新竹县北埔乡

续表

抗日遗址和纪念设施名称	所在地
深坜山秀农场日军拘留所旧址	新竹县北埔乡
杨统领庙	苗栗县头份镇
徐骧纪念公园	苗栗县头份镇
罗福星烈士纪念馆	苗栗县大湖乡
昭忠祠	苗栗县大湖乡
雾峰林宅	台中市雾峰区
莱园	台中市雾峰区
林献堂文物馆	台中市雾峰区
栎社二十年题名碑	台中市雾峰区
先贤丘沧海先生誓师抗日碑	台中市北屯区
丘逢甲进士碑	台中市北屯区
邱先甲墓	台中市西屯区
日本“鹿港‘国语’传习所”旧址(彰化孔庙)	彰化县彰化市
八卦山抗日烈士纪念碑公园	彰化县彰化市
乙未保台和平纪念公园	彰化县彰化市
1895抗日保台史迹馆	彰化县彰化市
马赫坡古战场	南投县仁爱乡
雾社事件纪念公园	南投县仁爱乡
清流部落	南投县仁爱乡
雾社事件纪念馆	南投县仁爱乡
雾社事件余生纪念碑	南投县仁爱乡
嘉义市狱政博物馆(嘉义旧监狱)	嘉义市东区
日军台湾步兵第二联队营舍旧址	台南市东区
亿载金城	台南市安平区
“噍吧哖事件”纪念公园	台南市玉井区
抗日烈士余清芳纪念碑	台南市玉井区
玉井忠烈庙	台南市玉井区
凤山县旧城	高雄市左营区
恒春(琅峤)古城	屏东县恒春镇
石门古战场旧址	屏东县牡丹乡
步月楼之役旧址(萧家古厝)	屏东县佳冬乡
将军府	花莲县花莲市
新城日军刑场旧址	花莲县新城乡
“七脚川事件”纪念碑	花莲县吉安乡
昭和八年吊魂碑	花莲县秀林乡
太鲁阁文天祥公园(由日本佐久间神社改建)	花莲县秀林乡
西屿西台	澎湖县西屿乡
西屿东台	澎湖县西屿乡

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史，应跨越哪些误区？

步　平

编者按：“第五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1月27日—30日在台北成功举办，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先生本是此次研讨会大陆代表团的团长，但由于身体原因未能成行，现摘录其书面发言，以飨读者。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两岸抗战史研讨会第五届会议在台北召开，是特别有意义的大事。海峡两岸学者济济一堂，共同研究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划时代意义的、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产生了巨大冲击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角度，直接影响了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促进中国的发展与统一的重要动作之一。尤其是在最近的两岸领导人会面中，习近平先生提议就“抗日战争胜利”开展共同研究，马英九先生也积极响应，称“这是开放的态度”，这就更加凸显了我们的会议的意义。在此，谨向以邵主任为首的会议筹备工作表示极大的谢意，同时预祝会议成功。

遗憾的是，最近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得不入院检查治疗，虽然已经办理好赴台手续，但还是得遵医嘱不能前往了。缺席如此重要的会议，特别是不能亲自聆听抗战老前辈郝柏村讲述抗战经历，让我深感遗憾，也深深地自责。在此，首先向郝柏村为代表的前辈表达我由衷的敬意，感谢您们以巨大的奉献和牺牲换来的胜利，同时也向诸位表达我的诚挚的歉意。

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我们的民族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考验，但使我们的民族得到了凤凰涅槃式的重生。近代以来，追求民族的复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愿，但面临十分艰巨的困难。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前人为中华民族复兴进行的努力。但坎坷的历史也告诉了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那就是：处于分裂、战乱状态，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中国则只能遭受战争的苦难；一盘散沙的社会，不可能在与侵略者的殊死战斗中取得成功；只有我们的自觉和觉醒，才能让侵略者面对的不再是软弱犹豫的对手，而是强大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中华民族。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复兴中国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集中显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蓬勃伟力。正是基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抗日战争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总体的胜利，共同的胜利，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根本动力和成功的原因。

经历了抗战的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感到和平的意义，民族团结的意义，社会发展的意义。我的亲人中有许多人是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义愤和自身的感受参加了抗战的，虽然他们加入了不同党派的部队，但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我访问过台湾的眷村，也曾见到过许多抗战老战士，每次与他们谈话，我总是充满了感动和敬佩的心情。

尽管在抗战胜利后，我们仍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是对和平、团结与发展的追求，已经越来越成为海峡两岸民众的共识。我们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史的会议肇始于 10 年前，正是两岸民众心心相印、血浓于水的反映。

此次会议的主题确定为“抗日战争研究的新史料与新视野”，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的确抓住了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史的核心问题。

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自 1949 年以来，海峡两岸一度不能站在同一立场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不能利用对方的丰富的文献资料，不能了解对方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特别是不能接受不同的研究范式。我还记得 1999 年，两岸的学者是在日本学者卫藤沈吉和山田辰雄的努力下，在日本的东京一起参加了军事史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与陈鹏仁先生、刘维开先生和现在已经过世的刘凤翰先生见面。虽然我们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但是那时大陆学者的飞机在成田机场着陆，台湾学者的飞机则在羽田机场着陆，人为地扩大了两岸的距离。今天，两岸实现了直飞，学者的交往无比地密切，两岸学术界在资料的交流、交换及共同使用方面做了许多努力，我们的共同研究会议也已经经历了 10 年，这是多么大的变化。今天，两岸领导人也实现了直接见面，更促使我们把共同研究的步伐迈得更大、更快，更符合两岸民众的愿望。

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意义自不待言。作为真正的历史学者，绝不应当提出没有史料根据的结论，也更不应当把学术问题作为政治问题，以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而应当将学术问题纳入规范的学术研究的范畴。当然，学术问题不要“政治化”，并不等于学术问题与政治没有关系。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是对学者的考验。

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来说，台湾所保存的史料的确是巨大的宝库。这些年来，大陆学者欣喜地看到，台湾的“国史馆”、“党史会”以及我们的兄弟单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许多单位在开放档案资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所以，每年有大量来自大陆的学者前往台湾搜集资料，许多地方出现大陆利用者多于台湾利用者的现象。这样的频繁往来，肯定会对两岸共同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大陆这些年来的档案开放和出版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关心抗战史研究的学者对此也是有目共睹的。坦率地说，比起台湾的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大陆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与大陆地域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有关，大陆学者也提出了许多更多开放档案资料的意见与建议。最近制定的深入开展抗日战争的中长期规划中，大陆把资料的整理、数字化和对外开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相信会对两岸的共同深入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抗战史研究的新视野，本来是应当在会议上向诸位报告的内容，在此，我想简单地向诸位提一些要点，待有机会详细报告。

记得在 2010 年，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之际，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所长在致辞时提到：大陆方面的学者已经同日本学者进行了共同历史研究，我们两岸是不是也能够进行共同研究呢？我当时的回答就是：完全应当，而且完全可以。为什么这样说，我觉得两岸学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接触之际，就已经发现在抗战史的研究方面，我们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我第一次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学术报告，介绍抗战时期日军在中国的化学战。报告结束时，张玉法先生在总结时明确地说：步先生的观点，台湾学术界可以说是完全同意。当然，不可否认，两岸在一些问题的判断上仍存在分歧，但是我们的分歧是否如中日之间那样的尖锐和难以弥合？

其实，在中日两国共同研究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听到许多的不同的意见，我自己也收到许多来信。那里面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支持中方代表团与日方斗争到底，一是认为与日本人坐在一起谈论就是绝大的错误。

我认为，上述两种认识最大的误区在于没有厘清历史问题其实是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面上，那就是政治层面、感情层面和学术层面。我们作为学者，面对的是对方的学者，而不是政治家，特别不是右翼的政治家。尽管学者也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我们之间的对话遵循的是学术规范，

是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不是政治口号。所以，我们不应重复政府发言人的讲话。学者的共同研究主要的障碍可能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史料利用的不均衡，二是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即史料的共享已经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现在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今后更不会产生障碍。但观察视角的不同，则是影响研究结果的主要问题。但是，我始终认为观察视角的不同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每个人对历史问题的观察视角都是独特的，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区域、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让自己治下的所有人保持完全同一的观察视角，而不同的观察视角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才是重要的。只有将不同视角的观察进行对比、分析和综合，才能够像“盲人摸象”那样对你的观察对象有相对完整、全面的，接近客观准确的理解。所以，我认为学者在这一方面的最大的任务不仅是自己把观点表达清楚，而且需要了解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对不同的认识进行分析鉴别，从而得出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的观点。在学术研究领域，即使是对于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认识，也应当倾听和尊重。逐渐披露的历史史料和冷静科学的态度，一定会逐渐缩短不同认识的差距。对于不同国家来说，应当首先追求的不是“同一的历史认识”，而是历史认识能否跨越国境。那么，对于海峡两岸来说，是不是也需要学者具有“跨越”的意识呢？

我们的学术会议已经到了第五届，五届会议的宗旨已经证明：“只要诚实面对历史，就能拉近两岸人民的距离，打造共同的历史记忆”。在两岸领导人刚刚实现历史性见面的今天，相信我们的会议定能在两岸学术界交流中做出表率。无论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的风波，两岸抗战史学术界的交往将永远坚持下去，并将开出更加灿烂的果实。

最后，再次预祝我们的会议成功，取得更大的成就。两年后，我们在北京等待大家。

（作者步平，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

第五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都　斌　李　鑫

今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11月27—30日，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五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在台北成功举办。

此次研讨会以“抗战史研究的新史料与新视野”为主题，旨在交流两岸研究新成果、展示抗战史新史料，加强两岸学界交流，打造共同的历史记忆。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罗存康率领的中国大陆代表团21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第五届海峡两岸抗战史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历久弥新

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是在两岸老一辈抗战史学家共同呼吁和积极推动下促成的，自2007年首次在北京举办以来，到目前为止成功举办了五届，已成为两岸抗战史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会议平台，其中，第一、二届在北京举办，第三届在台北举办，第四届在南京举办。此次第五届研讨会在台北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会议两岸轮办交流的机制已经更加趋于成熟和稳定。第五届海峡两岸抗战史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召开，是2013年在南京举办第四届研讨会时双方确定下来的。

今年以来，经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三方前期的积极准备，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纪念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吉林省社科院、黑龙江省社科院的21位抗战史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台湾方面出席会议的学者代表有来自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台北“国史馆”、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成功大学、政治大学、辅仁大学等多家单位的30余位学者以及在读历史专业博士生、硕士生。本次研讨会收录并在会上研讨交流的学术论文共计25篇，是两岸抗战史研究最新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对中国人民团结抗战历史的共同缅怀和对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的殷切期盼。

研讨会开幕式由中正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邵铭煌先生主持，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林丰正在开幕式上做了发言：海峡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面之后，两岸学者共同举行此次研讨会，意义十分深远。研讨会的论文里既有大陆学者查阅台湾档案写成的论文，也有台湾学者参考大陆档案完成的研究，是共享史料的一个具体实践，相信两岸抗战史研究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抗战老兵郝柏村应中正文教基金会邀请出席了研讨会，并以“八年抗战大战略问题”为题，结合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做了专题演讲。中正文教基金会副董事长陈鹏仁、董事蒋方智怡，台湾“国史馆”馆长吕芳上等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因病未能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罗存康代为宣读

了步平会长的致辞：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今天，我们两岸抗战史研讨会第五届会议在台北召开，是特别有意义的大事。海峡两岸学者济济一堂，共同研究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划时代意义的、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抗日战争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术意义，直接影响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对促进中国的发展与统一有重要意义。我们的学术会议已经到了第五届，五届会议的宗旨已经证明“只要诚实面对历史，就能拉近两岸人民的距离，打造共同的历史记忆”。在两岸领导人刚刚实现历史性见面的今天，相信我们的会议定能在两岸学术界交流中做出表率。无论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的风波，两岸抗战史学术界的交往将永远坚持下去，并将开出更加灿烂的果实。

罗存康副馆长还向与会的两岸学者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最新筹备展出的《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览以及最新建成的《台湾同胞抗日史实展》展厅的基本情况，回顾了两岸抗战史研究的历史脉络，展望了两岸抗战史研究交流的前景，并热情邀请台湾学者到抗战馆参观。

二、两岸学者百家争鸣、求同存异

1. 对于七七事变的问题研究

1937 年 7 月 7 日在卢沟桥爆发的七七事变，是中日战争一个重要的节点。大陆学者一般认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已经开始局部的抗日战争，而七七事变是日军开启全面侵华战争的关节点，也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起点。台湾学者则认为“七七事变”是抗战的真正起点，因此始终坚持八年抗日战争的观点。无论秉持何种观点，两岸学者对于“七七事变”这个重要的事件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学通研究员的《和呼？战呼？——卢沟桥事件中蒋介石决策过程研究》一文在对《蒋介石日记》《“总统府”机要档案，〈革命文献〉第 106 辑〈卢沟桥事变史料〉》等重新史料梳理的基础上，从中日战争决策的角度对卢沟桥事变的发展过程以及当前学界对蒋事变前后抗战的决策进行了分析和考察。作者认为：一直以来，大陆学术界多指责和批判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发生前始终采取的是“妥协”政策，七七事变后便毅然下定“抗战到底”的决心。事实上，事件发生之后，蒋并非‘立即下了抗战的决心’，其抗战决策也经历了一个从和与战之间摇摆到丢弃幻想的过程。

对于学界普遍认同的蒋介石“不求战而应战”基本方针，作者也给予了新的解读：应战不等于抗战，应战比不抵抗进了一步。应战是被动的，敌进一步我应一步，敌不进则我不攻。应战的最后结果仍可能是局部解决。抗战则是主动的，有攻有守，宜攻则攻宜守则守。在蒋介石从妥协到应战再到抗战的转变过程，日本亡华行动的加剧、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以及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日双方关于七七事变谁开了“第一枪”，七七事变是否是“偶然事件”的争论由来已久。因此，七七事变问题也成为了中日共同历史问题研究的专题之一。作为直接参与中日共同历史问题研究的中方学者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教授，长期致力于七七事变真相的研究和考察。此次研讨会徐勇教授的《卢沟桥事件中的日军谋略再考》一文认为：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作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关键环节，史实俱在性质清楚，七七事变并非“偶然事件”，“第一枪”是日军图谋全面开启侵华战争的一个战略性、全局性的阴谋。但在日军战时宣传作用之下、其事件发动原因及其目标与行动，竟然在很大范围内被掩盖起来，以至于事变至今 78 年过去，“偶发论”是为日本的主流认识，一些右翼学者还坚持说是中国军队打出了“第一枪”。从事变的相关史料来看，尽管 1945 年日本在战败投降前后大批焚毁机密文件，其直接的战争筹划与战略决策文件，相当一批已经永远消失了，值得庆幸的是现今的日军当事人回忆，旧日军战斗详

报，部队史、旧报刊战时报道等，数量相当惊人，已经足够进一步厘清事件的全貌。因此，卢沟桥事变的研究与中日对话并未结束，需要从史料、特别是日方史料的发掘及其整理与研判等方向努力，澄清“第一枪”诸借口与日军谋略真相。

2. 关于敌后战场和国共合作的问题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前，大陆多数学者在强调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敌后战场的主力军的同时，对国民党军队开展的敌后游击作战关注不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海峡两岸史学界才开始关注当民党军队的抗日游击战和敌后战场问题。即便是双方都承认了彼此在敌后作战的史实，但往往相互指责“摩擦”要多于团结。

上海师范大学的洪小夏教授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敌后战场衰落原因探析》一文，针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战场衰落的原因进行了整体考察。洪小夏教授首先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敌后游击作战的史实给予了肯定，“国民党敌后战场，曾地域广大，部队众多……战场环境艰苦，牺牲惨重”，但效果却不够理想。作者认为：台湾军政界和学术界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军的敌后部队，主要是被共产党消灭的；因为共产党在敌后，“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造成敌后国军的“致命伤”。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洪小夏教授通过列举大量统计数据，分析得出国民党在敌后战场为什么会走下坡路，主要有日军打击、与中共摩擦、内部不和、游击队素质低下被军委会编并撤销四个原因造成的。其中，受到日军打击是国军敌后战场失败的主要外因，而被军委会编并撤销是国民党敌后游击队锐减的主要内因。洪小夏教授的观点并非大陆学者的共识，事实上，关于敌后战场的界定，关于抗战路线与游击战开展的关系方面，仍存在不同见解。

“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在以往关于国共合作抗战的研究中，两岸学者由于政治立场之不同，大陆学者指责国民党军“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国民党则斥八路军为“游而不击，保存实力”。事实上，抗战时期在军事上，国共两党两军尽管政见不同，在国内政治地位、利益有所不同，并发生多次摩擦、龃龉与斗争，但国共两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相互配合支援作战始终是主流，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居之芬研究员撰文——《从华北看国共合作抗战》，从中共八路军在华北敌后与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抗战事实出发，对不同战略阶段的不同合作方式、双方牵制抗击日军比例、双方在抗战中的改革及实力与民心的消长等方面的论述，指出两个战场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是中国抗战能坚持八年，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

一般认为，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其主要的作战责任为开展敌后游击、牵制日军，从而起到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李蓉研究员的《国民政府军对八路军百团大战的配合》一文则从国民党军队配合八路军展开百团大战的角度对百团大战进行了考察：在八路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百团大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对于国民政府军的积极参与和抗日举措，八路军将士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密切合作的历史。正是因为有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才有了重要的保证。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庭华老师的《国共合作与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协同配合》认为：虽然两个战场的配合并未尽如人意，但两个战场都功不可没，两个战场军民高度发挥爱国主义精神，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下，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同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3. 关于日军暴行的问题研究

侵华日军暴行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在发动的 14 年侵华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犯下了众多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学术界在南京大屠杀、“慰安妇”、

细菌战、化学战、战时劳工、重庆大轰炸、“三光”作战等日军暴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以往学者在研究日军暴行问题时所暴露出的研究视角单一、方法传统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历史图片以其客观性、直观性和现场感，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因化学战是国际公约禁止的战争手段，日本在一战后开始研制化学毒剂，二战期间实施化学战都采取里一系列保密措施，掩盖侵华战争中化学战的真相，甚至延续到战后很长时间。而挖掘历史图片资料，对于揭开日军化学战的真面目，揭露其掩盖化学战的罪行，追究日军化学战责任能够起到重要作用。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高晓燕将整理研究侵华日军化学战图片的收获撰写了《历史图片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真相》一文，展示了一张“1935 年日本昭和天皇视察了位于东京新宿大久保的陆军科学研究所，研究所所长久村种树在前面作先导”的照片，说明战前日本天皇就支持化学武器研制，是推动军队积极准备化学战的最好证明。再如“昭和 13 年日本地图消失的大久野岛”照片，可证明战时日本是明知违背国际公约，又怕被世人知道其罪行，通过修改地图来掩人耳目。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专家学者，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和查阅文献史料，查证了很多当年日军在南京建立慰安所的遗址，也找到了一些当年在南京遭受日军迫害的日军“慰安妇”幸存者，这些都揭示了日军在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的铁的事实。因为南京战时的特殊地位，日军在南京驻军很多，因此，在南京建立的慰安所也较多，南京也就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实施较为完善的地区之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和馆员刘广建的《慰安所旧址保护利用与历史记忆当代重构——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的保护和利用为例》一文，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为例，一方面揭示日军建立并实施“慰安妇”制度，迫害各国女性及其违反人性的罪行；另一方面，通过介绍利济巷慰安所旧址保护与利用的曲折经历，重构历史记忆，使人们对日军在二战中推行“慰安妇”制度这一侵犯女权、违背人道的野蛮罪行有更清醒的认识，从而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历史的言论。在谈到对利济巷慰安所进行保护和利用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时，引朱成山馆长所言：“藉此教育生者，警示今人和后人，勿忘民族曾经的苦难，勿忘苦难中逝去的生命，勿忘所有英勇献身的英烈和为之做出贡献的人们，勿忘和平曾经的创伤。”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广泛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细菌战是日本军国主义一项重要的军事战略，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一项国家犯罪。1932 年至 1939 年，日军在中国构建完成了细菌部队体系，并利用中国活人进行人体试验，制造细菌武器。1939 年至 1945 年采用地面投放和飞机投撒等方式在中国各地长期地、经常性地、大规模地实施细菌战，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周进老师的《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阶段特点与作用评析》一文运用大量战时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史料表明，它并不是苏联《伯力审判材料》所给人的“还主要处在准备阶段”的假象，而是在中国建立和运转细菌战机器长达 13 年，在中国各地长期地、经常性地、大规模地实施细菌战，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作者还指出：日军细菌战造成中国人民的死亡人数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日军细菌战的危害，不仅是死亡人数的问题，对于各受害区域的社会经济、社会环境、社会心理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带来巨大的破坏和长期负面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的。

4. 关于战时、战后中国东北的问题研究

在研讨会第六轮的讨论中，有三篇涉及东北问题的论文，他们分别是哈尔滨师范大学李淑娟教授的《满铁铁路自警村移民初探》、吉林省社科院李倩研究员的《东北抗联精神的历史形成、科学内涵及其时代价值》以及台湾“国史馆”协修高纯淑研究员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收复东北之筹划》。

李淑娟、李倩两位同为东北籍的历史学者，对东北民众遭受的压迫和抗争也感触较深。李淑娟

教授在满铁铁路的研究中认为，满铁作为代表日本国家意志和代行政府职能的“国策会社”，充当了日本移民东北的尖兵，在铁路沿线设置的 23 个铁路自警村，肩负着“警备铁路”和“产业开发”等国策使命。此外，铁路自警村移民最突出的特点是其移民的军事性质，其成员全部是从在满陆军部队退伍兵中选拔的，不仅享受优厚的警备津贴，还配备警备服装和枪支，采取了“寓兵于农”的侵略政策。铁路自警村移民作为日本移民的先锋，保障了作为日本“国防线”和“生命线”的铁路畅通无阻，发挥了东北“经济开发”的大动脉国有铁路的重责和巩固满铁社会基础的反动作用，起到了维护铁路沿线治安和镇压东北抗日活动的反动作用。

李倩教授通过回顾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抗争历程，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处在与关内隔绝状态的东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历时 14 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挑战生存极限，与敌人作战万余次，付出了巨大牺牲，取得毙伤日军 18 万余人的战果、牵制日军 70 万人的奇迹，并最终与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顽强奋斗，英勇不屈，毅然决然地献出宝贵而年轻的生命，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壮丽的爱国主义诗篇。

台湾学者高纯淑研究员对战后国民政府收复东北的筹备计划与实施进行了考察，在大量运用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国民政府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特种档案》以及蒋中正、王世杰、熊式辉等相关人士的日记等史料的基础上，重新回顾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筹划过程，对东北省区调整与接收人选的选定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5. 关于战争审判和战后问题研究

关于抗日战争的遗留问题，著名抗战史研究学者荣维木先生曾撰文指出：战争性质所属和战争责任追究至今未能解决，这是战争遗留问题由来的源头。具体地说，由中日战争而产生的至今尚未得到解决的一切问题，都属于战争遗留问题的范畴。这些问题既是现实问题，又有历史的延续性。

东京审判作为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参与国家最多、开庭时间最长、留下的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国际审判，同时也是争议最为激烈的一次世纪审判，为史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目前关于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和公正性问题日本一些政界人士纷纷提出质疑，翻案之风喧嚣尘上。一般认为，对于抗日战争性质的评判，1951 年日本政府与美国等国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之第 11 条所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同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这表明，关于战争的性质所属问题当初已经得到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翻案之风，时到今日不仅仍存在，并且愈演愈烈。

上海交通大学程兆奇教授的《东京审判论争的由来和检讨》一文从法理学角度，通过梳理大量东京审判庭审档案和日本学术著作，细致对比回顾了审判过程，指出：有关东京审判的争议，并非仅仅是近些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处心积虑为军国主义翻案的结果，而是在东京审判之初，这些争论就已经在东京法庭检、辩双方的争论出现了。程兆奇教授认为，东京审判开庭前，日本辩护团就提出二点“动议”，一是庭长韦伯等所有法官“回避”的问题，二是所谓“管辖权”的问题。东京审判之所以旷日持久正是因为法庭进入庭审之后，检方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和所有被告的罪责都受到了辩方的反驳。当时东京审判的争议之所以没有从法庭蔓延到全社会，是因为战后日本希望全力在天皇制度问题上谋求突破，因而无暇顾及其他问题。此外，关于东京审判的“正义性”问题，作者指出：中国因素是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要源泉。因为只有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日本侵略的受害国，其余审判国，或是西方和日本左翼称之为的“殖民地宗主国”，或是尚未独立的殖民地。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有了中国的参与，东京审判才有了充足的正义性。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刘萍研究员的《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设立与战后审判——以对日审判为中心》一文运用了台湾“国史馆”的珍贵档案资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设置背景、运作、作用以及战后对日审判的问题进行了考察。刘萍研究员将联合国战

争罪行委员会的作用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奠定了惩治战争罪犯的思想基础；二是确立了惩处战争罪犯的基本原则；三是指导战争受害国对战争损失的调查和取证，为战后审判奠定了法律基础。

作者还特别指出：委员会从酝酿到成立的过程，是国际社会对正义与和平共同呼吁的结果。从同盟国领袖发表的各种宣言，到委员会制定的各种原则，体现了一切违背战争法规及和平、人道原则的战争罪行必须惩治的理念。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战后对战犯进行合法的审判。东京审判绝不是所谓的“胜者的审判”，而是国际社会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法律观念而采取的行动。虽然因国际法的滞后、军事法庭的局限，导致审判程序中存在一些问题，但其审判本身的正义性不容置疑。

近年来，中日因钓鱼岛问题争端频仍。此争端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及战略布局，而且也牵动了东亚，乃至世界的神经。战后美国对东亚战略资源的投递与汲取，对东亚整个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东亚政策，尤以对日政策为核心，而对日政策中，又尤以对琉球政策为焦点。南京大学张生教授通过《美国战后琉球战略演变与中日钓鱼岛问题》一文将当前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问题置于战后美国全面的琉球战略演变视野中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作者认为：从战时到战后，美国的琉球政策虽然具有继承性，但并不是呈现出单纯的线性表象，而是凸显出动态的阶段性特征。战时的美国琉球政策，更多的是从如何打败日本的军事角度进行考量，并没有形成独控琉球的整体战略。首先，战时美国对琉球群岛的地理调查及主权归属讨论，由于资料来源基本上来自日本，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美国政府内部形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对以后的美国琉球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在美国的琉球政策制定中，除了有对自身战略的考虑，对苏联的防范之外，日本的因素也不可低估。再次，中日钓鱼岛问题，虽然表面上是中日之间的领土主权之争，但内里却充斥着大国间利益博弈。最后，战后美国对琉球的处理，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为主导，或是美日在秘密“协议”中进行。实际上，美国此举是对盟国战后秩序安排的无视，是对《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盟国处理战后问题协议的践踏，可以说于理有亏，于法无据。

6. 关于抗战影像资料的问题研究

历史影像是一种提供历史阅览者了解历史更为直观的渠道，也是向研究者提供除了文字史料外，另一种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若将历史影像作为历史史料学来看，无疑是近年来才刚起步的研究，过去的历史研究者，或许是因为相关科技技术不发达的缘故，将影像素材视为是辅助性的历史呈现，以文字为主，偶而以图像点缀。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档案的重视开放程度，今后势必成为一个热点。在研讨会最后一场的讨论中就有两篇关于抗战影像资料研究的杰作。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副教授邵铭煌的《〈苦干〉纪实片的摄制与经典影像解析》是一篇结合历史映像资料，深入解析抗战人文历史的杰作。文章主要介绍了作者在研究赛珍珠相关历史时，无意间发现美国人史考特从 1937 年到 1940 年历时四年在中国拍摄的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一部彩色纪录片——《苦干》。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该片是抗战时期由美国人拍摄宣传中国抗战的唯一一部彩色电影。邵铭煌教授首先介绍了纪录片创作和拍摄的过程，详细梳理了爱国美籍女华侨李灵爱与美国传奇摄影记者史考特共同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作者认为史考特在影片中向人们传达了中国“不会被征服的秘密”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国抗战是一场人民战争，举国上下皆兵；二是中国军队和人民埋头苦干、吃苦耐劳的精神；三是抗战时期沿海大部分各种工业设施靠航运和人力得以搬迁至大后方保留。《苦干》一片另一处值得称奇的是著名作家林语堂参与到了纪录片的剪排，并专门为纪录片题写了开展序言和片名。

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生杨善尧的《〈生活〉杂志记录下的抗战影像中国》一文，紧紧围绕抗战时期在美国深受大众喜爱的、以影像为主的《生活》杂志。抗战时期《生活》杂志通过大量的图片向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传递着中国抗战的实时信息，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的主要信息来

源。据作者统计，从 1936 年底至 1945 年 9 月，《生活》杂志共出版发行 467 期，其中关于中国的报道、影像资料、产品广告、漫画多达 124 次，在关注度上，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在探究《生活》之所以热衷于关注中国的原因中，杨善尧博士对《生活》的老板美国人亨利 · 鲁斯的生活经历进行了考察，认为从小在中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的人生经历，让他对中国的真实状况有更多了解，对惨遭日军蹂躏的中国更多一份同情之心。从关注的角度而言，首先是蒋介石及其家属，其次是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等日军的种种暴行。此外《生活》杂志还对抗战大后方百姓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作者在深入分析了《生活》杂志对战时中国的报道后，指出："虽然影像的内容是中国题材，但反映的完全是西方人的趣味。西方摄影师在选择拍摄对象和构图时，无意中也会受游记和图画的影响。而且从主观上来说，为了使外销欧洲的照片更加畅销，他们会刻意在选材时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的视觉幻想。在亨利 · 鲁斯主导下的《生活》杂志，所要带给西方阅读者对于战时中国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就是"苦难下的动乱中国"以及"中国需要援助"这两种形象。以相对的概念来说，这两种形象当然是属于比较负面的。"尽管如此，作者在最后依然指出：《生活》杂志虽然这是一份带有西方观点的刊物，其文字与影像的取材亦有其相关主观的概念，但至少藉由丰富多元的"影像画面"的呈现方式，可以让西方世界认识到当时中国的面貌，在宣传层面而言，绝对是一件正面之事。

7. 其他研究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桶法的《抗战时期的捐献运动档案：以档案管理局为中心分析》一文对当前学界关于抗战时期民众的捐献运动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认为学界研究成果分为三大类，一是地区的捐献运动，如广东、成都、上海、新疆、武汉等地捐献情况；二是献机运动；三是劳军等爱国运动；尽管成果丰硕，但是使用的资料除各地的抗战史史料、《航空杂志》《航空学校月刊》《交通公报》《申报》等，有些参考个人的回忆录或报纸的报导，并未运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和台湾地区的史料汇编，仅使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未使用典藏于台湾"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台湾档管局等相关献机运动与捐献的档案，因此有些论证极为片面，有关中央的决策及各省的摊派原则及论述着墨不多。由此，该文对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典藏的相关史料进行介绍和分析。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典藏的捐献方面档案约分为四大类：其一为献机运动；其二为捐献运动；其三为劳军运动；其四为其他民众爱国运动。均参考价值巨大。

华南师范大学左双文教授的《蒋介石与华南抗战》一文，以 1936 年，两广"六一事变"后，国民党中央重新控制广东，并将广东纳入准备和实现全国抗战的统一筹划之下为大背景，深入分析了蒋介石在广东指导军政抗战的成败得失。作者认为，值得肯定的方面有以下几点：其一，在整个对日长期抗战的战略布局上，蒋介石以西南为首选，对华南亦有一定程度的重视，这种处置，事实证明大体上还是适当的；其二，日军大举侵粤后，蒋介石的反应，不是仅仅着眼于华南战场，作为战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最高统帅，他一是盘算敌人的这一行动对武汉会战会造成何种影响，须作何种战略调整。二是考虑对整个中国战局的影响，盘算以日军进攻华南，是其"南进"的开始，威胁英、美、法利益为理由，说动西方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援华制日，推动整个战局向好的方向发展；其三，广州、武汉的失守，对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无疑造成了相当的打击，一些人悲观失望，一些人倾向议和，甚至公开降敌。在此情形之下，蒋介石能够保持抗战必胜的信念，不丧失信心，不接受议和，并多次提醒广东将领抵制汪伪的蛊惑和诱降，是值得肯定的；其四，在人事的安排与使用上，抗战军兴，蒋介石能捐弃前嫌，对两广大批对抗和反叛过他的将士予以任用以至重用，使之投效于对日民族战争的战场。

蒋介石对华南抗战的指导，也存在若干失误，其中主要有：1. 在战术的指导上，蒋介石失误较多，敌情判断失误，部队调配失误，具体指挥失误，日军进攻广州之役，即使中方有种种客观不

足，但如果指挥得当，发挥出色，部队奋勇效命，战况并不至于如此糟糕。2. 蒋关于“焦土抗战”的命令，本意是为防止中国守军撤退之后，日军可以利用现有资源。但在实际的操作上，存在的问题甚多，一是撤退时往往情形慌乱，执行仓促，连带破坏较大，一些歹徒、汉奸趁火打劫，制造混乱，以致日军还没到，人民就已经遭遇一次浩劫；二是这毕竟是在中国人生活的地区，即使在沦陷后，一些民用设施的破坏，将使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陷于双重的痛苦之中。3. 在人事的调配和使用上，蒋介石有时过于迁就现实。

台湾“国史馆”协修廖文硕的《太平洋战争前夕国民政府对日本南进战略的肆应：吴铁城南洋行再探》一文，主要运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中正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国民政府档案》《外交部档案》以及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国防档案》等相关资料，辅以时人忆述文章，以 1940 年春德国在欧洲大捷与日本加速南进为时代背景，阐述 1940 年吴铁城奉蒋介石委派，赴南洋展开为期五个月的考察情况及成果进行了考察。作者对吴铁城 1940 年前后推进南洋侨务工作的重要作用给予了积极肯定，认为吴铁城主张为扩大中国对国际战局与战后国际关系发展之影响力，提升国家地位，从国际视野出发，勉力推展南洋党务与侨务、敦睦邦交，亦可见其洞视与远见。

1940 年 6 月 12 日，日军占领宜昌，控制长江宜昌段航运，致使连接华中、华南抗战前线与抗战大后方的战略运输线阻断，由四川经长江运输下行的抗战物资在宜昌以上江段阻滞。中共宜宾市委党校周兵老师的《宜昌失守致长江航运阻断后的民力转运》一文，结合湖北宜昌、长阳、兴山县等地方志档案资料以及相关口述史资料，探讨了抗战时期宜昌失守后宜昌民众为保障抗战运输需要，在南津关以上的三峡连山地带开辟新运输路线，以民力肩挑背驮接力转运抗战物资、运送伤员支援前线的积极作用。作者认为，虽然日军攻陷了宜昌城至长江航运阻断，但是，宜昌的作战“枢轴”和交通枢纽的作用并未因被日军截断而丧失，宜昌人民激起众志成城的抗战决心，以民夫接力转运抗战物资，克服艰难困苦，将汽油、枪弹、医疗设备、药品、军工器材、粮秣、食盐等物资及时转运到第五、六、九战区前线，为保卫重庆和西南大后方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为中国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2—1943 年的河南旱灾，由于战时国民政府压制舆论、史料留存较少而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灾情较重、死亡数量众多、令人震动却又语焉不详的重大事件，在诸多民国史或抗战史的书写中甚至不被提及。南开大学教授江沛的《1942—1943 年河南国统区旱灾述论》一文在综合已有史料，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救灾过程、中外媒体的报道情况以及如何认识死亡人数等问题进行重新梳理。

三、研讨会总结与启示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两岸与会学者以大量历史档案为基础，围绕着七七事变、重大战役、东京审判、钓鱼岛问题、抗战文化、抗战史料挖掘、两岸史料合作开发利用等议题共进行了九场讨论，对众多抗战热点、难点、疑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交流，在相互沟通中扩大了共识，以“求同存异”的精神实现了“聚同化异”的良好效果。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两岸学者畅所欲言，气氛热烈。总结其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尊重史实、还原史实，用史实说话；二是史料的共享已成为共同努力的方向；三是两岸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研究。会后，两岸学者一致认为从第一届到第五届海峡两岸抗战史学术研讨会，两岸学者的交流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全民族抗战逐渐成为认识历史的共同视角，评价第五届研讨会是历届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

总之，近十年来，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两岸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两岸关系正逐步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一契机无疑给双方共同编辑抗战史料、进一步做出客观分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对于持续推动两岸和平、共同发展、振兴中华，必然起到推动

作用。

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是，由于资料来源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以至于意识形态的不同，目前，在大陆学者之间、台湾地区学者之间、两岸学者之间也并非观点一致。但是，正是因为如此，两岸学者都认为利用会议平台交流更值得珍贵。近十年来海峡两岸抗战史学术研讨会始终能够延续、不间断的召开，从北京到台北，从台北到南京，再回到台北，两岸学者从相互争执到相互理解，从积极对话到资源共享，都说明了在抗日战争这场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史实研究上，两岸学者希望走到一起，并尽快促成共同研究。“第六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预计将于 2017 年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0 周年之际在北京召开。

（作者都斌、李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

近十年出版的中文抗战著作评述

吴　涛　李　颖

内容提要：本文查阅收集了国家图书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馆藏近十年出版的中文抗战著作总计1711种，整理了其相关信息，包括题名、责任者、出版社、出版地、出版时间、主题词等。笔者借助信息管理专业和党史专业出身的优势互补，利用大数据分析和图表展示等方式，同时结合重点主题重点书目的具体研究，从抗战著作出版的整体状况、抗战著作的主题分布、代表性抗战著作分析三个方面，对近十年中文抗战著作的出版和研究状况作一综合评述。

关键词：抗日战争　抗战著作　出版状况　研究综述　数据分析

近十年来，有关抗日战争的研究不断推进。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至2014年共有1711种中文抗战著作出版。本文拟对这些著作出版的整体状况和主题分布等进行考察，同时对各类别著作加以综述分析，以期使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有所参考。

本文分析数据来自国家图书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馆藏丰富全面，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馆藏特色是大量地方党史著作和港台著作。两馆馆藏相互补充，基本上涵盖了近十年出版的中文抗战著作。笔者收集整理了这些著作的题名、责任者、出版社、出版地、出版时间、主题词等信息。除文中有特别说明处，全文数据分析均以此为基准。

一、抗战著作出版的整体状况

近十年来，中文抗战著作出版整体上呈现出版物数量多、出版社相对集中、出版地分布广泛、译著占有一定比例等特点。

（一）出版数量统计

从出版物数量看，近十年共有1711种抗战著作出版，平均每年171种。2005年是种类最多的年份，为585种，占全部著作的34.2%；2010年位居其次，为165种。这表明，抗战著作的出版与逢五逢十纪念的关键时间点紧密相关，尤其是逢十周年。除了2005年的特殊情况，其余年份出版数量基本一致，波动不大，说明近十年抗日战争研究进展比较平稳。

（二）出版社统计

从出版社看，近十年出版过抗战著作的出版社共计358家。排名前10名的依次是：中共党史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团结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它们出版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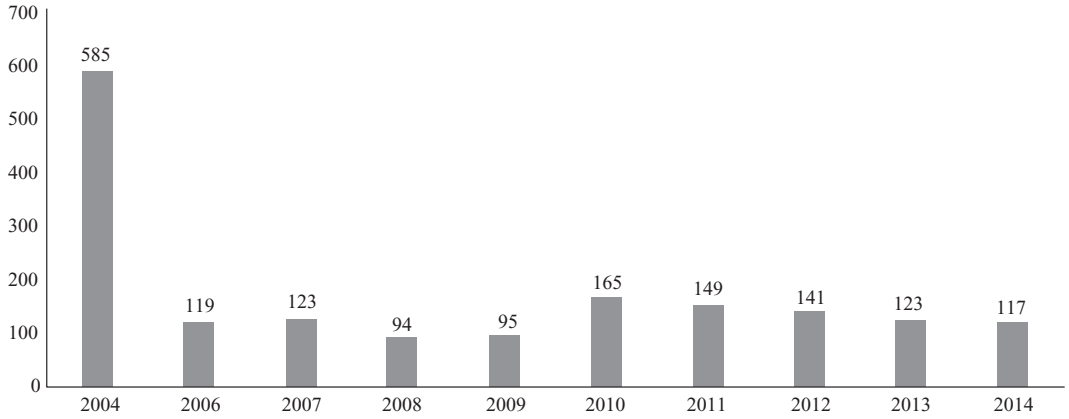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年份的出版物数量统计

战著作总计 578 种，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毋庸置疑是抗战著作出版的主力军。

出版抗战著作超过 10 种的出版社有 37 家，分为党政军机关直属出版社、各类人民出版社、研究机构主管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 4 类。具体而言，党政军机关直属出版社 14 家，各类人民出版社 14 家，研究机构主管出版社 5 家，其他出版社 4 家。这反映出抗战著作出版中，党政军机关直属出版社和各类人民出版社占据主要力量。

表 1　出版社统计①

序号	出版社	出版数量(种)	占总数比重
1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	11. 7%
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0	4. 1%
3	中央文献出版社	61	3. 6%
4	中国文史出版社	45	2. 6%
5	山西人民出版社	43	2. 5%
6	团结出版社	42	2. 5%
7	人民出版社	38	2. 2%
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8	1. 6%
9	解放军出版社	27	1. 6%
10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4	1. 4%
11	重庆出版社	23	1. 3%
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2	1. 3%
13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2	1. 3%
1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1	1. 2%
15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	1. 1%
16	陕西人民出版社	16	0. 9%
17	新华出版社	15	0. 9%
18	云南人民出版社	15	0. 9%
19	广西人民出版社	14	0. 8%
20	湖北人民出版社	14	0. 8%
2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4	0. 8%

① 本表统计了 2005—2014 年出版抗战著作数量多于 10 种的出版社。

续表

序号	出版社	出版数量(种)	占总数比重
22	人民日报出版社	14	0.8%
23	四川人民出版社	13	0.8%
24	河北教育出版社	13	0.8%
25	江苏人民出版社	13	0.8%
26	上海人民出版社	12	0.7%
27	南京出版社	12	0.7%
28	湖南人民出版社	11	0.6%
29	中华书局	11	0.6%
30	九州出版社	11	0.6%
31	白山出版社	11	0.6%
32	五洲传播出版社	11	0.6%
33	济南出版社	11	0.6%
34	武汉大学出版社	10	0.6%
35	云南民族出版社	10	0.6%
36	江西人民出版社	10	0.6%
37	山东画报出版社	10	0.6%

（三）出版地统计

从出版地看，近十年出版过抗战著作的城市共计66个（直辖市和地级行政单位），占全国334个地级以上行政单位的19.8%。抗战研究属于比较狭窄的专门史研究领域，相关著作在全国近1/5的地级以上城市出版，说明对抗日战争感兴趣的研究者分布相当广泛。其中，出版地位于港台的抗战著作共计63种，占总数比例为3.7%。

排名前20名的城市均属于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它们是各省和直辖市科研力量的汇聚地，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均具有重要地位，这些地区的学者，对在本地曾经发生的重要抗战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所有城市中，北京出版的抗战著作种类最多，占比高达36.6%。这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方面，北京拥有众多党政军机关和科研机构，抗日战争研究队伍庞大，研究成果丰富；另一方面，北京是全国的出版中心，出版社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为著作出版提供了便利。

表2　出版地统计①

序号	城市	出版数量(种)	占总数比重
1	北京	626	36.6%
2	太原	42	2.5%
3	昆明	41	2.4%
4	台北	39	2.3%
5	济南	36	2.1%
6	上海	33	1.9%
7	沈阳	31	1.8%
8	武汉	30	1.8%

① 本表统计了2005—2014年出版抗战著作数量排名前20名的城市。

续表

序号	城市	出版数量(种)	占总数比重
9	石家庄	27	1.6%
10	桂林	25	1.5%
11	哈尔滨	25	1.5%
12	西安	22	1.3%
13	成都	21	1.2%
14	长春	21	1.2%
15	南京	20	1.2%
16	重庆	18	1.1%
17	广州	17	1.0%
18	香港	16	0.9%
19	长沙	15	0.9%
20	合肥	15	0.9%

（四）译著统计

近十年出版的抗战著作中，包含一定量的译著，代表了境外的抗战研究成果。据统计，近十年的译著数量共 53 种，占所有抗战中文著作的比例为 3.1%。这 53 种著作的原作者国籍分别为日本（27 种）、美国（17 种）、英国（5 种）、加拿大（2 种）、荷兰（1 种）、原苏联（1 种）。日本和美国著作占据绝大多数，一方面说明这两国在抗战研究领域有较强实力，另一方面表明我国抗战研究学者与这两国的学术交流比较频繁。

表 3　境外抗战著作（译著）作者国籍分布

序号	作者国籍	数量	占总数比重
1	日本	27	50.9%
2	美国	17	32.1%
3	英国	5	9.4%
4	加拿大	2	3.8%
5	荷兰	1	1.9%
6	原苏联	1	1.9%
总计		53	100%

二、抗战著作的主题分布

主题词是用来描述著作主题的词语。每部著作都标明了主题词，对这些主题词进行统计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相关领域的主题分布与研究趋势。在对主题词进行分析过程中，笔者发现约有四分之一著作的原有主题词存在问题，需要进行处理。一方面，一些原有主题词意义模糊，难以反映出著作的具体内容。例如，萧一平主编《简论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5 年）原有的主题词为“抗日战争”和“中国”，这两个词涵义宽泛，并未反映其真正的主题——“中国共产党”，所以笔者将其主题词重新标注为“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另一方面，不少原有主题词语义重复，容易造成统计误差。例如，“文史资料”共出现 15 次，“文史资料汇编”出现 7 次，两者意义一致，分别统计降低了“文史资料”这一主题词的实际频次，所以笔者将“文史

资料汇编”重新标注为“文史资料”，最终“文史资料”这一主题词的频次上升为 22 次。经过处理后，1711 种抗战著作拥有主题词共计 642 种，总频次为 2297 次。

从总体概况、主题词在各个专题分布、年度主题词变化三个方面，对抗战著作的主题分布作一综合分析，可以看出，抗战著作整体上呈现多视角、全主题覆盖的特点。其中，有关抗战时期军政、地方抗战、日军罪行和抗战损失的研究最为热点，大部头档案资料、抗战纪实作品的整理出版不断向前推进。同时，各个主题内的专题性研究日益细微深入，新的专题不断出现，一些热门专题持续受到学者的关注，例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根据地、抗战文艺、日军罪行、抗损调查、中美关系、正面战场作战等。

（一）总体概况

为了对这些主题词有一个总体了解，笔者首先按照著作的主要内容，将全部著作划分为 11 个研究专题，即：“抗战总体研究”、“抗战史料”、“各地区各民族抗战”、“抗日根据地”、“抗战相关人物”、“抗战时期的军事政治”、“抗战时期的文化”、“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抗战时期的社会经济”、“日军侵华罪行与中国抗战损失”和“抗战纪实作品”。每个研究专题含有若干个主题词，每个主题词均出现若干次。一般来说，研究专题的主题词种类越多，说明该专题的研究越成熟，主题分布越广泛；主题词总频次越高，说明该专题越受研究者重视，著作数量越多。

表 4　主题词类别统计①

研究专题	主题词种类	主题词总频次
抗战时期的军事政治	46	321
抗战纪实作品	10	263
日军侵华罪行与中国抗战损失	19	254
各地区各民族抗战	54	249
抗战史料	14	224
抗日根据地	13	150
抗战总体研究	13	138
抗战相关人物	18	101
抗战时期的文化	15	100
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	8	51
抗战时期的社会经济	14	46
总计	224	1879

“抗战时期的军事政治”、“抗战纪实作品”、“日军侵华罪行与中国抗战损失”、“各地区各民族抗战”、“抗战史料”这五个专题的主题词频次均超过 200 次，明显高于其他主题。这表明近十年它们最受研究者关注，所以成果相对丰富。其中，“各地区各民族抗战”和“抗战时期的军事政治”的主题词种类分别为 54 个和 46 个，远多于其他主题，反映出这两个专题研究相对更成熟。这也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二）主题词在各个专题分布分析

主题词按专题的分布情况（有些专题本身即是主题词，如纪实作品、史料等），实质上反映了各个抗战专题的研究现状。考察主题词在各个专题的分布，可了解各专题内重点问题的研究状况。

① 由于不少主题词只出现一次，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统计意义不大，所以该表只统计了出现两次或以上的主题词。

表 5　主题词按专题分布①

专题	主题词
抗战时期的军事政治	东北抗日联军(43)、新四军(35)、飞虎队(19)、中国共产党(19)、抗战时期战役战斗(18)、八路军(17)、滇缅印战场(15)、正面战场(10)、日伪政权(8)、国共关系(7)、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华南抗日游击队(7)、国民革命军(7)、驼峰航线(7)
抗战纪实作品	纪实作品(121)、报告文学(79)、抗战图志(31)、通俗读物(12)、抗战画史(7)、普及读物(5)、电视节目(2)、电视纪录片(2)、画传(2)、少年读物(2)
日军侵华罪行与中国抗战损失	损失调查(89)、日军罪行(65)、南京大屠杀(24)、军国主义(18)、劳工(11)、侵华日军(11)、细菌战(4)、重庆大轰炸(4)、慰安妇(4)、经济掠夺(3)、殖民教育(3)、大陆政策(3)、万人坑(3)
各地区各民族抗战	台湾(26)、桂林(14)、山西(14)、河北(8)、湖南(8)、山东(8)、广西(7)、云南(7)、重庆(7)、保定(6)、广东(6)、北京(6)、华北(6)、四川(6)
抗战史料	史料(103)、回忆录(32)、文史资料(22)、口述史(11)、抗战史迹(11)、通讯集(9)、抗战纪念馆(8)、档案文献(5)、摄影集(5)、日记(4)
抗日根据地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6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30)、山东抗日根据地(12)、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1)、华中抗日根据地(8)、浙东抗日根据地(5)、冀鲁豫抗日根据地(3)、华南抗日根据地(3)、淮北抗日根据地(3)、鄂豫皖抗日根据地(3)、苏浙抗日根据地(3)
抗战总体研究	纪念文集(42)、抗战通史(31)、论文集(18)、反法西斯战争(11)、东京审判(6)、大事记(5)、战俘遣返(5)、综述(4)、战俘改造(4)、审判(4)
抗战相关人物	华侨(16)、抗战将领(12)、女性(8)、蒋介石(6)、知识分子(6)、抗战英烈(6)、国际友人(5)、陈纳德(4)、国民党将领(4)、抗战老兵(3)、毛泽东(3)、史迪威(3)
抗战时期的文化	抗战文艺研究(22)、抗战文化(22)、新闻事业史(12)、抗战精神(11)、抗日军政大学(11)、民族精神(3)、教育(3)、漫画(2)、报纸(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
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	中美关系(31)、中苏关系(4)、中外关系(4)、中日关系(4)、朝鲜流亡政府(2)、对日政策(2)、大韩民国(2)、外交(2)
抗战时期的社会经济	法制史(7)、战时社会(7)、抗日救亡运动(4)、司法制度(4)、社会生活(4)、经济史(3)、农村(3)、减租减息(2)、经济动员(2)、大饥荒(2)、货币史(2)、战时经济(2)、社会经济(2)、社会变迁(2)

从表 5 可以看出，近十年抗战专题性研究更加全面深入细微。“抗战时期的军事政治”专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是绝对的研究重点，比如东北抗联、新四军、八路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有关国民党作战的研究也比较全面，如正面战场、滇缅印战场、国民革命军。其他的重点主题还有国共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伪政权、中美军事合作（包括飞虎队和驼峰航线）。“日军侵华罪行与中国抗战损失”专题中，抗损调查是最受学者关注的主题。针对日军侵华罪行的研究也比较深入，主题广泛，如南京大屠杀、劳工问题、细菌战、重庆大轰炸、“慰安妇”问题、经济掠夺、殖民教育等。日本军国主义和大陆政策也是重要主题。“抗战史料”专题中，大量新史料得以发掘，诸如回忆录、口述史、档案文献、日记等，充实了抗战研究的基础。“抗日根据地”专题中，有关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成果最多。“抗战总体研究”专题中，需要注意的是大批抗战通史的出版和关于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涉及战后问题的主题也比较多，如战争审判、战俘遣返、战俘改造等。“抗战相关人物”专题中，“华侨”、“知识分子”、“女性”、“国际友人”、“抗战老兵”等群体的研究更加成熟，学者们不仅仅将目光聚焦在抗战将领身上，也开始关注抗战时期的小人物。“抗战时期的文化”专题中，抗战文艺、抗战精神、战时新闻事业和抗日军政大学是研究重点。“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专题中，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最为成熟，中苏关系和中日关系次之，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外交研究则相对较少。“抗战时期的社会经济”专题中，各个主题比较平均，涉及战时的社会变迁、司法制度、经济政策等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出现了很多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交叉更为紧密的主题，如货币史、司法制度等，这表明跨学科研究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

① 本表只统计了出现两次或以上的主题词，主题词后面括号内数字代表其出现频次。

（三）年度主题词变化分析

主题词按年份的分布情况，实际反映了抗日战争领域的研究趋势。分别对每一年出版的抗战著作的主题词进行统计，得到频次排名前 10 名的年度主题词。比较分析每一年的年度主题词变化，可以了解到近十年抗战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趋势。

表 6　主题词按年份分布①

年份	年度主题词
2005	纪实作品(40)、报告文学(38)、史料(38)、日军罪行(33)、纪念文集(23)、抗战图志(18)、东北抗日联军(14)、新四军(10)、八路军(10)、中美关系(10)、南京大屠杀(10)
2006	纪念文集(11)、纪实作品(8)、报告文学(7)、史料(6)、日军罪行(5)、抗战通史(5)、新四军(5)、陕甘宁抗日根据地(4)、文史资料(4)、回忆录(3)、滇缅印战场(3)、中国共产党(3)、新闻事业史(3)、抗战精神(3)
2007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9)、史料(8)、日军罪行(7)、纪实作品(5)、报告文学(5)、南京大屠杀(5)、抗战通史(4)、新四军(3)、回忆录(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3)、滇缅印战场(3)
2008	史料(5)、日军罪行(5)、纪实作品(4)、陕甘宁抗日根据地(4)、新四军(4)、军国主义(4)、东北抗日联军(3)、台湾(3)、报告文学(2)、损失调查(2)、回忆录(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战时社会(2)、伪满洲国(2)
2009	报告文学(8)、纪实作品(6)、史料(5)、论文集(5)、陕甘宁抗日根据地(4)、东北抗日联军(4)、新四军(4)、华侨(4)、抗战时期战役战斗(4)
2010	损失调查(47)、史料(13)、报告文学(7)、纪实作品(5)、回忆录(5)、日军罪行(5)、台湾(5)、陕甘宁抗日根据地(4)、东北抗日联军(3)、抗战通史(3)、新四军(3)、反法西斯战争(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3)、华中抗日根据地(3)、军国主义(3)、北京(3)
2011	损失调查(18)、纪实作品(15)、东北抗日联军(8)、陕甘宁抗日根据地(6)、史料(5)、回忆录(4)、抗战文化(3)、中美关系(3)、飞虎队(3)、南京大屠杀(3)、报告文学(3)、抗战通史(3)、中国共产党(3)、日军罪行(3)、通俗读物(3)、太行山(3)
2012	纪实作品(17)、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1)、陕甘宁抗日根据地(9)、史料(8)、抗战文化(6)、抗战图志(6)、中美关系(5)、抗战文艺研究(4)、东北抗日联军(4)、飞虎队(4)
2013	纪实作品(12)、陕甘宁抗日根据地(9)、史料(7)、抗战文艺研究(7)、中美关系(6)、新四军(4)、国民革命军(4)、损失调查(3)、东北抗日联军(3)、台湾(3)、桂林(3)、口述史(3)、飞虎队(3)、国民党将领(3)
2014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13)、损失调查(13)、纪实作品(9)、史料(8)、报告文学(6)、通讯集(6)、抗日军政大学(5)、日军罪行(3)、抗战通史(3)、抗战图志(3)、正面战场(3)
2005—2014	纪实作品(121)、史料(103)、损失调查(89)、报告文学(79)、日军罪行(65)、陕甘宁抗日根据地(65)、东北抗日联军(43)、纪念文集(42)、新四军(35)、回忆录(32)

有 22 个主题词入选年度主题词 2 次以上，当属近十年抗战研究领域的学术热点。它们依次是：纪实作品、史料、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报告文学、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日军罪行、损失调查、回忆录、抗战通史、中美关系、飞虎队、台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南京大屠杀、抗战图志、滇缅印战场、中国共产党、纪念文集、抗战文艺研究、抗战文化、军国主义。

表 7　各主题词入选年度主题词次数

序号	主题词	入选年度主题词次数
1	纪实作品	10
2	史料	10
3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9
4	报告文学	8
5	新四军	7

① 有不少主题词并列第 10 名，本表均统计在列，主题词后面括号内数字代表其出现频次。

续表

序号	主题词	入选年度主题词次数
6	东北抗日联军	7
7	日军罪行	7
8	损失调查	5
9	回忆录	5
10	抗战通史	5
11	中美关系	4
12	飞虎队	3
13	台湾	3
14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3
15	南京大屠杀	3
16	抗战图志	3
17	滇缅印战场	2
18	中国共产党	2
18	纪念文集	2
20	抗战文艺研究	2
21	抗战文化	2
22	军国主义	2

具体而言，“纪实作品”10 次入选年度主题词、“报告文学”8 次入选，这表明纪实类抗战作品受到作者和读者的持续青睐，经久不衰。“东北抗日联军”和“新四军”7 次入选，“中国共产党”2 次入选，说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始终受到研究者的重点关注。“飞虎队”和“中美关系”在 2011 年至 2013 年连续 3 年入选年度主题词，说明中美军事合作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损失调查”5 次入选，而且近五年就有 4 次，这表明抗损调查近几年被学者重视，相关研究一直在深入。“日军罪行”7 次入选，“南京大屠杀”3 次入选，“军国主义”2 次入选，说明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研究始终被中国学者铭记。“史料”每年都入选年度主题词，“回忆录”5 次入选，这反映出新史料的挖掘在抗战领域是热点问题，从未冷却。“陕甘宁抗日根据地”9 次入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3 次入选，表明有关抗日根据地的专题研究一直在向前推进。“抗战通史”5 次入选，其中包括 2014 年，这反映出通史类著作的大量出版是近年来的趋势。“台湾”3 次入选，“滇缅印战场”2 次入选，“抗战文艺研究”和“抗战文化”2 次入选，表明台湾地区抗战史、滇缅印战场的军事作战、抗战时期的文化也都是近年来的焦点问题。

三、代表性抗战著作分析

通过主题词统计分析某一时段的学术现状和趋势，更多的是一种大层面上的学术纵览，优点是重点突出，一目了然；不足是重全局，少细节。为了对近十年的抗战著作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笔者按专题考察了近十年出版的代表性抗战著作，并对其学术观点加以综述分析。可以看出，近十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抗战通史著作，既吸收概况了以前的研究成果，又有新的理论创新。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运用，专题性研究也更加深入细致，例如战争战役问题研究，经济问题，伪政权研究，根据地研究等领域。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近十年的著作更加注重细节和实证研究，而且跨学科交叉研究日益增多，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被引入。

（一）抗战通史和抗战史料

近十年来，一批优秀的抗日战争通史著作陆续出版。其中，最具权威性也引起极大反响的抗战通史，当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军事科学院主持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 2011 年）[①]。该书以抗日战争的历史渊源和历史进程为主线，采取分阶段和按专题相结合的方法展开叙述，在广泛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重点、难点和前沿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作了新的理论概括。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2005 年修订版）（解放军出版社 2005 年）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的。原书作为全国“七五”社科研究规划和全军“八五”科研计划重点课题，是反映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学术研究水平的代表作。该书的特色，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有较充分的论述，尤其是把解放区战场的开辟、发展和反攻部分写得较好，且有新意。2005 年的修订版在汲取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发掘的历史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原书中若干史实、表述、体例规范和校印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纠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持编纂的《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2011 年）是大陆中华民国史研究数十年来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其中，《中华民国史》第 7 卷至 10 卷是抗日战争史内容；《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 6 卷至 10 卷编排了 1931 年至 1945 年间的历史大事；《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 1 卷至 8 卷选取民国年间各领域代表人物近千人，不少人物与抗战相关。该丛书建立了较完整的民国史研究系统。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年）共计 10 卷，其中，第 8 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中涉及局部抗战时期的历史，第 9 卷“抗日战争（1937—1945）”则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以日本战败投降为终点，记述了全面抗战时期的历史。该书重视新史料，不仅采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珍藏资料，还利用了以往很少公布的中央档案馆资料，台北“国史馆”资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资料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资料、哥伦比亚大学珍本资料与前苏联解密档案等珍贵史料，对一些过去因史料缺失未能弄清的史实进行了澄清，对一些传统观点进行了完善或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见解。

近十年来，大量新的抗战史料被整理出版，充实了抗日战争研究领域的基础，尤以南京大屠杀和侵华日军暴行史料最为突出。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2005—2011 年）耗时 10 年，分 3 批出版，长达 78 卷（包括特辑 6 卷），总计约 4000 万字，囊括了来自日本军官日记、美国传教士日记和书信、东京审判记录、外国媒体报道和德国使馆报告、幸存者回忆等多方面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加拿大学者卜正民编《南京大屠杀史料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收录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四份重要英文材料译文。上海市档案馆编辑《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以上海档案馆馆藏日本方面及伪上海市政府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等机构档案为主，选编了日军在华中推行经济统制政策的史料。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主编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是一部大型档案文献资料工具书。该丛书共 10 卷，第 1、2 两卷为综合卷，主题是“损失调查”和“战犯供述”，第 3 卷至 10 卷为专题卷，主题分别是“大屠杀”“无人区”“细菌战”“毒气战”“集中营”“奴役劳工”“性暴力”“文化侵略”。苏智良、陈丽菲、姚霏合著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根据战时日伪档案、日本人在华文献和书籍、日军老兵回忆、战时报刊资料、中国受害者和证人证词等史料，再现了当年日军在占领上海期间所设立的近 150 处慰安所的情况。庄严主编的《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根据吉林省档案馆新发掘整理的日本侵华档案编写，收录了 89 件日军遗留的侵华档案，内容涵盖侵华日军强征“慰安妇”、向 731 部队“特别移送”人员、残酷奴役劳

① 文中出现的著作，其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均在行文中以括号形式标注，不再另用注释形式标明。以下同。

工、对中国军民实施种种暴行等内容。

除了日军暴行的相关史料，其他专题性史料也推陈出新。东京审判文献丛刊编委会所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年）为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内容包括法庭成立、立证准备、检方立证、辩方立证、检方反驳立证、辩方再反驳立证、检方最终论告、辩方最终辩论、检方回答、法庭判决的全过程。《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2003—2013 年）共计 82 册，是由台北“国史馆”秦孝仪、许卓修等人辑录函电、公告、讲词并摘抄蒋介石的日记，仿照传统史书体例编成的大事年谱。《事略稿本》以记录政治、军事为主，其中第 12 卷至 62 卷涉及到抗日战争，是研究抗战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重要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东北抗日联军相关史料，共分为 3 册：《东北抗日联军 · 文献》《东北抗日联军 · 综述　表册》《东北抗日联军 · 大事记　回忆史料　参考资料》（白山出版社 2011 年）。以往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资料虽然数量不少，但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综合性。而这套史料是有关东北抗日联军史料出版方面的最新成果，具有很高权威性。

（二）有关抗战的专题研究

近十年出版的抗战著作中，专题研究占据了大多数，涉及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和中外关系等方面。

1. 政治和军事

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共 5 卷，其中第 4 卷“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历史。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记述了抗战初期长江局的历史，考察了其发展演进的来龙去脉。徐彬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以政治动员为框架，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及其统一战线旗帜领导下的大众群体、社会精英和各党派的政治动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同时对国共两党的政治动员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从发动者、手段、内容和效果四个维度，将政治动员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突破了传统划分方式的限制。岳思平主编《八路军》（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是在 1995 年出版的《八路军抗战史》基础上，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对许多重大史实进行考订修正，编著而成的一部八路军史。张少鲲、郝雪廷编著的《八路军序列沿革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是研究八路军组织史料的著作，填补了八路军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空白。该书以八路军总部、各战略区、各直属机构为主线，记述了从 1937 年 8 月至 1947 年 10 月期间八路军的组织序列沿革和体制编制变化情况。

关于国民党政府及正面战场。丁平著《抗战时期绥远省政与在绥西施治历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年）考察了抗战期间绥远省政府在绥西的施政历史与施政方针，阐释了绥远省政府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下，围绕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对绥西进行恢复和重建，最终使绥西在国统区内形成独特格局的历史过程。余戈著《1944：松山战役笔记》（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和《1944：腾冲之围》（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分别研究了 1944 年发生在滇西战场上的松山战役和腾冲战役。作者抛弃了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模式，以微观战史的方式，展现了松山战役和腾冲战役中中日双方真实攻防的全过程。两书以海峡两岸和日本、美国的各种战斗详报、地方史志、新闻通讯、战地电文以及亲历者的回忆等材料为基础，相互参证、详加辨析，以逐日甚至逐小时的密度，生动地描绘出当年残酷的战争图景。

关于国共关系。杨奎松著《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修订版）》（新星出版社 2013 年）搜集整理了国共两党在抗战前后十多年间谈判的草案、提案和谈话录，引证了各种涉及谈判的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等材料，解析了收编与改编、合并与跨党、新四军问题交涉、蒋毛会

面之流变、马歇尔调处的成与败、打亦谈来谈亦打、南京代表团的困境等一系列谈判的核心问题，再现了国共两党谈判的曲折过程。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 年间国共政争（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研究了 1944 年至 1946 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对这场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揭示了双方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内在逻辑。王晓荣著《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系统研究了察哈尔抗日的发生背景和演化过程，对参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各种军事政治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进行了细致分析。

关于伪政权。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是研究汪伪政权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将汪伪政权分为准备阶段、时局奠定时期、协力战争时期、参加战争时期四个阶段，具体剖析了汪伪政权的政治军事体制、地方政权体制和警政体制以及军队、特工的组建与活动。蔡德金著《历史的怪胎——汪伪国民政府始末》（团结出版社 2008 年）记述了汪伪国民政府从萌芽、发展、壮大到灭亡的历史过程。刘敬忠著《华北日伪政权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7 年）从政治、军警组织，到文化、金融机构等方面，对华北日伪政权进行了系统剖析。作者认为：近代中国存在多种政治派系及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是伪政权建立的政治前提；近代东西文化交流派生出的“崇洋媚外”思想和由之蜕变生成的卖国理论，是伪政权产生的思想前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下、君主的观念，而缺少对国家、民族的认知，因此，民众对外族统治缺乏全力抗争的潜意识，是伪政权存在的社会基础。郭贵儒、张同乐、封汉章著《华北伪政权史稿——从临时政府到华北政务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以华北伪政权的兴亡为主线，阐述该伪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勾勒出该伪政权的演变情况。张同乐著《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运用取自日伪档案中的翔实资料，一方面考察了华北日伪政权的政治体制、政权结构和政权运作；另一方面，探讨了华北汉奸群体的复杂派系。该书还利用档案资料对国共两党地下组织和华北沦陷区民众的抗日活动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

2. 经济和社会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状况。黄正林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 2006 年）以皖南事变为分界线，探讨了事变前后陕甘宁边区财政状况和经济政策的变化。作者认为：事变前边区的经济政策为“力争外援，休养民力”，事变后边区的经济政策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张玮著《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以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为对象，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减租减息政策对乡村社会经济的影响；并通过两个层面的实证性分析，再现了减租减息政策推进过程的艰难曲折性。作者认为：战争影响以及中共减租政策的实施使农村土地发生“均化”现象，农村社会阶层剧烈分化，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农化”走势；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减息政策暂时减缓了债户的高利贷重负，但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借债问题，以致出现了农民重新“呼唤”高利贷的现象。该书史料比较独特，尤其是利用了张闻天晋陕调查中有关兴县 14 村的原始调查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曹天生、黄爱军、钱和辉合著的《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6 年）从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制度、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新四军与皖南“工合”运动、争取海内外经济支援的斗争等七个方面入手，分析了新四军如何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过程及意义。

关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状况。张燕萍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年）从国民经济动员角度考察了经济对战争的支撑作用，探讨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如何通过国民经济动员将中国现有的经济力量和潜在的国防经济力量组织、动员起来，为取得战争胜利服务的过程。该书是首部对战时国民政府经济动员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谭刚著《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与西部经济开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系统研究战时大后方交通问题，下编全面分析大后方交通对战时西部地区经济的各种影响。该书引用数十个省级档案馆的原始

资料，从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角度探讨战时交通问题，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张守广著《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重庆出版社 2012 年）围绕重工业与轻工业、国营与民营、统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等问题，对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工业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对西南大后方工业兴起、繁荣和衰败的原因，以及大后方工业为抗战胜利所做贡献，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系统总结。

关于沦陷区的经济状况。郭蕴静、周启乾著《中日经济关系史》（昆仑出版社 2012 年）根据中日两国的古今文献记录，系统叙述了自上古迄今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既有对不同时期两国的历史背景、社会状况、施政得失、对外政策的评价，更有对相互流通商品的名称、数量的说明。全书依历史时期分为四编，其中第三编“1911—1945 年日本对华经济掠夺”中的大量篇幅涉及抗战时期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历史。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从华中沦陷区的金融业、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物资等方面，深入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华中沦陷区经济进行全面掠夺和统治的罪行，以及给华中沦陷区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恶果。戴建兵、王晓岚著《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记述了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推行“公债政策”，对中国人民进行疯狂经济掠夺的历史。作者认为：日本大量发行战时公债，不仅抽光了当时百姓生存之血，而且成为日后国民政府通货膨胀的起点，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潘健著《汪伪政权财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考察了汪伪政权财政收支状况“结余颇多—收支平衡—入不敷出—彻底崩溃”的变化历程，对汪伪政权财政的特点及其与日本侵略政策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了汪伪政权的傀儡实质。此外，该书对前人研究汪伪政权的学术回顾史写得相当详细，对不熟悉该领域的学者有很好的入门向导作用。解学诗著《满铁与华北经济（1935—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以 1935 年满铁进军华北为切入点，全面揭示日本以掠夺煤、铁、盐、棉四大资源为重点的经济兵站基地化政策，深刻揭示了日本侵华时期华北地区农工产业、交通运输和商贸金融所遭受的严重破坏。

关于战时社会。张根福著《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年）对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及其与西部开发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该书提出：抗战时期人口迁移的数量和规模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对中国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高素质的迁移人口是推动战时西部地区开发和文化变迁的决定性力量。张根福、岳钦韬著《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论述战前浙江社会及战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的变迁；下编则选择战时社会的 4 个侧面，即铁路运输、人口迁移、新闻传播、日汪清乡进行分析，阐述了它们对战时浙江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房列曙著《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7 年）是作者多年来研究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的成果，对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廉政、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以及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和社会生活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分析。陈国庆著《胶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 年）以减租减息运动为主线，分析运动前后胶东农村地权、阶级、经济关系的变迁，探究近代农村社会变革的一般性规律。王士花著《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分别从政治结构与农村基层权力组织、粮食生产与流通、棉花生产与流通、合作社、经济封锁、文化教育等方面，阐述了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统治政策和实施状况，展示了沦陷后华北农村社会样态的主要变化。岳谦厚著《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通过数据统计及量化分析，探析了山西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战争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应时性影响以及对战后社会发展的长效性影响等问题。

3. 文化和中外关系

关于抗战文艺。田福宁著《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对抗战时期中共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背景、历史进程、理论贡献、基本经验及当代启示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田亮著《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史学分为马

克思主义史学、禹贡学派史学、新考据学派史学、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战国策派史学 5 个流派，分别展开论述。该书既有对每个学派史学的总体梳理和比较，又有对主要代表人物史学思想的深入论述，并结合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背景，清晰地再现了抗战时期各派史学主张的异同和其在当时的价值和影响，以及那个特定时代历史学家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洪认清著《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6 年）探讨了延安学风和延安史学的特点、毛泽东与延安史学、延安根据地的史学理论和传统文化研究、延安学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等问题。于文善著《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考察了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机制与理论方法，总结反思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失误。朱猷武、王俊芳著《国统区的文化与文化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年）从国统区的文化与文化人角度入手，探讨抗战时期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为抗战事业作出的贡献。作者认为：抗战时期文化界的种种努力，实质上引导和促进了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形成。刘忠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分上下两编。上编从延安时期的社会结构与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的精神形态与左翼文学传统等方面，对《讲话》的产生语境进行描述和还原，考究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原因，分析苏联文艺政策与左翼文学传统对《讲话》的影响。下编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入手，阐释《讲话》的人民性、实践性等理论价值；并把《讲话》置于马克思主义、新文学、中国传统文化等多重维度中，考察其思想渊源、指导意义、传播接受和版本沿革等问题。

关于抗战时期的外交。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共 3 卷，其中第 2 卷考察了 1931 年至 1945 年的中华民国外交历史。该卷在重视大国外交研究的同时，还运用相当篇幅阐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朝鲜、越南、印度、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国的外交，这是以往抗战外交著作中很少涉及到的。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介绍了抗战时期中国政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联合苏联、争取德国中立、反对英美妥协与争取外援等内容。该书对战时中外关系的论述比较全面，尤其是中苏、中德关系部分，还用两章篇幅专门叙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薛衔天著《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分上中下三册，中册阐述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期间的中苏关系。该书突破了以往将中苏关系史割裂成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的研究模式，以中苏国家关系和两党关系这两条线索，对中苏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勾勒出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基本面貌。书中大量参考和引用俄罗斯原始档案和俄罗斯学者研究成果，并对一些当事者进行采访，史料基础非常扎实。彭敦文著《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其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考察了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依次探讨了国民政府面对日本侵华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有限抵抗政策、向国联申诉政策、对日交涉政策、对日交涉政策的调整和转变等内容，并揭示影响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内在和外在因素。胡德坤、彭敦文著《战时中国对日政策研究（1937—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考察了七七事变至抗战胜利期间中国对日政策的形成、演变全过程，总结战时中国对日政策的四大特点：抗战的对日政策；国共两党的战时对日政策；争取国际援助，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各国连手制日；坚持持久抗战。该书还探讨了中国对日政策对中日战争进程的影响，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

关于战时各国对华政策。陶文钊主编《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大量使用美国第一手档案资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从九一八事变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美国对华政策。李世安主编《战时英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阐述了二战时期英国对华政策，重点揭示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内容、制定过程及其对战后英国对华仲裁委的影响，反映了英国从牺牲中国、执行对日绥靖政策，到援华抗日，最后与中国结成盟国的对华政策的曲折变化过程。马振犊主编《战时德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重点考察了德国对华政策对中国反法西斯

战争的影响。该书认为：德国共和政府以及纳粹政权基于战略原料的贸易需求，对中国采取了比较友好的外交政策，围绕着德国军事顾问来华、原料和军备贸易以及经济建设等诸多方面，中德之间开展了实质性外交。二战全面爆发后，德国基于全球战略需要，逐渐弃华联日，而中国则最终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德中关系被迫决裂。

关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胡德坤、韩永利著《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从中国抗战对日本世界战略的巨大影响和牵制作用、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巨大打击和制约作用，中国战场对太平洋、北非、苏德、西欧和印缅战场的巨大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在推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中的作用等方面，突出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4. 日军侵华罪行和中国抗战损失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和大陆政策。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是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的成果之一。该书在中日朝韩四国学者共同交流合作的基础上编著而成，主要探讨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产生的源流、形成过程和体制结构等，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根源。雷国山著《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 2006 年）通过梳理“东亚新秩序论”的公开提出、内涵的演变、“大东亚共荣圈论”的登台、日本“东亚新秩序”的野心失败等过程，勾勒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对华决策的脉络。渠长根著《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新华出版社 2009 年）以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军界、政界和财经界等代表人物为核心，剖析他们的侵华思想理论，并探讨其侵华思想演变的轨迹。

关于日军侵华暴行。涉及到毒气战、细菌战、鸦片政策、“慰安妇”政策、掳日劳工、移民侵略等日军罪恶行径研究。步平著《毒气战——追寻恶魔的踪迹》（中华书局 2005 年）在深入调查、多方采访、广泛查阅大量档案的基础上，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秘密推行毒气战中大量鲜为人知的罪行。王宏斌著《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分 7 章记述、揭露了日本侵华毒品政策 50 年的全过程，涉及日本对台湾的毒品“渐禁”政策、日本对伪“满洲国”的鸦片统制、华中宏济善堂的贩毒活动，以及日本在华南地区的纵毒活动等内容。陈丽菲著《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中华书局 2006 年）考察了日本“慰安妇”制度产生的政治根源和社会基础，揭露了日本军队在侵略战争期间对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国策划实施“慰安妇”制度的滔天罪孽，并记述了中国“慰安妇”的生存实态和索赔现状。何天义主编《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鲁书社 2005 年）以被强掳到日本本土的 55 个公司、135 个作业场的 4 万劳工为研究对象，反映出战俘劳工在被俘被捕被抓被骗后，从捕俘地到集中营再到就劳地的苦难经历。丁晓强著《关于浙赣地区日军细菌战的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以大量受害者的口述经历和受灾事实等一手资料为基础，用日军细菌战造成当地各种病疫爆发的事实和数据，全面揭露了日军在浙赣地区的反人类卑鄙行径。王胜今著《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就日军对东北实施移民侵略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其实施，以及移民的形态、移民的管理机构、日本实行移民侵略的动机及其危害进行了系统分析。

关于抗损调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年）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的第一批成果。抗损课题调研是中共中央交办重大任务，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全国各地先后共计 60 万人参与，持续 10 年之久。目前该丛书已出版 5 种 46 册。其中，省卷共 12 册，包括北京、天津、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河南、安徽、湖北、广西、重庆、甘肃，分别反映各行政区域内日本侵略造成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共 12 册，集中选编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的死伤 800 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共 173 个。《国民政府档案中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选编》共 3 册，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原始档案汇编。《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共 5 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馆藏的关于该类专题的原始

档案汇编。《山东省百县（市、区）抗日战争时期死难者名录》共 14 册，收录了山东省 100 个县（市、区）抗战时期伤亡人员中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死难时间等信息比较完整的共 16 万名死难者的名录。

综上所述，通过对近十年出版的中文抗战著作进行了总体分析和具体介绍，可以看到，这些著作呈现出多视角、全主题覆盖的特点。相较于以往，近十年出版的中文抗战著作更注重细节和实证研究，对史料的运用更加充分。而且，多学科交叉的著作越来越多，这主要基于其他学科能够提供区别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更容易产生学术创新。总体来说，近十年抗战著作成果丰富，不少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期待下一个五年和十年，抗战著作出版能更上一层楼。

（作者吴涛、李颖，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图书馆干部、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副主任）

新视野　新见解　新史料
——《中国抗日战争热点难点透视》评介

李　鑫　都　斌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席军史专家和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主要专家、军事科学院原军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刘庭华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热点难点透视》一书，于2015年9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上海、太原书展上反映甚佳。

《中国抗日战争热点难点透视》一书共30余万字，分23个专题进行论述，涵盖了抗日战争史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如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有几条？中国抗战时间最长、伤亡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成果会在战后丢失一部分，谁之过？如何评介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历史定位？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皖南事变的历史教训？东北抗日联军的光辉业绩与严重受挫的原因？美国投掷原子弹、苏联出兵东北与日本投降的关系？东京审判的历史功绩与缺陷是什么？为什么战后70年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日趋泛滥？开罗宣言与钓鱼岛有何关系？南京大屠杀、日军侵华暴行等等，不一而足。上述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抗日战争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学者之间的笔墨“官司”一直时而不断。作者研究抗日战争史40余年，对抗战史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回避，不人云亦云，大胆提出独到见解，反映了作者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艰苦探索和基本看法，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

《中国抗日战争热点难点透视》一书最大的特点是以史带论，论从史出，论与据相应，对抗战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能从大历史观、战略层次上进行阐述，不拘泥于烦琐细事的考据，使读者很快能从作者的论述中寻找到高度提炼概括的思想观点或新见解。例如，《1871—1945：日本侵华战略方针的历史演变》，作者对近百年日本侵华方针分为九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用一、二个关键词就概括出来了。再如，《1871—2005：日本与台湾关系百年史论》一文，把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分为五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本质内容，作者用两句话即将其概括了，这实在是高屋建瓴的史家手笔。

最后，《中国抗日战争热点难点透视》一书根据内容需要，插入了不少珍贵的历史图片，使读者从历史老照片中感受历史的动态真实。在全书的“附录”中还附有23个有关抗战史的数字统计表，如七七事变前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比较表、国民党正面战场主要战役一览表、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生化武器杀害中国军民统计、中国抗战时期人口财产损失构成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人口损失统计，等等。无疑，这将从量的规定性上说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要国家的历史作用。

（作者李鑫、都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